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本书荣获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



# 法兰西遗嘱

[法] 安德烈·马奇诺 著

王殿忠 译

LE TESTAMENT  
FRANÇAIS



谢天振主编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 LE TESTAMENT FRANÇAIS



ISBN 7-5360-27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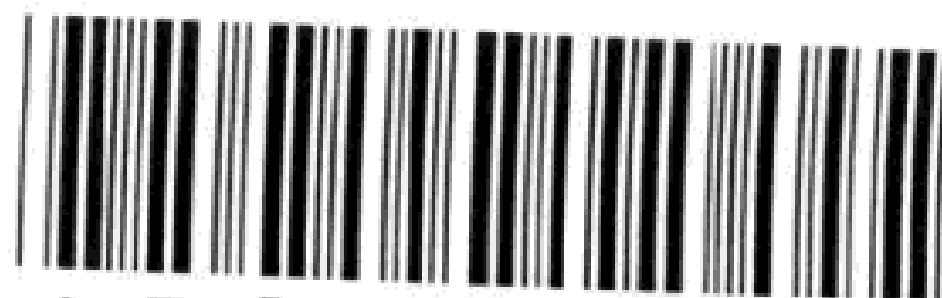


787536 027206 >

策划编辑：罗国林  
责任编辑：吴曼华 林青华  
技术编辑：赵 琪  
封面设计：苏家杰  
定 价：14.50 元

当代名家

丛



\* T 0 2 0 9 3 2 \*



[法] 安德烈·马奇诺著 王殿忠译

# 法兰西遗嘱

花城出版社

ANDREÏ MAKINE  
LE TESTAMENT  
FRANÇAIS

Publié avec l'aide  
du ministère chargé de la culture

ISBN 2—7152—1936—9

©Mercure de France, 1995

26, rue de Condé, 75006 PARIS

Imprimé en France

法兰西遗嘱

〔法〕安德烈·马奇诺 著

王殿忠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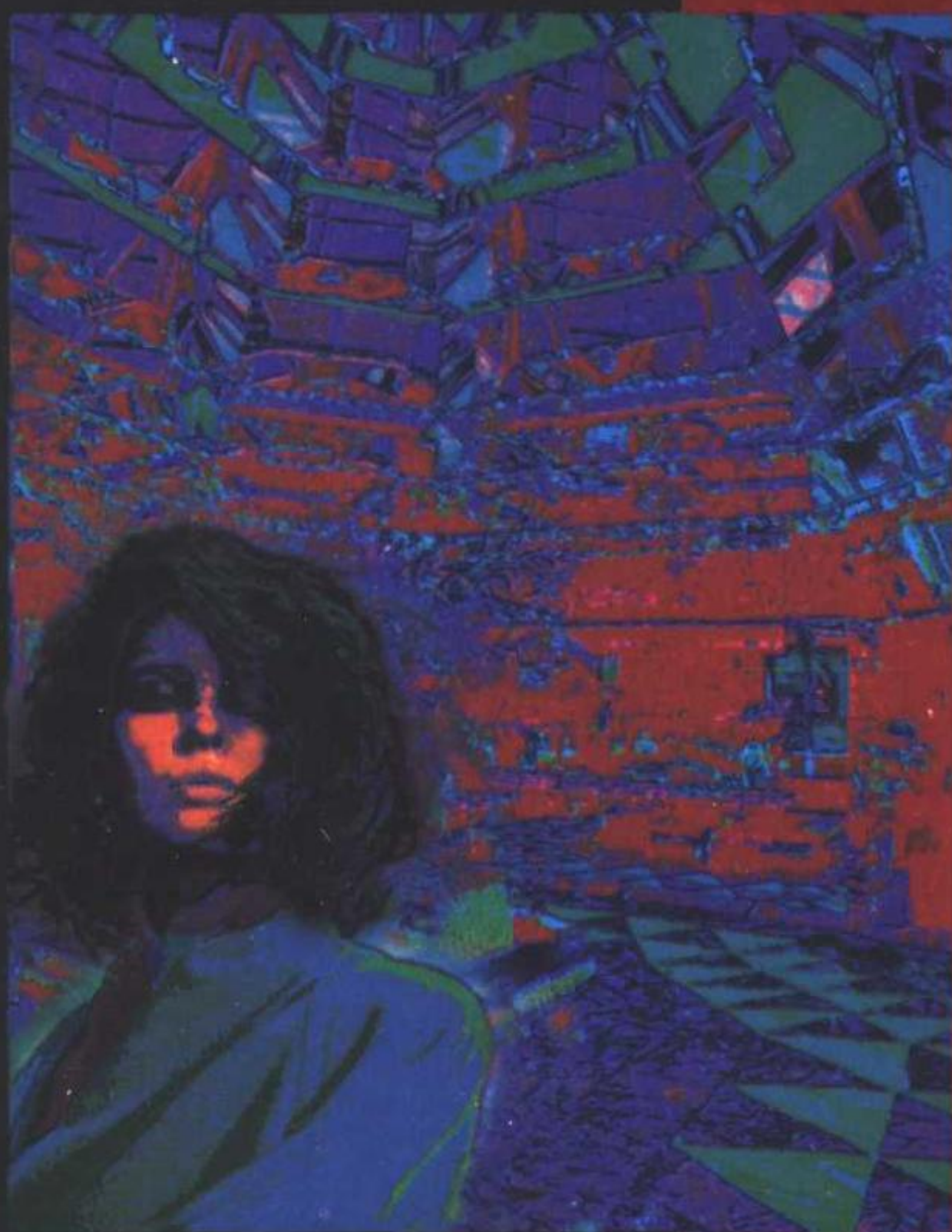
ISBN 7—5360—2720—6

I·2325 定价:14.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 内 容 提 要

作者以他少年时代的生活、思想片断为主要线索，追忆了包括他外曾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他自己四代人在俄罗斯、前苏联的生活经历与遭遇，因为他们是俄裔法国人，所以他们的命运际遇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内涵。专制、战争、贫穷像风一样，无处不在。他的外祖母夏洛特经历了沙皇时代，又在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活了下来，在她身上，烙着深刻的那个帝国最残酷时代的印记，但她也目睹了一幕幕壮丽的英雄史诗。作者深受外祖母的影响，是她在他的胸中嫁接了“法兰西的枝条”，来自西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成长以及将来的写作，形成了他极具个性的目光。

本书多采用跳跃式的思维、细腻的心理活动、意识流、时空穿插交错、倒叙、闪回、蒙太奇等描写手法，风格上有其异殊之处。



# 总 序

谢天振

在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我们向广大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奉献上一套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精品的崭新丛书——“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在读了中国明代的一部小说《好逑传》后突然感悟到：“我愈来愈深信，诗（Poesie，概言文学——引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所创造出来……民族文学在当今已没有很大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出力，加快这一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当时，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和抽象的憧憬的话，那么今天，对于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向世界敞开大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不能不深深感佩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英明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

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现代化，随着电脑网络的日益普及，人类确实已经置身于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了。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文学事件，无论是一位作家的获奖，还是一部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有关它的信息都可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球，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晓。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读者理所当然地希望更快、更好、更充分地享受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世界文学。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版权”、“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国内出版界曾片面热衷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重译，而忽略了对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从而一度造成了国内读书界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脱节。这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外文学的正常交流，对于渴望及时了解 and 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有鉴于此，在花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名家小说译丛”，其目的就是要从当代世界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撷取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组织优秀的译者把它们迅速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以满足人们渴望及时了解 and 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需要。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当代名家小说译丛”，首先是为了突出这套丛书的高品位特点：入选这套丛书的作品（或其作者）几乎都获得过各种各样的高级别的奖项，如本套丛书第一辑推出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的作者英国女作家朵丽丝·莱辛在当代世界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是1997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长篇小说《曼波之王的情歌》则获得过美国的普利策奖，扎雷金的《南美洲方式》获得过俄罗斯国家奖，《法兰西遗嘱》获得过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流浪的星星》则是罗诺多等多项奖获得者勒克雷齐奥的力作。其次是突出本套丛书的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的作品写作出版的时间，本套丛书选择译介的多是本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从时间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一是指的作品主题的时代性，即入选本套丛书的作品题材反映的都是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曼波之王的情歌》），对两性关系中女性价值的探究（《南美洲方式》），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肯定（《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等等，从而从作品的主题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

这里，我们要顺便提一下的是，在注重“高品位”和“时代性”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入选作品的可读性，相反，我们对作品的可读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因为我们觉得，名家作品即名著不一定要走曲高和寡、脱离大众读者趣味的道路。较强的可读性，富有回味，经得起反复阅读，能赢得广大读者的接受并能为他们所珍藏，这同样是“名著”的应有之义。其实，如所周知，古典文学名著中能传之后世并为世代读者所广泛传阅者，哪一本不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呢？因此，我们选入这套丛书的作品，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它们在其本国和国外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和《南美洲方式》所述故事与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异曲同工，但它们对中年人的感情危机的表现却更为深刻，对中年人爱情的探索和两性关系的剖析更富哲理，所以问世后不断再版，后者还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在国外出

版，极受读者欢迎，《曼波之王的情歌》和《美衾梦寻》出版后又被搬上银幕，以其委婉动人的情节和优美感人的艺术形象博得好评如潮，《法兰西遗嘱》读起来催人泪下……

最后，愿我们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能陪伴读者度过他美好的阅读时光！



## 译者前言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一位同事把译稿拿去，我译出一部分，她便看一部分。待译到三分之二时，她对我说，从前她看小说，为主人公的命运叹息者有之，为故事情节的哀怨而情不自禁地两眼湿润者有之，但这一次她却哭了，真的哭了，那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流。这也同我在翻译过程中的体会差不多，有的地方我是含着泪水在翻译的。

故事是讲夏洛特的一生，但她却始终没有在书中正式出面，她的一切，都是通过她外孙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讲出来。她是位俄裔法国人，一生主要的时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作者向我们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和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景色，以及俄国的风土人情，使我们读了如身临其境。这本小说涉猎面极广，上至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俄国沙皇及皇后，下至庶民百姓，监狱的犯人，俄国士兵，法国议员，笔触所及尚有文学评论，对作品的评价，对翻译的看法等等。

这同作者的出身不无关系，作者安德烈·马奇诺，出生在俄国，自80年代后期便定居在法国，因此，他对俄国和法国的情况都相当熟悉。定居法国后自1990年起已连续发表了四部小说，都是描写俄国的，如：《一个苏联英雄的女儿》

(1990),《一位失势领导者的忏悔》(1992),《阿穆尔河时代》(1994)。本篇《法兰西遗嘱》出版于1995年,同时获法国龚古尔奖和梅迪希思奖两个奖项。

当然,催人泪下的作品,不一定在文学上就是上乘之作,因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自有其特殊的标准。我也不想对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文字作何种评价。因为读者看后自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在这里,我想就两个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姑且作为第一个翻译这篇作品的读者,谈谈自己的读后感。

第一,作者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很值得一提,虽然本篇写来语言流畅,文字清新,但他似乎不太赞成文词的华丽,比如他在书中借主人公的口就说过:“……也不必看某一篇文章中词藻使用得如何华丽,而在于那件事情的本身具有较深刻的内涵,同时又比较自然而不造作。也就是说,在感知上,能使人感到一种极强烈的和谐性,它一旦在诗中表现出来,便可成为不朽之作。……”作者在本篇中,极力追求的,也就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较深刻的内涵”,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自然而不造作”。作者通过“我”的叙述,各种事件、各个人物的命运接踵而来,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惊人的言语,但却清新流畅,真实感人,虽是发生在西伯利亚或是巴黎,但那情感,那世态并不使我们感到陌生,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吧。

第二,本篇小说在写法上有许多特点,这里不想多说,只谈两点体会。一般地说,作者在本书中不是以文取胜,可以看得出,他是想以情动人。力求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都具有“较深刻的内涵”。本书可以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作者笔下的那个“我”,从孩提时起,便向我们叙述他那个家族的故事,直到成年,直到来到法国定居后出了书,都是那么心平



气和，那么沉静自如地娓娓道来，从身边琐事谈起，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渐入佳境。从这里还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人生经验颇丰的作家，在催人泪下的故事中，看不出“我”有何激动，有何激烈，有时甚至还以较轻松的口气把血淋淋的事实揭示在你眼前，倘无大本领，倘没有极端冷静的心态是办不到的。这是一。这部小说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所谓“意识流”的写法。首先，作者常常打破时、空的界限，往往那个“我”正坐在西伯利亚外祖母家小楼的阳台上，却一下子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野战医院里，西伯利亚草原上正刮着热风，却见到巴黎的洪水已淹没了楼房，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时空跳跃幅度非常之大。每当你看到外祖母家那个小小的凉台，在西伯利亚晚间吹来的热风中飘然而起，冉冉上升时，作者的思想便开始在太空遨游了。有些地方写来似幻似真，显得有些“虚无飘渺”，但却绝不使人感到陌生。其次，作者常以假想的笔法写真实，写“我”参加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欢迎沙皇的庆典，本来是“我”在想象中的事，因为“我”不可能身临其境，但却写得有根有据，并有当时的报纸为佐证。原来很实在的东西，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但“我”却说，那是他做的一个梦。在这些方面，很使人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的感觉。

但我们的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用了“虚无飘渺”，甚至一些比较恍惚的字眼，便觉得这部小说有些“虚幻”了。那绝然不是的，我这样说，只不过谈谈自己的感想，顺便提醒读者，本书在诸多特色中，还有这么一个特点，从而使读者读起来方便一点儿而已。

是为前言。

王殿忠

1997.10 于南京

为玛丽亚娜·维隆和海尔贝特·洛特曼，  
为罗拉和梯埃里·德·索塔朗贝  
为让·克里斯托夫

而写

“……对于那些可能为着同一事业而奋斗的其他人，当时无法道出他们的姓名，但却正是依仗着他们，法兰西才得以生存下来，现在，我怀着一种童稚的欢快，一种深厚的情怀，在这里把他们的姓名一一写出。……”

马赛尔·普鲁斯特：《再现往昔岁月》<sup>①</sup>

“西伯利亚人能要求老天长橄榄树吗？普罗旺斯人能要求老天长酸果蔓吗？”

约瑟夫·德·麦斯特勒：<sup>②</sup>《圣·彼得堡的夜晚》

“我曾向俄国作家问过他们的工作方法，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讲着一口纯正的法语，竟不愿动手翻译自己的作品。那原因是，顾虑进度迟缓，因为他们自认自己的思维是敏捷的。

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法兰西学院及它出的字典，会使他们变得僵化。”

阿尔封斯·都德：《巴黎三十年》

---

① 《再现往昔岁月》，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第七部，即最后一部小说。坊间译为《重现的时光》。

② 约瑟夫·德·麦斯特勒（1753—1821）：法国作家，哲学家。



# 第一章



还在孩提时代，我便曾猜度，女性们那种十分奇特的微笑，对她们每个人来说，都可能代表着一件使人无从捉摸的小小胜利。不错，那是对失望了的希望，对男人的粗暴，对在这个世界上，真善美事物的难得一见而进行的一次短暂的报复。那时，如果我能够，便会把这种微笑的方式称为“女性的特征”，……但那时我的语言是太过单纯了，竟不能表达。于是便只能在我的相集里仔细端详每一位女性的脸庞，以期在这些脸庞上能发现一些有着这些女性美的迹象。

因为她们都知道，为保持自己的形象美，必须在闪光灯的光线没把她们照得眼花缭乱之前的几秒钟内，发出下面这几个很少有人洞悉其奥妙的、不可思议的法文音节：“petite - pomme”<sup>①</sup>。这时候，那张嘴巴会神奇地形成很动人的圆形，而不会像在祝福时，由于故作天真活泼而把嘴巴拉得很长，也不会像故作笑容时，弄得满脸是皱纹。而发这几个音节时，会使整个面孔保持着一种俏丽状态，双眉会略呈弯月状，那张椭圆形的脸蛋也便显得长了些。这就是“petite pomme”的妙用。而那种遥远的、梦幻般的甜美的阴影，也便如轻纱般罩住了人们的目光，使得照片上人物的面部轮廓更见其优美。从而，由

---

<sup>①</sup> “petite pomme”：法文，意为“小苹果”，因为“pomme”的元音是圆唇音，发音时口型呈圆形。

于光照作用，那种因年久日深而产生的朦胧情调便笼罩了整个画面。

摄影术的这种神奇魅力赢得了绝对众多女性的信赖。例如这位同俄国有着亲缘关系的女性，也便出现在我们的相册中，而且是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她嫁给了一位外交官，在讲话时，几乎不张嘴巴，甚至在尚未听您讲话之前，便已厌烦得唉声叹气。然而在照片上，我却也立即发现了“petite pomme”的效应。

在这位平淡无奇的外省人的面庞上，我也看出了摄影的光晕。还看见了有那么一位不便指名的姑母辈的女人时，对这种女人，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的男人被屠杀后，谈起那些一直未婚的女人时，才能把她的名字讲出来。即使是那位名叫格拉莎的家庭农妇，在我们所保留的她有限的几张照片中，也显示出她这种妙不可言的微笑。最后，还有那么一大批年轻的姊妹们，一个个也都鼓起双唇，以便在照相的几秒钟时间内试图把这种法兰西的神奇魅力保留下来。她们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petite pomme”，一边相信，她们未来的生活将只能由这一瞬间优美的表情所造就……

这种呈现在面前的各种目光和各种面孔的大检阅，渐渐地便被一位五官端正、面貌清秀、有着一双灰色大眼睛的女性所代替。在这些年代久远的相册中，首先可以看出她还很年轻，她的微笑充满了“petite pomme”的内在魅力。其次，从年代上讲，这些相册愈往下翻便愈见其新，而且距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愈见其近了，所以那种笼罩着画面的忧伤的、朴素的情调也便渐渐地淡化。

就是这位女性，这位法兰西女性，她踟躅在俄国冰封万里的大地上，这片大地，它教会人们使用的语言，可以使女性更



美丽。她便是我的外祖母……她在本世纪初诞生于法国的一个诺贝尔和阿尔贝蒂娜·勒莫尼埃家族，那“petite pomme”的奥秘，可能就是使我们的童年感到神奇的第一个故事。而且如果用母亲开玩笑时常说的话来形容，它也是用“你外祖母的语言”讲的那些故事中的一个。

一天，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可能从未见过的照片……当时我正在外祖母家度假，她住的那座城市便坐落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其时正处于战后萧条时期。那是一个漫长的炎炎夏日，时近暮色苍茫的黄昏，街道房屋都沐浴在淡紫色的夕阳中，我在一个敞开的窗户下仔细翻看着那些照片，这种近乎虚幻的光线就照在相册上，这些也是我们相册中年代最久的照片，其中的画面已是无法记忆的 1917 年革命之前的镜头，重现了沙皇时代的景象。更有甚者，这些照片透过那个时代十分坚实的铁幕，时而把我带到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时而把我带到一座花园的林荫路上，那里的花草树木组成的各种似乎伸手可及的几何图案，使我瞠目结舌。我便深深地沉浸在我们家族古老的历史之中……

突然，我看到了那张照片！

它装在相册最后一页和封底之间夹着的一个大信封里，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便打开信封见到了它。这实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天意，使人们觉得这些照片不配同其它照片一起摆在卡通纸的相册中，上面的景象已无法辨认，人物的面孔也已失去了鲜明的形象或纪念意义，这种天意实则是使人们有朝一日打开它时，会想到要把它们分拣一遍，以确认照片上所有这些苦难灵魂所遭受的命运……

我正是在这些陌生人的面孔中和被人遗忘的景色里见到了

她。这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其服饰打扮，明白无误地把她同在其他照片上的人区别开来了。只见她身穿一件肥大而肮脏的灰色棉上衣，头戴一顶男式带护耳的棉帽，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婴儿，外面裹着一方毛毯。

“这些男人都是身穿燕尾服，女人们则都是浓妆艳抹，”我惊讶地想，“她何以竟能置身于这些人们之间呢？”随后，我又在其他照片上看到，她又出现在那雄伟的林荫大道上，出现在那庄严建筑物的廊柱间，以及地中海岸的风景区。她在这些地区出现，实在是不合时尚，不符潮流，而且不可理解。在这个已逝的家族成员中，她一直是个外来者，尤其是她的服装，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冬天，在公路上扫雪的女人才做那样的打扮……

我没有听到外祖母进来的声音，她悄悄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吓了一跳，随即便把照片指给她看，并问道：

“这个女人，她是谁？”

这时外祖母平时十分镇定的眼中有一丝惊恐一闪而过，只听她以一种几乎是漫不经心的口气，用一个问题来回答我说道：

“什么女人？”

但我们俩却不约而同地竖起了耳朵，谁也不说话了，只听到屋子里发出了一种奇怪的、轻微的沙沙声。外祖母转过身去，似乎非常高兴地喊了起来：

“一只大蛾子！快看，一只大蛾子！”

我回头一看，果然看到一只棕色大蝴蝶，是一种只在黄昏时出现的那种大蛾子，正在不停地抖动着，只见它趴在那个欺骗了它的穿衣镜上，正使劲地往镜子里蹿。我伸开手便一下子向它扑去，并把它按在手心里，它那毛茸茸的翅膀使手心里有

些发痒……同时我也感觉到，这只蝴蝶之大，非比一般。我凑近一看，便不禁喊了起来：

“是两个，它们是联在一起的！”

一点儿不错，这两只蝴蝶似乎紧紧地互相联接着。而且它们的躯体也似非常兴奋地在强烈地抖动。使我惊奇的是，这一对大蛾子好像对我毫不在意，一点儿逃跑的意思也没有。在抓住它们之前，我已看见了它们背上有白点，头也长得挺漂亮。

我们已顾不上谈那个穿棉上衣的女人了……我把这对蛾子放开，用眼睛看着它们飞翔，——在空中，它们忽然一分为二了，于是我便懂得了，当然，在当时年仅十岁的一个孩子，所知还是不多的，但我已懂得了它们联接在一起的原因。外祖母之所以显得有点儿惊奇，对我来说，也就不足怪了。

把那一对正在交配的大蛾子捕获，给我思想上带来了我童年中两个非常遥远也是最神秘的记忆。第一个，是在我八岁那年，它可以用我外祖母经常叨念，或者说经常哼唱的一首歌曲的几句歌词来说明，那时她有时坐在阳台上，低着头缝补着一件衣裳的领子或者重新加固一下上面的扣子。那首歌的最后几句歌词曾使我深深地陶醉——

……就在那儿，我们要一直睡到天荒地老。

这一对恋人睡在那里，竟是那么长时间，实在是已超出了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范围。当时我已经懂得，人如果死了，就会永远睡不醒了（正如他们曾对我讲过的我们邻家的那位老妇人一样，她在一个冬天里便一睡不起了）。难道它们也像歌谣里这一对恋人一样？那时，在我幼小的头脑里，爱情和死亡便

形成了一种互相混杂的奇特概念。而那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的哀伤之美，更加强了我这种混乱的想法。爱情，死亡，美，……这夜色朦胧的天空，这呼啸的风声，这大草原上的气息，再加上这动听的歌谣，竟使我觉得，我的生命在这一瞬间才刚刚开始。

第二个记忆，已说不清具体的时日，因为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由于这一记忆的模糊不清，其中甚至已没有了一个准确的“我”的概念。正是由于对光线有着强烈的感应，对花草的芬芳非常敏感，以致当那金光灿灿的阳光，穿过蔚蓝的天空，投射到大地上，在许多年之后，我还把这些灿烂的霞光称作圣母的金发。但这种影像又是不可捉摸和含糊不清的，因之对我也就更见其珍贵了。因为我竟相信，这些景像，是一种对我出世之前的模糊的回忆。是的，那是我的法兰西的长辈向我发出的一种声音的回声。在外祖母的讲述中，我就能找到所有这些记忆的成分：她游历普罗旺斯时那秋日的阳光，薰衣草草原的芳香，甚至那圣母的金发也似依稀在带着香味的空气中飘洒着。但我却从来不敢把我这种幼稚的感觉向她提起。

那是在下一年的一个普通的夏日，有一天，我姐姐和我，我们看到外祖母正在垂泪……那还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的情形。

她在我们眼中，一直是一个公正、宽厚的女神，从不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心上，她实在是一个从容平静的完美典型。她个人的历史，很久以来便已成为一个神秘的传说，这样，便把她置于世间庸人的烦恼之外了。是的，此前我们从未见她流过一滴泪水，见到的，只是在她脸上有时掠过轻微的痉挛，嘴角上闪过一丝痛苦的抽搐，眼睫在迅速地开合而已……



我们坐在地毯上，上面扔满了揉皱的碎纸片，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一种引人入胜的游戏：把一些用白色油光纸包裹着的一块块小石头取出来，然后一个个地比较，一会儿拿出一块光亮的石英石，一会儿又是一块用手摸上去十分圆润光滑的卵石。在包石头的纸上，我们分别给每块石头都标出我们给起的名字，由于无知，我们就随使用一些难懂的名词当作这些矿石的名称，诸如费岗、拉罗歇尔、巴约纳等等。我们甚至还在一个油光纸的包内发现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黑铁片，我们认为把这样一块奇怪的金属叫“维尔顿”比较好……在这些收藏物中，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打开了许多小包。当外祖母走进屋时，我们正玩得起劲，而且已玩了那么一段时间了。对那些漂亮的石块，我们就互相抢夺，为了检验一下它们的坚硬程度，就把它拿起来互相敲打，有时候把两块都敲碎。有一些在我们眼里很难看的，例如像“维尔顿”那样的，我们就从窗户里扔出去，扔到外面的大丽菊的花圃里。还有一些油光纸已被撕坏了……

外祖母进来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这撕满白纸团的战场，我们便抬起头来。这时才发现，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泪水——这泪光，恰似向我们发出的难以招架的光芒。

不，我们的外祖母她绝非是一个冷若冰霜、无动于衷的女神，她也同别人一样，常常为苦恼所困扰，因不幸而伤心。在我们心目中，在日常平静的日子里，她前进的脚步是那么稳重。然而，却也有时偶见步履踉跄，几欲黯然泪下的情景！

就是自这年夏天起，外祖母的生活向我展示出一些新的、出人意料的变化，这些变化特别带有个人色彩。

从前，她的历史，可以用某些吉祥物、用某些家族中值得

纪念的物事来概括，比如那一把细纱扇面，它可以使我想起槭树上那细嫩的树叶，又比如那个著名的“小新桥皮包”<sup>①</sup>等。根据我们听到的故事，那个小皮包是夏洛特·勒莫尼埃在上述那座新桥上拾到的，当时她年仅四岁，正在她妈妈前边跑着，突然停了下来并且喊到：“一个皮包！”时至今日，已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俄罗斯广袤无际的大地上，在这座偏远的城市里，她那响亮的声音依然在大草原的阳光下回荡。这个小皮包是用猎皮做成，开口处镶有蓝色珐琅瓷小板，外祖母就用这个小皮包收藏着那些石块。

这个年代久远的旧皮包，它标志着外祖母最早的回忆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她记忆中那个神奇世界的发源地，如巴黎，新桥等等。也是正在孕育着的一个令人惊异的星系，它勾勒出了摆在我们迷惑的目光前尚属朦胧状态的那些物事的轮廓。

在这些往昔岁月的遗物中，我还记得我们曾怀着喜悦的心情摩挲着那些粉红色的、光滑平整的烫金切口的图书，有《一个卷毛狗的回忆录》、《傻大姐格里布依的故事》……还有一件年代更为久远的见证物，那就是这张照片，它是在西伯利亚时照的，上面有阿尔贝蒂娜、诺贝尔，在他们面前便是夏洛特，只见她坐在一张类似小圆桌的一个一看便知是假的高脚支撑物上，这种道具在照相馆里非常普通，她当时还是个两岁的孩子，头戴一顶镶着花边的软帽，身穿一件极短的连衣裙，这张照片贴在相册的一页厚卡通纸上，上面写有摄影师的姓名。还有一些带有人头像的纪念章，我们看了觉得非常惊讶：“这位面孔透着纯真、精明，头上的发髻如丝一般光滑的漂亮太太和

---

<sup>①</sup> 新桥：巴黎最古老的桥梁之一，始建于1578年，建成于1607年。

那个白胡须老人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个老人唇上的胡须分成两撇，僵硬地向外伸着，如同海象的两只大牙。”

我们当时已经晓得，这个老头是我们的曾外祖父，比阿尔贝蒂娜大二十六岁。“就好像和他的亲生女儿结婚一样！”姐姐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认为他们这种结合是一种凑合，极不正常。在学校读书时，读过的所有文章中都经常谈到过这种婚姻，即一个穷得没有嫁妆的年轻姑娘，嫁给一个富家翁，这个老头有钱、吝啬，且喜欢年轻女子。我们觉得，在有产者社会里，任何一种婚姻关系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努力想从诺贝尔那张脸后，能发现某种邪恶的迹象，某种没有掩饰好的心满意足的伪装。但是，他那张面孔却表现得像我们读过的儒尔·凡尔纳<sup>①</sup>小说的插图上那些勇敢的探险家一样，既纯朴又坦率。

这位长着长长的白胡须的老头，在年方四十八岁时，便寿终正寝了。

至于阿尔贝蒂娜，那个所谓的资产阶级风俗的牺牲者，便跟着跑到刚刚扔进几锹新土、还很松滑的墓穴口上，不顾大家强行拉着她，下死力挣扎着要往下跳，那喊声直可撕心裂肺，以致使得西伯利亚这个偏远城市中那些到这座墓地送葬的俄国人听到都十分震惊。这些人，在他们的祖国，已经习惯于听到送葬行列中那种悲惨的尖叫，习惯于看到亲人们泪飞如雨，习惯于那种凄绝的哀嚎，然而在这个如此哀恸欲绝的法兰西年轻美女面前，一个个也都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她站在墓穴边上激动异常，一边用响亮的话语喊道：“把我也扔下去！把我也扔下去！”

---

<sup>①</sup> 儒尔·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幻小说家，著有《海底两万里》等。



这似一曲悲歌，它在我们童年的耳朵边回荡着。

“这也许……也许她爱他……”一天姐姐这样对我说，她比我大，说罢脸就红了。

然而，还有比诺贝尔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结合更加奇特的，那就是夏洛特，她在这张摄于本世纪初的照片上出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她那光光的十个脚趾，或者是出于偶然的单纯恶作剧，或者出于并非故意卖俏，她竟把它们强行向脚掌上弯去，这一不引人注目的细节被摄入镜头，十个指头弯得一模一样，那可能就绝非一般了。由于我尚不能完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只有以一种梦幻般的声音在心中反复说道：“这个小姑娘在这个 1905 年的 7 月 22 日，在西伯利亚的腹地，而且又是在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夏季的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她竟会坐在那张滑稽的独脚小圆桌上。是的，这个法兰西小姑娘是在这一天庆祝她两岁的周日。这个小孩的眼睛看着摄影师，在不经意间，把她那小得出奇的脚趾向下弯去，这一切，她便使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那个夏日的这一天，并领略着那里的气候，那天的天气，那里的色彩……”

我闭上了双眼，这种孩提时代的一切神秘景象，使我头晕目眩。

这个孩子就是……就是我们的外祖母。是的，正是她，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她蹲在地上一声不响的那位女性。我姐姐和我既羞愧又惶恐，便背靠着墙慢慢地站了起来，既不敢轻声说一句请求原谅的话，也不敢帮她去收拾散落在地上的那些吉祥物。我们猜测，在她那双低垂的眼睛里，大约正满含着泪水……

就在我们玩那个亵渎圣物游戏的晚上，我们所面对的，已不是从前那个仁慈宽厚的女神，已不是那个向我们讲述在寂静

的森林里出现蓝胡子怪物和美丽仙女的那个人了，而是一个尽管在精神力量的控制下，仍然变得很激动，而且是受到伤害的女性。此时此刻，对她来说是忧伤的，流露出成年人的心情，使人看到了她的弱点，她感到自己在孩子们那双专注的眼睛里恰如一位一丝不挂的国王。他使人想到一位走钢丝的演员，刚刚迈错了一步，接下来的几步也都失去了平衡，他只能在观众的众目睽睽下，站住不前，而且被这一料想不到的局面弄得局促不安……

她把那个“小新桥皮包”合上，并把它拿回自己的房间，然后便呼唤我们吃饭。在饭桌上，一阵沉寂过后，她开始以一种无所谓平静语调同我们谈起来，她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以其惯用的手势用法语对我们说道：

“在你们刚才扔掉的石块中，有一个我非常希望能够再找回来……”

她便这样，始终以这种平淡的语调，用法语向我们讲述起来，尽管平时在饭桌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讲俄语（因为在吃饭时，经常有些朋友或邻居们不期而至）。她向我们讲述俄国那支伟大的军队分列式的情景，也讲了那块被我们称之为“维尔顿”的棕色小铁片的故事。我们也仅只能够抓住她讲述的这些内容的大意而已——因为她说话的那种口气控制了我们。我们的外祖母同我们谈话，如同和成年人谈话一样！我们似乎仅能在想象中看到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漂亮军官，离开了他正在游行的队伍，来到一位挤在热情的人群中的漂亮女性面前，并且交给她一块棕色的小金属片……

晚饭后，我便拿着一支手电筒来到我们房前的大丽花圃，仔仔细细地寻找了一番，但却一无所获，那块“维尔顿”并不在那儿。然而在第二天早晨，我却发现了它，原来它被扔在一

条人行道上，只见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混在烟头和酒瓶的碎玻璃中间，上面还沾满了砂子。它在我的眼中，已经就像一块陨石刚刚从一个陌生的星系上飞落一样，摆脱了原先的那个共同体，然而却几乎被人把它和其它的铺路石子相混同……

就这样，我们便悟出了何以外祖母眼中会满含泪水，也体会到了存在于她心的深处的那个遥远的法兰西式的爱，这种爱，曾经超过了对外祖父费奥多尔的爱。是的，就是那个伟大军队里的一位矫健的军官，就是那个人，他把那块名叫“维尔顿”的粗糙的锈铁，放在了夏洛特的手心里。这一发现，使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感到一个秘密已把我们同外祖母联接在一起，而这个秘密，又可能是家庭里其它成员所从未接触过。在我们家庭中，这些故事和它们发生的日期的后面，我们已看明白了，从现在起，生活将以它令人痛苦的那种美丽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晚上，我们到外祖母房间的那个小阳台上找她。这个小阳台布满了鲜花，似乎飘浮在大草原炽热的薄雾上面。一个炎热的古铜色的太阳，已触及远方的地平线，它犹豫不决地踟蹰了一会儿之后，便很快地沉没下去。乍现的几颗疏星，正在天际微微地抖动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浓烈香气，随着傍晚的微风向我们的阳台上扑来。

大家彼此都不说话。外祖母还像白天一样，在缝补着一件放在她膝上的女式衬衣。当天色完全变成石青色时，她才抬起头来，放下手中的活计，只见她的目光远望，似已融进了大草原上遥远的薄雾中。我们生怕打扰了她的宁静，只有不时地向她偷偷看上一眼：莫非说她要向我们倾诉另一番心曲，比前一个更加秘密？还是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把她那盏装饰着青绿色灯罩的台灯拿出来，给我们读几页都德的或是凡尔纳的小

说？因为在这夏日漫长的晚上，这些小说里的故事经常伴随着我们。由于她没有向我们表露出一丝迹象，于是我们便十分注意地听她开始要说些什么，注意她说话的语调。在我们的关注中——这恰是观众对一个走钢丝的演员的关注——夹杂着一份相当严峻的好奇和一种隐约的不安。当时我们的印象是，在这个唯一面对我们的女性面前布下了一个陷阱。

然而，她却似没有见到我们紧张的神情一样。她的双手依然一动不动地放在双膝上，她的目光融进了透明的天空，只见一丝微笑，照亮了她的嘴角……

渐渐地，我们便摆脱了这种沉寂，我们俯伏在阳台的栏杆上，睁大了眼睛，使劲地望着天空。这时我们觉得阳台在轻轻地摇动，在我们的脚下下沉，随后便开始飘荡起来。而遥远的天际也在向我们靠近，有如我们穿过这清凉的夜风向它靠去。

只有站在地平线之上，才能看清那一片银白的闪光，那可能是一条河流泛起的微波发出的闪光。我们从不相信神灵，我们努力观察着展现在我们飘荡着的阳台前的这难以理解的一切。是的，在大草原的深处，一片暗青色的大水闪着青光正在上涨，正在把暴雨形成的寒冷的气流散布开来。它泛着一种灰暗、阴冷的光亮，那片大水的面积似乎在逐渐扩展开来。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清，在这惊人的潮涌中露出了一团团的黑物，那是楼房的屋顶，还有大教堂的拱顶，路灯的高杆——这分明是一座城市！然而，尽管大水淹没了它的街道，一座宏伟的、和谐而神奇的城市又显露在我们眼前……

突然，我们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有人正在同我们谈话，而且已经谈了那么一会儿了。那是外祖母在向我们讲述！

“当时我大约和你们几乎一般大，那是 1910 年的冬季，塞纳河变成了一片名符其实的大海。巴黎市民在市内划船。每条



大街便是一条河流，而每个广场就形成一个大的湖泊，但使我惊奇的是，一切都那么沉静……”

在我们的阳台上，似乎都已听到大水中的巴黎那种沉睡般的宁静，当一条小船划过时，水面便发出几声拍拍的浪声，而在洪水下林荫大道的那一头，却传来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唤。

我们外祖母的法兰西，正如一位一身水气的阿特朗蒂德<sup>①</sup>从洪波中走了出来。

---

<sup>①</sup> 阿特朗蒂德：希腊神话中能顶住天的巨神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这里把她们变成一个人。

## 二

“甚至连总统也不得不以冷餐度日了！”

这是响彻我们这个法兰西——阿特朗蒂德首都的第一个声音。于是在我们想象中便出现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在他的面部，同时融进了我们曾外祖父诺贝尔高贵的仪表和斯大林的那种法老般的庄严——这个长着白胡须的老者正在一张桌子旁边，上面一支蜡烛发着凄惨的光。

上面那条消息就是这位四十岁左右的人发出来的。此人在外祖母最老的那本相册的照片上，看起来目光炯炯有神，面容果断。在大水中，他把一条小船泊近一个建筑物的墙边，在上面竖起一张梯子，然后，登上去爬进二楼的一个窗户里。此人就是万桑，是夏洛特的舅舅，《爱科赛肖尔报》<sup>①</sup>的记者。自洪水一开始，他便这样穿梭于首都的每条大街，以搜集当天的重要消息。共和国总统吃冷餐的消息便是其中之一。就是在万桑的那条小船上，还拍了一张使人惊讶的照片，我们仔细打量着这张在已经发黄的报纸上剪下的照片，只见上面有三个男人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小艇上正在漫街没屋的洪水中穿行，下面有一段说明文字写道：“议员先生们正前往国民议会”云云……

万桑越过窗栏，一下子便跳到他姐姐阿尔贝蒂娜和夏洛特的怀抱中，她们在巴黎逗留的期间，就躲在他家里……而阿特

---

<sup>①</sup> 《爱科赛肖尔报》：巴黎的一家报纸。

朗蒂德，直到那时一直在沉默着，这时也开了口，她激动万分，话语不绝。每天晚上，外祖母讲的故事，都能向我们提供已被光阴的流逝所埋没的这个世界中几个新的片断。

再就是我们发现的那份秘密财宝，就是那只装满旧报纸的大箱子。那是我们在夏洛特房间里那张大床下玩耍时发现的，它那鼓鼓囊囊的样子使我们感到讨厌，于是便打开锁，拆开包，竟是一大堆废纸！大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无端的烦恼和一本正经的忧愁，就像久久封闭的房间发出的霉味或是尘土味一般，使我们窒息……难道我们仅仅能够这样猜想，即外祖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找出那三个议员在船上的照片，才翻捡这一堆旧报纸和那些标着不可思议的日期的信件吗？

……这种对新闻报导体速写文字的爱好的，是万桑感染给夏洛特的，而且把这些反映现实生活一瞬间的文字从报纸上剪下来，也是得到他的怂恿才这样做的。随着时光的推移，他可能会想到，这些东西，其价值倒似乎存在于另一方面，正如那些银币，其价值倒是在于它已蒙上时代的色彩一样。

就在这微风不断送来草原芬芳的夏日夜晚，一天，在我们的阳台下突然传来一个过路人的声音，把我们从追寻往日的梦幻中惊醒。只听此人说道：

“不，我敢同你发誓，他们在电台上广播了，说他已经出来，并走向太空了！”

这时又听到一个愈走愈远的人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傻瓜了？‘他已经出来……’那儿可是太高了，没有任何可以使他出来的办法，那就像没有降落伞要从飞机上向下跳一样……”

这一争论把我们拉到现实中来。包围着我们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它怀有一腔强烈的自豪感，一心想探索我们头顶上这片无边无际的天空。这个帝国，凭借的是它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凭借的是它那些原子破冰船，便能硬生生地深入到北极的腹地；凭借的是它那些工厂，不久它便可生产出比世界其它各国都多的钢铁；凭借的是它那无限伸展的麦田，它的小麦似波浪般从里海直到太平洋……凭借的是这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

然而在我们的阳台上，却正有一位法兰西女性向我们娓娓地讲述着一只小船正穿行在被洪水吞没的城市，停靠在一座大楼的墙边上……我们极力想使自己清醒起来，以搞清楚我们身在何处，是这里？还是那边？我们的耳际，那洪水的微波悄悄的撞击声正在消失。

不，我们有这种双重感觉已非一次。在外祖母身边生活这件事本身，已经使人有一种身在异地的感觉了。她穿过居民区外出时，从来不去“巴布什卡”<sup>①</sup>们的凳子上去坐一坐。而如果俄国的居民区没有这种凳子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却绝不妨碍她同她们非常友好地打招呼，也不妨碍她向别人打听她几天没见的人是否身体不适。她甚至还可以向有点嗜酸的人推荐一个缓解办法，比如多吃点咸乳菇等。但她向她们讲这些友好的话时，始终是站在那里，附近的那些老太太们对这种不同的习惯也予以谅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夏洛特并非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巴布什卡”。

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她同外界隔绝，也不意味着她对社会持

---

<sup>①</sup> “巴布什卡”：俄语“老奶奶”、“老妇人”的音译。



有某种偏见。在清晨很早的时候，我们有时就被回荡在院子里的一个响亮的喊声从睡梦中惊醒：

“来取奶喽！”

在睡意朦胧中我们也能听出，这是阿芙多蒂亚的声音，特别是那语调，别人是学不来的。她是从邻村来送牛奶的。于是主妇们便拿着装奶的铁罐出来，纷纷走向两个铝制的硕大奶桶周围，这是那位年已五十岁左右的健壮农妇背来，给一家家送奶用的。一天，我被她的呼唤叫醒，便再也无法入睡……这时我便听到我家的门被轻轻打开的声音，接着便是两个人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到了我们的饭厅里。过了一会儿，便听到有一个舒服又懒散的声音说道：

“啊，舒拉，你家可真好！我现在就好像睡在天上的云里一样……”

这些话使我感到很奇怪，便向那道幔布后面看了一眼。因为我们的房间是被这道幔布隔开的。只见阿芙多蒂亚，两只胳膊和两条腿都叉开，双眼似睁似闭地就那样躺在地板上。她整个身子都懒洋洋地处于一种极度放松状态，伸着两只沾满泥土的光脚，连头发都披散在地上。一个漫不经心的微笑，给她那半开半合的双唇平添了几分色彩。

“舒拉，你家可真好！”只听她又小声重复着说，一边这样叫着外祖母的爱称，在平时，这里的人都习惯叫爱称，不习惯叫别人全名。

我猜想，躺在餐厅里的这个高大的女性，身躯大概是很疲劳了。我了解，阿芙多蒂亚除了在外祖母家里外，倘在别处，她绝不会让自己摆出这么一副懒散状态。因为她知道，在这儿她既不会因此被慢待，也不会因此被议论……随后她便继续背着那些大奶桶，弯腰驼背地到处送奶，这个工作实在非常辛

苦。当她把桶里的奶全部送完时，只觉得双腿疲软、两臂沉重，便又来到“舒拉”的家，在这里，地板总是清洁、光滑，而且始终保持着清晨时分非常宜人的凉爽。只见阿芙多蒂亚走进门来，同外祖母打过招呼，便脱下她那双大鞋子，又走到老地方躺了下来，“舒拉”递给她一杯水，然后便在她身旁一个小凳子上坐下。两个人便轻声私语起来，直到阿芙多蒂亚又恢复了体力，能够上路为止……

就在这一天，我听到外祖母同那位精疲力竭的送奶女谈的一些话，这些话从前可能已被她忘却了。两位女性回忆起先前的田间劳动，如何收割荞麦等等。夏洛特谈起那些农村生活，而且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我听着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是她的俄语，讲得总是那么纯正，那么精到，同阿芙多蒂亚讲的那种粗犷、有力，而且形象化的俄语绝无不调和之处。她们的谈话也自然涉及到战争这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这位送奶女的丈夫在前线战死了。她们还谈到地里的收获、荞麦、斯大林格勒等等。我想，到晚间她又会向我们讲洪水中的巴黎，或者给我们读几段埃克道尔·马洛<sup>①</sup>的小说吧！我似乎已感知到了一个遥远而黑暗的过去（不过这一次是俄国的过去）正在她往昔的生活深处苏醒了。

阿芙多蒂亚站了起来，吻了吻外祖母，便开始往回走。在这个大草原上，头顶上是一颗草原的太阳，她乘的那驾四轮马车在广阔无边的田野上前行，不久便淹没在长得高大的野草的海洋中……这一次，因为她走出了房间，我便看见她伸出那农村妇女粗大的手掌，带着小心又犹豫的神态去摸我们房门旁边五斗橱上那尊非常精致的小雕像。那是一位女神，其身躯被弯

---

① 埃克道尔·马洛（1830—1907）：法国作家。其代表作有《无家可归》等。

弯曲曲的枝条所缠绕，显得湿润光滑，这是本世纪初一件罕见的精品，竟奇迹般地被保留到现在……

出现这种情况是相当奇怪的，多亏了当地一个名叫加夫利里奇的酒鬼，我们才能弄明白包括外祖母在内，大家都持有疑问的这个不好懂的现象。这个使大家都害怕的男人出现时，似乎是附近那些垂柳后边的一个晃晃悠悠蹒跚而行的影子。这个人，他可以不怕军警的阻拦，在主要大街上走着“Z”字步，从而使得交通难行。这个人，他可以无视官方当局的权威，同他们大吵大闹。当他大喊大叫，咆哮如雷地讲粗话时，把门窗的玻璃都震得直颤，并把那些“巴布什卡”们从一排排的长凳上给吓走。然而，就是这同一个加夫种里奇，他迎面碰上了外祖母，却尽量压制住满嘴里呼出的伏特加酒气，停下来以十分尊敬的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夏洛塔·诺贝尔托芙娜，您好！”

是的，当时在附近就是他一个人，便这样以略带俄语化的方式唤她的法语名字。更有甚者，也不知他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方法把夏洛特父亲的名字也给记住了，竟把它改成一个颇带俄国情调的“诺贝尔托芙娜”，——当然，这在他嘴里以这种方式讲出来，那是表示极端礼貌和殷勤。他原本模糊的目光，也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他那高大摇摆的身躯，也一下子又找回了相当的平衡，他那个脑袋在不断地不听使唤地摆动着，一边强行把他那浸透了酒精的话语像表演杂技一般响亮地说了出来：

“您好吗，夏洛塔·诺贝尔托芙娜？”

外祖母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他，甚至还同这个加夫利里奇谈了几句不无规劝含义的话。这时周围便呈现出一个古怪的场面：“巴布什卡”们被这个醉汉的登场给吓跑了，都躲到我们

这栋房子对面那个大木屋子的台阶上去，孩子们则都跑到树后边藏了起来，隔着窗户还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又好奇又害怕的面孔。在这中间，则是我的外祖母同一个非常驯服的加夫利里奇谈话。再说，此人也并非是个混人，他早已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已然越过了一个酗酒者所应做和公众舆论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也感觉到自己维护这一带的精神安宁有着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加夫利里奇于是便变成了一位闻人，一位怪人，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成为大家无法逆料的，古怪命运的一个代言人。在俄国人的心目中，那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却突然之间遇上了这位法兰西妇女，她那双灰色眼睛里发着镇定的光，虽然衣裙朴素，但人却非常高雅，身材修长，与同年女性相比，同刚才他吓走的那些“巴布什卡”们比，差别甚大。

有一天，他想同夏洛特说点除了简单的“您好！”之外的什么事，便一边用他粗大的手掌挡着口，不断地轻声咳着，一边低声嘟囔着说：

“夏洛塔·诺贝尔托芙娜，您怎么就这样，一个人住在我们这个大草原上……”

正是这句笨拙的话，才使我能够想象（这种想象，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外祖母在我们不在她身边时，是怎样在冬天里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的。

在莫斯科或是在列宁格勒，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又不一样了。在大城市里，人们五方杂处，这就抹杀了夏洛特同他人的差别。但她却依然又来到这个小城沙朗札，在这里打发那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日子是个理想的地方。这里的生活，过去和现在一样，今天有如昨天。

小城沙朗札，它深入大草原的腹地，面向无边无际的荒



原。街道弯曲，尘土飞扬，并且一直向一面小山丘上延伸，一片片青翠的果园掩映着木制的篱笆墙，这里的太阳整天都是睡意朦胧，构成了此地的一景。这里的行人，你看到他们在大街的一头出现了，但却走起来没完没了，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

外祖母的住处，位于城市的边缘，被称做“西方的林中广场”的那块地方。这种巧合（西方——欧洲——法兰西）使我们非常开心。这幢四层楼房建筑于本世纪的前十年，依据当地一位行政长官雄心勃勃的计划，还要开辟一条林荫大道，而且还要修建得具有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不错，这幢四层的建筑，就是本世纪之初这种风格留下的一个作品。可以说，这种注重曲线、讲究外形、避免平直的建筑风格，其起源来自欧洲，它像一条小溪，待它流淌到俄罗斯腹地时，其气势不但大大地削弱，而且其特色有一半也已被抹杀。在大草原加水带雾的大风卷裹下，这一条小溪，流淌到此地，便凝固了，便形成了建筑物上加了那些怪模怪样的椭圆形牛眼窗，入口处被装饰性的玫瑰藤所攀绕……然而那位高明的行政长官的计划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资产阶级各种具有颓废倾向的艺术遭到了灭顶之灾。于是我们这幢楼房（它只在那个想象中的林荫大道上占据很小的一块地盘）便成了这类建筑的唯一一幢。再说，经过多次维修，这幢房子现在也仅只留下了它原先建筑风格的一个轮廓而已。特别是官方开展的“清扫资产阶级建筑残余”运动（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都是见证人），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似乎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残余”，于是工人们便把玫瑰藤连根拔掉，大肆谴责那种牛眼窗……又由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那么一些人表现得非常积极（也正是因了他们，这场运动才取得了成功），楼下的一位邻居，曾花大力气把墙上那个最明

显的“残余”给铲除。那是两个长着漂亮小胡子的头像，恰在外祖母凉台下边的两侧，他们似在带点哀愁地相对微笑着。要想把它们铲掉，就必须拿出点勇气和冒险精神，因为那要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大钢钎，站在窗台上干。那两个头像终于相继被从墙上铲下，一个个跌落在地，其中一个掉在人行道上摔了个粉碎，另一个落在旁边的大丽花丛中，从而得以保全下来。待到天黑，我便把它找出来拿到我们家去。自那以后，在整个炎炎夏日漫长的夜晚，这个石头人像便在凉台上的花盆中间带着憔悴的微笑，张着温柔的眼睛瞧着我们，似在和我们一起听夏洛特讲故事。

居民区的另一头，椴树和垂柳成荫，树丛中建造了一栋木结构的三层大楼，里边任何时候光线都很暗，因为那窗户太小，屋里不但阴暗而且使人生疑。这一栋房子，还有和它类似的一些建筑，按那位行政长官的意愿，是要把它们拆除，代之以光线宜人的现代式样。这个建筑物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其中居住着那些俄罗斯民间风味保持得最浓厚的“巴布什卡”们，你只要看看她们那厚厚的披肩，那使人害怕的灰白面色，那横放在膝上，几乎是灰色的，青筋毕露的双手，你会觉得她们似乎是直接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当我们有时走进这栋黑暗的房屋里时，便感到一股浓厚的怪味直刺我的喉咙，但却又不是那么使人不舒服，这种味道就滞留在她们堆满什物的走廊里。这便是那种古老的、阴暗的，也是非常原始的生活，人们便以这种生活方式，在这里迎接死亡，迎接生命，迎接爱情，也迎接苦痛。这里有着某种沉重的气氛，但却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勃勃生机，总之，只有这种气氛才适合于这栋大木屋的住户。这是俄罗斯的气息……来到房子内部，使我们吃惊的是，里面门

户特别多，而且又极不对称，在烟气朦胧的阴影中都藏有小房间，而每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我几乎用体能直接感到，这些杂居在这里的人们，其居住密度是极大的。加夫利里奇同另外三五人家共同住在一个地下室内。他房间的那扇狭小的窗户，在一个岬角上露出地面，一到春季，它便被地面上茂密的草丛给挡住。那些“巴布什卡”们坐在长凳上，距离那儿有几米远，不时地斜过眼睛心神不安地向那边看一眼——因为经常会在那些枝条后面开着的窗户中看到这个让“万人恨”的家伙的那张宽脸。他那个脑袋就像从地下长出来似的。但在他向外打量的时候，这个加夫利里奇，倒总是表现得非常安静。他把脸使劲向后仰着，好像打量着天上什么东西，又像注视着垂柳枝条间落日的余晖一般……有一天，我们来到这栋阴森黑暗的木楼的顶楼上，站在被太阳烤得发热的屋顶下，打开了天窗上那块沉重的活动木板，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大草原已被可怕的大火所覆盖，浓烟很快便把天上的太阳遮住……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小城沙朗札这个沉静的角落里，其成果归根到底只有一项改革。那就是改造了那个教堂，它坐落在本区的另一头，这个教堂的尖顶已被掀掉，当然，也把里面的圣像屏给撤掉，在原来的位置上装了一个方形的丝制白色大幕布——电影银幕，这个银幕是用从一家已经“堕落”的资产阶级的住宅里充公的窗帘做成的。于是便出现了一座名唤“街垒”的电影院，正准备迎接它的第一批顾客……

是的，外祖母是这样一位女性，她能够镇定自若地同加夫利里奇谈话，她反对一切运动，曾经有一天，她一边同我们使着眼色，一边同我们讲这家电影院，她说：“那家被砍了头的教堂……”而且我们也亲眼看到，在那个又矮又圆的建筑物上（对此，从前我们是一无所知的）立起了一个又细又长的金色

葱形圆顶和一个十字架。

除了服饰和相貌外，她向我们显示着她与众不同的正是这些细小特征。提到讲法语，我们都认为倒不如说，那是我们家庭特有的方言土语。当然，每个家庭，都有其惯用的口头语言，都有其语言上的怪毛病，每个成员也差不多都有自己从不传出家门的浑号，甚至有自己心照不宣的“黑话”。

外祖母的形象便是由这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与众不同的所织就，——在某些人眼中，她又有些古怪，在另一些人眼中，她又有些荒诞。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竟能使她满眼泪水，以及我们家庭里的方言——法语，通过她魔术般的声音，竟能在滔滔的洪水中托起一座幻影般的城市，而后又缓慢地重新返回到生活中来。

就这样，夏洛特从一个并非源于俄国的黑暗中走出来的女性，就在那天晚上转化成一位被时光所埋没了的阿特朗蒂德的使者。



### 三

塞纳河上的纳伊<sup>①</sup>，仅由十几栋圆木筑成的房屋组成。那些由长条木板覆盖着的屋顶，由于冬季恶劣天气的摧蚀而变成银白色，那些镶着木框的窗户雕刻得非常漂亮，以及那木篱上晒晾的衣物，这一切都形成了真正的欧洲式的木屋景象。年轻的女子们抬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几只盛满水的木桶，让里面溢出的水滴润湿主要街道上的尘土，男人们则扛着装满小麦的沉重麻袋，放在四轮马车上，一群绵羊正在懒洋洋、慢吞吞地向羊圈里移动着。我们便听到一阵阵低沉的铃铛声，公鸡嘶哑的打鸣声，并感觉到了一种木柴燃烧时令人愉快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是烧晚饭的时候了。因为曾经有一天，外祖母已对我们讲过她这个故乡城市：

“啊！那个时候的纳伊，还只不过是一个简陋的村庄罢了……”

她讲这些时，用的是法语，而我们呢，我们了解的只有俄国的村庄，而俄国的村庄，那只是一串串木屋联接而成，除了树木便是森林。这自然会把两者弄混，尽管夏洛特在随后的讲述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只要我们一听到“纳伊”这个名字，我们头脑中马上便会出现房屋都是用树木做成的村庄，会看到羊群和公鸡。而待到第二年的夏天，夏洛特第一次向我们提到，

---

<sup>①</sup> 塞纳河上的纳伊：巴黎附近的一个地名。

有那么一位名叫马赛尔·普鲁斯特其人时，曾说：“有人看到他在纳伊的比诺大街上打网球”时，我们还想象着，那位有一双无精打采大眼睛的纨绔子弟（他曾把他的照片给我们看过）是处在木头房屋的包围之中呢！

俄国的现实情形，经常以一种模糊的形象在我们法语词中显现，即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我们头脑中构画出来的形象也逃不脱有点儿斯大林味儿。于是纳伊就只好住满了集体农庄的庄员。而巴黎呢，它正慢慢地在洪水后恢复元气，可它也充满了俄国情调——在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之后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恢复，在一场战事之后，在死亡的重压下得以逃生的欢乐，等等在我们的心目中无不带着这种情调。我们走在依然潮湿、残留着许多沙石和散落着许多盆盆罐罐的大街上，只见居民们正在各自的家门前堆放着家具和衣服，准备把它们晾干——这正像俄国人干的那样，俄国人在过了一个冬天之后，也这样做，他们似乎觉得自此再也没有冬天了。

随后，当巴黎在清凉的春风吹拂下重新变得容光焕发时，我们凭直觉也能感到出现了什么场面——一列豪华的列车，由扎满彩旗、花环的车头拖着，行经各个城门时便放慢了速度，然后便在拉诺拉车站的站台上停了下来。

一位年轻人从车厢里下来，只见他身穿一件朴素的军服，踏着脚下的大红地毯向前走着，在他身边，还有一位夫人，夫人也非常年轻，身穿白色长裙，肩披一条羽毛长围巾。又见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人，身穿大礼服，唇上蓄着特别体面的小胡子，胸上配着漂亮的蓝色缓带，此人走出站前列队欢迎的热情人群，迎上前去欢迎这一对夫妇。和风吹拂着装饰在廊柱上的兰花和鸡冠花，也舞动着那位年轻夫人白色天鹅绒大帽上的

羽毛。两位男子的手互相握了起来……

法兰西——阿特朗蒂德的主人，费利克斯·富尔总统，表示热情欢迎全体俄国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

这一对皇帝夫妇在共和国显贵们的簇拥下，引导着我们走过了巴黎……在若干年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这次庄严访问的确实时间：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那次到这儿来，并非在1910年春季的洪水之后，而是在1896年10月，也就是说，大大提前于我们法兰西——阿特朗蒂德的再生之日。但这一现实情况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十分重要，我们比较看重的，还是外祖母那种长长的叙述中的日期，比如：某一天，在某一传说中的某一时刻，巴黎出现了洪水，天上的太阳光芒万丈，就在同时，我们却听到了还在很远的地方就已传来的皇家专列的噪声。事件顺序的如此安排，我们认为同普鲁斯特在纳伊的农民中出现那件事，同样合情合理。

这座已然沉睡的城市，由于大草原上无边的寂静，似已把它与世隔绝了，而夏洛特这个狭窄的凉台，就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飘荡在大草原上馨香的微风中。每一个夜晚都像炼金术士的那个长颈瓶，往昔岁月使人惊异的蜕变，就在里面进行着。而这一魔法的诸种因素，对我们来说，其神秘性绝不比点金石更小。夏洛特打开一张旧报纸，把它拿到她那个有青绿色灯罩的台灯下，便给我们读着为欢迎俄国君主到达瑟堡时举行宴会上的菜谱：

## 汤

### 虾酱浓汤

蓬巴杜夫人<sup>①</sup> 小吃  
索泰尔纳<sup>②</sup> 白葡萄酒烧卢瓦尔<sup>③</sup> 鳟鱼  
牛肝菌炖海滨牧场羊脊肉  
路克鲁斯<sup>④</sup> 葡萄酒鹌鹑  
芒·冈巴塞莱斯<sup>⑤</sup> 小肥母鸡  
吕奈勒<sup>⑥</sup> 冰淇淋  
加莴苣的潘趣酒  
烤山鹑、雪鹑配块菰  
南锡<sup>⑦</sup> 肉汁猪肝糜  
冷盘  
荷兰调味汁拌带茎芦笋  
肉冻  
甜点

我们怎么能破解这些使我们难懂的套语呢？什么叫山鹑和雪鹑？什么叫路克鲁斯式葡萄园鹌鹑！外祖母非常善解人意，她力图把那些食品用相应的语言用我们沙朗札的食品店里尚能看到的那些很粗陋的食品来做比较。我们特别高兴，能够在想

---

①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妃。

② 法国的地名。

③ 法国的地名。

④ 路克鲁斯（公元前109—前57）：罗马将军，以美食著名。据说，有一天他一个人吃晚饭，看到仆人没给他准备丰盛的酒菜，便高傲地对仆人说：“你难道不知道路克鲁斯今晚是在路克鲁斯家里吃饭吗？”

⑤ 芒·冈巴塞莱斯（1753—1824）：公爵，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

⑥ 吕奈勒：法国地名。

⑦ 南锡：法国地名。



象中品尝这些还带着潮湿海鲜味的菜肴（因为那是在瑟堡<sup>①</sup>），但遗憾的是，不得不随着沙皇的离开而离开。

和他一样，我们也进入了爱丽舍宫，但我们看到的，满眼是清一色的黑色大礼服，这景象把我们惊呆了，而当他走近时，这些黑礼服便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了，——请想一想吧，在这儿等待的有四百名参议员和三百名众议员！（而且，据我们报纸的报导，就在几天之前，他们还在一条船上开过会……）外祖母平时讲话的声音，始终那么平静，并带点儿沉思的味道，而此时此刻，她的声音却带着轻微的悲苦的颤抖：

“你们知道，两个世界面对面地相会了，（你们看这张照片。可惜这张报纸已经被折叠得太久了……）是的，沙皇，这位绝对的统治者，和法兰西人民的代表们相会在一起了！他们是民主的代表……”

这种对比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却发现那五百双向沙皇注视的眼睛中，有那么一些，尽管没有恶意，却也分明没有那种通常表现出来的热情。而特别是因了“民主”这个神秘的词，他们也能使自己接受这个人物！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人感到懊丧。我们仔细打量着那穿黑礼服的行列，以便能识别出那些潜在的使人扫兴的人。共和国可能会识别他们的，那时可能会赶走他们，把他们推出爱丽舍宫的大门！

第二天晚上，外祖母的台灯又在凉台上打开了。我们发现她手里拿着几份刚从那只西伯利亚箱子里拿出来的报纸，她又开始讲述了。这时我们这个凉台也便慢慢地脱离了墙壁，便又飘飘荡荡地融入散发着大草原香气的夜色中。

---

① 瑟堡：法国的一个军港，位于英吉利海峡上。

……尼古拉坐在装饰着漂亮花边的宴会餐桌后面，一会儿他听到坐在他右边的富尔夫人向他讲的优美动听的法语，一会儿又听到总统那圆润的男中音同皇后的谈话。宴会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流金溢彩，使众宾客眼花缭乱……待最后上甜点时，总统站了起来，并举杯致词道：

“陛下在全体人民的欢呼声中驾临我们中间，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之间的联接纽带得到了加强，这一纽带使我们两国在行动上得以协调一致，在处理自己的命运时，得以互相信任。一个强大的帝国，同一个勤劳的共和国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一种经受过考验的相互忠诚而更加巩固……作为我们全体人民的代言人，我谨向陛下再次致意，……为您伟大的国家，为皇后陛下的幸福，……并且为向尼古拉皇帝陛下及皇后亚历山德拉·菲德罗芙娜陛下表示敬意，干杯！”

于是共和国卫队的乐队便奏起了俄国国歌……晚上，在巴黎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使欢迎盛典达到了高潮。

皇帝及皇后由两个高擎火炬的人在前引路，他们开始登上台阶，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正在穿过一个由活人组成的瀑布：使他们应接不暇的，是那些雪白的女性双肩的曲线，贵妇们衣服上怒放的鲜花，妆扮得珠光宝气、香气扑鼻的发型，裸露的胸背上闪闪发光的首饰，为这一切所衬托的背景则是鲜亮的军服和燕尾服。“皇帝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要把那富丽堂皇的屋顶掀起，并同天体融在一起……待节目演完，乐队奏起《马赛曲》时，沙皇便转向总统，并向他伸过手去。

外祖母把灯关掉，我们在黑暗中沉默了几分钟，这一段时间是专门为了使那些向台灯下扑来投火的飞蛾准备的，好让它们趁此飞走。慢慢地，我们的眼睛也开始适应了。只见天上的星星又重新组织了它们的星座，天上的银河似浸润在白色的

光波里。在我们凉台的一角，在那些加杂着香豌豆的乱枝条中，那个被铲落的头像正向我们发出不悔的微笑。

夏洛特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只听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知道，那首《马赛曲》并非别的，实际上是一首军队进行曲。它有点儿像俄国革命时的歌曲一样，在那个年代，鲜血从来是吓不住人的……”

说罢便走进屋子里去，随即我们便听到从里边传出来她低声吟咏的几句歌词：

“……血染的战旗已经举起……让魔鬼的血，洒遍我们的田野……”

我们静静地倾听着，这些歌词的余音融进了夜色之中。突然我们一阵激动，便惊呼起来：

“可是，尼古拉呢？那个沙皇呢？他晓得歌中唱的是什么意思吗？”

法兰西——阿特朗蒂德的声音响亮，生动多彩，并且有滋有味。随着那些引路者走下来，我们还发现，我们这个神秘的法兰西精英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语调。

爱丽舍宫中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巴黎歌剧院里，女性裸露的双肩令人眼花缭乱，争奇斗胜的发型，散发着令人陶醉的芳香。巴黎圣母院此刻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杂乱纷繁的天底下——一块引人注目的冰冷石头。是的，我们几乎都能伸手摸到它那粗糙多孔的墙壁，——我们觉得，那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一块凹凸不平的巨岩，一块因日久天长，被鬼斧神工的自然腐蚀作用造就出来的巨岩……

这些敏感的侧面所勾勒出来的轮廓到底如何，在法国人的

眼中尚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片刚刚在洪水中露出来的陆地上，充满了各种人和事。皇后双膝跪在一个使人难以捉摸的、叫做“拜墩”的上面，这个“拜墩”，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现实物件中，它是个什么样子。夏洛特解释说：“那是一种类似椅子的东西，只不过把四条腿锯掉了。”于是想到这种被弄残废了的家具，我们只有瞪大了双眼听的份。同尼古拉一样，我们也把想动手摸一摸那件大红袍的念头压了下去，那是一件外面绣金但已褪色的红袍，拿破仑行加冕礼的时候穿的。我们当时觉得非常需要摸一摸它，尽管这是亵渎圣物的一摸。正在恢复中的这块土地尚缺乏具体的法度。使我们这样想的，是因为在圣教堂中有一份很古老的文字材料上面写满了粗糙的文字——夏洛特告诉我们，这些很长的信件手稿，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是由一位法国皇后，也是一位俄国女人写的，她名叫安娜·伊阿罗斯拉芙娜，是亨利一世的王后。

而最使人激动的场面，是阿特朗蒂德在我们亲眼目睹下进行自身建设。只见尼古拉拿起一个金制镏刀把灰浆抹在一大块花岗岩上，——那是亚历山大三世<sup>①</sup>大桥的第一块基石……随后，他把镏刀递给费利克斯·富尔：“现在该您了，总统先生！”无拘无束的春风吹皱了塞纳河水，也吹走了商业部长吃力的说话声，因为他要极力压过风吹旗帜发出的劈啪声：

“陛下！为了陛下的先父奥古斯特，法兰西特在她的首都建造这样一座最大的纪念性建筑物，并谨以共和国政府的名义，请陛下接受这一敬意，并请陛下和共和国总统共同为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安放第一块基石。这座大桥将把巴黎同 1990 年

---

<sup>①</sup>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俄国皇帝，于 1881 年登基，在位时同法国友好，并结成联盟。



国际博览会联接起来，这样，陛下将对人类文明及和平做出巨大贡献。我们也将对陛下本人及皇后的亲切支持做出高度评价。”

总统刚刚在那块花岗岩上象征性的抹了两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便发生了。只见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皇帝夫妇面前，此人既不是皇帝的随员，也不是法兰西的显贵。他直呼沙皇为“你”，而且显得很机智，看起来很有社交经验，甚至他竟然吻了皇后的手！我们被这一放肆行为惊得几乎喘不过气……

不过情形也就逐渐明朗化了，这个擅闯禁地的人，他的讲话，超越了遥远的往昔，也克服了我们法兰西语言的缺陷，讲起来清晰明了，那余音久久在我们耳际萦绕：

你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无比英明的皇帝！  
法兰西为了热情隆重地欢迎你，  
特差我用上帝的语言向你致意，  
因为只有诗人才能直呼皇帝为“你”。

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个傲慢又古怪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夏洛特对我们说的那个诗人，他的名字叫约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sup>①</sup>！

还有您，夫人，同他一起参加盛会，  
您国色天香的容貌，堪称天下之最，

---

<sup>①</sup> 约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诗人，生于古巴，代表作有《战利品》等。

皇后陛下，请允许我向您鞠躬致敬，  
您的温柔，更显示了您的高贵！

这诗一般的语言，音调之铿锵，令我们陶醉。其音韵之响亮，在我们耳朵里听起来就好像给那些毫不相关的同韵词如“fleuve - neuve”以及“or - encor<sup>①</sup>”……等举行了一个奇异的婚礼，把它们联系起来了，……我们觉得，只有这样的文字技巧，才能表达我们法兰西——阿特朗蒂德的那种异国情调：

这就是巴黎！为迎接你们，欢呼声响彻大地，  
这个喜笑颜开的城市，到处是一片彩旗，  
无论是宫殿、楼台，还是普通宅区，  
到处都把我们两国的三色旗挂在一起……

金色垂柳掩映的，是那美丽的河岸，  
塞纳河带给你的，是欢乐人群的笑语连天，  
尊贵的客人，所有的目光伴随着心声都朝向你们，  
法兰西以充沛的活力向你们致意，向你们问安！

我们的力量将完成建桥这一和平的伟业，  
它那巨大的跨幅，将超越时代的限界，  
而时代又是永无终止的纽带，  
它不仅联接着两国人民，也连接着时代……

---

① “fleuve - neuve”意为“花”和“九”；or - encor (e)意为“金子”和“还”“尚”等。在法语中都是同一音韵。

趁你在这历史性的河堤上尚未下来，  
如果你博大的心胸也通向法兰西的心怀，  
那就请你在这座桥前仔细思考和遐想，  
这工程是法兰西为你父亲亚历山大而开，

不管你父亲多么坚强，多么仁慈和善，  
我劝你要始终看好鞘中的利剑，  
因为和平的军人也离不开武器，  
沙皇，且看地球是怎样在你手中旋转。

帝国的举措足以维持世界的平衡，  
你强有力的臂膀从不知什么叫沉重，  
因为获得一个自由的人民爱戴的荣誉，  
是亚历山大连同他的帝国一起，给你的遗赠。

“获得一个自由的人民爱戴的荣誉”，这句话，在优美流畅的讲话中，一开始几乎滑过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评价使我们感到震惊。法兰西人民，是一个自由的人民……至此，我们方始明白，何以这位诗人竟敢于向世界上这个最强大帝国的主人提出自己的见解。也终于明白了，何以被这个国家自由的公民们所爱戴，竟是一种荣誉。就在那天晚上，由于懂得了这种自由的意义，使我们觉得，夜色深沉的俄罗斯大草原上吹来的闷热暑气，竟如同塞纳河上吹过的一阵清冷的凉风，它吹皱了塞纳河水；又似一股令人沉醉的，带点疯狂的气息充满了我们的胸膛……

后来，我们对于这种夸张的词句，便懂得了如何掂一掂它的分量了。但在当时，尽管他的诗对环境大加渲染，却也不能

阻止我们在读过后有“我对法国的事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而在那一瞬间又叫不出名目来，不知道法国人的精神吗？不知道法国人的礼貌吗？总之，当时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此期间，诗人便转身面向塞纳河站立，并伸出手指向河对岸残老军人院的大屋顶。他那带韵律的讲话，竟把往昔法俄的关系描写得令人痛苦不堪：拿破仑，大火中的莫斯科，别列兹纳河<sup>①</sup>……我们听着，感到不安，急得直咬嘴唇，他讲到这儿时，我们便十分注意他的声音，深恐出现什么不虞之事。沙皇的面孔板起来了，亚历山德拉也把眼睛垂了下去。这种事，如果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以沉默的态度对待，或者使这位皇帝径直走友好谅解之路，岂不更好？

然而埃雷迪亚甚至把声音又提高了：

请看在远处的天上，那个美丽的屋顶，  
它下面还存在着年代久远的英雄，  
在那里，俄国人和法国人正进行着一场无怨的  
比赛，  
在瞻仰未来时，他们已把共同的鲜血化为长虹。

在惊诧得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们反复地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稍开疏问题：“在回忆起七个世纪以来，一直到最近一次战争中，我们受到日尔曼人那么多的人侵时，为什么对德国人憎恨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我们对已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波兰和瑞典侵略者的敲诈行为始终不能忘怀？更不要说鞑靼人了……为

---

<sup>①</sup> 别列兹纳河：在白俄罗斯境内，因法国军队在1812年11月26日至29日曾渡过这条河而著名。



什么提起 1812 年那可怕的灾难时，在俄国人的头脑中，法国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害？莫非说这正应了刚才说的‘无怨的比赛’这个漂亮的词藻所致？”

然而“我对法国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特别表现在有女人在场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在场时，别人对她的关注都显得极其尊重和分寸，在每次讲话中都被提到，但比起对她丈夫的颂扬，那分量要轻，但却更有礼貌。即使在法兰西学院里，那里面摆设的古老家具和被尘封已久的厚厚的大部头书籍散发出来的味道使我们窒息，而那句“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可以使她保持一个女人形象。不错，她甚至在那些喜欢唠叨，又爱卖弄学问，而且因为耳朵里长的毛太多，有些重听的老学究中间，她仍然是个女人。这时，老学究中有一个站了起来，他是院长，只见他脸色阴沉地宣布会议开始。然后便一声不响地沉默起来，好像在头脑中清理自己的思路一般，然而我们敢肯定，这种场面很快便会使所有听众感到时间的难熬和座下木椅的坚硬。那种霉尘味愈来愈浓了。突然，老院长抬起头来，一丝狡黠的火花在他眼里发着光，只听他说道：

“皇帝陛下及皇后！距彼得大帝<sup>①</sup> 光临敝国，差不多已近二百多年了，有一天，在大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的院士们正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参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而皇帝陛下今天所做的又更进了一步。她并非自己来的，她在我们原来的荣誉之上，又加了一层荣誉，（说到此便转身对着皇后）：皇后陛下，您的驾临，将给我们这个庄严的会议带来某种非比寻常的东西，那就是……魅力。”

---

① 彼得大帝（1672—1725）：即彼得一世，俄国沙皇，曾化名秘密出国考察。

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很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而那位演说者，似乎已然觉到，是该讲主要话题的时候了，便提高了声音，字斟句酌地反问道：

“我是否能够这样说呢？即，这一热情友好的表示，并非专对我们科学院的，它甚至也是对我们民族的语言所做的表示……这一语言对你们来说，并非仅是一种外国语。我很难说出，大家是以多么强烈的愿望，希望用这个语言，以法国人的情趣和法国人的思维，进行内心的交流……”

“我们的语言！”我姐姐和我，通过外祖母所读的这些报纸，互相望了望，惊奇地发现，我们竟被同一件事所打动，就是“……这一语言对你们来说，并非只是一种外语。”就是这一点，这正是我们阿特朗蒂德的关键所在！语言，这个神秘的物质，它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它通过声音的媒介可以达到我们正在探索的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语言这东西，它可以塑造人性，雕琢物品，表现诗作，可以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大声喊叫，也可以使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一位年轻的沙皇皇后笑容满面……特别是，它竟能使我们激动得心跳不已，正如嫁接在我们心灵上的一枝花叶茂密的枝条，本身正在结着全部文明的硕果。是的，这个嫁接的枝条，就是法语。

正是由于我们心中有了这枝长满含苞欲放的花朵的枝条，我们在晚上才得以进入法兰西喜剧院特为皇帝夫妇准备的贵宾室。打开节目单，上面写着：缪塞的剧本《短暂的爱情》<sup>①</sup>；纪德剧作的片段；《女学者》<sup>②</sup>的第三幕。当时这些作品我们

---

① 《短暂的爱情》：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著，于1847年11月27日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获全面成功。

② 《女学者》：莫里哀的五幕喜剧。

一部也未读过。在讲述这些时，夏洛特的声调稍有些变化，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作品的名字对于阿特朗蒂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幕拉开了，全体演员身穿庆典大氅，都登到台上，其中一位年高德重的代表走上前来鞠躬致意，他的贺词中谈到了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我们一时竟没有马上回过味来：

那是个美丽的国家，其幅员和世界一样大，  
那无穷无尽的地平线，直伸到海角天涯，  
真是个生机勃勃的国度，  
她的过去伟大，而将来更见伟大。

那麦穗如黄金般灿烂，那瑞雪似白银般耀眼，  
它的儿子们迈着坚定的步伐，不论是战士还是  
军官。

祝福这个国家好运长在，  
让这片纯洁的处女地长满丰收的庄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外部观看我的国家。距离是那么遥远，以致使我觉得自己已不属于它了。被带到欧洲一个伟大的首都之后，我再回过头来打量着那一望无际的麦田，再遥望着月光下那覆满白雪的平原。我把俄罗斯看了个清楚！我心不在焉，已经站在我这个俄罗斯生命之外，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尖利的，同时又使我激动得闭上了双眼。我害怕再也不能找到我自己，而成为一个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巴黎人。我一面微合上双眼，一面深深地呼吸着。夜晚草原上的热风又向我吹来。

那天晚上，我决心把她变魔术的宝贝偷过来，想走在夏洛特之前，即在她之前进入那个欢庆的城市，不等到她那盏带青绿色灯罩的台灯发出使人昏昏欲睡的光亮便赶到沙皇的随员那儿。

那一天非常寂静、灰暗——是一个色彩黯淡、忧郁的夏日，总之，是属于那种使人惊讶地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么一天。夹着土地潮气的风把开着窗的白色窗幔鼓得胀胀的，——似乎窗帘占据了屋里一块地方，随后又突然瘪下去，好像要躲开，以便让某一位看不见的人进来似的。

我独自一人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很高兴，便开始执行我的计划了。我把放在床旁边地毯上的那只西伯利亚皮包打开，皮包打开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这我们每天晚上都听惯了。我把外边那个大包皮扔掉，便弯下身打量起这一堆旧报纸来，——那情形就像一名海盗在打量着箱子里的财宝一般……

在最上面，有几张照片，我很熟悉。我又看到了沙皇和皇后在先贤祠前照的相，接下来是在塞纳河岸上照的。不是这些，我要找的，还在下面，在那一大堆已经弄得黑乎乎的铅印的文件里。我像个考古学家一样，一页接一页地翻看。里面有尼古拉同亚历山德拉在一些我不认识的地方照的相。翻到另一页上，就没有他们了，却看到一些长长的装甲舰，停在平稳的海面上，还有一些机翼很短的飞机，样子很可笑，以及战壕里的战士等。为了进一步搜寻这对皇帝夫妇的线索，我便把这些剪下来的报纸弄混了，放的顺序也乱了。接着，沙皇的照片又出现了，是骑在马上，手里捧着一尊东正教的圣像，他面前跪着一排士兵……在这张照片上，我觉得他的面孔有些老了，而且面色阴沉。可我呢，内心里却希望看到他重新年轻起来，还有漂亮的亚历山德拉陪伴着，并且周围有欢呼的人群，有热情



的赞美诗颂扬着。

终于在箱子的最底下，我找到了他的踪迹。那黑体大字的标题是不会错的：《光荣属于俄罗斯》。于是我也像夏洛特那样，把报纸打开放在双膝上，便压低了声音读起上面的诗句：

啊！伟大的上帝，这是多么好的消息，  
巨大的喜悦使我们心灵震颤不已。  
我们看到那座城堡已塌坍，  
里面的奴隶曾经痛苦地悲叹！  
看到一个民族已砸烂枷锁，  
正义的火炬正燃烧着熊熊烈火。  
朋友，这个节日是多么盛大，  
请在我们殿堂上把彩旗悬挂！

只是当我读到这首诗的副歌时，我才被一个怀疑给打住：《光荣属于俄罗斯》吗？但是“那麦穗如黄金般灿烂，那瑞雪似白银般耀眼”的国家在何处？这个国家真的“生机勃勃”吗？如果那样，那些“曾经痛苦地悲叹”的奴隶们又是做什么的？而且大家欢庆他倒台的那个暴君又是谁？

心乱如麻的我，于是便开始朗读那首副歌：

敬礼，向你们敬礼，  
俄罗斯的人民和战士！  
敬礼，向你们敬礼，  
你们拯救了生你养你的大地！

敬礼，至高无上的杜马<sup>①</sup>，  
辉煌和荣耀属于她，  
为了你们大家的幸福，  
明天她就去砸碎你们身上的铁枷。

突然，一个大字标题，突出地显示在诗歌之上，跳入我的眼帘：

尼古拉二世退位，革命爆发：俄历八十九年。自由在俄罗斯显现。克伦斯基<sup>②</sup>——俄国的丹东<sup>③</sup>。俄国的巴士底监狱<sup>④</sup>——彼得和保罗监狱被攻陷。独裁政权宣告解体……

上面这些句子，其中大部分我都不甚了了。但那主要的意思还是懂的，即尼古拉已不再当沙皇了。而他倒台的消息传来，引起了那些就是在昨天晚上还向他欢呼，愿他的统治长盛不衰的人们爆发出一阵疯狂的欢笑。不错，诗人埃雷迪亚的声音我仍然记忆犹新，而他那响亮的声音依然在我们凉台上回荡——

是的，你父亲用一条亲如兄弟的纽带，  
把有共同向往的法国和俄国联接起来，

---

① 杜马：沙皇俄国时的议会。

②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

③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活动家，1792年被选入国民议会，为“山岳派”领袖之一。

④ 巴士底监狱：14、15世纪法国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是法国专制制度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陷该狱，开始了法国大革命。

沙皇啊，请听明白，今天的俄罗斯和法兰西  
正在向这个慈爱、圣洁的名字膜拜！

而突然间竟出现这样一个大转变，对我来说，实在无法理解。我也无法相信竟然有如此卑劣的背叛。特别是来自一个共和国的总统，更令人费解！

进来的屋门响了，我便匆忙地把这些报纸收好，把箱子关上，又把它推回床下。

到了晚上，因为下雨的关系，夏洛特便不再把灯拿到外面凉台上了。我们依然如在凉台上一样，坐在她旁边。便又听她讲了起来：尼古拉同亚历山德拉坐在包厢里正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纪德的戏……但我却抱着绝望的悲哀注视着他们的面孔，我是那种对未来有某种预感的人，由于我知道了他们的未来，这就使我那颗孩子的心，一直感到很沉重。

“真理在何方？”我一边心不在焉地随着故事的发展，一边这样自问：（这时候皇帝和皇后已站起身来，观众们都转过身来向他们欢呼）“这些观众们不久就又会对他们大加攻击的，而他们这几天过的这种飘飘欲仙的日子，到头来什么也不会留下的！什么也不会……”

我强迫自己事先了解的这样一个结局，现在突然觉得是那么荒谬，那么没有根据，特别是在这充满了欢乐气氛的庆典时刻，在这法兰西喜剧院里灯火辉煌的时刻，于是我便一面把自己的小凳子向后推，一面禁不住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随后便跑到厨房里去。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姐姐想安慰我，把手伸过来，我粗暴地推开了（我特别怜恤她，因为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在我哭泣的时候，传来了几句十分难过的喊声：

“一切都是假的！叛徒，叛徒！这个长小胡子的骗子……”

你还叫他总统呢！全是谎言……”

我不晓得夏洛特是否已猜到了我悲伤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她已发现了那个西伯利亚箱子里的东西已被我翻乱，也许她还找到了那一张决定命运的报纸）。平时，只要我一出现意料不到的痛苦而流泪时，她总是非常动情地过来坐在我床上，静静地听一会儿我断断续续的叹息，然后，在黑暗中摸到我的手，便悄悄地塞到手里一块粗糙的小铁块。我便紧紧地把它攥在手中。这时我无须睁眼，仅凭感觉，就会知道，这就是那块“维尔顿”，自此以后，它就属于我的了。



## 四

暑假结束了，我们便离开了外祖母。阿特朗蒂德此时也便在秋天的雾气后面，在最初几场暴风雨后面，也就是说，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后面隐去。

因为我们要返回的城市，同那个寂静的小城沙朗札毫无共同之处。这座城市坐落在伏尔加河两岸，人口有一百五十万，这里有兵工厂，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有斯大林式的高大建筑，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化身，伏尔加河下游有一个大型水利发电中心，一条地铁正在施工中，一个大型内河港口，这一切在大家眼中就是我们同胞的形象——战胜自然的形象，为灿烂美好的前景而生活的形象，在生龙活虎的建设中，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可笑的陈迹丝毫不放在心上的形象。此外，我们这座城市，由于它有众多的工厂，对外国人是不开放的……是的，它是这样一座城市，住在这里可以很明白地感觉到这个帝国的脉搏。

自我们回到这里以后，这种生活规律，便开始规范我们的行动和思考了。于是我们也同我们祖国皑皑白雪同呼吸共命运了。

嫁接在我们心灵上的那枝法兰西枝条，无论是对我姐姐还是对我，都没产生妨碍我们过着和我们这儿的同志们相同生活的作用：俄语又成了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学校按造就一个模范维埃青年的模式来教育我们，准军事性的训练，使我们习惯了火药味，习惯了训练用的手榴弹的爆炸声，而且也习惯了这

种思维方式，即：总有一天要同西方这个敌人开战的。

与外祖母对坐在凉台上的夜晚已一去不返了，即，似乎已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梦幻。在历史课上，当老师向我们讲到尼古拉二世时，说：“尼古拉二世被人民唤作嗜血成性的尼古拉”时我们绝对没有把这个被说成刽子手的人同那个在剧院里赞赏纪德的青年君主联系在一起。没有，这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

有一天，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头脑中突然对这两个形象加以比较了。在没有人问我的情况下，我便主动地谈起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来，谈起他们访问巴黎的情况来。我的这种做法很出乎老师的意料，而且对历史细节的叙述又那么丰富和翔实，因此使老师显得颇为尴尬。全班同学都带着惊愕的傻笑看着我：他们不知道该把我的讲述看做一个挑衅行动呢，还是简单地看做胡说八道。但老师很快便控制住当时的局面，只听他清楚明白地说道：

“发生在库丹卡广场上的大混乱，要由沙皇负责——那里有数千人死于非命；是他下命令在1905年1月9日向和平游行的群众开火的，——那一次又有数百人死亡。而在雷纳河<sup>①</sup>上所犯下的屠杀罪行也是他的政权干的，那一次有一百二十人被杀！再说，如果伟大的列宁这样称呼他，那绝不是偶然的，——是想通过这个名称来抨击沙皇制度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进行这种抨击时所使用的激烈语调，而是当课间休息，班上其他同学围住我开玩笑时，在我脑中形成的那个使人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围住我开玩笑说：“大家看！这个沙皇，他还有一顶皇冠呢！”其中一个，一面拉住我的头发一面喊）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

---

<sup>①</sup> 雷纳河：西伯利亚的一条河流，注入北冰洋。

非常简单：“是的，我知道，他是个杀人的暴君，这在我们教科书上已写得很清楚了。但是，又如何理解塞纳河上吹起的那股带着海鲜味的清风？又如何理解飘荡在这股清风中的那些响亮的颂诗？如何理解那金制的慢刀碰在花岗岩上发出的声音，——总之，怎样理解距今已然相当遥远的那一天的情景？因为我现在又再一次感到当时那种极其浓郁的气氛了。”

不，对我来说，绝非想为这位尼古拉二世恢复名誉，我相信课本上讲的，也相信我们的老师。但是，那遥远的一天所发生的事，那阵阵的清风，那明媚的天气呢？我沉浸在半是思维半是想象的、不连贯的思索中，变得糊涂了。这些同学们缠住我不放，嘲笑，讽刺，弄得我耳朵都聋了。在推开他们时，我突然对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感：“如果像他们这样，没有看到那个非同寻常的一天，不了解那个气氛浓郁而又毫无用处的过去，那该有多好啊！是的，只看到人生的一个方面，而不要看像我看到的这些……”

这最后一个想法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异乎寻常，竟使我不再推开那些嘲笑我的人们，转身向窗户看去，窗外是披着白雪的这个都市。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别的！难道说，这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个不利条件，甚至是个缺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想，我能用我的这两种语言来解释这个双重景象。即当我用俄语说出“yapb。”<sup>①</sup>时，一个残酷的暴君便站在我的面前；而法语“沙皇”这个词则充满了耀眼的光华，喧闹的人声，习习的凉风，光辉的吊灯，女性裸露的肩头，以及花香、粉香的混合香气，总之，充满了我们那个阿特朗蒂德所特有的，不可模仿的气息。我明白，必须把我的这第二种看法隐藏起来，因为

---

① 俄语：“沙皇”。

这样，只能招致别人的嘲笑。

我这种秘密的感觉，后来在上历史课时又出现过一次，那一次也和这次一样，充满了悲喜剧味道。

在一个食品商店前，我排队买东西，那个队排得就像一条长蛇，等得没完没了，随后，慢慢地排到门口，再等一会儿，便排到屋里了。毫无疑问，这是冬季里某种罕见的食品，比如说柑桔，甚或就是普普通通的水果，总之，我已然记不起来了。我在这儿等得已经超出了我心理上所能容忍的最高界限，——而在商店门外还有几十个人站在泥泞的雪地上等待。这时姐姐来找我了，因为我们两个人排队便可以买到双份定量分配的物品。

就在这时，不晓得为什么，排队的人群突然愤怒起来，排在我们后边的人可能以为我姐姐想不排队就插进来——这种犯罪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于是便爆发出愤怒的喊声，这一条长蛇开始挛缩了，一张张愤怒的面孔把我们俩给包围起来。我们极力解释，我们俩是姐弟两人，但群众是从来不会认错的。尤其是还没排到屋里来的人，他们特别恼火，发出了愤怒的喊叫，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反对的到底是哪一个。又由于群众性的活动总是容易盲目地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于是反倒把我给推了出来，这条长蛇激动了，每个人的肩膀也都挺起来了。经过一阵骚动之后，我便和姐姐两个人站在队伍的外边，面对着一大群愤怒的面孔。我打算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但他们的手臂就组成了一道盾牌。这时我十分慌乱，双唇发抖，正好看到姐姐的目光，在慌乱中，我想，姐姐和我，我们两个是特别受人欺侮的人。她比我大两岁，马上就十五岁了，她还没有到做年轻少妇打扮的地步，然而却也完全失去了一个孩子的特征，



如果她还像个孩子，那么这个铁一般的长队或许会因之有所软化。而我自己呢，也是如此，我当时年龄是十二岁半，也无法像十四五岁的年轻小伙子那样，做出未成年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那种好斗行为。

我们便在等待的队伍旁边走来走去，以期能够被准许再插进去，哪怕比原来的位置靠后几米也没有关系。然而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挤得很紧，不久，我们就被完全挤出来了，又回到已融化的雪地上。尽管一个女售货员大声喊：“喂，外边的，别等了，卖不到你们那儿了！”但人们还是不断向前涌来。

我们站在长队的头上，被这些陌生的人群给吓呆了，我站在那里不敢抬头，不敢动，放在衣袋里的双手直打颤。突然，像从另一个星球传来的一样，我听到我姐姐的声音了，她在讲话，那是带着凄凉的微笑讲出来的：

“你还记得烤山鹑、雪鹑配块菇那道菜吗？……”

只见她正在轻轻地微笑着。

我一面看着她苍白的面孔，看着她那双映着冬日天空的双眼，觉得我胸膛中充满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瑟堡的空气——那里面还含着一一点儿湿漉漉的咸味儿，似乎看到了海滩上潮湿的卵石，似乎听到了一望无际的海洋上传来海鸥清亮的鸣声。我在这一刻，有一一点儿失常。随着排队人群的向前移动，也慢慢地带动着我向门口移动。我任自己被人群带着向前，不想摆脱在我身上正在扩大的这一线光明。

烤山鹑、雪鹑……我微笑着很谨慎地朝姐姐看了一眼。不，我们绝对没有感到自己比在这儿挤着排队的人们优越。我们完全和他们一样，甚至我们的生活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要简朴。我们大家都属于同一阶层，即属于那种在一个工业化的大城市中，脚踏着残雪到处奔波的人，属于那种在商店门口排

队，期望着自己的筐子里能多买两公斤柑桔的人。

然而，在听到这种可以使人产生幻觉的话语，并且了解到瑟堡宴会的情形之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和他们不同。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学识渊博（因为在当时我还不知道，那著名的山鹑和寻鹇，到底像什么东西），之所以觉得和他们不同，那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刻的时间（就是在我头脑中涌出模糊的光辉，闻到海鲜味的那一刻），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相对化了：这座城市及其带有斯大林风味的宽大街道，这些排队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神经质和那种麻木不仁的粗暴。对这些人，尽管他们推搡了我，我不但没有生气，现在反而对他们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同情感：他们一边轻轻地眨着眼睛，一边只能置身于那个充满海鲜味，到处都能听到海鸥叫，并且天上挂着朦胧的太阳的情景之外……一种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的强烈愿望控制着我。但怎么说呢？我必须发明一种别人从未说过的语言，才能说清楚，而这种语言目前我只掌握两个粗浅的词：山鹑和雪鹇……

## 五

自曾外祖父诺贝尔去世以后，阿尔贝蒂娜便逐渐被关在那无边无际白茫茫的西伯利亚了。不错，她也曾带着夏洛特到巴黎来过两三次，但那个广袤的大雪原对那些被它那未开垦的空间，和始终沉睡的时间所迷住的人，却也始终舍不得放弃。

再说，在巴黎居住的那些日子，也打上了一种苦涩的烙印，这在外祖母的讲述中也并没有掩饰得住。是有什么家庭纠纷，而那原因又不为我们所知吗？还是因在亲人之间存在着那种极端欧洲式的冷漠关系，而这种冷漠又不被我们这些充满集体主义思想的俄国人所理解吗？要么，干脆就是因为那些比较朴实的人们以可以理解的态度对待家庭中四姐妹中的一个所引起的。而这一个又是家中的冒险家，她做的不是黄金梦，而每次回家所带来的却是对一个野蛮国度的焦虑，和对她支离破碎生活的愁烦。

不管怎么说，阿尔贝蒂娜喜欢住在她哥哥的房间，而不愿意住在纳伊的家里，却是个事实，而这件事又不会不被别人注意，甚至连我们都发现了。

每次返回俄国时，西伯利亚都愈来愈使她感到，那里是她生命所系的地方，是无法躲避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已和她的命运融为一体了。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诺贝尔的坟墓在那儿，才把她拴在这片冻土上，同时也是因为俄国这样阴郁的生活，有如醉人的苦酒，已渗透进她的血管的缘故。

阿尔贝蒂娜从一位名满全城、受人尊敬的医生的妻子，而成为一个很奇怪的寡妇——一个法兰西女人，而且她似乎不能决定自己能否回去，然而更其糟糕的是，每次回去，她还必须回来！

她当时还太年轻，人也过于漂亮，无法躲避博雅斯克城上流社会的恶意中伤，而且这些诽谤又十分离奇，使人无法接受，不过不久，也就不攻自破了。

夏洛特发现，每次她们从巴黎回来，住的房子就越来越小，靠了她父亲从前一位病人的关系，她才得以被接受入校学习，但入校不久，她便成了“那个勒莫尼埃”<sup>①</sup>了。有一天她的“教室太太”（在革命前大家对学校的主要教师都这么称呼）让她到黑板前面来，但又不是向她提问题……当夏洛特走到她面前时，这位太太便仔细打量这个小姑娘的双脚，随后，嘴角上便带着蔑视的微笑问道：

“勒莫尼埃小姐，您的脚上穿的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全班三十名学生立即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只见在被腊打得光亮的地板上，有两个毛套子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夏洛特自己动手缝制的两只“鞋”。在全班同学目光的注视下，夏洛特低下了头，并且不自觉地把脚趾卷缩起来，恨不得把双脚藏起来……

在那个时候，她们已经住在市郊的一间老的木房子里，夏洛特也已经习惯于看到她母亲几乎总是神情沮丧地躺在隔幔后面一张高大的农民用的床上。当阿尔贝蒂娜起床后，尽管她的双眼已经睁开，可仍然能从中看到她梦中留下的阴影。她甚至连对她女儿笑一下也不想了。只见她拿起一把长柄大铜勺，从

---

<sup>①</sup> 勒莫尼埃：是夏洛特的姓。



桶里舀了一大勺水，很认真地喝完便走了。夏洛特已经知道，已经好久了，她们是靠了放在小盒子里的那几件镶有珍珠的首饰才得以这么苟延残喘……

她们这栋小屋，距博雅斯克的高级住宅区很远，她也很喜欢它。它座落在被冰雪覆盖的一条弯曲而狭窄的小街上，这样，她们日子虽然艰难，却也不太引人注目了。另外，每当她放学回家，踏上那木板做成的台阶时，便发出吱吱的声音，那感觉是那么良好；每当走过那条由粗圆木搭成的黑暗过道，看到那墙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时，感觉也是那么良好；当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它便发出一声短促而清脆的嘎嘎声，那感觉还是那么良好。待走进屋里时，她暂时不去点灯，先欣赏一下从低矮的窗口透进来的那一片紫色的晚霞，再听一听夹着冰雪的寒风击打玻璃的声音，然后便把身子靠在又宽又大的炉壁上取暖，这时夏洛特便感到暖气慢慢地从她大衣下钻了进去。她把那双冻僵了的双手放在那块温暖的石头上——这种石砌的火炬给她的感觉，就是这栋老木屋的心脏。这时那毛毡靴子底下的冰雪也慢慢地融化了。

有一天，一个冰块破碎的声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但那声音又不像平时冰碎的声音。夏洛特感到很奇怪——她进屋来已经足足半个小时了，她大衣和帽子上的雪早已融化并且也已经干了，那么这冰块声……她低下头想把它捡起来，原来竟是打碎的玻璃！这玻璃很薄，是一个打碎的药瓶……

就这样，“吗啡”这个可怕的词儿便进入了她的生活。这样，幔布后面的沉寂，在她母亲眼中的那些拥挤的人影，以及何以这个荒诞的西伯利亚竟会像命运一样躲避不开等等，都得到了解释。

于是阿尔贝蒂娜对她女儿便什么也不再隐瞒了。从此人们

便常看到夏洛特进出于药店，并胆怯地嗫嚅着说：“我是来买勒莫尼埃太太要的那种药的……”

她总是一个人回家，要通过一大片旷无人迹的空地，这片空地就把他们这个小镇同城区的最外边几条街分开，也就同那些商店和城里的灯火分开了。经常是一场暴风雪会在这片死气沉沉的空阔地上掀起。这种暴风雪中加着冰粒，吹得两耳什么也听不到。有一天晚上，精疲力竭的夏洛特已无力在暴风雪中挣扎，便在这不见人烟的雪地中停了下来，背转向风头，两眼看着被大风吹得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有点头晕目眩，在极度紧张中，她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瘦小躯体中的热量，感觉到这个躯体已紧缩成一个极小的“我”。她还感到在帽子的护耳下，似有一个水滴又麻又痒地在蠕动，又好像已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然而就在她心房的旁边，就是那些易碎的东西，——她刚刚买的小药瓶子。“是我，”突然，一个沉闷的声音在她身上响起，“是我在这儿，在这样的暴风雪中，在这世界的尽头，在这个西伯利亚，是我，夏洛特·勒莫尼埃，我，我同这个野蛮的地方没有任何瓜葛，甚至和这里的人也是如此。可我却身在此地，孤零零的一个人，身上揣着母亲要的吗啡……”她觉得自己的精神恰似在跌入深渊之前正在踉踉跄跄地摇摆着，如果跌入这个深渊，那么目前出现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荒谬想法就将会是正常的了。她摇了摇头：不，这个荒凉的西伯利亚必将在某个地方有个尽头。在那个地方，必定有一个城市，城市里有两旁种着栗树的林荫大道，有灯火辉煌的咖啡馆，有她叔叔的房子，还有许多书，全都是打开的，上面印的字特别漂亮，那里还有个法兰西……

那座有栗树林荫大道的城市，忽然变成了一个薄薄的金

片，在她的眼前闪闪发光，而这个景象别人是见不到的。夏洛特看见过这种漂亮的闪光，她认出了，那是在一位年轻小姐的长裙上发出来的，那位小姐脸上正带着任性又高傲的微笑，——她正坐在一个大屋子中间一张华丽的扶手椅上，这间屋子里家具考究，窗户上一色是真丝窗帘。

“最有力的道理，总是最好的道理。”那位女青年带着傲慢的声调朗诵着。

“……总是最好的道理，”夏洛特低着头顺着眼睛，小心翼翼地说，然后便纠正她：

“应该是‘最好’，而不应该发成‘最豪’，这样就正确了，要发‘最——好——’。”

说着她把口型开成圆形，然后把这个音拉得很长，最后以圆润的“r”音结束<sup>①</sup>。那个年轻的朗诵者脸色十分难看，接着又往下背：

“我马上就会把那原因告诉你……”

这位小姐是博雅斯克市长的女儿，夏洛特每周的星期三都给她上法语课。一开始，她非常想和这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做个朋友，而且她比自己年龄也大不了多少。但现在她就什么也不再想了，只是专心一致地把自己的课上好就算了。她这位学生经常向她投过来那种带着蔑视味道的迅速的一瞥，对她也已不再造成伤害了。夏洛特一般情况下总是听她的，但有时也提出异议，但那眼睛，总是瞧着她胸前那只闪闪发光的漂亮的琥珀别针。只有市长的女儿才被允许在学校里上课时，身穿开领的连衣裙，在中间别上这只别针。夏洛特对她的发音错误或语法错误，总是十分认真地指出。在这颗金黄色琥珀的里面，能看

---

① 法语“最好”这个词的尾音应是[r]。

到一座满是金秋红叶的城市。她知道，自己必须忍受整整一个小时这个衣着华丽、满身肥肉的大孩子因小性使出来的脸子。然后便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像家庭女仆一样接受她的津贴，再吃一些剩下的午饭。然后再到街上去等，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在药店的女老板身后没有旁人才又嗫嚅着说：“劳驾，罗勒莫尼埃太太的药……”在药店里偷来的那点暖气，很快便被这旷无人迹的空地上的风雪从大衣里给驱走了。

当阿尔贝蒂娜来到房前的台阶上时，马车夫睁大了双眼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没有料到，这样一个木屋，屋顶坍塌并长满青苔的木屋，这个长满杂草并被虫蛀的台阶，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街道被埋在灰色沙子里的小镇上，竟会……

门打开了，只见在已变了形的门洞里，走出来一位女子，她身穿一件剪裁得非常得体的长裙。这种长裙，车夫只见到那些漂亮的仕女们晚间在博雅斯克要人们拥护下从剧院走出来时穿的就是这种长裙。眼前这位太太头上挽了个发髻，上面扣上一顶宽边大帽，春天的风把她的面纱吹得似波浪般卷在非常漂亮的帽子的宽边上。

“我们去车站！”她说。这句话一出口，更使车夫吃惊，因为她的声音特别清亮而且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

“……到车站去。”那个小姑娘也重复了一句，因为刚才在大街上是她把他呼唤来的，她，她俄语讲得非常之好，并稍微带点儿西伯利亚口音……

夏洛特晓得，阿尔贝蒂娜之所以能够站在台阶上，那是经过一场长时间痛苦的战斗之后的结果，而且中间还断断续续有许多次失败和反复。她这场斗争，就像有一天夏洛特在走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个男人的挣扎一样，那天她看见那个男人正在一



个黑乎乎的水穴里滚着碎冰在挣扎。他用手抓住别人向他扔过来的一根大树枝，便顺着溜滑的河岸斜坡向上爬，四肢趴在冻成冰的土地上，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蠕动，那双冻得紫红的手伸出来，已经碰到去救他的人们的手了，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全身突然抖动起来，并开始向下滑，终于又滑到原来那个黑色水穴里去，这时水流又把他冲得更远了，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是的，阿尔贝蒂娜的战斗就像这个男人一样。

但那个夏日的下午，阳光明媚，绿草依依，她们的动作也显得十分轻盈。

“哎，那只大箱子呢？”当她们在马车上坐下时，夏洛特突然这样问。

“我们不带了，那里面只有些旧报纸，而你舅舅的这些报纸……等以后找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再来取。”

她们坐着马车，穿过大桥，并在市长的家旁边走过。这个西伯利亚的城市就像在一个古怪的往昔中伸展开来，对过去的一切，以一笑抵之，那是并不难的……

是的，当她们在巴黎重新住下之后，向博雅斯克投去的那一瞥目光中，并没有怨恨。在一年夏天，当阿尔贝蒂娜又想重返俄国时（她的亲戚们想，这是为了最终封闭住她生命中的西伯利亚时代），夏洛特表现得甚至对她的母亲有些嫉妒，她或许是也想到那儿去住上一两个星期，看看这个城市是否还住着从前的老熟人，看看那里的房子，以及她们那间木屋，是否已变成历史的遗迹。一个城市，在那里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受到伤害的。

“妈妈，不要忘记看看是不是还有老鼠窝，就在火炉旁边，你还记得吗？”她向坐在开得很低的火车车窗旁边的妈妈这样喊。

那是 1914 年 7 月间的事，当时夏洛特十一岁。

她在生活中，没有什么诀窍。不过她最后说的那句话（“不要忘记老鼠窝”）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她愈来愈觉得愚蠢和孩子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该一句话也不说，并且多看一眼火车车窗后的那张面孔，把脸上的每个线条都印在眼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光阴就这么过去了，而最后一句话的声音，总是带着稚气的幸福在她耳际回响。在夏洛特的生活中，等待已成为她全部的时间。

这一段时期（报纸上称，这是“战争时期”），就像一个阴沉的下午，就像在外省的某一城市中，街上寂无人迹的一个星期天：突然在一个房子旁边的角落里起了一阵风，接着便扬起滚滚的尘沙，百叶窗无声地摇摆着，人在这种毫无生气的氛围中，很容易便受到它的感染，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便会赶紧离去。

就这样，夏洛特的舅舅离去了——据报纸上讲，他是“躺倒在光荣的战场上”、“为法兰西而战死”了。这样的措辞，使人对他的死更加感到不安——就像他工作台上的那只卷铅笔刀一样，已经把一只铅笔插在里面，并且卷出了几片精致的刨花，然而，自他离去后，这些东西仍在那儿一动没动过。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纳伊的家，便慢慢变得空旷了。家里的男女下人们毕恭毕敬地拥抱了夏洛特，并且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她说，要她好自为之。在这一段非常时期，也有它变幻无常之处。从一些放映得很快、人物都显得有点蹦蹦跳跳的电影上，会突然看到她的一位姨母，穿一身缟素，被聚集到她周围的亲人们包围着，这些人的动作也和那时的电影一样，显得那么匆忙，只见这些人，迈着慌张的步子，一颠一颠地向教堂走

去，在教堂里，姨母便站在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身边，这个男人留着平滑的头发，显得油光光的。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在夏洛特的记忆中，他们几乎没有来得及离开教堂，那位年轻的新娘就又披上了黑纱，眼里的泪水没有干过。也许有人会说，这变化未免发生得太快了吧，待新娘从教堂里出来时，便身穿重孝，用手捂住红红的双眼，竟成了寡妇一个了！其实，那是把两天的事合并在一天了，明朗的天空使这一天更加绚丽，教堂的钟声使它更加活跃，而夏日的熏风，似乎更加加快了客人们来去的速度。于是它炎热的气息便使得那位青年女子的头上，一会儿披上婚礼的白纱，一会儿又是未亡人的黑纱了。

不久，这个反复无常的时期，重又迈出它有规律的脚步，并且由于那些无眠之夜和残废人员大量的增加而变得有节奏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在这个由纳伊公立中学临时改成医院的各个大教堂中，随时都充满了人声。她第一次认识一个男子的躯体，便是看到了那副已然撕裂的、血肉模糊的男性肌肉……这几年来，夜晚的天空中始终有两只德国灰白色的怪物齐柏林<sup>①</sup>在玉柱般的探照灯光的追踪下窜来窜去。

终于，在1919年7月14日那一天，来了一批数不清的战士，他们列队通过纳伊，向首都进发。一个个服装整齐，目光坚定，军靴擦得发亮——战争又以检阅形式出现了。在这些人中，是否也有向夏洛特手中塞小铁片的那位战士？那原是一块生了锈的炮弹片。他们这些人是否有了心上人？是否已定了婚？

这种遭遇丝毫也没有改变夏洛特几年前已下定的决心。只要一有机会，一遇到使人意想不到的天赐良机，她就要返回俄

---

<sup>①</sup> 齐柏林：德国二十世纪初所制造的一种飞艇。

国。当时尚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同这个被内战蹂躏得满身疮痍的国家取得联系。时间到了 1921 年，一个红十字会代表团准备动身到伏尔加河流域去考察，因为那个地区有几十万处于饥馑状态的难民，夏洛特获准，以护士的身份参加。作为候选人，她很快就被确定下来，因为参加这样一次远征的志愿者是很少的，特别是她还能讲俄语。

就在那边，她觉得自己方始明白了什么是地狱。从远处看，似乎很像一些俄国宁静的村庄——一栋栋的木房，然后便是成排的篱笆，都笼罩在这条大河的雾霭中。如果从近处看，就是代表团的摄影师在这些灰暗的日子里所摄下来的一些镜头：一群身穿老羊皮袄的男女农民，在一堆人骨前，在撕裂的人的身躯前，在一堆无法辨认的人肉碎块前木然不动。再向后看，就是那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就那样在雪地上坐着，一头乱糟糟的长发，那目光却像老年人那么似乎看透了一切，整个人便如一个大昆虫一样。还有，是在一条被冰雪覆盖的大道上，看到的那颗人头，却依然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情形更坏的是，这些镜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摄影师把他的三脚架折叠起来时，那些农民们也便走出了照片上所摄取的范围，也就是说，离开了照片上所照的那种可怕而残酷的画面，重又开始他们那种无法再简单的日常活动。是的，他们还继续活着！一个妇女伏身仔细打量一个孩子，承认那是她的儿子，但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老昆虫”，因为她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靠吃人肉维持生命。于是便听到她从喉管里发出几声母狼般的嗥声，这种声音，是任何相机也照不下来的……一个农民一面用眼睛看着扔在路上的人头，一边叹气，然后便蹲下身来，用动作极不灵活的手把它滚到一个棕色粗呢做的大袋子里，一



边自己嘟囔着说：

“我把它埋起来，我们究竟不是鞑靼人……”

为了看一看那个老太太，就必须走进这座平静的人间地狱中的一个木屋里去，她正在窗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外面的街道，她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年轻姑娘的妈妈，就这样在窗下坐着，盼望着无望的援救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夏洛特到了莫斯科以后，便离开了红十字代表团。她一走出驻地旅馆，便一头扎进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并且马上就不见了。在苏哈尔夫卡大市场，她以五法朗的银币，换了两个圆形大面包，这足够她旅途头几天吃的了。在这个市场上，以物易物是最受欢迎的交易方式，同她换面包的商人，先把银币用牙咬了咬，然后又在一个斧头刃上敲了敲才换。现在她的衣着打扮，已完全像个俄罗斯姑娘了。在火车站上，乃至在火车车厢里，相互拥挤的乱糟糟的人群中，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身背背包在人群中挣扎的年轻姑娘。

她出发了。而且她也见识了一切。她面对这个国家走不完的大地毫无惧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就融溶在这无限的空间内，她就在这了无生气的时间内挣扎着向前走。有时乘火车，有时坐四轮大马车，有时步行……

在旅途中，她什么都见过。比如，一大群套上马具的马，背上没有人骑，便成群结队地奔驰在大平原上，它们会一瞬间突然停住，一旦受了惊吓，便又立即向前狂奔，对于它们自己能取得这种自由既感到快活，又觉得害怕。这群奔马中有一匹把大家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只见它的鞍子上深深地捅进去一把马刀，并且直竖在背上。那匹马疾速地奔跑，那把刀长长的利刃插入厚厚的皮革中，前后左右地摇摆着，一面在夕阳下闪闪



发光。众人用眼睛追随着夕阳中这一派闪闪的血光，看着它慢慢地掩盖在田野的薄雾中。大家都知道，这只刀柄上灌了铅的马刀，在插入马鞍的皮革中之前，可能一刀便把一个人的躯体一分为二了，——从肩部下去直劈至下腹。这两部分正拖在马的两肋下，在草地上拖着呢。

她也见到过死马被从深坑里拖出来的情景，也看见过人们在那肥沃而沉默的土地上挖新地窖的情景，那支撑穴壁的圆木，在农民们放到坑下时还散发着新鲜树干的香味。

她还看到一伙村民，在一个身穿黑色皮上衣的人的指挥下，正在一起拉一条粗绳，那绳的一头捆缠在一个教堂的圆屋顶上，而且上面还有个十字架。那一阵阵的破裂声，似乎是给那些人的热情加油。而在一个很早的清晨，在另一个村子里，她见到一位老女人，面对着被抛在没有围墙的公墓中的一个教堂的葱形圆顶，跪下来膜拜。

她还经过一些寂无人烟的村庄，那里的果园，树上的果子累累，却无人摘取，任由果子落在草地上，或者就干死在果树上。她曾在个城市里逗留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卖水果的把一个孩子的双手给砍伤，因为这个孩子曾想偷他的一个苹果。一路上她所遇到的人，似乎都在向着一个不可知的所在涌去。这些人或是围住火车，或是挤破站台，或者是等在店铺的门面前，却不知他们在等谁，因为店铺的门都是关着的。要么就站在有哨兵站岗的机关大门旁边，有时甚至连大路两边也站满了人。

她所面对的空间，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建设规划。原本这儿人群拥挤，突然之间竟然变得人迹全无，那么宽阔的天空，那么深邃的树林一下子都还给了那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人。这种毫无过渡期就突然造成无人区的做法，便导致了农民无节制的流

动，于是便出现了大批农民在秋雨连绵、河水暴涨时的泥泞的河岸上艰难跋涉的场面。是的，夏洛特当然也见过这种场面。她还看到一些愤怒的农民，在岸上拿起长长的竹竿，把满载着怨声不绝的人的平底驳船远远地推开，也还看到岸上另一些人却向驳船伸出他们那瘦骨嶙峋的双手，这些人是伤寒病患者，被遗弃在这儿，——从他们那条漂流的墓地上被扔在岸边已经有几天了。每当河里有船企图靠岸时，岸上的居民便联合起来加以阻止。于是那条船便只好像办丧事一样继续航行。人在不断地死去，当时主要是死于饥饿。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就没有力量试图靠岸了。于是船上这最后一批奄奄待毙的人，有一天会突然被强有力的浪涛很有节奏的声音弄醒，他们会看见里海<sup>①</sup>的那条冷漠的地平线……

那是一个树上挂满晶莹白霜的清晨，在一个森林的边缘，她看到树上悬着几个黑影，那是几个吊死的人，只见他们龇牙咧嘴的吊在那儿，却没有人想到要把他们埋在地下。在极高处，阳光初照的蓝天上飞着一队候鸟，并渐渐地消失得不见了踪影，它们从天空传来的鸣叫声，更加重了这里的沉寂。

这个俄国社会所吐出来的沉重而无节奏的气息，已不再使她感到害怕。自她出行以来，学到的东西是太多了。她知道，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四轮马车上；你背着一个里面装满稻草和一些碎石的背包是最为实用了。因为土匪们在夜间打劫时首先抢的就是它。她知道一节车厢的最好位置，是车顶上排气孔旁边的那个地方，因为在这个通气孔里，人们套上绳子，攀着绳子上来下去都非常快捷。有时碰上好运，她能在挤满人的

---

<sup>①</sup> 里海：在欧亚之间的一个海。

车厢过道里找到一个位置，这时她看到在地上拥挤的人们把一个吓得惊诧莫名的孩子从众人头顶上向出口处传递，但她已不再感到吃惊了。那些蜷曲在通道上睡觉的人，当他们的孩子要大小便时，便把火车门打开，架着孩子在脚踏板上解决问题。这种做法直是在开玩笑一般。做这些事时，他们面带微笑，对那个小家伙顺从地让他们这样做而一声不响，表现出一副怜恤神态，而且对在这种极不体现人道精神的环境中，对孩子有这种生理要求也表现得非常同情……在这样的深夜里，在铁路和车轮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中，发生什么事都不会令人吃惊的。只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议，人们在议论着一位旅行者在窘困的生活重压下死去的事。

在这种以痛苦、血污、疾疫、泥浆为里程碑的漫长的旅途中，只有一次，她自认为看到了一方安祥平静的天地。那已是她翻过乌拉尔山脉，到了另一边了。在一个一半毁于战火的小镇的镇口，她见到几个男人坐在满地落叶的山坡上，只见他们苍白的面孔沐浴在冬初温和的阳光里，显得安祥、幸福。赶着四轮大马车的农民摇了摇头，低声解释说：“可怜的人们，他们大约有十二三个人每天都在这个地方闲荡，都是些精神失常的人，这里的疯人院让战火烧了……”

是的，已没有任何物事可以再使她感到惊诧了。

经常是，在车厢里，她被挤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竟能在那里做一个短梦，情节记得很清楚，但却道道地地的是一种假象。一群高大的骆驼正在大雪中行走，它们扭过高傲的头向一个教堂看去。教堂的门开着，从里面走出四名战士，在他们后面还拉着一位神甫，这个神甫正在用颤抖的声音向他们说教。见到这些身上落满了雪的双峰驼，见到这座教堂，见到这些欢乐的人群，夏洛特在梦中想道，倘在从

前，这些驼背的家伙肯定是在棕榈树的国度，在沙漠里，在沙漠的绿洲里……

这时她方始在睡梦中走出，不，这不是一个梦！她正处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的一个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上。雪下得纷纷扬扬，雪花直打她的睫毛。过往的行人向她走来，并且试探着摸一摸她那个准备用来换面包的银质纪念章。骆驼们高高地雄踞于众商贩之上，就像一个古时诺曼人使用的龙头船放在岸边的支架上一般。在众人消遣的目光的注视下，那几个士兵便把那个神甫推到一架装满干草的雪橇上。

方才那个假梦做完以后，晚上的散步却是既普通又真实的了。她在一条大街上走着，街面被朦胧的路灯照得闪闪发亮，然后便推门走进一家面包店，里面十分温暖，也很明亮，以致使她觉得木制柜台上那油漆的颜色，以及橱窗里点心及巧克力食品等摆放的位置都显得那么亲切。女老板很热情地朝她笑了笑，就像接待常去的顾客一样，然后便递给她一个面包。来到街上，夏洛特便很茫然地停下来过，因为她还要买许许多多的面包！要买两个、三个，不，要买四个这样的大圆形面包！她要记住这条街的名字，以及这家特别讨人喜欢的面包店在什么地方。便来到街角的这家店门前，并抬起头来观看，但门牌上的字母十分奇怪，而且也很模糊，那字母混杂在一起而且还很反光。“瞧我多蠢！”她突然这样想，“这条街，不就是我舅舅住的那条街吗……”

突然一惊，她从梦中醒来。列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停了下来，车厢里充满了乱糟糟的声音，一群匪徒把火车司机杀死后，正在每个车厢里逐个搜寻，遇到好拿的东西，便都顺手拿走。夏洛特把披巾往上一拉，包住自己的脑袋，像农村的老女人那样把两个披巾的角在下巴下系起来。然后又对着自己梦中



的景象微微一笑，便把一个大包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这个包里装的是满满的废纸，废纸中间裹着一块石头……

如果说在这两个月的旅途中，她能幸免于难，那是因为在 她所经过的这片广大的陆地上已浸透了鲜血。死亡，起码在最近几年内，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变得十分普通了，无需花费力气便可得到它。

夏洛特步行来到她童年的故乡，那个西伯利亚的城市博雅斯克。她也不去想这件事到底是个梦呢，还是现实。她觉得自己已无力再去想这些事了。

在市长家的房屋前面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面红旗。门两旁的雪地上站了两名哨兵……剧院的一些窗户，有的被打破，有的被堵起来，没有什么好材料，便用作广告用的胶合板来凑付。可以看得见，有的地方是一簇树叶，上面覆盖着白色的花朵，那大概是《樱桃园》的广告。剧院的正门上方，有两个工人正在张挂一个长长的红布横幅，夏洛特放慢脚步，只见上面写道：“大家都来参加无神论者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工人从口中取出咬着的一颗钉子，使劲地把它钉在那个感叹号旁边。只听他向他的同志喊道：

“喂，你瞧，在天黑前可以全部完工，真是谢天谢地！”

夏洛特笑了笑，继续赶路。是的，她也不再做梦了。

在桥头上，一个站岗的士兵挡住她不让通过，要求她出示证件，夏洛特交出了证件。战士拿到后，可能看不懂，于是便决定要没收这份证件，而且，看起来，这个战士对他自己的决定也感到意外，“您到革命委员会去，在那里经过必要的验证后，还可以归还您。”他这样说，一边又重复着一些显然是某一位人物的话。夏洛特没有精神和他争论。

在博雅斯克这个地方，冬季来得特别之早。但这一天，气候却相当温和，桥下的冰面上可以看到已融化的大片大片的水。这是天气变暖的第一个信号。大片的雪花，懒洋洋地、寂无声息地落在那一片空旷的白色雪地上，这片空地她在童年时曾走过许多次。

那一间木屋，连同它那两个窄窄的窗户，似乎已远远地见到了她。是的，那间木屋在看着她一点点地走近了，它那长满皱纹的门面，也变得活跃了，好像在做着一个不易被发现的鬼脸，又似表现出久别重逢时，一种苦涩的欢快。

夏洛特对这次重归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指望。她在思想上早常做好准备，准备迎接各种使她绝望的消息：人死了，精神失常了，失踪了。或者也可能干脆就见不到人了，找不出任何说明，就那么平平常常地丢了，而且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她强使自己不抱任何希望，但却仍然在希望着什么。

直到最近几天，她已然精疲力竭，头脑中能想的，就只有那个大火炉的暖气，回想着自己曾怎样走过去，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它那个大炉壁上。

站在木屋的台阶上，透过一棵矮矮的发育不良的苹果树，她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块黑披巾，只见那位老妇人弯腰曲背，正在从雪堆里向外拉一条粗树枝。夏洛特叫了她一声，但那位老农妇并没有转身。她的声音太弱了，很快便在刚刚变暖的晦暗的空气中消散掉。她觉得自己实在已没有力量再喊第二声了。

她用肩膀一撞，便把木门打开了，在阴暗、冰冷的门道里，全是堆积的木料：箱板，地板条等，甚至还有一堆黑色和白色的东西，那是钢琴的琴键。夏洛特想起来了，那都是当地富人家里的钢琴，因为这些富农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才把他们

赶跑。她曾经见过一架，扔在一条河的冰窟里，已经让斧头给砸坏了……

走进里屋以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去摸那个大火炉壁上的石头，石头还是暖的，夏洛特感到一阵非常舒适的眩晕，此时她已经想坐下来靠在这个火炉上了，但这时却又在那张用厚木做成的、因年深日久而变成褐色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打开的书。那是一本不太厚的粗纸印成的旧书，于是她便靠在一张凳子上，侧身向打开的书页望去，奇怪的是，那上面的字一个个地都开始跳动起来，而且也变得联成一片了，——就像那天在火车上，她梦见在巴黎的一条街上，她舅舅的门牌那样。但这一次可并非在梦境中，但却是在泪水中。那是一本法文书。

那位头上裹着黑披巾的老妇人进来了，看到这位身材修长的年轻妇女在她屋里并从凳子上站起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吃惊。只见从她的胳膊里夹着的那些干树枝上落下了一条条的残雪。她那张干瘪的脸，同这个西伯利亚地区的任何一位老农妇的脸没有什么两样。她那张布满锯齿形皱纹的嘴唇在抖动着。就在这个难以辨认的女人那张嘴里，在她那已然干瘪的胸脯内，回荡着阿尔贝蒂娜的声音，这个声音，几乎连一个音符都没变。

“这些年来，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怕你再回来！”

是的，这就是阿尔贝蒂娜对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夏洛特明白：自从她们在火车站道别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八个年头了，这期间采取的各种行动，变换的各种面孔，说出的各种话语，经历的各种苦难，受到的各种贫困，产生的各种希望，出现的各种忧虑，以及吃惊的呼喊，伤心的泪水，所有生活中这一切杂乱纷纭的物事的互相碰撞，就只形成了一个声音，那就是：拒绝死亡。这一次的相聚，是那么令人喜悦，又那么令人

担心。

“我原想请个人替我写封信，告诉你，我已经死了。但这是个战乱的时代，先是打仗，后来是革命，接着又是打仗，后来又是……”

“就是写了，我也不会相信的……”

“是的，随后我也想，不管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的……”

说罢她便把树枝扔在火炉旁边，向夏洛特走去。在巴黎时，当她坐在车厢里那低矮的车窗后面向她女儿看时，那时她才十一岁，如今她马上就要满二十了。

“你听见了吗？”阿尔贝蒂娜轻声地说，脸上放着光彩，一面向火炉转去，“这是老鼠，你还记得吗？它们一直都在这儿……”

过了一会儿，阿尔贝蒂娜便蹲在火炉前边，生铁铸的炉门里面的火也愈烧愈旺了，夏洛特直躺在凳子上，似乎已经入睡了，只听阿尔贝蒂娜轻轻地低语，眼睛并不看夏洛特，似乎在对自已说的：

“这个国家就这样形成了，你进来是容易的，但要想再出去，可就难了……”

热水就好像一个全新的，人们从来不认识的东西一样，夏洛特把双手举起，迎着从上面流下来的细细的热水，那是她母亲用铜勺舀了水从上面慢慢一点点向她的双肩及后背上淋下来的。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用以照明的，就只有用碎木刨花燃起来的一个小火苗。那细细的一滴滴的热水，就像松脂油一样发着亮，它们落在身体上使人感到非常舒服，夏洛特用一种蓝颜色的硬粘土来搓身，至于肥皂，那是在人们记忆中已变得模糊的东西了。

“你身上瘦多了，”阿尔贝蒂娜低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



到。

夏洛特轻声笑了笑，当她抬起带着一头湿发的面孔时，她看到母亲无神的眼里那琥珀色的泪水正在闪光。

光阴荏苒。这期间夏洛特设法了解，她们怎样才能离开西伯利亚（出于迷信观念，她不敢说，“回到法国去”）。她来到市长住的原来那栋住宅，门口站岗的哨兵朝她笑了笑——这是个好信号吗？新上任的博雅斯克市长的女秘书让她在一个小房间里等一等。夏洛特一看，这正是原先她在这儿接受津贴、吃剩饭的那间屋子……

市长接见了她，只见他坐在一个笨重的大写字台后面，她已经进来了，但他却还在皱着眉头，手里拿着一支红铅笔，正在一本小册子上画着粗大的红杠。在他桌上堆着整整一大堆相同的小册子。

“女公民，您好！”，他终于开口了，一边向她伸过手去。

他们便开始接谈起来。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惊诧，夏洛特发现，这位官员对她的回答，完全是把她向他提的问题经过歪曲以后再重复一遍。她向他谈到法兰西救济委员会的事之后，作为回答，便听他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议论，大旨是说，西方帝国主义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搞了一些活动，但这些活动又都打着资产阶级慈善的幌子进行的。她又提到，她们想去莫斯科，然后……对方马上打断她的话说，外国干涉主义者的势力，以及国内的阶级敌人正在想方设法地破坏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重建工作……

经过一刻钟这样的交谈，夏洛特直想喊：“我只是想离开，就是这些！”但在这一对话中表现出来的荒谬逻辑使她欲罢不能。

“只要有一辆去莫斯科的火车……”

“资产阶级专家们正在铁路部门搞破坏……”

“我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

“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经济和文化余毒是可怕的……”

最后，她实在没有力气了，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我说，请您把我的证件还给我吧……”

那位领导的声音似乎遇到了一个障碍，只见一阵痉挛迅速地在脸上掠过，便什么也没说就走出了办公室。趁他不在的机会，夏洛特向那一堆小册子看了几眼，只那标题就把她抛进了极端困惑的深渊：**为解决各基层党支部男女性关系混乱问题的注意事项**。正是在这些注意事项下面，那位领导用红笔画了杠。

“我们没找到您的证件。”他一进来便这样说。

夏洛特坚持要。因为这件事，也和他讲话的逻辑一样那么不合情理。但那位领导却破口骂了起来，而且满嘴粗话，以致两个月后，在挤满人的火车上，她想起来仍感到震惊。那位领导继续怒斥夏洛特，这时她的手已经抓到办公室门的把手了，他却突然把面孔凑到夏洛特面前，压低了声音说：

“我可以把你抓起来，然后就在这个院子的厕所后面把你枪毙！肮脏的女间谍，你该明白了吧！”

回去时，夏洛特走在盖满白雪的田野上，心中暗想，一种新的语言正在这个国家诞生，这种语言她听不懂，所以在原市长的办公室里的这一场对话，在她看来，似乎有点不像真的。不，任何物事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种突然间便滑到使用一种下流语言的革命雄辩术，这种从“女公民”一下子就变成“女间谍”，以及那些为自己的党员性生活定出制度来的小册子，等等，无不如此。是的，处理各种事物的一种新秩序已开始出

现。在这个国度里，尽管一切物事，人们对它们都很熟悉，但却都要另起名字。对每一件物品，对每一个生命，都要给它们贴上不同的标签。

“那么，这下得慢腾腾的雪呢？”她暗自思忖，“那么在这黄昏时分，暗紫色的天空中，气候将回暖的时分，这些看起来昏昏欲睡的雪花呢？”她想起了，在孩子时，每当放学后，同市长的女儿出了校门走到街上时，发现这满地白雪，感到那么高兴。“可是今天……”她心中想，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几天以后，生命便被冻结了。严寒似乎突然在一个清澈明亮的夜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大地变成了一片冰裹的水晶世界，树木的枝条裹着白雪，显得亭亭玉立，白色的冰柱在烟囱上挂着一动不动，远处的泰加森林<sup>①</sup>似一条银光闪闪的白线，横在地平线。天上的太阳也罩上了一层波纹状的光晕。人的声音也传不远了，呼出来的热气立即便在唇上结成了冰。

她们两人只能做到苟延残喘。一天天凑合着活下去，也只能在自己的身体周围保留那么一小块尚有暖气的地方。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是那一间木屋救了她们。为了能挨过那个没完没了的冬季，为了能熬过那些好像没有底的寒夜，在这个木屋里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些木柴甚至那些粗大的圆木，其中饱含了西伯利亚几代人严酷的经验。阿尔贝蒂娜已摸透了，这间老房子也在偷偷地呼吸，她也已学会了同那个占屋子一半地方的石砌大火炉，和它那缓缓的热气共同生活，同这间屋子非常活跃的寂静一起生活。夏洛特呢，在观察她母亲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做法以后，经常私下笑着想：“她可是个真正的

---

<sup>①</sup> 泰加森林：俄国亚寒带针叶林的一种。

西伯利亚人了！”在屋子的进口处，她自来这儿的第一天起就已发现，有好多捆干草。这使人想起了俄国人在洗澡时用来搓身的一束束香草。一直到她们吃完家里的最后一面包，她才发现了这一捆捆干草的真正用处。阿尔贝蒂娜拿一捆草泡在热水里，到了晚上，她们便开始吃这种后来开玩笑时说的“西伯利亚菜汤”，即草茎、草籽和草根的混合物。“我开始已经用心记住了泰加幼苗的形状”，阿尔贝蒂娜一边往她们盘子里倒这种汤，一边这么说，“另外我还想，为什么本地人不大利用它呢……”

救了她们的还有那个小女孩的突然出现，那个名叫齐加诺的小姑娘。那是有一天她们在屋外的台阶上发现的，当时已差不多快冻僵了，她正用冻得僵硬的、青紫的手抓门上坚硬的木板……为了养活这个小姑娘，夏洛特花力气干的那些事，为自己她从来没干过。在市场上，有人看到她在行乞，她伸手向人讨一个葱头，几个冻土豆，或者一块肥肉。她还去党委机关食堂旁边的那个垃圾箱里去寻找吃的，这个食堂离那位市领导人扬言要枪毙她的那个地方不远。有时候为了得一个圆面包，她还当小工去卸火车上的货物。那个女孩开始时骨瘦如柴，在光明和虚无间虚弱地摇摆着，随后、慢慢地在惊诧和犹豫中，便又重新滑入这个非常特别的、有阳光、有说话、有气味、被众人称作生活的熔流中来……

三月份，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积雪在行人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位妇女（是她母亲，还是她姐姐？）来找她了，而且什么也没说便把她领走。夏洛特在村口赶上了她们，把一个大玩具娃娃递给了这个孩子，小齐加诺在整个冬季的漫长夜晚都拿着它玩……这个玩具娃娃是原先从巴黎带来的，同那些旧报纸一起放在那个“西伯利亚箱子”里，也真是



她们往昔生活中最后一批遗物中的一件。

阿尔贝蒂娜知道，真正的饥馑，那是在春天……屋里的门道里，墙边上一捆干草也没有了，市场上也空无一物。五月份，她们便不得不逃离自己的木屋，至于到何处去，她们自己也不甚了了。她们在一条大路上走着，由于春季的潮湿，道路非常难走，她们一边艰难地跋涉，一边不时弯下腰来采一些还非常细嫩的酸模幼苗。

终于有一家富农把她们收留下，给他的农场当短工。这个富农是个强壮而严厉的西伯利亚人，那一张脸有一半让大胡子遮住。大胡子下面的那张嘴很少说话，如果说，就是很简短的一个命令句。

“我什么报酬也不给你们，”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提供伙食和住宿。我收你们，绝不是因为你们眼睛长得漂亮，因为我缺人手。”

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头几天，在外边干活一回来夏洛特就像生病一样躺在那张破床上起不来，手上磨得全是发亮的水泡。阿尔贝蒂娜从早到晚缝补大麻袋，准备将来收割时装粮食，同时还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一天晚上，夏洛特累得实在不行了，遇到农场主时，便和他讲起法语来。这个农场主立即变得很有生气了，一动一动地，很活跃，眼睛也拉长了——他原来是在笑。

“好，明天你可以休息。如果你母亲想进城，也可以去……”说罢便走了，刚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来说：

“村子里年轻人每晚都跳舞，你知道吗？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讲定了，所以这位农民就什么报酬也不

给她们。秋天到了，她们准备好要回城去，他便指着一辆四轮大马车给她们看，车上搭着一顶全新的棕色粗呢蓬子。

“就是他，给你们赶车。”说着向那个坐在赶车座位上的老农看了一眼。

阿尔贝蒂娜和夏洛特向他道了谢，便爬上大车，车上装满了筐子、麻袋和大包小包的东西。

“您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市场上去？”夏洛特为了打破临走前这几分钟令人尴尬的沉默，便这样问。

“不，这是你们挣的。”

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便见车夫把缰绳一拉，大车猛地一晃，便向前走去，不久便消失在田间道路燥热的尘土中……在车蓬底下，夏洛特和她母亲发现，车上有三麻袋马铃薯，两麻袋小麦，一小木桶蜂蜜，四个大南瓜，还有好几筐子青菜、蚕豆、苹果等，在大车的另一头，她们还发现有六七只母鸡，爪子都被捆住，在它们中间还有一只大公鸡，正睁着一双忿怒而恼火的眼睛望着人们。

“我还是要晒几捆干草。”阿尔贝蒂娜说，眼睛终于离开了这一堆财宝，“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

两年以后，她就去世了。那是八月份的一个夜晚，夜色很安静，也很明亮。夏洛特刚从图书馆里回来，因为那里放了山一样一大堆从几家破产贵族家里搜来的书籍，有人让她分捡一下……她母亲就坐在同木屋墙壁连在一起的一条小凳子上，头就靠在后面很光滑的圆木上。双眼已经阖上了，可能她是睡在那儿的，人就在睡梦中死去了。从泰加树林里吹过来一阵轻风，把放在她双膝上已打开的那本书的书页吹乱了。就是那本涂金切口的法文小书。

第二年春天，他们便结了婚。他出生在白海边上的一个村庄里，距这个西伯利亚城市有一万公里，因为国内战争，才来到这儿。夏洛特很快便发现，在他那自认为是“人民的仲裁者”的自豪感中夹杂着一种模糊的苦恼，至于那原因，在那时，连他自己也说不出。在结婚的晚宴上，有一位客人提议，为悼念列宁的逝世默哀一分钟，于是大家便站了起来……结婚三个月，他便被调到这个帝国的另一端，即要到布克哈拉去。夏洛特坚决主张要把那只装满法文旧报纸的大箱子带走。她丈夫自然毫无异议。然而待到了火车上，由于对那种长期的苦恼没有成功地掩饰好，终于使她知道了，有一道界线，它比任何大山都难跨越，自此以后便在她的法国生活和他们现在的生活中间矗立起来了，她找遍了所有的词藻就是无法表达，但不久这个词便很自然地产生了：铁幕。

## 六

在暴风雨中的骆驼。严寒把树的汁液都冻僵，把树干都冻裂。夏洛特用已然冻僵的双手抓住从一个车厢里扔下来的一些长长的木柴……

就这样，在我们被熏得黑黑的厨房内，经过那么多个冬日的长夜，这一传奇性的往昔又再现了。在覆盖着积雪的窗外，是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伏尔加河流域灰色的大平原，在上面矗立着一座座堡垒式的大楼，那是斯大林式的建筑风格。厨房里，在这顿无休止的晚饭杯盘狼藉的饭桌上，在饭桌发着珍珠般的光亮中，便出现了那个神秘的法国女性，只见她正在西伯利亚的天底下踟躇。电视机正在播放当天的新闻，播送的是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开会的消息。但这些内容却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客人们的谈话。

在这个人满为患的厨房里，我蜷缩着身子躲在一个角落里，肩膀顶着那个放电视机的搁板，一边非常注意听他们讲，一边努力想使自己不被他们看见。我晓得，过不了多久，便会从蓝色的烟草云雾中露出一张大人的脸，便会听到一声生气又诙谐的喊叫：

“喂，大家都来看，瞧瞧这个小夜游神！现在已经半夜多了，他还没上床睡觉。好了，快点，快去睡觉！等你长了胡子，我们会叫你来听的……”

被赶出厨房后，我也无法马上入睡，在我年幼的头脑中，



这个使人困惑的问题，始终不断地来打扰我：“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那么喜欢谈夏洛特？”

一开始，我认为我明白了，因为对我的亲属和我亲属邀请的客人们来说，这个法国女性是他们谈话的理想话题，不错，只要他们一提起最近这一场战争，热烈的争论马上就会爆发。我父亲是步兵，在前线打了四年仗，他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在陆地作战的部队，按他的话说，就是从斯大林格勒直到柏林，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洒遍了这片土地。他的哥哥，不想得罪他，便说，“正像大家所公认的那样”，炮兵乃是现代战争中的女神，于是争论便热烈起来，慢慢地，炮兵便被当成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了，而步兵呢，由于在地上作战，其道路肮脏泥泞，也被说成是“臭步兵”了。在这时候，他们一位最好的朋友，在战争中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也带着自己的论据披挂上阵了，于是这场争论便进入了极其危险的“俯冲”阶段。然而他们既没有分析一下他们这个战场上各种部队各自有什么功绩，也没想到在战争中斯大林的作用……

我能感觉得出，这一场争论，很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晓得，不管自己在这胜利中有多大功劳，总之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一代，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幸存者也都创伤累累；而且不久也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不管你是步兵、炮兵，还是飞行员，概莫能外。我母亲就步二十年代出生的那些孩子们的后尘，不久就先他们而去了。于是我在四岁那年，就和姐姐相依为命。这种对不久即将出现的事实，在他们的争论中似乎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预感一样……我想，夏洛特的生活向这些争论的双方提供了一块中立的土地，能够使他们言归于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开始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喜欢就

这个法国女性展开无休止的论战，那实在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夏洛特在俄国的天底下出现，有如一个外星人。她无需亲身经历这个版图极大的帝国严酷的历史，无需来忍受饥饿，经历革命，参加内战……完全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是俄国人，没有别的选择，而她呢？借用她的目光，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变得认不出来的国家，因为，由一个外国女性来判断一件事，特别是她有时还显得有些天真，常常比他们自己判断来得更准确。在夏洛特眼睛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自发的真理，即一个违反常规的俄国，一个需要由他们自己来揭示的俄国。

我继续听他们讲话。我也要像他们那样由我自己去揭示夏洛特在俄国的遭遇，但却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可某一些细节刚刚被抓住，便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完全秘密的世界，因而便大大地扩展开来。至于其它一些事件，能使成年人认真对待的，又似乎没有发现。

就这样，奇怪的是，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村庄里，那些吃人的残忍景象，却又很少使我感应。我刚刚谈过《鲁宾逊漂流记》<sup>①</sup> 书中“礼拜五”等那些土人，吃人时那种兴高采烈的情景，以其浪漫主义的情调，对我影响很大，因此我对现实中的残暴就不甚在意了。

夏洛特从前在农村时，在农庄上干的那些沉重艰辛的劳动，也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没有，那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村子里经常到青年人那里去串门。甚至晚上

---

<sup>①</sup> 《鲁宾逊漂流记》：英国 18 世纪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写于 1917 年，下文的“礼拜五”，是鲁宾逊俘虏的土人。

也去，有时还发现他们正在讨论一些非常玄妙的问题，比如，他们想探讨一下，那种敢于一个人在半夜里到一个荒野墓地上去的人，是哪一种死人才能把他吓倒。对此，夏洛特只是微微一笑，她自信自己完全可以对付各种超自然的力量，而那天晚上，他们也正是在一堆堆的坟墓中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们消遣娱乐的时候很少，那些年轻人，私下里总想解决一下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便怀着极大的热情对她那种勇敢精神表示欢迎。下面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件东西，让这个不知轻重的法国女青年把它放在乡村墓地的一个坟头上去，这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任何一件被选择使用的物品都能够被同它相同的東西所代替，比如：披巾、石块、硬币……是的，这个狡猾的外国姑娘，她可以在大家都在熟睡的黎明时分，很轻松地来到那儿把她的披肩挂在坟上，不，不能这样，必须选一个不能被代替的东西……第二天清早，青年人便派出一个小组前去查看，结果在墓地一个最隐蔽的地方，在一个十字架上挂着一个——小“新桥皮包”……

正是想象了在西伯利亚的天底下，在众多的十字架中间，有这么一位女式的皮包之后，我方始预感到各种物品的难以相信的命运。这些东西，经过迁徙、动荡之后，在它们平凡的外表上记录下我们生命每一个时期的痕迹，而且把每一个瞬间都联系得那么紧。

至于我外祖母同那个“人民的仲裁者”的婚礼，毫无疑问，我不会从中发现什么可以纪念的能使得当时成年人称道的特别之处。夏洛特的爱情，我外祖父对她的追求，以及他们这完全处于西伯利亚风俗之外的一对夫妻，对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在记忆中保留的，只有一个片段：费奥多尔，他身穿熨得笔挺的制服上衣，长统靴擦得闪闪发光，便向他们预定的决定他

们命运的那个地方走去，在他后边几步远的地方，是他的书记官，此人是东正教神甫的小儿子，很清楚当时这种场合的严肃性，所以，手中擎着一大把玫瑰花束正在慢慢地迈着方步。一个人民的仲裁者，尽管在热恋中，也绝不能表现得像轻歌剧中的求爱者那样的。夏洛特远远地看着他们，立即便明白了表演这一幕的原委，于是带着狡黠的微笑，接受了费奥多尔从书记官手中拿过来的那束玫瑰。书记官感到手足无措，又很好奇，便倒退着逃跑了。

可能还有另一个片段：那就是他们还留下唯一的一张结婚照片（其它照片，凡是上面有外祖父的，在他被捕时都被搜走了。）是他们两个的人头像，头彼此向对方稍稍靠过去。夏洛特那么年轻，又那么漂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向她的嘴上看，在微笑中明显地突出了“petite pomme”……

另外，每天晚上大家讲述的这些漫长的往事，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孩子来说，也并非完全都是那么清楚明白，比如，夏洛特父亲那种一时的冲动我就不懂。有一天，这位颇受人尊敬而生活富裕的医生，从在警察局担任高级职务的他的一个病人那里得知，那天工人们举行的大游行，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向博雅斯克那个最大的广场逼近，而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迎接他们的将是机关枪的扫射。待到他那位病人一走，这位勒莫尼埃医生便立即脱掉白大褂，也没叫他的车夫，便跳上马车，自己驾车穿街走巷去向工人们报信。

屠杀没能得逞……但我却常常自问，这个“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特权阶级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已经习惯于区分穿黑衣服的和穿白衣服的，也就是说已习惯于区分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一句话，习惯于看他是阶级敌人呢，还是正义的人们。然而，夏洛特父亲的做法，把我搞糊涂了。从轻



而易举划分成两部分的人群中，便有这种人，和他们那种难以逆料的自由一起出现。

在布克哈拉发生的事，我也闹不懂。从大人們的讲述中，我只能凭猜想，觉得他们说的事可能是残酷的。那些大人们用暗示的语言提起那件事时，伴随着启发性的点头示意，这不是很不平常吗？可以肯定那件事是犯禁忌的，但在大家讲述的过程中，加上描写，那背景就经常变换。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河，它在铺满光滑卵石的河床上流淌，随后便是一条道路，它在沙漠上伸向远方。太阳也开始在夏洛特的眼睛里摇动了，她的双颊也被灼热的砂石炙得似在燃烧，天空中传来了马嘶……这种场面，到底包含着何种意义，我不得而知，但随之，一切便都消失。大人们叹了口气，便转变了话题，同时又倒了一杯伏特加。

最后，我的猜测是，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是发生在亚洲中部的大沙漠里，它总是以神秘的方式，很隐蔽地表明，那同我们家的历史有关。而且我还发现，这些人怎么也不会把这件事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因为夏洛特的儿子，我的舅舅塞尔格依就在那些客人中间……

事实上，如果我要是偷偷地窃听大人们晚上讲的这些秘密，还是能得到东西的，特别是在了解外祖母在法国的历史情况方面。她在俄国这边的事，我相对地不太感兴趣。我恰似一个这样的探索者，他一面研究着天上落下的陨星，一面主要的兴趣却被它玄武岩表面上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小型晶体所吸引。正像一个人在梦想着一次远游，但那目的是什么，却还不知道。我在梦想着夏洛特的那个凉台，梦想着她的阿特朗蒂德。我觉得，去年夏天，我已把我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那儿。



# 第二章





那年夏天，我特别害怕碰到沙皇……是的，特别害怕再在巴黎的大街上见到这位年轻的皇帝和皇后。这就如同怕和一个医生告诉你，他的大限将尽的朋友相遇一样，而这个朋友却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还在兴高采烈地向你讲述着他的各种打算。

不错，如果我已知道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已被罢黜，我怎么还能去追随他们呢？如果我知道了他们的女儿奥列加也将不能得到赦免，如果我了解到，亚历山德拉当时尚未生下来的其它孩子也将遭受同样的悲惨命运的话，又会怎样呢？

那天晚上，我怀着偷偷的喜悦心情看到，外祖母坐在她凉台上的花丛中，正把一小本诗集放在双膝上翻阅。

莫非说她已感觉到，我想起了去年夏天的变故时，那种局促的情绪？还是仅仅简单地为了给我们读一本她喜爱的诗集？

我便走到她旁边，坐在地上，胳膊肘支在那个胡子石像的头上。姐姐站在另一边，身子靠在凉台的栏杆上，目光融溶在大草原湿热的薄雾中。

夏洛特朗读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似与诗歌的内容融为一体：

你是一支古老的乐曲，我要把

罗西尼<sup>①</sup>，莫扎特<sup>②</sup>，和韦贝尔<sup>③</sup> 奉献给你。

你的旋律是那么忧伤而哀怨。

只使我一个人为你悄悄地着迷……

奈瓦尔<sup>④</sup> 这首诗的神奇魅力，竟使得在夜晚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座路易十三时代的城堡，和那位“金发黑眼，身着古代服装”的城堡主夫人……

这时，姐姐的声音把我从诗境的冥想中拉了出来：

“那位费利克斯·富尔，他现在怎样了？”

她一直呆在那儿，在凉台的角落上，身子微微地向栏杆外倾斜着。她心不在焉地不时伸手摘一朵已经开败的牵牛花，一边又在黑暗中转过身去顺手把它扔掉。她正沉浸在少女的梦幻中，根本没有听到外祖母的诗朗诵。这是她十五岁那年夏天……可她为什么忽然想起法国总统来了？也许因为这个人长得漂亮、伟岸，再加上一撮漂亮的小胡子和一双沉着冷静的大眼睛，这一切都能使他忽而表现得像多情的梦幻一般叫人捉摸不定，忽而又表现出一个大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吧。她这句问话是用俄语说的，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悄悄地袭上她心头来的那句令人担心的、含义奥妙的话吧：

“那位费利克斯·富尔，现在他怎样了？”

夏洛特飞快地朝我瞟了一眼，充满了笑意。然后便把放在她双膝上的书合上，轻轻地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着远方，看

---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③ 韦贝尔（1786—1826）：法国作曲家。

④ 奈瓦尔（1805—1855）：法国作家。

着遥远的天际，在那个方向，已经一年多了，我们每天都看到那儿浮现着阿特朗蒂德。

“在尼古拉二世访问巴黎的几年之后，总统就死了……”

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这种不经意的暂短停顿，更加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他是猝然而逝的，就在爱丽舍宫。死在他的情妇玛格丽特·斯丹海尔的怀里……”

就是这句话，宣告了我童年的终结。

“他死在情妇的怀抱里……”

这句话所包含的悲剧美震撼了我。自此，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了。

此外，在这件事中，尤其使我震惊的，是它发生的地点：这种爱和死的场景，竟是发生在爱丽舍宫！在总统的府邸！竟发生在这个权力的金字塔的尖端，荣誉的顶峰，社会著名人物的身上……我在想象着宫内豪华的景象，那高博兰<sup>①</sup>的花毯，那镀金的器皿，那一排排明亮的大镜子等等。在这些华丽的陈设中间，有一个男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一个女人正狂热地搂抱在一起……

在惊诧中，我便不自觉地开始把这一幕画面转移到俄国方面，也就是说，把法国的那些主要人物，用俄国相应的人物来替代。于是一长列身穿黑色西装耸肩缩颈的幽灵，便鱼贯来到我的眼前，他们都是政治局书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四个人有四种完全不同的个性，或者被人民群众所爱戴或者被群众所讨厌，但是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帝国的历史上都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然而，这

---

<sup>①</sup> 高博兰：巴黎生产花毯的著名厂家。

四个人，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情妇，那是不可想象的。

“总统死在爱丽舍宫，死在他情妇玛格丽特·斯丹海尔的怀里……”这句话就如同译成电码的电文，来自另一个星系。

夏洛特起身到那只西伯利亚箱子里去找当时的旧报纸，以期能够在上面找到斯丹海尔夫人的照片给我们看。我呢，因为被方才那幕我所喜爱的法兰西——俄国的转换搞得心绪纷乱，便想起了一天晚上，从我同班同学，一个又懒又笨的学生嘴里听到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在学校阴暗的走廊上走着，当时刚刚做完举重练习，举重是他唯一的强项，待我们走到列宁的像下时，我这位伙伴吹了一声极不礼貌的口哨，并且说：

“哼，哼，什么列宁。他，他连孩子都没有。那只不过是因他不会做爱的关系……”

他用了一个很粗俗的动词来形容性交行为。按他的看法，他认为列宁的性机能不健全。那个动词，我可从来也不敢用，它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就变成了畸形的了。我当时感到十分窘迫，似乎听到了这个伤风败俗的动词在空荡荡的长长的走廊里响着回声……

“费利克斯·富尔……共和国总统……死于他情妇的怀里……”。阿特朗蒂德——法兰西，在我面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成了一个“terra incognita”<sup>①</sup>，在那里，我们俄罗斯民族已经不时兴了。

费利克斯·富尔之死，使我注意到自己的年龄：当时我十三岁，并猜想着：“在一个女人怀里死去”意味着什么，而且

---

<sup>①</sup> terra incognita：意大利文：“难以捉摸的地方”。

以后也可以就类似的话题互相交换意见。再说，在夏洛特的讲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对虚伪的绝对摒弃，也表明了我所了解的是对的，即，她并非一个像一般人那样的外祖母。不，任何一位俄国的“巴布什卡”都不敢同她的孙辈们讨论这些问题。在这种十分自由的表达自己看法的气氛中，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视觉，这种视觉是身体的，爱情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视觉，亦即是说，是一种神秘的，“法国式的视觉”。

一清早，我就一个人跑到草原上去思索，想一个人思索一下共和国总统之死给我的生活所带来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变化。使我特别吃惊的是，这一思索如果用俄语来表达，那个场景说出来可就不太好了，甚至不可能说出！这种表达由于被一些羞于出口的话语所羁绊，便突然间被一种奇怪的、令人讨厌的道德标准给压了下去，说到底，它之所以不好出口，是因为它徘徊于两种表达方式中间，一种表达是病态的淫秽的表达方法，另一种表达，是婉转含蓄的表达方法，它把一对情人说成是很蹩脚的爱情小说里的人物。

“不，”我对自己说，一边躺在被热风吹得起伏不定的草地上，“只有用法语表达，才能说，他是死在玛格丽特·斯丹海尔的怀里……”

正是由于爱丽舍宫的这一对情人，我才得以了解了那位年轻女仆的秘密。她在浴盆里洗澡时，被她的主人碰见了，于是带着恐惧的心情委身于他，从而也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热烈的梦想。是的，从前这种离奇的三重奏，只是在我春天里读的



一篇莫泊桑<sup>①</sup>的小说中见到过。根据那小说上的描写，一个巴黎的纨绔子弟，渴望得到一个难以实现的女子的爱情，这位女子做出一副十分文雅、十分矜持的姿态。她工于心计，懒散娇弱，就像一朵脆嫩的兰花，那位公子哥儿千方百计想取得她的青睐，但她总是让他空怀想念，却不能得逞。同他们相比，这位女仆，年轻的浴室清洁工，却有一副强壮和健全的躯体。刚一读那篇小说时，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个三角形显得有点人工造作的痕迹，没有生气。实际上，这两个女人甚至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对情敌……

自那以后，我便对巴黎的三角关系抱着一个全新的看法了。它们变得具体了，实在了，也看得见，摸得着了，因为他们都是活人！现在我也明白了，那位女仆从浴盆里被拉出来，全身湿漉漉地被抱到一张床上时，那种又害怕又幸福的心情。我甚至都能体会到水珠儿在她柔软的胸脯上曲折滚动时那种发痒的感觉，也感觉到她的双臀在那个男人臂上的重量，我甚至都能看到她赤裸的身子刚刚被拉出来后，浴盆里水在有节奏地晃动的景象，那水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可是另一边呢，那个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又不被接受的女子呢，从前，她总使我想到了，她似夹在一本书里干枯了的花朵，秘密地没溺于夜间的肉欲之中。她的身体内蕴藏着一种散发着香气的热能，一种使人眩晕的芬芳，而这一切又都因为她血液的奔腾，她肌肤的润泽，说话时慢声细气而又富有勾摄力所致。

不可抵御的爱情，使共和国总统的心灵爆炸了，同时也改变了我心目中法兰西的形象。这个法兰西就其主要方面讲是浪漫的。文人学士们正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忽然间在使人难

---

<sup>①</sup> 莫泊桑（1850—1893）：法国小说家。

忘这天晚上，发现自己在漫长的梦境中方才醒过来一般。从前，他们枉自挥舞长剑，枉自攀登绳梯，枉自吞吃砒霜，枉自宣布自己的所爱，而且，也枉自坐在豪华的四轮马车上外出旅行，膝上摆着爱人的头颅——他们总是离不开自己那个虚伪的世界。因为他们具有异国情调，虽然辉煌显赫，但却也可能显得有些可笑，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感应。和福楼拜<sup>①</sup>小说中的那个神甫，就是爱玛向他倾述自己痛苦的那个外省的教士一样。我对这个女人也同样不理解，因此我很赞成他的话：“这个女人，漂亮的房子有了，勤快的丈夫有了，邻居的尊敬也有了……她还想要什么呢？”

爱丽舍宫里这一对情人也帮助我读懂了《包法利夫人》。凭着我突如其来的直感，我抓住了这样一个细节：理发师那润滑的手指正在灵巧地束理着爱玛的头发。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空气沉重，烛光把晚间阴暗模糊的阴影驱散。这个女人坐在镜子前面，她刚刚离开她那位年轻的情夫，现在正准备回自己家里去。是的，我便开始体验，一个成年女子，晚上，在一家理发馆里，这时她刚刚走出约会的旅馆，还能感到她情人的最后一吻，便又不得不对她丈夫讲那些最无聊最平常的话语了，这时，她会做何想法……我自己尚未能来得及说明，便已听到这个女子灵魂深处的心弦响亮地震动起来。我的心灵同她发生了共振，“爱玛·包法利，就是我！”<sup>②</sup>突然在夏洛特的讲述中出现了一个笑咪咪的声音，这样小声对我说。

---

①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下面讲的那些，是有关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内容。

② 这句话原是福楼拜自己的一句名言。

在我们的阿特朗蒂德，时间的流动有它自己的规律。当然，准确地说，它并不流动，但它却围绕着夏洛特提到的每件事波动。每件事即使纯系出于偶然，都将会永远在这个国家的报纸上留下记载。比如天上的慧星。夜晚的天空，总要有一颗慧星划过，但外祖母却能引证剪报，向我们准确说明这一天体现象发生的日期是1882年10月17日。如果没有那个疯狂的奥地利人，我们就不再能设想艾菲尔铁塔是什么样子的了，他从塔顶那个锯齿形的尖顶上跳下，由于降落伞出了毛病，竟活活摔死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拉雪兹公墓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宁静的墓地，那个地方也充满了被前往瞻仰的旅游者那种怀着敬意的议论声。不，在那些坟墓中间，手持武器的人们在穿梭般奔走，并各自隐蔽在墓碑后面互相交火。像这种巴黎公社人员同凡尔赛人之间的战斗，一旦讲给我们听，在我们的头脑中这种场面便永远同“拉雪兹神父公墓”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另外，我们也还听到过在巴黎地下基地里枪战的声音。因为，据夏洛特说，他们在这种迷宫式的地下战斗，那子弹把几个世纪以前就死去的人的颅骨都击得粉碎。如果阿特朗蒂德那片土地上的夜空被慧星照亮，或者有德国人的齐柏林飞艇飞行，那么白天，这片碧蓝的天空上，便会被单翼飞机有节奏的鸣叫声所充斥。那一定是那位名叫路易·布雷里奥<sup>①</sup>的老兄在飞越英吉利海峡。

对事件的选择，多少带点儿主观性。下面要讲哪些事，那要取决于我们想了解它的热情有多大，也取决于我们提出的那些毫无系统的问题是什么。但不管该事件的重要性如何，却总

---

<sup>①</sup> 路易·布雷里奥（1872—1936）：法国飞机驾驶员及设计师，他于1909年7月25日，首次驾机穿过英吉利海峡。

不会背离一般的习惯。比如，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浮士德》时，天花板上的分支吊灯突然落了下来，那么它那清脆的碎裂声马上会传遍巴黎的各个客厅。而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戏剧是在设想着那么大的一串玻璃花冠<sup>①</sup>能够轻轻地脱离天花板落下来，并能发出一种装饰音或者诗歌一般的音律，那么，这个花冠一定是相当成熟了……至于巴黎上演的真正马戏，据我们所知，那驯兽师总是要被猛兽们咬死的，就像那个名叫戴尔莫尼克的黑人一样，他饲养的七只母狮一起向他发起了攻击。

夏洛特把她所掌握的东西和盘托出，有一些是她那只西伯利亚箱子里的材料，有一些是她童年的记忆。其中有一些故事，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是从她舅舅或是从阿尔贝蒂娜那里听来的，而他们又是从自己的上辈那里听到的。

但对我们来说，准确的年代并不太重要！阿特朗蒂德的时间，只承认现在时的神奇性。浮士德响亮颤抖的男中音响彻剧场：“请让我，请让我仔细看看你的面孔……”分支吊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母狮扑向不幸的戴尔莫尼克，陨星划破黑暗的夜空，跳伞者从艾菲尔铁塔上跳下，两名盗贼利用夏季人们疏于防范的机会，从卢浮宫出来时，顺便把《蒙娜丽莎》的画像真迹偷了出来，波尔赫兹亲王挺起胸膛，兴高采烈，为自己驾汽车首次冲击“北京——巴黎”中经莫斯科的路线成功而骄傲……在爱丽舍宫一个秘密沙龙里一个半明半暗的地方，一位留着漂亮的白色的唇须的男人正在紧紧地搂抱着他的情妇，就在这最后的一吻中，他也便与世长辞了。就是这种现在时态，各种行为都在其中无止境在重复着，当然是视神经的一种错觉。然而却正是因了这种虚幻的错觉，才使我们发现了我们阿特朗

---

① 指分支吊灯的形状。



蒂德的子民们主要特点和某些轮廓。在我们听到的讲述中，巴黎的街道经常被炸弹的爆炸所震动。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那数量同街上的马车里坐在座位上的车夫或女人一般多。这些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们，他们某些人的名字会和炸弹爆炸声或步枪声一起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拉瓦舒尔、桑托、加慈里奥……

是的，当这些街道在轰雷似的爆炸时，这个民族中的一些奇特的人物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总是搞着请愿的活动，他们从来就对现状不满，随时准备到他们那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去闹事。当我们祖国的社会治安处于非常平静状态时，这些法兰西人的面孔就像天生的反叛者一样，就像从信念上操不同政见者一样，又像个职业的牢骚者。那只西伯利亚箱子里装的报纸上，有记载罢工的，有记载谋杀的，也有记载街头战斗的，这个箱子本身就像一颗大炸弹，它被安置在正处于宁静睡眠中的沙朗札城里。

随后，我们便到了距爆炸地点有几条街的那个平静的小酒馆里。当然那时间总是凝固不动的现在时。在夏洛特的记忆中，她微笑着说，那个酒馆的名字是“纳伊甜酒馆”，接着她又解释说：“这种甜酒，这里的老板是把它们倒在银贝壳里喝的……”

我们的阿特朗蒂德的人，于是便能够对一个咖啡馆倾注一种情感的依恋，或者喜爱它那种别具一格的招牌，或者从那里体验到一种对他们很为相宜的气氛。而且还可以毕生保留着这样一个回忆，即，就在那个地方，在大街的角上，我们用银贝壳喝过那种甜酒。不错，在那里喝酒不是用的各式各样的玻璃杯，也不是高脚杯，而是很精致的贝壳。我们还有一个新发现，就是：这种讲究，都是同饮食行业相关联的，比如吃饭时



举行的带宗教色彩的仪式，以及这种仪式表现出来的精神色调等。

“他们所最喜欢的这些小酒馆”我们心中暗想，“是否它们自己也有个灵魂？或者，至少也该有一个人的外表吧？”

在沙朗札就只有一个咖啡馆。尽管它名字很漂亮，叫“雪花咖啡馆”，但却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特别的兴趣，觉得既和它旁边的那家家具店没有什么区别，也同它对面的那家储蓄所没有什么不同。它每晚八点就关门，但它黑乎乎的内部却漏出一线蓝色的灯光，这一点倒常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至于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城市，在伏尔加河边上有那么五六家餐馆。大家行动一致：一律七点整开门。看门人一开门，外面便已等了一大堆不耐烦的人群了。于是打雷一般的音乐声，加杂着烧焦了的油味，便一下子涌到了大街上，等到中午十一点，又是那么大批人，只不过显得神疲意懒，浑身无力的样子，便一下子涌到门外的台阶上来……银贝壳，“纳伊甜酒馆”我默默地念叨着。

夏洛特也曾给我们解释过纳伊甜酒这种不寻常的饮料的成分。她的讲述，特别自然地要谈到酒的世界。我们简直被那些五花八门的名称，名种各样的味道，不同类型的芳香给惊呆了。我们终于了解了这些非比寻常的酒类。而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辨别出它们的区别所在。但依然是那些街垒的制造者在作祟！我们想起了摆在“雪花咖啡馆”橱窗里一些酒瓶上贴的商标，到现在我们方始明白，原来那些都是纯粹的法国名字：“香槟斯克依”，“柯尼亚克”，“西尔瓦内”，“阿里克泰”，“穆斯卡”，“加各尔”……

是的，正是这种荒唐现象才使得我们茫然不知所措：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们就是善于制造出这么一系列的似是而非的饮料。另外，所有这些数不清的酒类，按夏洛特的说法，又同奶

酪的制造形成了极大的联合体！而奶酪的生产，又形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各种口味大全，而且极富有地方色彩，也就是说几乎各行其是……拉伯雷<sup>①</sup> 曾经常常光临我们的草原之夜，因此，他没有说谎。

我们还发现，吃饭，是的，就是简单的对食物的吸收，也能变成一幕戏剧，一种仪式，一门艺术。比如在那个“吉利咖啡馆”，就是位于意大利人大街上的那家饭馆，夏洛特的舅舅经常和他的朋友们去吃晚饭的那家。那是她舅舅亲口对外甥女讲的这个使人无法相信的故事：他们吃了一百只青蛙，算帐时竟收他们一万法朗！“那天天气特别冷”他回忆说，“所有的河面上都结了冰，要想破冰下水弄到这些青蛙需要五十个工人……”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我们眼前的这些景象更使我们吃惊的了：一种使人无法想象的菜肴，同“美食”这个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或者是一大群俄国庄稼汉（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正在已封冻的塞纳河上破冰。

说实话，我们开始糊涂了：那卢浮宫，那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纪德的戏剧，那些街垒，那地下墓地里的枪战，法兰西学院，小船上的议员，慧星，还有天花板上的分支吊灯一个接一个地落下，还有像尼加拉瓜大瀑布般的酒，还有共和国总统的最后一吻……还有被从冬眠中搞出来的那些青蛙！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民，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目光，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创作，他们的爱，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夏洛特告诉我们，也还有一位名叫于尔班·杜布瓦的著名

---

<sup>①</sup> 拉伯雷（1483—1553）：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小说家，代表作有《巨人传》等。

厨师做了鲜虾汤呈给了沙拉赫·贝尔娜<sup>①</sup>的事。这些使我们想到了要把一盘俄罗斯芥菜浓汤呈给献给某人，而不是送给他一本书……一天，在阿特朗蒂德大街上，我们走在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公子哥儿的后面，只见他走进“韦伯”咖啡馆去，据夏洛特的舅舅说，那是当时非常时髦的一家咖啡馆。他在那里要了平时常要的东西：一串葡萄和一杯果汁。此人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我们用眼睛瞧着那一串葡萄和那一杯果汁，在我们迷惑不解的目光下，这些东西竟变成了一桌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但却没有那么多花色的酒，也没有拉伯雷式的那丰盛的食品，然而……

我们又重新思考法国人的内心世界，并极力想破解个中的奥秘。而夏洛特呢，就如想让我们这种探讨变得更加有声有色一般，她已经在向我们讲述舒塞——当坦大街上那家“荡妇”饭店了。加拉曼——什梅公主就是一天晚上在那儿被那个茨岗小提琴手里戈给迷住了……

对此我尚不敢相信，便悄悄地问自己：这位如此难得的法兰西精英，难道她原先就没有爱情吗？我们阿特朗蒂德的所有道路，似乎一到了爱情国<sup>②</sup>便都互相交叉了。

沙朗札沉浸于草原之夜的辛香中，这种香同另一种香混合在一起，那另一种香是把裹在缀着宝石的皮裘内的女性娇躯薰香的那种香，因为夏洛特又向我们讲起了那位不可思议的奥泰罗的放荡行为了。我带着一种惊疑的神色打量着这最后一位伟大的高级妓女画像，只见她挺着肚子，十分随便地靠在靠背椅上，她把荒诞怪僻的一生，完全贡献给爱情。在她的宝座周

---

① 沙拉赫·贝尔娜（1844—1923）：法国悲剧女演员。

② 爱情国：为17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名词。

围，许多男人在躁动着，一些人在计算已经破了产的那点微薄的金币，另一些人则慢慢把手枪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即使在做这最后一个动作时，他们也忘不了表现得十分风雅，以便配得上普鲁斯特的那一串葡萄。于是，那些不幸的情人中的一个便在这个地方自杀身亡了，这个地方正是加萝琳·奥泰罗第一次同他见面的地方！

此外，在这个国家，对爱情的崇拜，不分社会等级界限，即使不在这些豪华的小客厅里，就是在普普通通的村镇上也是如此。我们在贝尔维尔看到过两帮敌对的团伙，为争夺一个女人而互相残杀。这个女人同美丽的奥泰罗只有一点不同，奥泰罗的头发黑如墨缎，而被争夺的这个女人的头发则恰如在落日晚霞照耀下已成熟的麦穗。所以贝尔维尔的强盗们称它为“金帽子”。

我们这种批评态度在当时是遭到反对的，我们可以相信吃青蛙的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但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为了一个漂亮眼睛的女人，那些强人们竟不惜互相扼住对方的咽喉！

很明显，一切对我们的阿特朗蒂德来说，却毫不足怪，难道我们没看到过夏洛特的舅舅从破马车里下来，双目无神，手臂被一条血迹斑斑的头巾包住——他刚刚在马尔丽森林里同人决斗过，那起因是为了保住一位太太的名誉……随后，那位落魄的独裁者，布朗热<sup>①</sup>将军，不也是在自己可爱的人的坟前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吗？

一天，我们在外边散步回来时，突然遇上了一场大雨，我们三个人都被淋在雨中……于是便在沙朗札的老街上走着，这种老式街道由清一色的大木屋组成，这些木屋又由于年代久

---

<sup>①</sup> 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曾任作战部长，鼓吹沙文主义。



远，已变得黑乎乎的了，终于在一栋大木屋的档雨檐下我们找到了一个躲雨处。当时的街道上，正被暑气笼罩着使人喘不出气，却突然间有这么一分钟的清凉，那是因为这时又下了一阵冰雹。街道路面也是老式的，——用圆形花岗岩大石块铺成，由于受雨水一击，水中便冒着一股强烈的石头味。那一排排房屋，朦朦胧胧的似被一面轻柔的水幕所笼罩。正是因为有了这股味，才使人们觉得，自己是在傍晚时分，在一阵秋雨中，走在一个大城市里。夏洛特的声音，一开始勉强能压过雨滴的声响，有如这朦胧的秋雨产生的一个微弱的回声：

“也正是由于下了一场雨，才使我发现了刻在一栋房屋潮湿的墙上的那个题铭。那栋房子坐落在巴黎阿尔巴雷特里埃大街上。当时我们，我母亲和我，躲在一个门洞里，等着雨停下来，我们眼前就只有这么一块纪念性的铭文。于是我们使用心把这些文字记住了：‘就在这个通道上，在这个进出于巴尔贝特旅馆的出入口处，国王查理四世的兄弟，路易·德·奥尔良公爵<sup>①</sup>于1407年11月23至24日晨被勃艮第公爵让·桑·勃尔<sup>②</sup>杀害’……当时他正从伊莎博·德·巴维尔<sup>③</sup>王后那里出来……”

说到这儿，外祖母打住不说了。我们却始终听到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似在窃窃私语，在讲着用爱和死织就的他们这些悲剧性的名字：路易·德·奥尔良，伊莎博·德·巴维尔，让·桑勃尔……

---

① 奥尔良：法国有四个奥尔良贵族世家，这里指的是第二个奥尔良贵族世家。

② 让·桑·勃尔（1371—1435）：是国王让·勒崩的孙子。

③ 伊莎博·德·巴维尔（1331—1435）：法国国王查理四世的妻子。



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共和国总统，那思想特别清晰，特别简单，也特别明显：在整个的欢迎俄国皇帝夫妇的仪式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车队中，在拿破仑的墓前，还有，在巴黎歌剧院里，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思念她，思念她的情妇，思念那个玛格丽特·斯丹海尔。在他同沙皇交谈时，在发表演说时，在回答皇后的问话时，在和他的夫人交换眼色时，她每时每刻都在当场。

秋雨在长满苔藓的古老的木屋顶上形成小溪向下流，我们就躲在木屋下的台阶上。一时间我竟忘了身在何处，从前我随着沙皇访问的那个城市，在我眼前变了模样，我身在现时，却用陷入爱河的共和国总统的目光去观察那座城市。

这一次，在离开沙朗札时，我的印象好像是一次远征凯旋而归的人。我带走了一些知识，了解了一些风俗习惯，听到了某些叙述，尽管还不甚全面，也懂得了那种神秘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每天晚上都在大草原的深处再生。任何一个青少年都是属于某一类型的。他们面对成人世界的复杂性有一种本能的自卫心，而这种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却又在儿童世界的门口吸引着他们。我可能在这方面受的吸引比其他人更强烈。因为我要探索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必须透过往昔岁月的浓雾，重新绘制那些高等社会和圣迹所在地的地形图。

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收集品中，有一个人类的长廊，那里除了那位十分钟情的总统之外，还有小船上的议员，在餐馆里要一串葡萄的那位公子哥儿，一些地位相当低下的人，尽管他们也并非寻常人物。比如那些孩子，还非常年轻就当上了煤矿工人，他们的笑脸上抹得全是煤黑。还有一个当街叫卖的报贩子（我们不敢想象，一个疯子竟能沿街跑着高喊“真

理报！真理报！”）、一个剪狗毛的，他竟能把生意做到车站码头上。一个乡村警察，还有他那面随身带的鼓。还有一些围绕在“共产主义菜汤”周围的罢工工人。甚至还有一个贩卖狗粪的。我甚感骄傲，知道这种货物在那个时代，可以用来熟皮革……

但，那年夏天，我掌握的最大学问，就是懂得了怎样才能具有法国味儿。在这方面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看到。那便是，生存的方式非常之条理化，尽管也仍然表现出许多荒诞怪异之处。

法兰西对于我，已不再是单纯好奇心的橱窗，而是一个感觉灵敏、内容充实的有机体，其中的一小部分，终将有一天会被我所接受。

## 二

“是的，我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她竟乐于终老在那个沙朗札。她原是完全可以生活在这儿，和你们在一起嘛……”

我听后，差一点就要从电视机旁边的那张木凳上跳起来。因为对于夏洛特之所以要留在自己家乡的那个小城里，那原因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对于我来说，要向聚集在我们厨房里的这些成年人解释她这样选择的原因，那真是再容易不过了。我可以回顾那大草原上干燥的空气，它可以把往昔的岁月蒸发到无声的明晶之中；我可以谈那遍地灰尘的街道，这些街道它们除了通往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之外，没有任何出路。这个城市的光荣史就是把那座教堂实施了斩首，并清除了“资产阶级建筑风格的残余”，在这里也消除了任何关于时代的概念：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就意味着反复不断地重复着过去的生活；意味着机械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日常家务。

但我却什么也没说。我怕别人把我赶出厨房。那些成年人，很容易便会准许我留在那儿，有这么一段时期以来我就发现了。似乎以我十四岁的年龄，已经取得了参加他们成年人深夜长谈的资格。那条件就是，呆在角落里别在他们眼皮底下。对这样一个特权，我绝对不想使它受到损害。

在这冬日长夜的闲聊中，夏洛特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别的时候一样多。不错，和从前一样，我外祖母的生活向我们这些客人们提供了谈话的资料，并使他们每个人的心灵得到了安

慰。

此外，这位年轻的法国女性，她的一生经历了我国各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在这一点上，她占有绝对优势。她在沙皇时代生活过，又在斯大林清洗运动中活了下来。她经历过战争年代，也经历过数次反个人崇拜的运动。她的一生，既印上了那个帝国最残酷时代的景象，又亲眼目睹了一幕幕壮丽的英雄史诗。

也正是她，这位诞生在世界另一端的法国女性在火车车厢里，敞开的车门后面，以茫然若失的眼神看着那一片荒凉的沙漠（“但又是哪个魔鬼把她带到这样讨厌又荒凉的地方的？”有一天，我父母的那位朋友，战时当飞行员的那个人这样喊。）。在她旁边的，是她丈夫费奥多尔，他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外面涌进车厢里的风，一点也没有给里边增加凉意，尽管列车开得很快。他们就在这又亮又热的门道里站了很久。外面的风加着灰沙吹在他们的额头上，就像撒了一层细沙，天上的太阳十分刺眼，就像万点金星刺入眼球。但他们却一动不动，似有意让这刺人的厉风，让这灼人的太阳把艰难困苦的往昔岁月给吹掉，给烧光一般。他们刚刚离开布克哈拉。

他们回到西伯利亚之后，她便在一个阴暗的窗下过起那永无尽头的时光。一边不时地在窗上哈几口热气以便让厚厚的冰霜融化以留出上一个圆点。通过这个小观察孔，她可以看到夜晚那茫茫的街道。有时一辆辆汽车慢慢地驶来，并靠近他们那栋房子，但犹豫一阵之后，便又驶走了。清晨三点钟敲过之后，又过了几分钟，她便听到门外台阶上的雪发出尖利的嘎嘎声，她闭上了眼睛，便起身开门了。她丈夫总是在这个时候回来……那时，有些人经常失踪，有时在工作岗位上，有时在深夜里，一辆黑色汽车在覆满冰雪的街上，在他家门前开走之

后，人便失踪了。她非常清楚，她在窗下等待他，用哈出来的热气融化窗上的霜，画出的那个小圆点也根本帮不了她的忙。清晨他才站起身来，想整理一下办公桌上的文件，然后就起身离开办公室。这个庞大的帝国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如此。他们知道，在克里姆林宫，那位国家的主人是在清晨三点结束他一天的工作的，因此，也无须想什么，于是大家便都纷纷学他的样子，也按这个时间表工作。甚至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要跨越好几个时区，“工作到清晨三点”这种做法根本就不适用，这样一个事实大家都不想。当斯大林从床上起来，口里叼上他一天中第一次装上烟丝的烟斗时，这时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里，正是夜色开始降临的时刻，他那些忠实的工作人员正坐在椅子上同睡魔作斗争，而那张椅子也便变成了折磨人的刑具了。克里姆林宫的那位主人似乎在那里便能够支配时间的流逝，甚至也可以支配太阳的升落。而当他开始就寝时，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时钟都正指向清晨三点。至少，在那个时代，那是大家所亲眼目睹的事。

夏洛特每天都这样等待着。一天，她突然累得不行了，于是在这个普遍遵守的时刻前稍微小憩了一会儿。没过多久，她便突然惊醒，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在孩子的房间里响。她便走进进去，看到她丈夫正弯着身躯，伏视着他们那正睡在床上的儿子，这个孩子头发漆黑、平直，在这个家庭中，他谁也不像。

费奥多尔的被捕，不是大白天在办公室里，也不是在大清早大张旗鼓地敲门打窗、把人从睡梦中惊醒后带走，而是在圣诞节的前夜，当时他正身穿圣诞老人的大红袍，脸上装着长长的胡子，谁也认不出他来，这张面孔使孩子们十分惊讶，所谓孩子，就是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和他的妹妹——我的母亲。夏洛



特把她丈夫头上戴的波兰式军帽整理了一下，因为那些人已经进入了房间。他们进来时也无需敲门，因为正在等待着前来共同过节的客人，所以门是敞着的。

这种随时都可以捕人的场面，仅仅在十年之内，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就发生过几百万次。不过这天晚上，作为背景陪衬的，有一棵圣诞节杉树，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卡通纸面具，他的是一只野兔，她的是个松鼠。站在屋子中央的，就是这位圣诞老人，他几乎僵在了那儿，因为随后要发生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几乎感到高兴，因为他脸上贴着棉花做的大胡子，才使得那两个孩子看不到他那苍白的面色。那只野兔和松鼠并没有摘下他们的面具，却用眼睛打量着这些擅自闯入的人们，只听夏洛特以非常镇定的声音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到那边去，去点孟加拉圣火吧。”

她是用法文讲的。两名官员交接了一下眼色……

费奥多尔被放出来了，他被释放的原因也正是他被捕的原因，即他妻子的国籍在起作用……八年之前，当许多人开始失踪时，这种失踪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向下轮流，那时他马上就已想到了这个问题。在夏洛特身上有两大致命的问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出身，一个是她在海外有关系。他竟然娶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更何况还是个法国人，他自然就会被看作是一个“被法、英帝国买过去的间谍”了。一个时期以来，这种类似说法，已是很平常的事了。

然而，就是在这种最明白不过的事实面前，那个作为压迫工具的机器却卡住了。因为按一般做法，要制造一桩案件，必须充分证明被告曾经狡猾的，并且在几年当中始终隐藏其同国

外的一切联系。可他们现在面临的这个被告是个西伯利亚人。只会讲自己的母语，而且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祖国，甚至也从未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见过面。——就这样一种经历如果进行全面的篡改，也须有一定的本领才能做到。但费奥多尔却什么也不隐瞒。夏洛特的护照上白纸写的黑字，她的国籍是：法国，出生地点：塞纳河上的纳伊，在她护照的俄文副本上，也仅只对某些特殊点强调了一下而已。她去了几次法国，一直在那边生活的那几位“资产阶级”的亲属，她的孩子法语讲得同俄语一样流利等等。这一切都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一般要经过几个星期的审讯，还要通过刑讯才能弄出假口供来。但这一次，一开始当局就比较开恩，压迫机器也在原地不前了。费奥多尔一开始被监禁了几天，但愈来愈觉得此人在那儿碍事，于是便把他调到这个帝国的另一头——一个已合并到波兰去的城市里。

他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星期。这包括穿行全国的长途旅行，和用来安家的一天时间，这一天是漫长的，也是乱糟糟的。第二天，费奥多尔便出发去莫斯科，要求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们采取速战法，已把他驱除出党了。夏洛特为他送行，在车站上他对她说：“这件事花两天的时间就够了。”待从车站回来，她发现他把那个香烟盒忘在家里了。她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两天后他就……”这段时间会很短的（当费奥多尔再回来时，走进屋里看到这香烟盒还放在桌子上，他就会拍拍自己的额头，感叹地说：“多么蠢啊！我到处找过它多少次啊……”）。是的，待到那一天到来时，正是一个六月的早晨，将会成为他们幸福日子长河中的第一天……

然而，这一次一别，四年以后他们才见面。而费奥多尔再也没见到他的那只铁香烟盒，因为时值战争年代，它被夏洛特

用来换了一个面包吃了。

成年人们还在谈着话，电视里播送的是振奋人心的时事新闻，是最近取得的国家在工业上出色的成就，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宁静的有声背景。伏特加的酒精消减了往昔的苦涩。我感到，我们这些人们，甚至包括新来的人们，大小都很喜欢这个法国女性，她一声不响，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他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这些议论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于是现在我也猜出了，何以每年新年的庆祝活动，在我们家总带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就似在黄昏之后，有一股忧郁的气流，把一间屋子所有的门窗都吹得劈啪作响一般，尽管我父母显得很开心，尽管有那么多糕点，尽管爆竹在鸣响，尽管杉树上灯光闪闪，但那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不安气氛却始终存在着。即使在大家举杯祝酒时，在爆竹声和欢笑声中，似乎在等待着某一个人要到来似的。我甚至相信，尽管我们的父母不说，他们在迎接一月份头几天那种带着白雪的宁静时刻时，是一定会带着某种宽松心情的。不管怎么说，节日之后的那段时间，对我们、我姐姐和我来说，是比节日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的……

外祖母在俄罗斯所过的那些日子，在一般情况下，已变成了她的生命，而不是在回法国之前的“一段俄国生活”。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秘密的，别人无法辨别的色调。是在我们那间被烟薰黑了的厨房内，通过对那种往昔岁月的再现，体现在夏洛特身上所特有的，不为人所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曾十分惊讶地暗自思忖：“这位女性，她曾月复一月地在挂满冰霜的寒窗下，等待着那名满国内的“清晨三点”之后的那一下敲门声；这位女性，同她在纳伊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用银贝壳装

酒的那一天，竟是同样的神秘，而同我的距离又是那么的贴近！”

而当他们提起夏洛特时，也总是从来不会漏掉那天清晨的事……

那是她的儿子在夜半时突然发现的。然后他便一下子从那张折叠床上跳起来，光着脚，伸着双臂向着窗户走去。在黑暗中穿过那间屋子时，撞到他妹妹的床上了。夏洛特也没睡，她躺在床上，双眼在黑暗中睁着，极力想搞清楚这种极单调又强烈的声音是从哪儿传过来的，这沉闷的震动声似乎把墙壁都晃动了。她感到自己的身躯和脑袋都在随着这缓慢而听起来使人讨厌的声音在颤动。孩子们也都醒了，向窗前跑去，这时夏洛特听到她女儿吃惊的呼喊声：

“啊！这么多星星！可它们都在动……”

夏洛特没打开灯，便走向孩子们那儿，一边走她一边看见，在桌子上有一件模糊不清的金属亮光，那是费奥多尔的铁香烟盒，他应该在今天早晨从莫斯科回来。她看到一排排的光点，在黑暗的夜空中慢慢地移动。

“是飞机，”哥哥用他平静的声调说，他的语调是从不改变的，“有好几个空军中队……”

“但它们这样排着，是向哪里飞呀？”女儿张大了惺忪的睡眼，出了口气这样说。

夏洛特伸出双手，分别搂住了他们的肩膀。

“去，睡觉去吧，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军队的飞机在训练。你们知道，国境线离这儿很近，训练，或者演习，那是为了防备敌人的空袭……”

这时儿子咳嗽了几声，便听他轻声地说，似乎是对自己讲



的，却总是带着平静而忧郁的声调，这在这个青年人身上很使人吃惊，只听他轻声说道：

“也或者，是一场战争……”

“塞尔格依，别讲蠢话，”夏洛特对他说，“快点上床睡觉吧，明天我们还要到车站去接你父亲呢。”

她说着便打开一个床头灯，看了看表：“两点半，那么已经是‘今天’了……”

他们已没有时间重新入睡了。第一批炸弹已经把黑夜撕裂。这一批飞行中队在城市上空已经盘旋了一个小时，它们要在这个国家的腹地，最偏远的地区对目标实施轰炸，那飞机的俯冲投弹情形可能会像地震一样吧。然而直至凌晨三点半，德国人才开始轰炸国境线，以为其陆军扫清道路。而那个睡眠惺忪的女孩，也就是我的母亲，被天上的那一片片排列得非常整齐的，闪闪发光的怪东西吓得呆住了，实际上她已处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间隙里。

此时再想离开房间，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大地在颠簸。房顶上的屋瓦一排排地往下掉，落在门前平台的台阶上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爆炸声震耳欲聋，只能用手势表达意思。

夏洛特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孩子们推到外边去，然后，自己手臂上挎一只沉重的大箱子，也出来了。对面房屋的门窗，玻璃已全没有了，一个窗帘，在刚刚醒来的风里摆动着，只有这个浅色的窗帘，在轻轻地摆动中还保留着一份和平的清晨里那种恬淡的宁静。

通往火车站的大街上已撒满碎玻璃和被炸飞的断树枝。有时一棵树被拦腰炸断，一分为二挡住了去路，有时候路上有个大弹坑，还必须绕过去，每遇到这种地方，逃难的人群便愈聚愈多。为绕开弹坑，提箱负重的人群就互相推挤。就在推挤



中，突然发现对方原是熟人。于是便想互相谈一谈，但愿是在住宅区爆炸的冲击波，突然间便涌到这儿来。那震耳欲聋的轰鸣，使他们张不开口。便只好无奈地彼此挥一挥手，再继续逃跑。

来到街头，当夏洛特已看到车站时，她才切切实实地感到，她整整这个冬天的生活，已是匆匆忙忙地走过，无法再现了。火车站只有正面的墙壁还没被炸塌，透过空空荡荡的窗户框，可以看到清晨苍白的天空……

那消息终于透过炸弹的爆炸声，通过数百张嘴，传了过来。朝东开的火车刚刚才出发，那是按照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遵循的时刻表的规定发车的。逃跑的人群被车站的残墙断壁挡住了，便停了下来，接着便被一架嗥叫着过来的飞机所冲散，接着分散到邻近的几条大街上，或是躲到街心花园的树下。

夏洛特也被冲散了，她用眼睛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只见脚下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要横穿铁路！危险！”但那铁路已被炸断了，已变成一些孤形的铁条，僵直地靠在高架桥的水泥支架上。它们一根根地伸向天空，那铁轨间的枕木，就像一个魔梯直直地向天上伸去，一直通向云端。

“在那边，有一辆货车马上就要发车了。”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小声说，那沉着的懒散劲，就是她儿子的声音。

她看到，在远处果真有一列火车。车厢很宽大，是褐色的，可是在列车周围，有无数的人头在攒动。夏洛特便伸手抓住她那只大箱子的提手，孩子们也都拿好自己的包裹。当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前面时，列车突然晃动了一下，于是便听到有人欢喜又害怕地嘘了一口气，似乎向这个启动的信号打招呼。一大群惊慌的人群都挤在车厢的活动拉门内外。夏洛特感到自己动作出奇地慢。便使劲把孩子们向那个车门口推，但那

车已慢慢向前滑动了。儿子向上爬，并紧紧抓住手提箱，妹妹赶紧加快脚步，跑上去抓住哥哥伸过来的手，夏洛特抓住女儿的腰把她举起来。终于把她送到挤得满满的车厢的门里。现在她自己只有一面跑一面紧紧地抓住门上的那个大铁闩。这种场面只持续了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她还来得及看到那些得以逃生者痴呆的面孔，看到了她女儿的眼泪，并且以一种超自然的清晰程度看到了那车厢活动车门的木板已经干裂了……

她被拉倒了，双膝弯曲。随后的时间似箭一般快速，她觉得自己并未能碰到路堤上铺的白石块。便有两只强有力的手紧紧箍住了她的双肋。天空突然旋转起来，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扔进了车厢。在灯光照耀下，她似乎见到了一顶铁路工作的大沿帽和一个男人的身影，只有那么一刹那时间。这个身影便走到车厢的逆光处，看不清楚了……

时近中午，列车通过明斯克，太阳在厚重的烟尘笼罩中，红红的，好像另一个星球上的太阳。一些奇形怪状的暗色大蛾子一样的东西（一团团灰色毛絮般的东西）在空中飞舞。没有一个人明白，只经过几个小时的战争，这座城市竟变成了一排排黑灰的框架。

火车行驶得很慢，就像摸索着前进，在这满眼焦土的黄昏中，太阳也不再刺眼了。大家已习惯了这种慢吞吞的速度。也习惯了天空中飞机不断的轰鸣声，甚至也习惯了车厢顶上飞啸的流弹声。

在离开这个几乎一片焦土的城市的时候，他们看到被炸弹拦腰炸断的一列火车的残骸。有几节车厢相撞在一起，像个怪物一样，把道路给堵住了。有几个女护士面对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伤员，忙得手足无措，不知做什么好。只是沿着列车来回地跑。在列车黑乎乎的车厢里，只能看到一些人的轮廓，有时

还能在破裂的车窗上看到挂着一只胳膊。地上都是丢弃的包裹，特别使人吃惊的是，还有许多年轻的妇女，都躺在枕木上或者草地上。有一节车厢还在铁路上，车厢外面还有一个珐琅瓷的牌子，上面写着终点站名。看到后，夏洛特吓呆了，那就是今天早晨他们误了点的那一趟车，就是向东开的那一班车，它按着战前的时刻表准时开出的。

夜幕降临了，列车的速度也加快了。夏洛特感觉到她女儿正靠在她肩膀上打颤。她便站起身来，把她们坐在身下的那只大箱子打开。要准备过夜了，应该从里面抽出几件厚一些的暖和衣服和两袋饼干。于是便把箱子盖掀开一点，把手伸到里面去。她立刻呆住了，抑制不住自己，不由地喊了一声，以至把邻座的人都惊醒了。

箱子里装的全是那些旧报纸！原来今天早晨在忙乱中，她把那只西伯利亚箱子拿来了……

她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报纸，在昏暗的灰色灯光下，只见上面有一篇报道写道：“没有分歧意见的参、众两院议员，积极响应鲁贝特<sup>①</sup>先生及布里松<sup>②</sup>先生之召唤，……全体高级官员之代表，齐集于穆拉沙尤内……”

夏洛特做了一个梦游般的手势，便把箱子关上，坐下来用眼睛看着自己的周围，一边轻轻地摇着头，好像在否认一事实一样。

“在我的箱子里有一件旧外套，然后，在出发时我又把厨房里的面包都收了来……”

---

① 鲁贝特（1838—1929）：他于1899年至1906年间曾任法国总统。

② 布里松（1835—1912）：法国律师，曾任最高法庭庭长。

她听出来了，这是她儿子的声音。他可能已看出她那不安的神态。

夜里，夏洛特睡着了，她做了一个快速的梦，梦中加杂着往昔的声音和往昔的彩色……这时一个人正轻轻地向门口走，就把她惊醒了。火车在田野里停了下来。这里的夜色同他们从中逃出来的那个城市不一样，那夜晚黑得程度就不同。外面的大平原在敞开的苍白的长方形车门前伸展开来。呈现在北方夜晚那种灰白的颜色。待她的双眼开始习惯了黑暗时，她发现在铁路旁一个小树林的黑影里，竟影影绰绰的有一栋似沉睡了的木屋。在它面前横亘着长长路堤的草原上还有一匹马。四周出奇地静，以至那匹马轻轻地撕吃草根声和蹄子在潮湿的土地上踏步声都能听到。带着连她自己都吃惊的一种苦涩的安详，夏洛特在自己的头脑中明明白白地听到一种声音产生并响了起来：“刚才还是一片焦土的城市就如同地狱一般，而几个小时以后，这匹马就在清凉的夜晚在沾满清露的草地上吃草了。这个国家是太大了，不可能把它打垮的。这无边无沿的大草原，将是抵御他们炸弹的最好场所……”她从来没感到自己离这块土地像现在那么贴近。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她的睡眠几乎都用于看护不断送来的残废伤员，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这个城市离前线仅只有一百公里左右，那伤员便一列列的火车往这里送。夏洛特还经常陪着医生到车站去接那些装满火车的缺胳膊少腿的伤员。那时她就发现，在并行的另一条轨道上停着另一列火车，上面载满了新应征入伍士兵，是从相反的方向开来的，也是上前线去。即使在睡梦中，她也去那些残伤人员那里查看，于是每到她做梦巡查时，便见这些人都在前线集合起来，并在那里等着她，只见这边这个年轻的步兵下颌骨被打掉了，那舌头就在肮脏的



绷带外面吊着；再看那一个，已没有了双眼，面孔也几乎没有了……特别是那些失去手臂和腿的人愈来愈多，只见这些人只有一个可怕的躯干，四肢都没有了。由于痛苦和绝望，那目光似疯狂了一般。

是的，特别是这些人的眼睛，撕破了她梦中的那面易破的风帆。这些人在黑夜里形成了闪闪发光的、与众不同的一群，随着她到处走，并悄悄地同她讲着话。

一天夜里（那天夜里，数不清的装甲车队穿过了这座城市），她比平时任何时候都容易惊醒，那些梦也随做随忘。但有一个梦却没忘，那背景是一片灰白的原野，夏洛特突然间明白了，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所包含的意义。是的，她曾在另一个城市。她一下子便醒了，奇怪的是，再也听不到一点轰鸣声。坦克已经开出了街区，静得使人觉得像聋子一般。在这些浓重的黑暗和寂静中，夏洛特又一次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者的眼睛。在纳伊旅馆里的日子，又突然在眼前显现。“这就像昨天一样”夏洛特想。

她起身走到窗前想把上面的气窗关上。但手伸到半路就停住了，一场白色风暴（这是战时的第一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席地卷起，来得特别突然，大地还在黑暗中，天空中卷起了雪浪，她目光被天空中变幻莫测的雪浪所吸引。她想到了男人的生命，也想到了他们的死，想到了就在这个纷纷扬扬的天底下的某个地方还有那么多缺臂少腿的人；想到了在黑夜里他们睁着的眼睛。

人的生命在她看来是各种战争的单调的继续，是对永不愈合的伤口永无止境的包扎，也是钢铁的炸弹落在潮湿的地面发出来的爆炸声……她感到有一片雪花落在手臂上了。是的，这就是生活，这永无休止的战争，这战争造成的伤口，在战争和



创伤中这种悄悄的等待，在下第一场雪的这一刹那……

受伤者的那种目光在她幻想中消失，在整个战争时期仅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她女儿得了伤寒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寻找面包和牛奶（几个月来，他们只靠吃马铃薯皮度日）。第二次，是她接到前线送来的一份死亡通知……早晨她到了医院，就在那里干了一天又一整夜没回家，希望能用工作把自己累死，而不敢回家，不敢看到自己的孩子，不敢同他们讲话。在近午夜时，她才坐在火炉旁，把头靠在墙上，闭上双眼，便立刻来到一个大街上……她听到了人行道传来清晨的嘈杂声，呼吸着被苍白的斜射的太阳照亮了的空气。走在这个尚未睡醒的城市里，她每迈出一步，都能认出它朴素的面貌：车站前的咖啡馆，教堂，露天市场……在看那些街名时，在看到那窗户上反映出来的形象时，以及看到教堂后面那个小公园的树丛时，她感到有一股莫可名状的喜悦。走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孩请她翻译一下其中的一个名字。她在寻思，是什么东西使她这一次在这个清晨的城市里散步竟这么开心……

夏洛特从睡梦中醒来。嘴唇还在动，因为依然在讲着梦中的最后那几句话。当她终于明白过来，她这个梦完全是不真实的时候（她和费奥多尔在一个秋光明媚的早晨在一个法国的城市散步），当她又进入这个绝对不现实而又非常简单的漫步情景时，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张长方形的纸，读了起来，这是她第一百遍读它了，那上面的字迹已有些模糊，有她丈夫用紫墨水写的亲笔签名。这时走廊的另一头有人在呼唤她。下一辆送伤员的车马上就到了。

“那些‘茶炊子’！<sup>①</sup>”在他们夜谈时，我父亲和他们的朋友们有时对那些既失去双手，又失去双脚的活树干似的士兵们这样称呼。但他们的双眼却蕴含了世界上所有绝望情绪。是的，这是些茶炊子，再加上他们身上的那两条大腿根，很像那种铜茶炊的腿，再加上两条胳膊，就成了这种茶炊子的把手了。

我们这些客人在谈论他们时总带着一种可笑的大无畏的好汉味道，嘲笑味道，或者两者都有的一种苦涩味，说他们是“茶炊子”，是一种奚落和冷酷，但却意味着这些人离战争已远。一些人已把它遗忘，另一些人对它又毫不关心。这些人，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次战争胜利后的十二年左右出生的一批青年人。我想，为了不致使场面变得那么凄惨悲凉，他们大概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故做从容潇洒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吧，这也是按照一句俄国的谚语：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然而过了不久，以这种看破一切的声调讲话的人便向我透露了个中的真正的秘密：一个“茶炊子”就是被割下的一块肉所附体的灵魂，就是脱离了身体的一个神经，就是生活中软弱无能懦弱的眼神。这种被伤害的灵魂便被大家称做“茶炊子”。

讲述夏洛特的生活，对他们那些人来说，也是为了避免涉及各自的创伤和各自痛苦的一种方式。更何况她那个医院收容了来自各个战线的几百名战士，包容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命运，自然就会有许许多多个人的故事。

比如说，那一个战士，他那条腿是用……木头嵌进去的，始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弹片嵌进他的膝盖下部，正好他

---

<sup>①</sup> 指俄国用以盛开水的，有加热装置的一种圆粗的器具。

原先把一把木匙放在他的高筒靴里，在里面竖着，结果弹片把木匙打碎，木屑便进入伤口。伤势并不太严重，但却要把所有的碎屑都取出来。按夏洛特的说法，要把肉里“所有的刺”都挑出来。

另一个伤员，每天都不绝口地抱怨，声称他那条腿被石膏糊住，里面奇痒难耐，“要把心肝肠子肺都翻出来了”。他全身连扭带弯，使劲用手去抓挠那层白石膏，似乎他的指甲能够抓着里面的伤口一样。“把石膏起下来吧，”他大声哀求说，“这太折磨人了，起下来吧。不然的话，我可就要自己用刀把它打碎了！”主任医师一天十二个小时，手里不放下手术刀，忙得不可开交，对他的请求根本不予理会，认为他是在无病呻吟。“那些茶炊子，他们就从来不抱怨什么。”他这样想。最后还是在夏洛特的坚持下，把腿上的石膏打了一个洞。而且也是她亲自动手，拿了一把镊子，从血肉模糊的伤口内挑出许多白蛆。又把伤口洗干净。

听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一阵恶心，想象着那副使人不愉快的画面，全身都在颤抖。就觉得我的皮肤已经和死人接触了。我睁大了双眼看着那些成年人，所有这些情节，比如嵌在伤口里的木刺，白色的蛆等等都好像很合他们的胃口，觉得很好玩似的。

另外，还有一些伤口，就好像它不乐意愈合一样。实际上，它愈合得很好。有一名战士，很镇定，也很严肃，他躺在病床上，和其他伤员完全不一样。其他伤员刚一做完手术便在走廊上一瘸一拐地到处走。医生走到他身边，俯下身来看看他那条腿，然后便摇摇头。前一天晚上，那伤口处皮肤已经光亮并已拉紧了，现在却又出了血。伤口周围发黑，像一圈被撕破了的花边。“太怪了！”医生惊讶地说，但他又不能在这儿耽搁

太久。“重新包扎！”他对值班护士说，然后便在一个连一个的密密麻麻的床中间走了出去……到第二天夜里，夏洛特才在无意中撞见了那位伤员。当时所有的女护士都穿的是高跟鞋，走起路来急促的后跟声响彻走廊。只有夏洛特一人穿着一双毡鞋，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此，那位战士没有听到她进来。她来到这间很大的黑屋子里，便在门口站住了。因为窗外有雪，所以那位伤员的身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只见他正坐在床上，夏洛特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在猜测他在干什么：只见那位战士正用一块马蹄铁刺他的伤口，在他枕头上放着一堆刚刚解下来的绷带……第二天早上，她便把这件事对主任医师讲了。这位医生由于熬了一整夜没睡，看夏洛特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并没有听懂她说的话，待他清醒了一下之后，便沙哑着嗓子对她说：

“你想让我怎么办？我马上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人把他带走，这是个自我伤害分子……”

“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那又怎么样？你说这值不值？其他的人死在战壕里……可他……却是个逃兵！”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医生便坐了下来，开始用沾满碘酒的手搓脸。

“如果一开始给他打上石膏呢？”夏洛特说。

医生在那双手掌后面的面孔震怒得都变了形，他已经张口要说话了，但随即又缓和下来，他那熬夜熬红的眼睛也开始活跃了，只听他笑着说道：

“又是你那石膏的故事。因为一个人觉得里面痒，已经打破过一个，难道还要因为另一个人因为自己想让它痒。再打破一个吗？夏洛特·诺贝尔托芙娜，你怎么专门一次次地让我吃



惊啊！”

待到查房的时候，他查看了那人的伤口，然后以非常自然的口吻对女护士说：

“要给他打石膏，打一层就可以了，在走之前，由夏洛特来做。”

在接到第一个死亡通知书的一年半之后，她又有了希望，因为又接到了一份死亡通知书。她想费奥多尔不可能死两次，因此，他现在可能还活着。这两次死亡，就变成了她生命的希望。夏洛特对谁也没讲。自此便又开始了她的等待。

他果真回来了。但不是从西边来的。也不是像大部分战士那样，是夏初回来，而是在九月份从远东回来，是日本人战败之后……

沙朗札，原先是靠近前线的一个城市，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平静的所在，在伏尔加河的后面，又恢复了大草原的沉寂。

夏洛特一个人住在那儿。她的儿子（即我的舅舅塞尔格依）入了一所军校，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去就学，和其他所有学生一样，她也希望继续自己的学业。

在九月份一个温和的傍晚，她离开自己的家，走在寂静无人的大街上，她想趁天黑之前，到草原边上采一些野茴香梗，以便做腌菜用。就是在回来的路上，她看见了他……当时她捧着一大把长长的、头上开着伞形黄花的野茴香，她的裙子，乃至她的全身，都充满了静静的田野上那种明快，并沐浴在夕阳的霞光里，她手指上还带着浓厚的茴香香味以及枯草味。她已经晓得，这种生活，尽管它是那么痛苦，也可以过下去，必须使它慢慢地从这西下的夕阳过渡到这浓香的野草，从草原上无



边的宁静，过渡到在天空翱翔的小鸟的啁啾。是的，要从这样的天空走向它所反映出来的一切，而这一切在她心中的感觉，有如一个亲切的、活生生的现实。是的，这种现实甚至就是能发现这条通向沙朗札的小路上，那尘土都是温柔的……

她抬起头，就看见了他。他正向她走来，但距离尚远，还在大街的那一头。如果夏洛特是在自己家门口迎接他，如果是他推开自己的家门走了进去，正如很久以来她所想象的那样，也正如所有从战场上复员回来的士兵那样，在生活中或者在电影里，这种场面都不鲜见，那么，毫无疑问她会发出一声欢呼，向他扑去，并抓住他挂武器的肩带，并且会哭泣……

但他离得太远了，只能让别人一点点地认出他来，只能给他妻子以向这条街走过来的时间，而这条街却对一个男人变得陌生了，而她却已隐隐约约地看见他在微笑。他们没有互相跑去，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拥抱，他们只是觉得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彼此都向对方走去。街面上空无一人，黄昏的天空，那光亮在金黄色的树叶间闪烁着，似乎是虚假的一般。她在他面前站住了，轻轻地摇着手里的茴香茎。他向她点着头，似乎在说：“对，对，我懂了。”他没有佩带挂武器的肩带，只有一条带铜扣的皮腰带，脚上的靴子落满了焦黄的尘土。

夏洛特住在一栋老木屋的楼下。这里的地面，一百年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地往上长，因此，房子就向下沉了，所以她那屋子里的窗户仅只刚刚高出人行道……他们两人默默地走进房间。费奥多尔把背包放在一个小凳子上，想说点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捂着嘴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夏洛特便去准备吃的了。

她无意中发现自己已经在回答他的一些问题了，而且回答时也并没有经过仔细考虑（他们谈到面包问题，谈到凭票供应

口粮等食物问题，也谈到在沙朗札的生活问题)，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请他喝茶，在他提到“要把这个家里所有的刀具都磨得快快的”的时候，她也向他面带微笑地听着。但在进行他们分别以来这种第一次还有些不太自然的交谈时，她却心不在焉。她内心里回荡着的却是另一番言语：

“这个一头短发并且上面像撒上一层白粉似的男人就是我的丈夫。我已有四个年头没见到他了，而且他还被埋葬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时，第二次是在乌克兰战斗时，他现在就在这儿，他又回来了。我应该为高兴而落泪，我应该……他的头发完全花白了……”

她也觉得她丈夫的心思也根本没放在关于什么粮食定量供应等的谈话上。他又回来了，是在人们对战争胜利的激情已平息了很久以后他才回来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它日常的平静。他回来得太晚了，就像一个漫不经心的男人一样，被邀请在这儿吃的午饭，然而，待到吃晚饭的时候，他又不请自来，而恰好碰上这里的家庭主妇正在向外送她最后一批吃过饭刚离开的客人。“他可能觉得我太老了。”夏洛特突然这样想，尽管这种想法并没有消除她内心里那种颇为奇怪的缺乏热情状态，也没有消除那种使她感困惑的冷漠。

只有当她见到他的身体时，才落了眼泪。吃过饭后，她便烧好了水，拿来一个瓷盆，并在屋子中央把那个给孩子用的小澡盆放好。于是费奥多尔便蜷缩在这个灰色的小澡盆内，接着盆底便发出一声颤音。她一边向丈夫身上淋热水，他丈夫一边笨手笨脚地搓着自己的双肩和后背，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特哭了。那泪水就在她木然不动的脸上向下淌着，它们一滴滴落在盆里和里面的肥皂水混在一起。

这个身躯简直是她所不认识的一个男人的身躯。上面疤痕

累累，有些像刀伤，有的在肉厚的地方，伤痕很深，像正在吃东西的大嘴，向外咧着，有的就伤在表皮上，有些发亮，像蜗牛在上面爬过留下的痕迹一样。在一个肩膀上，有一个地方已经凹下去。夏洛特明白，那是被哪种类型的弹片所擦伤。在一个肩膀的周围还能看到伤口缝合时留下的紫红色的疤痕，一直伸展到胸部……

在泪眼朦胧中，她打量着这间屋子，就像第一次见到它一般：一个窗户，几乎和地平面取齐，那一束野茴香，现在看来已成了她生活中另一个时代的遗物了，一个战士背包放在门边的一张凳子上，还有一双满是尘土的军靴。在那个光秃秃的灰暗的灯泡下面，在屋子的中央，这个陌生的身躯，已有一半埋在地下了。那样子，就好像让机器轮子给绞烂似的，不自觉中，便在她头脑中形成了如下惊人之语：

“我，夏洛特·勒莫尼埃，就在这儿，在这个被草原的野草掩没了的木屋里，面前是这样一个人，是全身伤痕累累的一个战士，我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个人我非常爱他……我，夏洛特·勒莫尼埃……”

费奥多尔的一个眉毛上，有一道很宽的白色的伤疤，虽然已变得比较细薄了，但却把他的前额给吊了起来，因此他的目光始终显得像很吃惊似的。就好像此事虽然结束了，他仍然不习惯这种生活一样。

他在这儿生活了不到一年……在冬天时，他们就搬了家。在搬过来的这栋房子里，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年夏天便去那儿找夏洛特。他们忙得甚至没有时间添置餐具和铺盖。费奥多尔切面包用的刀子是从前线带来的——用刺刀改造的。

一边听这些成年人讲述，我也一边想，在这一段出奇短暂

的重逢日子里，我的外祖父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战士正在迈步跨上那间木屋的台阶，他的目光完全溶进他妻子的目光之中，而且恰好在说着：“你看，我又回来了……”是在受了那么多的创伤之后，没有躺下，也没有死去，而自己回来的。

### 三

这一年，法兰西把我关在一个极端清静的学习环境中。夏天一过，我就从沙朗札回来了，就像一个探险者一样，箱子里装了一千零一个新发现——从普鲁斯特的那一串葡萄，到证明奥尔良公爵之惨死的那个题铭，应有尽有。在秋季，特别是在整个冬季里，我几乎变成了一个研究狂，一个对这个国家的一切材料都关心的档案保管员，而对这个国家的神秘之处，也只不过是夏季休假时才开始涉及。

凡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与法兰西有关的书籍我都读过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所有较大的图书馆或书店我也都跑遍了。对于夏洛特所讲述的每一点，只要引起强烈兴趣的，我都要予以系统的研究，从那个世纪到这个世纪，从路易国王到他的继承者，从一个小说家到他的同事、学生及其追随者。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我沉浸于无人问津的、积满灰尘的书籍迷宫里。毫无疑问，这和一个苦行僧的做法有些相近，不过，每个人在这么大年龄时，都有这种感受的。在尚未被成年人那些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事情所缠住时，总要想些办法回避它们，一个人躲起来幻想将来种种儿女恋情的故事。这种等待这种修士般的生活，很快便会变得不堪忍受了，于是青少年那种分散的或集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即狂热地想在尚未成年时便玩玩成年人社会的各种手段的倾向便从这儿产生了。这些人，即十三四岁的这些人，很少有人能够顶得住这种强行压在



离群索居者，压在苦修者身上的诱惑，更何况这一切对那些昨天的孩子们，又是那么残酷和难以忍受。

多亏了我对法兰西这种痴迷的探索，才得以免受青少年那种孤独的等待之苦。

在我们班级同学的那个小社会里，他们对我的态度时而表现得有点漫不经心的高傲（认为我“不成熟”，也不吸烟，也不讲那些淫秽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无论男女的生殖器官都变成了完全与身体分开的一个人物了），时而又表现得有点敌对的好斗情绪，他们全体对我的粗暴行为，常使我目瞪口呆。我自觉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也不认为有什么地方值得他们对我如此仇视。不错，对于他们这个迷你社会在消闲时租来的那些影片，我并未表现得那么狂热，对于他们所醉心支持的足球俱乐部，我也并不怎么热心，我的无知冒犯了他们。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他们的挑战，于是便用嘲笑和老拳对付我。就在这年的冬天，我开始认识到一个很使人感到狼狽的真理，即，掌握了这样一个遥远的过去，让自己的灵魂在这个传奇般的阿特朗蒂德中徜徉，也并非无可指摘。是的，在那些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的眼中，这无疑是个货真价实的挑战和对抗。一天，我被他们捉弄得实在厌烦了，便假做对最近一场球赛的结果很感兴趣的样子，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来，并且把头一天听说的足球队员的名字一个个都报了出来，但大家一听便发现，那是假做出来的，讨论便中止了，这个迷你社会的人也就散了。我原应该得到点儿同情的目光，我觉得自己被贬低了。

经过这次可悲的尝试之后，我便更加沉浸于探索和阅读之中。在一般的年代中，阿特朗蒂德那里发生的一些昙花一现的人和事，于我已感到不够了。自此，我便致力于它历史核心事

件的研究。于是我便整日埋头在我们的那家小图书馆里。我试图搞清楚，亨利一世同俄国公主安娜那场荒唐的婚姻的内幕，我还想知道，她的父亲，那位著名的哲人，亚罗斯拉夫，作为陪嫁财产，都给她带了些什么去。他是怎么把那一大群马匹从基辅弄到当时正受到好战的诺曼底人攻击的他那位法国女婿那儿去的。还想知道那位安娜·亚罗斯拉芙娜公主在那阴暗的中世纪城堡中是怎样排遣她的日常生活的，因为她在那里对吃不到俄国面包甚感遗憾……对于奥尔良公爵之死，我也不再满足于漂亮的伊莎博王后窗下的那块铭文上那种悲剧性的叙述了。不，现在我要向这次谋杀案以后的事态发展发起冲击，向那个让·桑·勃尔以后的活动发起冲击，要研究他的家谱，要对他的战功加以证实，要再现当时的服装和武器，要确定他的领地……我了解了格鲁斯元帅<sup>①</sup>那几个师延迟的后果是为什么，而这几个小时的耽搁对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战役是致命的……

当然，图书馆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作抵押的领土，它向你提供的资料是非常平等的。我在那里找到介绍关于路易十四时期的书，只有一本。而在旁边的书架上，有关巴黎公社史料的图书竟有二十六册，另外还有十二三本关于法国共产党创建的书籍。由于对知识的渴求，我懂得了怎样对付这种历史的欺骗手法：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学著作。法国伟大的经典著作都在那里，除了几位被查禁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沙德的或纪德的等，一般他们大抵都能逃过书刊检查。

由于我年轻又缺乏经验，使我变成了一个资料的盲目崇拜者。我收集的反映当时历史面貌的资料远远超出了我要掌握的范围。我特别注意研究同那些导游们在历史遗迹前向游客们解

---

<sup>①</sup> 格鲁斯（1766—1847）：拿破仑的元帅。

说的故事相似的一些轶闻遗事。在我的收集品中，有台奥菲尔·戈蒂埃<sup>①</sup>的红背心，这个红背心，他在第一次上演《爱尔那尼》<sup>②</sup>时穿过；有巴尔扎克的一些手杖；有乔治·桑的水烟筒；有关于她背叛了她的情人缪塞<sup>③</sup>投身于为缪塞治病的医生的怀抱的剧本故事等。我很欣赏乔治·桑在向她的情人提供《罗朗查丘》<sup>④</sup>故事情节时那种高雅的风度。与此同时，我还不知疲倦地重新检阅了一遍附有各类图片的那些资料的程序，因为仅依据我的记忆，确实把它们弄得很乱。比如有一段记着这样一个故事，就于我的资料无补：当雨果已是一位须发斑白的忧郁老人时，在一个小公园里遇到了勒孔特·德·李勒<sup>⑤</sup>，于是这位老人便问李勒：“您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吗？”面对被他问得莫名其妙的李勒，他夸张地说道：“可能很快我就要到天堂去见上帝，我现在想的是，见到他时我要对他讲些什么……”这时，勒孔特·德·李勒带着挖苦和尊敬的口气，但又很认真地说道：“噢，你可以对他这样说：‘我亲爱的同事……’”

奇怪的是，这个人对法国一无所知，而且也从未读过一本法国作家的书，我敢肯定，这种人绝对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指出法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来。是的，就是这个人，他在无意中帮助了我，使我从专事收集轶闻遗事中走出来，把我的兴趣引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就是这个又懒又笨的学生，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列宁之所以没有孩子，那是因为他不会做爱……

---

① 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

② 《爱尔那尼》：雨果的一部戏剧。

③ 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剧作家。

④ 《罗朗查丘》：是缪塞写的一部五幕大型历史悲剧。

⑤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

我们班上那个迷你小团体，对我的蔑视，那程度同对列宁的一样，只不过原因不同而已。他们讨厌列宁是因为他那副造作的面孔使他们厌烦。我这个又笨又懒的朋友，比我大两岁，在一般的学生中，这个岁数已经超前尝试过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了，但他却很少像他们那样。大家把他叫做巴什卡。巴什卡过的是俄国农民那种很奇特的生活，这种农民一直到死，在他们身上都保留着一部分孩子的天真，这同他们本质上表现出的粗野和阳刚之气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些人固执地远离城市，远离社会，远离舒适的环境，却定居在森林里，或者是狩猎，或者是流浪，常常就这样在那里终了此生。

巴什卡身上常把一股鱼味带到班上来，有时又有股雪味，到天气回暖时，又有股泥土味。他一整天一整天地都在伏尔加河堤上到处走，如果他来上学，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他母亲生气。但却总是迟到，他对那些未来的成年人投过来的不屑目光根本就看不见，径直走到最后面他的座位上悄悄坐下，在他走过去的地方，学生们故意做出闻到一种难闻气味的样子，女教师叹了一口气，两眼向天上望着，接着雪味和潮湿的泥土味便渐渐地充满了教室。

我们班上那个小集团排斥弱者的不成文的法典，在我们两人的团结下结束了。确切地讲，在我们俩没变成朋友时，就已发现我们两个是孤立的，于是这也就成了我们互相接近的信号。自那以后我便经常陪同巴什卡到满是积雪的伏尔加河岸上去钓鱼。他用一把沉重的曲柄手摇钻在冰里打洞，把鱼线扔进冰洞里，然后就站在这个圆圆的冰口上一动不动地等着，冰面露出了暗绿色的水层，我就在一边想，在这一条窄窄的冰口里面，突然有一条一米多长的鱼，游近了鱼饵……接着便看到有虎背鲈鱼，白斑狗鱼，红尾巴的红眼鱼等都在洞口出现了，然



后把它们从钩上拿下，便扔在雪地上，在上面蹦跳了一阵之后，它们的身体便慢慢僵了，随之便在夹着冰的大风中冻僵了。它们的背鳍都冻成了结晶体，像顶王冠。我们很少谈话，这雪原上的无边的寂静，这明亮的天空，这沉睡的大河，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语言变成了多余。

有时巴什卡找到了一个鱼多的地方，我们便冒着危险，向那一片黑黑的、上面带水的薄冰走去，因为底下有活水，所以冰冻得很不结实……听到有咔咔作响的声音，我立即转过身去，看到我这个同学，正在水里挣扎，并且把手伸成扇形，抓住那些变成冰粒的雪。我赶快向他跑去，在距缺口几米远的地方，我便趴下把我的长围巾的一头向他扔过去，在一般的情况下，不用我参与，巴什卡自己是能出来的，就像一只鼠海豚，刚刚爬出了水面，便又趴下，胸贴在冰面上，一边向前爬一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湿印。但有时候，肯定是为了让我高兴，便伸手抓住我的长围巾，任由我把他拖起来。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之后，我们便向泊着一片旧渔船的地方走去，只见那些旧渔船这儿一只那儿一只的在雪堆中露出来。我们便在里面找了个地方用木柴生了一堆大火。巴什卡把他的大毡靴和大棉袄都脱下来，放在火旁边烤着，然后便赤脚立在一块船板上，又开始钓鱼了。

就是围着这一堆木柴燃起的大火，我们两个的话语才开始变得滔滔不绝了。他给我讲关于钓鱼的一些不寻常的故事（用手摇钻打开的冰洞太小，鱼太大，弄不出来！）。他对我说冰淌，那是说冰块发出震耳的轰鸣声向下游涌来，卷走了冰上的渔船，把岸边的树木连根拔起，有时连整栋木屋屋顶和上面站着的猫都给卷走……我呢，我就对他讲骑士比武的事（那是我刚刚听说的，从前的武士，在经过一场比武后，摘下他的尖顶



头盔时，脸上便有一层铁锈，因为铁很喜欢和汗结合，至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这个情节我听到后，比比武本身更使我感兴趣……)，是的，我对他讲的是这些带有阳刚气的行为，讲的是年轻的武士举起号角吹三声便唤来增援的故事。我知道巴什卡，无论春夏秋冬都在这伏尔加河岸上走动，私下里却梦想着辽阔的大海。我很高兴，在我搜集的有关法兰西的资料中，为他找到了一个海员同巨大的章鱼大战的故事。由于我的知识主要来自我搜集的这些资料中，于是我便想对他讲其中的这么一个，而且正对他的胃口，也正好是我们在这艘旧渔船上烤火的时候。另外，从前在一个很危险的大海上，一艘英国的战舰遇上了一只法国的军舰，在双方投入你死我活的战斗之前，英国船上的船长用手做成喇叭筒状向他的法国敌人喊道：“你们法国人，作战是为了金钱，而我们，女皇的仆人，我们都是为荣誉而战！”这时就听到一阵带着咸味的海风从法国船上传来船长欢快的回答：“先生，每个人都是为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战！”

有一天，他却真正地差一点就丢到冰下去了。那是在一个冰面上，其时天气已然转暖，突然那块冰就在他脚下沉下去了，他也就随之落水，一会儿后冰面上露出了他的头，接着又伸出一只胳膊，想抓住个支撑物，但却什么也没有，他使了一股猛劲，便窜了上来，把胸贴在冰面上，但冰面已融化得满是气孔，承受不住他的重量，便又碎了，河下的水流已把他那穿着灌满水的大靴子的双腿冲得直向下滑。我已来不及再解下围巾，便俯伏在雪地上向前爬，然后把手伸给他，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在他眼中很快闪过一丝惧意……我想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也会爬出来的，因为他经受的这种锻炼太多了，同自然界的力量打交道也太多了，所以一不小心便造成了这个疏

忽。但这一次他拉住我的手时，脸上却没有了平时那种满不在乎的微笑。

几分钟以后，我们就生了一堆火，巴什卡光着两条腿，在火堆旁边的一块木板上直蹦，上身只穿着一件羊毛套衫，那还是他脱下的衣服未晾干时我借给他的。他用冻得通红并且磨破的手揉了一个泥团，用来把鱼糊起来，然后放在火上烤……在我们周围，便是冬季的伏尔加两岸白茫茫的一片寂静的旷野。垂柳瘦细的枝条似在瑟瑟发抖，这些树沿着河岸组成了一道透明的荆棘墙，但已被积雪盖住了。那条破船，几乎散了架，它的船帮就成了我们火堆的木柴。火苗欢乐地跳跃着，似给周围的暮色更添了几分浓意，这暂时的慰贴更加使人神往。

为什么那一天，我对他讲了这个故事而不讲个别的呢？这无疑是有原因的。有一个谈话的诱因启发了我讲这个件事……这原是雨果的一首诗，内容已被大大的删减，很久以前夏洛特讲给我听的，甚至我连题目都忘了……故事是这样的：某地，在被摧毁的街垒旁，士兵们正准备枪毙那些起义者，在这个起来造反的巴黎的心脏，那里铺路石竟有了一种特殊功能，用来当壁垒了。这次行刑按照常规执行，是残酷的，无情的。首先让人们背靠在墙上，然后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一动不动地瞄一会儿，然后再把枪放下，抬起头来看看天上轻轻飘动的白云。他们倒下了，而他们的伙伴又补上来，面对着那些士兵……在这些被枪决的人中有一个流浪儿叫加伏罗什的，按他的年龄，应该得到宽大的处理，唉，但却没能得到宽免！一个军官命令他也站到等待行刑的人的行列里去，孩子也和成人一样被处以死刑。“你也一样，我们也要把你枪毙了！”那个刽子手头头这么说。但这个孩子在向墙壁走去之前，突然向那个军官跑了过去并请求说：“请您准许我把这块表再还给我母亲，行

吗？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在喷泉旁边。我向您发誓，我会回来的！”这个很带孩子气的欺骗手段竟然打动了那些野蛮的大兵们的心。他们放声大笑，因为这种手法也确实太幼稚了。那个军官一面大笑一面说：“去吧，跑着去，逃走吧，你这个小流氓！”这些士兵一边继续大笑一边往枪里装子弹。突然，他们的声音一律都打住了，那个孩子真的又回来了，而且也站在了墙边上，站在那些成年人旁边，并大声说道：“我回来了！”

在我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巴什卡好像勉强能听得懂。他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弯着腰烤火，把面孔藏在大皮帽子里，并把帽舌也拉了下来。但当我讲到最后那个情节，即那个孩子又回来了，脸色苍白严肃地站在士兵的面前时，是的，当我刚刚说出他最后那句话：“我回来了。”时，巴什卡浑身颤抖，并站了起来……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他一步跨过那只渔船的船帮，光着脚就在雪地里走起来。这时我好像听到一种极力压抑的呜咽声，然而很快便被潮湿的寒风吹走，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消失了。

他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下来，积雪直没至双膝。我呆呆地站在小船上一动不动，在小船上看着他，只见这个高个子小伙子，身穿一件长长的羊毛衫，被风吹得鼓鼓的，就像一个毛料短裙，皮帽的护耳在寒风中轻轻地晃动，他那两只光腿直没在雪里，看着叫我害怕，这时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便一跃跳下渔船追了上去。他听到脚步声嘎嘎的响，便突然转过身来，只见他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得变了样。我们那一堆火在他的眼中反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湿润的光亮，他慌张拿出手帕把那两只眼睛擦了擦。“啊，看这烟薰的！”他一面眨眼睛，一面这么抱怨，然后，也不看我一眼，便又返回渔船。

就这样，他一面拖着冻僵的双腿向火堆走，一面带着气愤，固执地问我：

“后来怎样了？他们把这个孩子杀了，是这样吗？”

被他这突如其来地一问，关于这一点，我脑子里一时还真没找出明确的答案来。于是我便含含糊糊、犹犹豫豫地说道：

“嗯，……这个吗，我也说不准……”

“怎么，你说不准？可是，不是你给我讲的吗？”

“没有，不过，你看，在那首诗里……”

“我不管诗不诗！我问你，在现实生活中，他被杀了没有？”

他的目光透过火苗，紧紧地盯着我，闪烁出的光似乎有点疯狂。他的声音既严厉又有点恳求的味道。我叹了一口气，似乎是在向雨果老先生抱歉似的，然后便以干脆、果断的语气说道：

“没有，他们没枪毙他。当时有一位年下的下级军官，看着他就想起了自己在乡村的儿子来，于是便喊道：‘谁要是动一下这小子，我就跟谁算帐！’于是那个头头就只好把他给放了……”

巴什卡于是便低下头，开始用树枝把火拨开，取出用泥糊住的在火堆里烤的鱼。我们两个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把鱼外面烤焦的泥壳敲碎，鱼鳞也一起掉了下来。我们在上面撒了些盐，便吃起又嫩又烫的鲜鱼来。

待天黑下来，我们回城时，依然互不讲话。我仍然想着方才制造的那个情节，想象着诗人的话向我展示了那么神奇的力量。我猜想，这并非是文字技巧问题，也不是大作家善于遣词造句的缘故。不是的！因为首先，雨果的一些著作，早已经在夏洛特的口述中给予改造过了，然后再加上我的重复，语言早



已变了样，这可以说它们已遭到双重的背离……然而就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远在它的发源地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被传诵起来，竟能使一个野性十足的青年人洒下激动的泪水，竟能使他不穿衣服在雪地上行走！而我也私下里感到骄傲，即在夏洛特的祖国照射出来的这一线光芒，我竟能使它在这里也发射出一丝火花。

随后，那天晚上，我便明白了，并不一定要在我读过的那些资料中去选择什么闻人轶事，也不必看某一篇文章中词藻使用得如何华丽，而在于那件事情本身具有较深刻的内涵，同时又比较自然而不造做。也就是说，在感知上，能使人感到一种极强烈的和谐性，一旦在诗中表现出来，便可成为不朽之作。对于这种感知上的和谐，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来，但我自那以后在阅读每一本书时都去追随它。但不久，我就知道了它的名字，那就是：风格。我却绝不在这个名字的幌子下搞那些浮华虚词，玩弄文字的把戏。因为我眼前始终都好像看到巴什卡那双冻得发青的腿，正立在伏尔加河岸上的雪堆里，看到他眼中闪烁着晶莹的火花……是的，他被那些年轻的起义者的命运感动了，其动情的程度比一个小时以前他自己险些淹死更强烈！

在郊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和我分手时（因为巴什卡住在郊区），他把我应得的那一份鱼递给我。那是几条裹着泥烤出来的大鱼，随后他躲开我的视线带着一种粗暴而忧郁的口气向我问道：

“关于枪毙人的那首诗，在哪儿能找到？”

“我明天就给你带到学校来，我家里应该有，是我抄的……”

我一口气把话讲了出来，没能掩饰住内心的高兴。那一天是我青少年的岁月中最美好的一天。



## 四

“但是，这样一来，夏洛特就没有什么可以向我讲述的了！”

在我到达沙朗札的那天早晨，便产生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火车一进那个小站我就跳了下来。在这儿下车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月台的那头，我看到了外祖母，她也看到了我，并轻轻地摇着手，向我迎来。就在这个时候，在向她迎上去的时候，凭直觉，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关于法国的情况，她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要对我讲了，该讲的她已全部向我讲过，再说，由于我大量阅读了那么多的资料，我所积累的东西可能比她的还要多……在拥抱她时，我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有些羞愧，我把它看做是一种对外祖母不自觉的背叛。

另外，已经有几个月了，我总感到有一种极其怪异的苦恼，就是：我了解得太多了……我就像一个很勤俭的人，总是用眼睛盯着自己积累的那一大批财富，这些财富不久便可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会向他展开一个神奇的天地，改变他对物事的看法，甚至可以改变他走路的姿势、喘气的神态、同女人讲话的态度等等，这一笔财富在不断地扩大，但根本的变化却总是迟迟不来。

我那一部分关于法兰西的知识也同样如此。那倒也并不是因为我想从中得到些好处，我的那位同学对我向他讲的故事之大感兴趣，已经使我满足了。倒不如说我是想从中了解一种神

秘的开锁机构，就像音乐箱里的那个弹簧机关一样，那把钥匙一开，就可以放出小步舞曲，于是那些小人就可以在那小台子上跳舞了。我希望我搜集的那一大堆有关的日期、有关的名字、有关的事件和有关的人物能够融汇成一份前所未有的、具有生命力和材料，能够彻底凝结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亟望法兰西能植入我的心田，被研究，被探索，被学习，从而把“我”改造成另一个人。

然而今年夏天一开始时，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姐姐不在。她到莫斯科继续她的学业去了。我很害怕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她这一走可能会使我们每晚在凉台上的故事成为不可能。

第一天晚上，为了证实一下我的担心，我便开始向外祖母提问关于她年轻时的法兰西情况，她很愿意回答我，对我内心的好奇也很重视。一面讲着，夏洛特一面缝补着一件长袖女衬衫领子上的花边。她在那件漂亮的衬衫上一面穿针引线一面对谈着话，这情形总是使人想到，一位一边工作，一边同客人交谈，而且自信所谈的内容很快使客人感兴趣的那种女性形象。

我把臂肘支在那个凉台的栏杆上，一面听她讲。我不由自主地提出的那些问题，把我孩子时沉思过千百次的往昔的事件，熟悉的景象，认识的人物都呈现在眼前了：那塞纳河码头上剪狗毛的师傅，皇帝的车驾在爱丽舍宫前面的检阅，美丽的奥泰罗，共和国总统抱住他的情妇那致命的一吻……现在我方始明白，夏洛特每年夏天都重复讲给我们听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喜欢反复听那些我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罢了。是的，一点儿不错，这完全是使我们童年岁月取得欢悦的神话故事，它们也和其它真正的故事一样，使我百听不厌。

那年夏天我十四岁，我心里很明白，听故事的岁月不会再

有了，而且由于我懂得的事情多了起来，所以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也不会再使我飘飘然了。但奇怪的是，对于自己这一明显的成熟标志我不但没感到高兴，那天晚上反而对从前自己那种天真的轻信感到遗憾。因为我新获得的这些知识，同我期待的恰恰相反，似乎是在我想象的法兰西的形象上罩了一层阴影。我刚刚想要回到我童年的阿特朗蒂德中去，便听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的书的每一页我都看过了，我还看了那些用黑体字写的日期。”于是这个声音便开始对它们进行评论，进行比较，并加以引用。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瞎子……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谈话中断了。对夏洛特的讲述，我特别心不在焉，以致最后几句话我根本没听到（这或许就是个问题），由于内心感到很抱歉，我便打量着她向我抬起来的面孔。这时，我耳朵里便听到她刚刚讲那句话悦耳的声音，由于她的语调正确，我仅从语调中，就了解了她完整的意思。是的，这是一位善讲故事的人应该采用的语调，他并且还要声明：“不是这样，但刚才那个故事你们已经听过了，我不想用那些陈词滥调来招你们讨厌……”但他内心里却暗暗地希望他的听众们这时最好能奉承他几句，并对他说，他讲的故事他们根本没听到过，或者，虽然听过，但早已忘了……我轻轻地摇着头，面带疑惑的神色。

“不，不，我不这样认为。可是，你肯定这个故事已经对我讲过了吗？”

这时，我看到一丝微笑照亮了外祖母的面孔，并且她又接着讲了起来。我听着她讲，这一次可是十分用心了。于是一个中世纪的巴黎便反复不知多少次地出现在我眼前，那街道是狭窄的，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在一堵墙上，那块题铭是阴暗的，

但它始终把三种命运和三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那就是，路易·德·奥尔良，让·桑·勃尔，伊莎博·德·巴维尔……

不知为什么，我竟在这个时候打断了她的话，无疑我是想向她卖弄一下我的知识。但眼前的景象却又突然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坐在一个凉台上，而那凉台，就飘浮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只见她又讲了一遍她心中记得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她讲得像在唱片上录下来的一样，那么准确。对这个多少带点儿传奇色彩的故事，她讲得十分忠实于原意，说的是只存在于她记忆中的某一个国家……我们在这个寂静的夜晚，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突然使我觉得有些离奇，而夏洛特的声音，也使我想到木偶的声音。我马上便抓住她刚才提到的那个人的名字，开始讲话了。讲那个让·桑·勃尔同英国人的无耻勾结；讲巴黎的那些屠夫们，变成“革命者”之后，怎样立法，又是怎样屠杀勃艮地所谓的敌人。讲那个疯子国王，讲巴黎各大广场上的绞刑架；讲因内战而遭致荒芜的城市，以及饿狼们怎样在市郊窥视的情景；还讲伊莎博·德·巴维尔令人无法想象的背叛，讲她同让·桑·勃尔的再度结合，讲她如何否认那位王储，说他并非是国王的儿子。是的，就是讲的那个我们童年时非常漂亮的伊莎博……

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让自己的话给哽住了，因为我说得太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只见外祖母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非常真诚地说：

“你能了解这么多的历史情况，我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她的声音虽然充满确信，但我自信从中听出了一种言犹未尽的隐秘想法：“熟悉历史，这当然好，但当我谈到伊莎博，谈到那个阿尔巴雷特里埃林荫路，谈到那个秋天的夜晚



时，我想的可完全是另一件事……”

她伏身于自己手中的活计，开始用小针脚缝起来，那针脚细密、整齐。我回到屋子里，然后下楼来到大街上。远处一声火车的长鸣在空中回荡，那声音被夜晚的热风吹得似断似续，使人听了如泣如诉。

在夏洛特住的房屋和大草原之间，有一片类似小树林一样生得特别茂密的丛林，密到人几乎进不去。其中有荆棘般的野桑树，有带刺的榛子树条，还有长满寻麻的坍塌的壕沟。另外，在我们玩耍的时候，儿时我们能够穿过这个天然的障碍，但那些人为的障碍却依然会挡住我们的通路：那里有一排排的铁丝网，有纵横交错的反坦克障碍物……大家依据战争期间人们在这儿修建的这条防线的名字，便把这个地方称为“斯大林防线”，当时大家担心德国人会打到这儿来，但伏尔加河，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把德国人给挡住了……这条防线后来被拆了，但剩下的那些作战用的器材，还留在这片小林子里，所以便把原来的名字也保留了下来。沙朗札的居民说，“斯大林防线”连同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也就这样一起被列入“历史的伟大行动”之中了。

有人说那片丛林内部埋了地雷。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想进去探险的念头也给打消了。

就在“斯大林防线”的矮树丛后边，有一条窄轨铁路通过，那好像是一条微型铁路，上面开的小火车让烟熏得漆黑，车厢也特别小。就好像人的视觉产生了错误一般，那身穿满是油污工作服的司机，一个笨手笨脚的大个子，正把身子探在窗外，每次当小火车要通过这条伸向远方的小铁路时，便发出一种半哀半怨的鸣声，再加上它的回答，就变成了两个，好像杜



鹃在呼唤。“咕咕什卡”<sup>①</sup> 我们一边说，一边向这列小火车看一眼，只见它正在长满蒲公英和春白菊的小铁路上行驶……

那天晚上，就是它的声音把我带走了。我绕过斯大林防线旁边的那一片荆棘，看到那列小火车最后一节车厢正在暮色苍茫中向前滑动。尽管这是一列小火车，但它却也能散发出铁路上那种特殊的气味，有点刺鼻，使人于不知不觉中便想起了要去一个美好的地方长途旅行。远处，在傍晚的淡蓝色的薄雾中传来了那幽怨的杜鹃啼声。我把一只脚放在铁轨上，它依然因已远去的火车的压力而在轻微地振动，宁静的，大草原一声不响，似在期待着我的一个行动，一个步骤。

“在很早以前，”我身内一个没讲出话来的声音说，“那时，我认为这个‘咕咕什卡’离开这儿不知向哪个方向去了，那个地方一定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些国家，是白雪覆盖的大山，是夜间的大海，在那里，船上的灯火同天上的星星连在一起，现在我明白了，这列小火车是从沙朗札的砖厂开来，到一个车站去把砖卸下来，全长总共也不过两三公里，这是多好的旅行啊！是的，现在我明白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认为这条铁路通向无穷无尽的远方。而那天晚上，也是唯一的一个晚上，在宽阔的蓝天下，加上大草原的强烈的馨香，我来到这个地方，却说不出为了什么，但又奇怪地觉得非常之必要，就站在这条枕木已然开裂的铁路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紫红色的天空下，传来了这杜鹃声声，但那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那么正常……”

夜里，我没有睡着，我记起来了，我终于明白了，在欢迎沙皇的宴会上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菜单名字的意义了：“烤山

---

<sup>①</sup> 俄语“杜鹃”的音译。

鹑、雪鹑配块菰”，是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美食家特别对野味情有独钟，那只不过是一道精美绝伦、美味可口而且难得一见的野味而已，此外无它。我从前枉自多次提到它：“山鹑、雪鹑”。那种把我的肺里灌满瑟堡咸海风的魔法已经不灵了。在迟疑的失望中，我低声自言自语，一边在黑暗中睁大了双眼：

“这么说，我已然度过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自那以后，我们讲话，就是为了什么也不讲。我们便看到，在我们中间竖起了这样一块屏幕，上面就映着这些八面玲珑的语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切属于这种类型的有声语言也都映在上面，而这种如稀汤般无味的语言，大家又感到不得不用它来填充生活中的沉默，却不知为了什么。我惊愕地发现，讲话，实际上就是不讲心里话的最好方式。于是，你要想说这件事，你必须先讲些完全与此无关的话，还要把这些话悄悄地凑到别人的耳朵边去讲，还要把它们在夕阳的光照中，在晚上的传言中加以精心编造。有一次，我觉得在我身上正神秘地孕育着这种语言，它同人们经常使用、从而变得没有棱角的语言是那么不同。这是一种当我碰上夏洛特的目光时，我才能压低了声音向她说的语言：

“为什么当我远远地听到那个‘咕咕什卡’的鸣叫时，心里便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一百年前瑟堡的那个秋天的早晨，是的，那天早晨我从未经历过，而且那个城市我从未去过，可为什么那天早晨，那里的阳光和秋风却使我感到比我现实生活中的阳光和秋风更有活力？为什么你这个凉台现在不再在傍晚淡紫色的霞光中在草原上飘浮了？围绕着它的那个朦胧的梦像炼金的瓶子一样被打碎了，它的碎片发出了嘎嘎的声音，并且

同从前一样，阻止我们讲话……而你的那些对往昔的回忆，我现在已经从心底里了解了它们，难道它们不是像地下室一样把你如囚犯般关在里面了吗？而我们的生活，难道它不正从一个变化万千而且是热情的‘现在’每天都在向那个已凝固了的众多的回忆标本在变化着吗？难道这不像那些大头针钉住的蝴蝶，被放在已落满灰尘的标本匣里一样吗？然而为什么那时我会觉得自己为了在纳伊的那个幻觉中的咖啡馆里想象出来的银贝壳杯留在我嘴上的那种酸味，竟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回忆的标本奉献出来？难道只是为了吸那么一小口瑟堡的咸味海风吗？难道只是为了来自童年时期‘咕咕什卡’的那么一声鸣叫吗？”

然而，我们仍继续填充这个生活的沉默，然而它竟像达那依德的木桶<sup>①</sup>，我们使用毫无意义的废话，不着边际的空话来填充它，诸如：“今天可是比昨天热呀！加夫利里奇又喝醉了……‘咕咕什卡’今天晚上没来……那边的草原上起火了，你看！不，那只不过是一片乌云……我去泡茶……今天集市上又卖乌兹别克斯坦的西瓜了……”

真是难以表述！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些废话却不可思议地同“心里话”联系在一起，心里话就难以表述，就是无法言传。在这个世界上，凡属以其无声的美来折磨我者，凡属在我眼前默默无声者，我都认为那是在讲心里话，难以表述就是心里话。

这样一个方程式在我年轻的头脑中制造了一种思维的短

---

① 达那依德的木桶：达那依德是达那奥斯的五十个女儿的总称，在新婚之夜，她们除一人外，统统把她们的丈夫杀死，于是她们被罚以向一个木桶里灌水，灌满为止，但是这个木桶却没有底。于是人们便把“达那依德的木桶”比做欲壑难填，或者，一个浪荡子把到手的东西转眼间便挥霍殆尽。

路。由于它特别简明扼要，所以那年夏天我便跌入这样一个可怕的推理之中：“人，之所以讲话，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沉默。他们下意识地讲着话，而且声音很大，但每个人都把自己排除在外，他们被这些言不及义的语言搞得飘飘然、昏昏然，而这些赘话又同一切的物事、一切的生命连在一起。他们谈论下雨，谈论晴天，还谈论金钱，谈论爱情，谈论鸡毛蒜皮。当他们谈论起他们高尚的爱情时，就用那些被人说过一百遍的词藻，就说那些被人说得把耳朵都磨破了的句子，甚至连内容都是雷同的。他们之所以要讲话，就是因为要讲话，他们不要沉默……”

那个炼金术士用的长颈瓶破碎了。由于认识到我们话语的荒谬，我们便进行这样的日常对话：“可能要下雨了，你看那一片乌云。不，那是草原上起了火……瞧，那个‘咕咕什卡’今天到的比平时早……加夫利里奇……泡茶……集市……”

是的，我生命的一部分已然在我的身后了，那便是我的童年。

最后，我们在那年夏天说的关于下雨、晴天的对话，并非全无根据，也的确是经常下雨，而由于我的忧郁使得那年的暑假在我的记忆中染上了朦胧和冷淡的色调。

就在这阴暗冷淡的日子里，我们从前每晚的夜话有时又重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偶尔我又在那个西伯利亚大箱子里发现几张照片，其实，很久以来那箱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已不再是秘密了。那是家族中一个很小的细节故事，尚不为我所知，这时夏洛特带着点儿腼腆的喜悦向我讲述，就像一个破了产的王妃突然在她的破钱包里发现了一块金币一般。

那一天，下着大雨，我在翻阅着放在箱子里的那一大堆法



文旧报纸时，突然发现了一张照片，可以肯定，那是从本世纪初的一份画报上搞下来的。是一幅特别逼真的写实主义作品，这种作品以精确和细部的丰满取胜，但这个复制品的彩色仅勉强可以看出棕色和灰色。这幅画的主题，我之所以仍能记住，是因为在漫长的雨夜中我反复地翻检这些报纸的缘故。只见有一队纵队，和一个军人队列非常之不协调，一眼便可以看出来，画面上的人年龄已很大，人也十分疲惫了，他们正走在一个贫穷的村庄的街上，两旁的树都是秃秃的。不错，这些士兵年龄都很大，我觉得都是些老头了，长长的白头发都露在宽沿帽的外边。这是全民应征入伍，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所剩下的最后一批尚属健壮的人了。我没有记住画的标题，但“最后”这个词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是最后一批可以同敌人作战的人，最后一批能够掌握武器的人。那武器也相当简陋：一些短木棍，几把斧头，还有一些破战刀。怀着好奇心，我打量着他们的军服，只见脚上穿的是大皮鞋，带着大铜扣，头上戴的帽子，有的则是褪了色的防护帽，好像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戴的那种，手指都长着结节，痉挛地握着武器……法兰西，她总是在她宫殿辉煌的壮丽场面中，在我眼前出现，总是在她历史的光辉时刻在我眼前出现，而现在，却突然向我展示出这样一座北方村落的面貌，在这里，低矮的房屋蜷缩在稀疏的篱笆后面，在这里，生长不良的树木在冬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奇怪的是，对这样泥泞的街道，对这些老头兵被派去在一场不公平的战争中牺牲，我感到离这一切很贴近。不，他们在举止上，一点也看不出悲怆的神态。这些人并不是英雄豪杰，在显示他们的勇气或牺牲精神，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凡人。特别是那个人，头戴老式西班牙殖民主义军帽的那个人，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他在队伍的最后，正柱着手里的木棍向前走，最使我

动心的是，他的面孔出奇地从容，同时又带着苦涩的微笑。

在我这种带着青少年色彩的忧伤过后，又突然变得心中有一种难以说清楚的欢快。我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这位老军人何以面对即将溃散的队伍，面对痛苦和死亡，仍然那么从容不迫。他走在这一片平坦、寒冷而又肃杀的土地上，双目远望，既不似不食人间烟火者，也不似那么怡然自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爱那个被他称为“祖国”的那片土地，他好像还很坚强，在这一刹那间，我心跳的节奏似乎和他的取得了同步，战胜了惧怕，战胜了命运，战胜了孤独。在这一情绪支配下，我觉得法兰西之于我，有如一条新的琴弦，它发出了生动而悦耳的谐音。我试图想立刻为它找出一个合适的名字：爱国主义的自豪感？耀武扬威？还是意大利人对法国军人称呼的那个著名的 *furia francese*<sup>①</sup>？

在暗自搜寻这些名字时，我看到那位老战士的面孔又慢慢阴沉下来了，他的双眼也失去了光彩，他又变成了那个复制出来的老照片上的那个人，那色彩也依然是只有棕色和灰色：这似乎是他在有意地扭转自己的视线以掩盖我刚才发现的他那神秘的内涵。

另一道往昔的闪光，就是那位女性。即那位身穿棉袄、头戴波兰式棉军帽的那位女性。我是在一个满是我们家族在法兰西时期的照片影集里发现她的照片的，我记得，当我对这张照片刚一发生兴趣后，它就在影集里消失了，还记得我曾把这件事对夏洛特说过。我也曾费尽心思想过，何以当时竟没有得到回答。当时的场面又出现在我眼前了：我把那张照片拿给外祖

---

① 意大利语：法国式的愤怒。

母看，但却突然看到她脸上很快地便罩上一层阴影，竟使我忘记了提问。在墙上，我用手扑住一只奇怪的蝴蝶，那是个大蛾子，有两个头，两个身子，四对翅膀。

现在距那时已是四年之后了，我想，那个双身的大蛾子，对我已不再有半点儿神秘的了，那是两只蝴蝶在交配，再清楚不过了。于是我也想到人的交配，同时也在头脑中想象着他们身体的动作……突然，我明白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甚至可能有好几年了，我总在想着它们的身子紧紧地搂抱着纠缠在一起的景象，无论在一天的什么时候，我都在想这些，但嘴里讲的，却是别的事。好像那一对大蛾子火热的情景一直在烧我的手掌。

向夏洛特请教那位穿棉袄的女性是谁，我现在感到最终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外祖母和我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绝对的障碍，即女性的胴体已经成千次地被我梦想过，觊觎过，而且使我着魔。

晚饭时，夏洛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以漫不经心的语气说：

“这可奇怪了，‘咕咕什卡’现在还没过来……”

从梦中被惊醒的我，抬起头来看着她。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彼此再没有讲什么，直到这顿饭结束。

这三位女性改变了我的观点，乃至我的生活……

我是偶然间在翻检那只西伯利亚箱子时在一篇新闻剪报的背面发现她们的。当时我又读了一遍关于“北京——巴黎”经莫斯科的第一次汽车拉力赛报道的那篇文章，好像是在向我自己证明，夏洛特的那个法兰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了解的了，那些材料已经实实在在地用光了。因为我心不在焉，这张报纸便

滑落在地毯上了，我通过凉台上开着的那扇门向外看，这一天天气出奇的好，正是八月下旬，阳光明媚，气候凉爽，穿过乌拉尔的寒风已把秋天的第一阵凉意带到我们草原上。在这清澈的秋光中，一切都闪闪发亮。斯大林防线上的树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十分清晰，遥远的天际，似给地平线画了一条清晰、明朗的线条。随着那种苦涩心情的减缓，我心中暗想，假斯快要结束了。同样，我生命的一个阶段也行将结束了。这一结束的标志，就是我这个不寻常的发现，即我所了解的一切，它们既没给予我幸福，也没能使我对家庭中主要事件的了解得到帮助……还有一件事也是如此，即长时期以来，我一直在想雌性的躯体，想女人的身体。其它的想法是附带的，偶然的，或是派生出来的。是的，我愈来愈清楚地感到，做一个男人，就意味着不断地想女人，男人不是别的，就是女人的梦想者！我想，我正在变成这样……

由于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落在地毯上的那张报纸翻过来了。我把它从地上捡了起来，于是在反面，我看到了她们，本世纪初的那三位女性。到当时为止，我还从未见过她们，因为我原来觉得一张新闻剪报的反面不会有什么重要内容的。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我很为惊讶，我把照片拿到从凉台上照进来的光亮下面……

我马上就爱上她们了。爱上了她们的身体，爱上了她们那温柔而专注的目光，从这种目光推测，很容易就使人想象到，有一位摄影师，正弯着腰，头戴一顶鸭舌帽，站在三脚架的后面。

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特征，恰是绝对能使像我这样孤独又不合群的青少年心动神移的那种东西，是属于某种十分标准的女性特征。三个人一律都穿一件黑色的长裙，其剪裁又恰



恰突出了她们浑圆而丰满的胸部，把臀部紧紧地裹住，显得轮廓分明，这件长裙在向下延伸，拥抱着她们那两条腿，并在脚周围展示出它精美的裙褶之前，还特别描画出她们肚腹的那种隐蔽的线条。那个略见丰满的三角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似羞怯般的肉感，使我心醉神迷！

她们表现出来的美，恰是像我这样一个耽于幻想，并对肉欲无知的青年所不断想象的色情场面中的那种美。想象中的她，是一个“典范”女性的代表，是理想的女性特征的具体化，理想情妇的幻影。因此，我便细心地打量着这三位美女，打量着她们黑色的眼圈，打量着她们饰有深色天鹅绒彩带的大帽子，打量着她们往昔的这种面容，这种面容在前几代人的肖像中，给我们的印象始终是某种天真无邪的特征，一种与生俱来的纯真特征，这种特征为我们当代人所不具有，它使我们产生信赖感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动。

事实上，特别使我赞叹的，是那种精确的巧合：我这种毫无经验的爱，在一般情况下，所呼唤的恰恰就是“那种女性”，即一位尚不具有肉感上一切特征的女性，而那也正是为一个性欲成熟的人所不喜欢的。

我打量着这三个人，心中愈来愈苦闷，她们的躯体，我是无法得到的。噢，要想同她们相会，也并非是真的不可能。很久以来，我的色情妄想就已经能够克服这种障碍了。只要我把眼睛一闭，就能看到那些陪伴我的漂亮女郎——一律的裸体。正如一位化学家善于实施巧妙的合成一样，我也能够把她们最一般化肉体的有关部分予以重新改造，比如那个女人，笨重的臀部，有一天在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上，碰在了我身上，海滩上那么多晒成古铜色的曲线分明的躯体，裸体画面上的每一个人等等，我都能加以充分想象，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也能够

这样！是的，尽管在我的祖国曾发布禁令打击裸体画，特别是女性裸体画，但我可以把她们的胸脯，想象得在我的手掌下是那么富有弹性，她们的腰肢是那么婀娜多姿。

不，这三位美女对我来说，绝非不可接近……当我要想找出时间来和她们在一起时我的想象力马上就会开动起来。我便想起了布莱里奥，他曾驾着单翼机首次穿过英吉利海峡，想起了毕加索，他曾画过《阿维尼翁的小姐们》……历史上杂乱纷纭的物事在我的头脑中回响。但那三位女性却一动不动，了无生气——原来是三个陈列品，上面挂有标签，写道：香榭丽舍花园中陈列的美人。我企图使她们成为我的意中人，即，使她们成为我想象中的情妇。经过色情的组合，我塑造了她们的躯体，她们也能够动了，但要把她们改造成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要使她们站起来，穿衣服，都要模仿得刚睡醒的那样，为了要突出昏昏欲睡的印象，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形象，却使得我直皱眉头：那裸露的胸脯扁平松弛，就是有一天我在火车上看见过的那个嗜酒的老女人的干瘪胸脯。我摇了摇头，想极力摆脱这个令人恶心的形象。

然而还必须俯首听命于这个陈列馆的安排，它陈列着木乃伊、腊像，每个上面都挂着标牌：《三美女》，《富尔总统和他的情妇》，《在北部村庄里的老军人》……我便把箱子盖上了。

我斜依在凉台的栏杆上，任我的目光在大草原上明暗相间的金色晚霞中驰骋。

“那么她们的美色，归根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头脑中突然掠过一道似这金色晚霞般的闪光，使我想到了上面这个问题。“是的，她们美丽的乳房，她们的腰肢，她们的长裙紧紧地裹住那青春的躯体，这一切，都做什么用？如此的天香国色，竟被压在一只旧箱子里，在这样一个昏昏欲睡满街是灰尘的城市

里，被遗弃在这一大片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对沙朗札这个城市，她们生前是没有半点印象的……她们身后的全部遗物，就是这张照片，而且这是在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大大小的灾难之后保存下来的，是作为《北京——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新闻报导剪报的背面留下的唯一一个。甚至连夏洛特都对这三位淑女的身影没留下一点儿印象。只有我，在这片土地上只有我一个人，尚保留着把她们同尚还活着的人们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我的记忆是她们最后的庇护所，也是她们在被人们完全彻底遗忘之前最后的居留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是她们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上帝，是香榭丽舍这一角落的上帝，在这里，她们的美色依然光艳照人……”

然而，尽管我是她们的上帝，我却只能向她们提供一个木偶式的生活条件。我又展示了我回忆的力量，三位美女开始碎步小跑了，共和国总统在紧紧搂抱玛格丽特·斯丹海尔了，奥尔良公爵倒下了，一把背信弃义的匕首洞穿了他的胸膛，那位老战士正在手持着木棍，挺起了胸膛……

“所有这些情感的波涛，”我忧郁地暗想，“这些苦痛，这些爱，这些语言，何以竟会留下如此稀疏的痕迹？这个世界的法则又是何等荒谬：那么美丽又是那么令人向往的女性，其生活竟然依附于轻飘飘的一张旧报纸上。不错，这张报纸如果不翻过来的话，我就未必能够把她们从被人遗忘中拯救出来，而且就此就永无出头之日。而让一位漂亮女性消失，岂不是天下最蠢的事！更何况是一旦消失便永无再现之日，更何况是就此被全部的抹去，更何况是就此没有了影子，没有了声音，没有了呼唤……”

太阳在草原的那边消失了。但天空中却长久地继续保留着凉爽的夏日傍晚时那种清澈晶莹的光。森林的后面又响起了

‘咕咕什卡’的鸣声，在这凉爽的空气中显得尤其响亮。地上的青草已开始点缀着几片黄叶了，这是第一批黄叶。小火车又开始鸣叫，但那声音已经远了、弱了。

当我的思绪又转到那三位淑女身上时，便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产生了经过伤感的思考之后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方才，我还被这一思考搞得混乱不堪，这个想法便是：“在她们们的生活中，不也是同样有这种凉爽而清澈的秋日的清晨吗？在这铺着枯叶的地上，不也同样有这样的小路吗？在这样的小路上，她们走走便停了下来，只停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站在相机的镜头前，她们要把这一会儿的时刻永远固定下来……是的，在她们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个清澈明亮的秋天的早晨……”

就因为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却产生了奇迹。突然，就在这一瞬间，我全身各个器官都感到，三位淑女脸上的笑容突然隐去，我又置身于秋天气味很浓的环境之中，我张开鼻孔，秋天树叶的那种强烈气味便直冲进来。我眯着眼睛看着透过树枝照着我的太阳，我听到远处传来四轮马车在路上走的声响，这声音同那三位美女在把自己的形象定格以前当着摄影师的面开玩笑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是的，我正在和她们生活在一个时空里，是那么真切，那么绝对。

我置身于秋天的清晨，和她们在一起，这一现象的作用非常之大，以致使我几乎失去理智，我突然觉得如果永远留在那儿是非常怕人的。于是便懵懵然、昏昏然地回到屋子里，又把那一张报纸拿了出来……

照片的表面似在微微地抖动，就像彩印画的色彩潮湿并且太浓了一般，那个平淡的画面开始变深，并在我眼前开始消失。我就这样孩子般地打量着两张相同的面孔在融溶成一个立体画面之前，慢慢地向一起游动。三位女性的这张照片便在我



面前展了开来，并渐渐地包围了我，使我走进了它的天地，带着宽阔的黄色树叶的枝条向我伸来……

我这样的反应足足有一个小时（忘记了一切，同死人一般……），但它却也不再说明什么了。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无须说什么话的。我闭上了双眼，那一刻依然属于我。我甚至连这三位女性有何种欢悦都想象到了，比如夏日炎炎的永昼过后，秋高气爽宜人天气来临的欢悦，按季节换装的欢快，城市生活的欢乐，甚至不久之后的秋雨和秋凉，都能使生活增加欢乐。

她们的躯体，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法接近了，但仍然活在我的心里，它们沐浴在枯叶的强烈气味中，沐浴在阳光照射下的金色薄雾中……是的，我在想象她们身上那种使人难以察觉的颤抖，她们以一个女儿之身用这种颤抖来迎接新秋的到来，来迎接这个既欢悦又哀愁的季节，这个既明朗又忧伤的季节。这三位女性和我之间，已不存在任何隔阂。我们的合而为一，这使我已经感觉到了，比任何肉体的占有都更加多情，更加肉感。

我出现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早晨，又返回到几乎是黑暗的天底下，感到十分疲乏，有如刚刚游过一条大河一般，睁开眼打量着我周围的一切，几乎刚刚认出那些熟悉东西，但我立即便想沿着来路返回重睹那三位美女的芳颜。

然而，我刚刚经历的这一场幻境，似乎又离我而去。我的记忆在不经意间又为我制造了另一个过去意境。我看见一位身穿黑衣、相貌堂堂的男子正坐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这时门悄悄地打开了，一位蒙着面纱的女人走了进来，只见共和国总统非常戏剧化地把他的情妇紧紧地搂在怀里。是的，这是爱丽舍宫的那一对情人秘密幽会过千百次的场面。这一对情人被我的记忆唤了回来，又以歌舞剧的形式把那个场面重新表演一

番。然而仅只如此，已不能使我满足了……

三位美女面貌的变换，使我产生了一个希望，即幻境可以重造。我对这样一句话记得很清楚，这句话虽简单，却使我尝试到了一切：“但是，在这三位女性的生活中，也有那种阳光明媚而清凉的早晨……”于是我便像一个术士的小徒弟一般，重新设想着那个在办公室里长着漂亮小胡子的男人，站在黑暗的窗前的一切活动，我嘴里如念咒语般念念有词：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也有一个秋天的夜晚，当他站在黑暗的窗下时，窗外爱丽舍宫花园里光秃秃的树枝在摇动……”

我没有考虑现实和虚幻之间的时间界线该止于何处……总统用眼睛盯着那摇动的树枝，却没有看到它们。他的双唇靠玻璃那么近，以致在玻璃上形成了一小片水汽，在很短的时间内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发现了这一点，便轻轻地摇了摇头，算是对自己无声的思绪的一种回报。我猜想，那一定是感到他身上的衣服有些硬得异样吧，他对自己也感到奇怪了。是的，有一个不为自己所知的东西很生硬地在那儿，而又不得不在，外表上强使自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到，不，不是想到，而是感觉到，在窗户外边某一个黑暗又潮湿的地方，有一个同自己愈来愈知心的人不久就要走进房间里来了。“共和国总统，”只听他低声说，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慢慢地咬得非常清楚，“爱丽舍宫……”突然，这些平时常用的词好像一下子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很强烈地感到，男人在一段时间里，会重新动情的，那原因就是他被闪闪发光的面纱笼罩下的女性那双温柔火热的嘴唇所软化……

这种反差极大的感觉在我面部表情上停留了几秒钟。

对往事的这种魔术般的转换，使我很兴奋，也很疲劳。坐

在凉台上，我激动地喘息着，目光盲目地望着大草原的夜色。毫无疑问，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颠倒时间的术士。刚刚清醒过来，我又念起了我的咒语：“然而，在那个老兵的生活中，也有那冬天的日子……”于是我便看到了那位头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军帽的老人。他正手拄长长的木棍，那被风吹得通红的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他内心愁苦的心情，他在想，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当自己撒手尘寰时，这场战争可能还在继续。突然，在这冰雪满天的时刻，沉闷的空气中，他闻到一股燃烧的木头的味道。这气味很好闻，似乎还略带一点儿酸味，混杂在这光秃的田野上冰冷的气息里。那老人深深地吸了口冬天的冰冷空气，于是便有一丝微笑浮现在脸上，使他那张严肃的面孔增添了几分生动的色彩，他轻轻地眨了眨眼。这就是他，就是那个闻到有燃烧的木材味的那个人，就是贪婪地吸了一大口冰冷空气的人，就是他，他就在这儿，就是现在，在这个天底下……他正要投身战场，去参战，这场战争，乃至他的生死，对他来说，已不再有什么意义。是的，作为生命中的一个插曲，在无意识中，他将是，而且已经是这场战争的参加者，那么这个生命也应该说十分伟大了。他在使劲地呼吸，他在微笑，双目半睁半闭。他已意识到，他尚能苟活的这个瞬间，便是他所预感的那个生命的开始……

夏洛特直到夜幕降临方始回来。我知道，她有时候整个下午直到傍晚都是在墓地上度过的。有时她为费奥多尔墓前的花坛除除草、浇浇水，或者擦一擦上面有一颗红星的墓碑，待到天色行将暗下来时才离开。她走得很慢，要穿过整个沙朗札城，有时还要在路旁的凳子上坐下来歇歇，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到凉台上去……

她进来了。我激动地听到了她在走廊上的脚步声，随后便听到她进了厨房。我没来得及考虑一下我的做法是否合适，便和平时一样，跑过去请她给我讲她年轻时的法兰西。

我刚刚度过的那些幻想的时刻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异乎寻常的疯狂的实验，它既美丽又使人害怕。要想否认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全身都还保留着清晰的印象。我确实是实实在在地经历过那些事！但却是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矛盾心情，带着一种既害怕又理智的心情经历的。但我必须否认我的发现，摧毁我隐约看到残垣断壁的那个天地。我所希望于夏洛特的，是她能讲一些孩子们感兴趣的、平平淡淡的、她青年时期法兰西的故事。讲大家所熟悉的，像照相底片那样光滑的对往事的回忆，并且还应该能帮助我忘却幻境中那些疯狂的过客。

她并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显然她很清楚，我之所以敢于这样打乱我们的生活习惯，那肯定是有什麼重要的原因强使我这样做。她可能会想到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那些没有结果的谈话，想到我们每当太阳落山时讲故事的习惯，但在今年夏天，那却是一反惯例的应景之事。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叹了一口气，嘴角上带着微笑说道：

“但我能给你讲些什么呢？你现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等一等，我还是给你读一首诗吧……”

我将经历我有生以来最不寻常的一个夜晚。开始的那个时刻，因为夏洛特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找到她寻找的那本书。就在这样一种奇妙的空闲时间内，我们有时看到她把东西翻个乱七八糟，但她却是一个有条不紊、甚至爱挑剔的女性，因此，那天晚上就让她折腾到好晚。几大摞书籍都堆在地板上，我们爬到桌子上，去查看搁板最上面的几层，但那本书仍然没找



到。

直到凌晨两点，站在别开生面的一大堆乱糟糟的书籍和杂物中间的夏洛特，却惊呼起来：

“你瞧我多么蠢！那本诗集，就是去年夏天我才开始读给你们，就是你和你姐姐听的，你还记得吗？后来呢？……后来我就记不起来了，哦，对了，我们已经读到第一节了，这就是说，它应该在。”

说罢夏洛特便弯着身子去查看凉台门旁边的一个小衣橱，打开衣橱后，我们发现那本书就在一顶草帽旁边。

我就坐在地毯上听她读起来。一盏台灯放在地上，照亮了她的面孔。墙上，我们的身影在上面映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幻影。不时地，黑暗的大草原的一股冷风，从凉台的门外直刮进来。夏洛特的朗诵传达了诗中人的话语，在他们说出来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听到了这些回声：

然而我每次来领教并和她直面相对，  
那灵魂便突然年轻了两百多岁……  
那是在路易十三治下，我似乎看到，  
平静的绿丘上，夕阳正在下坠。

又看到上砖下石的一片城堡，  
它座落在百花丛中，还有流水环绕。  
那门窗的玻璃已被夕阳染红，  
花间的小河正涤濯着她的双脚。

还见一位夫人站在高大的窗前，  
她金发黛目，一身古老的装扮，

我想起来了，可能在另外什么地方  
我曾经目睹过她的芳颜！

在这个不寻常的夜里，我们再也没说什么话。我在入睡以前，想到了这个人，他在我外祖母的国度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有勇气讲出自己的“疯狂”——即在幻想时的一切，然而它却比正常人所经历的任何现实更加真实。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晚。隔壁那间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屋子，又整理得有条不紊了……风向也换了，现在吹来的是黑海的热风，昨天的冰冷气氛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事了。

时近中午，我们没经过商量，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草原上。我们一声不响地并肩走着，绕过了斯大林防线上那一堆荆棘，然后，我们又越过了杂草丛生的窄轨小铁路。在很远的地方，“咕咕什卡”便让我们听到了它的鸣叫，接着便看到那列小火车出现了，就好像在花丛中行驶一般。它愈来愈近了，跨过了我们的田间小路，便笼罩在放出的热汽之中。夏洛特目送着它远去，然后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轻声说道：

“我小时候也坐过火车，那火车同现在的这种‘咕咕什卡’不相上下，那时它用自己那种小车厢载旅客，要横穿普罗旺斯，要七拐八拐地走好长时间。那时我们常去一位姑母家小住几天，她住在……那个城市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每当我们在那些瞌睡般的小车站上停靠时，便见小山坡上阳光明媚，蝉鸣聒噪。而那些小山坡上，一望无际，全是种的薰衣草……是的，阳光，秋蝉，碧绿的青草，以及被秋风从开着的车窗送进来的那股特别的气息……”

我在她身边走着，沉默不语。我觉得“咕咕什卡”这个词将是我们今后的新语言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我们这种

新语言，它讲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表达的。

两天以后，我便离开了沙朗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火车开动之前的那最后几分钟的沉默，没使我感到难过。我在窗户边看着夏洛特，站台上送行的人特别多，那些都在用手比划着什么，像个哑巴一样，以防对方听不清他们的话。夏洛特一句话也没讲，看到我的目光后，便轻轻地笑笑。

我们用不着讲话。

# 第三章





那年秋天，母亲对我们说，她需住院做“一个简单的体检”，真不好意思承认，对这一段时间不同她在一起我感到特别高兴，然而刚过了几天，就在那天下午，我刚放学回家，便得知她已去世了。

在她离家住院的第二天，我们家便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王国了，父亲每晚在电视机前看到凌晨一点。我呢，也尝到了成年人这种自由自在的甜头，每天放学后也都会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第一天九点回家，第二天九点半，随后是十点……

那几天晚间，我都逗留在一个交叉路口上，在秋日的薄暮中，带着一点轻微的想象力，那个地方就能出现惊人的幻象：即雨夜中西方的一个大都会。这个交叉路口是我们这座城市千篇一律的林荫路中唯一的一个好去处。纵横交错的街道，在这儿向外延伸，就像一个车轮的辐条，街面上门面房的墙壁都被割成梯形。我当时已经知道，在巴黎，拿破仑就曾命令过把马路建成这种放射形，以避免车辆的堵塞……

夜色愈浓，我的幻境也便会愈具体。我知道，这些房子中有一栋是作为本地破除迷信展览馆之用，其它房屋的墙壁也把住得满满的集体宿舍给挡在后面，但这一切对我妨碍不大。我站在雨中仔细打量着那些窗户上黄黄绿绿的水彩画，打量着平整的沥青马路在雨中的反射光，以及光秃秃的树影。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自由自在，感到很开心。于是我便悄悄地用法文同自

已讲话。在这些梯形的门面房前，这种语言的声音使我感到特别自然。我那年夏天发现的那种魔法，它会不会恰巧成为现实？每个在我面前走过的女性似乎都想和我讲话，每在这个夜色中多逗留半个小时，都会给我头脑中的法兰西幻境增加新的内容。我已然不属于我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国家了，在这一方极小的夜色中，我惊奇地感到，对自己愈来愈陌生了。

从现在起，太阳已使我厌烦，白天，也成了我真正的生命——夜晚，来到之前的一个无聊的等待时间……

然而，就是在大白天里，在被秋天第一场白霜照得眼睛发花的白天，我得到了这个噩耗。当我在一群高高兴兴的学生旁边经过时，平时他们一向对我表示出一种蔑视的敌意，现在依然如此，只听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

“你们听说了吗？他母亲死了……”

于是便看到，有好几个惊奇的目光向我投来，而我也认出了刚才讲话的那个人，他是我们邻居的儿子……

这种无关痛痒的话，使我不得不想到那种难以想象的局面：我母亲死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所有发生的事情一下子都汇集在我头脑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画面：父亲经常不在家，而且常常沉默不语，我姐姐突然回来已经两天了（我现在才想起来，这并非是她们放假的时候……）

到家时是夏洛特给我开的门，当天早晨她就从沙朗札来了，这么说，他们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可我呢，我仍然属于“暂时什么也不应该对他说的孩子”。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依然在他那个“法兰西”路口上踱来踱去，一边以成年人自居，自由自在，神秘兮兮。我母亲的去世也给我当头一棒，使我第一次清醒过来，接着便感到羞愧：母亲死了，而自己却沉溺于自我陶醉的漩涡，沾沾自喜于逍遥自在，站在破除迷信展

览馆的窗下，欣赏巴黎的秋色！

在这几天悲伤的时刻，以及送葬的那一天，没有落泪的只有夏洛特一人。她只是面无表情，目光平静地忙着各种家务，接送宾客，并负责安置从其它城市来的亲友。她这种冷漠的态度很使大家感到不快……

“你什么时候想去，就到我那儿去。”当她要动身回去时，对我这么说。我点了点头，似乎又见到了沙朗札，凉台，装满法文报纸的大箱子。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很羞愧，在我们相互讲故事时，在我们的生活经历着它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时，母亲就已经染病在身，但她却一直工作着，忍受着病痛却没有对任何人讲，意识到自己被宣判了死刑，却一句话也没讲，一点也没表现出来。可我们呢，依旧过我们的日子，依旧讲那些什么三个美丽的女人……

我怀着悄悄的宽慰心情送走了夏洛特。我内心感到母亲的死和我有关系。是的，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对此我负有责任，就像一个走钢丝的演员感到观众向他射来的目光，使他左右摇摆，甚或掉下来一样。是夏洛特教会了我，使我能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大工业城市中看到巴黎的轮廓，是她把我封闭在梦幻般的往昔之中，我在那种梦境中，向现实生活中投过来的目光是漫不经心的。

而这种现实生活，就是在母亲入土的那天，我颤抖着看到的积留在基底的那一层止水。在绵绵的秋雨中，大家慢慢地把母亲的棺木放在满是积水和淤泥的墓底……

使人能切实地感到这种现实生活的表现之一，是我姑母的到来。她是我父亲的姐姐，住在一个工人集中的小镇上，那里的居民，早晨五点起床，然后便向城里各大工厂的厂门拥去。



这位女性带来了浓厚而强烈的俄国人的生活气息——她能把凶暴、怜恤、酗酒、杂乱无章、强烈的生活乐趣、甘受驱使、盲目地固执、使人意想不到的精细……等等令人惊异地结合在一起，把这些特点集于一身。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从前被夏洛特的法兰西所掩盖了的另一个世界，现在在我面前出现了。

姑母十分担心父亲会开始喝酒，那是她一生中见到的男人们一种致命的癖好。因此，每当她来看我们时总是反复地说“尼古拉，可千万不要喝那苦水啊！”她是指的伏特加。他就毫不在意地一边使劲摇着头，一边答允她说：

“不喝，不喝，如果喝那玩艺儿，先死的肯定是我……”

于是他又把手掌捂在已谢顶的头上。我知道，在他左耳的上方有一个“洞”，那个地方表面只有一层光滑的薄皮肤，脉搏有规律地跳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母亲一直担心，如果他和别人打起架来，人家只要用手指一戳就能置我父亲于死地。

“可千万不要喝那苦水……”

“不喝，不然先死的肯定是我……”

他并没开始喝酒。但他和他姐姐的谈话，却是不幸言中了。二月份，严寒的冬季已近尾声，但也正是最难耐的时刻。一天晚上，他跌倒在一个满是积雪的小胡同里，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就此躺倒不起了。警察们发现他躺在雪地里，自然把他当成一个醉汉对待，便把他送到“戒酒所”里去。但直到第二天早晨，大家才发现这件事是弄错了……

这种现实生活，以其狂傲的力量，再一次前来向我的幻想挑战了。只说那一件传闻就够了：据说发现他以后，人们把他放在一辆带篷子的货车上运走，那里面和外面一样冷，运回来后把他放在一张木桌上，向上抬时，都能听到坚冰碰撞木头的声音……

我不能对自己撒谎，在我有着这一堆不带假面的乱糟糟的思想情况下，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对自己的心灵说），我双亲的去世并没给我留下什么不可治愈的创伤。是的，在我内心深处同自己悄悄地谈话时，我坦白地说，对此事，我并不感到过分难过。

如果说，我也曾哭过，我那哭却不是因为失去他们而哭。眼泪乃是为了在一个惊人的事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而流的无奈的泪水，也就是说为整整被杀害的一代人而哭，为残伤者而哭，为“徒有青春年华”的人而哭。为从人生的名单上，几千万被抹去姓名的人而哭。战死在疆场上的人们，他们至少应该享有“英勇战死”这一称号的特权。而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战后的十年或二十年中再逝去时，似乎都是“寿终正寝”或“无疾而终”似的。应该走近我父亲身旁，仔细看看他耳朵上方的那个小凹陷，血管的收缩在那地方都看得很清楚。应该了解我母亲，要在她身上看到，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清晨，那个在黑暗的窗台下，仰望着夜空，看着那些隆隆作响的奇怪的星光而吓得挪不动步的小女孩。还应该在她身上看到，那个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因大口地吞吃马铃薯皮而噎得喘不过气来……

我透过模糊的泪水，纵观他们的一生。我看到了父亲，复员时，在六月份一个炎热的傍晚，回到了他的故乡。那里的一切他都很熟悉：森林、河流，以及那弯曲的道路。随后便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见到的是那条被熏黑的马路，两旁各排列着一行被烧焦的木屋，没有一个活物，有的只是一只杜鹃在一声声有节奏的呼唤，随着他那耳朵上方流着热血的血管的跳动在回荡。

我看到了母亲，她这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大学生，这个年轻的姑娘，在一群摆出一副不屑的面孔的人前，以立正的姿势冷冰冰地站在那里。那是巴黎来的一个代表团，正聚在一起审判她的“罪行”。她晓得，夏洛特的国籍，是的，她那种“法国习性”，始终是她一个极大的缺陷，特别是在这个正在和“世界主义”作斗争的时代。在审查之前填调查表时，她用颤抖的手写上：“母亲——俄国籍”……

但这两个人却走在了一起，这两个人，在他们残缺不全的青年时代，是那么不同，又是那么相近，于是我们终于出世了，我，和我姐姐。生活在继续下去，尽管战火连年，家乡毁于战火，尽管要背井离乡。

是的，倘使我要哭，哭的是他们那种默默的忍受。他们不怨天，不尤人，他们活在世上，乃是为了极力使我们过得幸福。父亲一生都奔波于伏尔加和乌拉尔之间那片无际的空间，哪里吃紧，便和他们那个旅向哪里开赴，母亲被调查之后，被那所大学开除，自此再没有勇气做复校之尝试，便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家大工厂里当了一名翻译。似乎只有技术性而无个性的法语把她从“法国习性”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了。

我观察着这两个既平庸又不寻常的生命旅程，感到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但却又不知道该怨谁。不，我知道，要怨夏洛特！要反对的是她讲述的那个平静而从容的法兰西世界。要反对想象中往昔岁月的那种毫无用处的温文尔雅。一味地追忆世纪之初剪报上印出来的那三位美女，是何等荒唐！而企图再现一个坠入爱河的总统的心灵，又是何等荒谬！忘记那个在严冬里逃出来的头裹绷带的战士吧。忘记吧，如果说我能活下来，那是因为那辆火车把我们载走，它在载满血肉模糊的伤员的列车中，困难地爬行着，那辆火车载着夏洛特和她的孩子

们，把他们送到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俄罗斯的腹地……从前我对这句宣传口号是没有什么感应的：“为了你的生存，死去了二千万人！”是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老调子，现在却一下子赋予我以新的，并且是痛苦的含义，而且极具个人色彩！

俄罗斯，就像一只经过漫长冬季的熊，在我的身上苏醒了。那是一个冷酷的、美丽的、愚蠢的、绝无仅有的俄罗斯；是个以其苦难的命运而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俄罗斯。

是的，在我双亲逝去之时，我倘能痛哭，那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是个俄国人，是因为嫁接在我心中的那个法兰西枝条不时地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父亲的姐姐，我的那位姑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促成了我的这一态度的大转变……

她同她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位表弟，住在我们的套房里，这样她便离开了那个工人区里人满为患的集体宿舍，为此特别高兴。这也并非是因为她想抹去我们过去生活的痕迹而加给我们某种另外的生活模式。不是的，原因也很简单，她是尽其所能地要过好自己的日子。至于我们家庭的那个特殊问题，即“法国习性”问题，我们表现得很审慎，而且同母亲当法语技术翻译一样，距离法国尚远得很，因此也就变得淡漠了。

我姑母属于斯大林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斯大林逝去已经二十年了，但她依然故我，没有变化。当然也谈不上对那位大元帅有什么特别的爱。她的第一个丈夫死于战争初期的混乱中。姑母晓得谁是战争开始时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凡是乐于听她讲的，她都讲给他们听。她同她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从来没举行过婚礼，同他在一个军营里生活了八年。“那是因为他的嘴太快。”她这样解释说。



不，她的“斯大林主义”，特别是她说话的口气，穿衣打扮的方式，以及看人的目光，就好像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就好像电台依然在以忧伤悲愤的语调广播着：“经过数次激烈的英勇奋战，我军撤出了基辅……撤出了斯摩林斯克……撤出了……”随着这种严峻的形势，这种节节向莫斯科的进逼，所有的面孔都凝固了。她还像生活在那种恐怖的年代一样，在那种年代里，邻居们早晨起来经常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用眼神指一指一家人家，就在昨天夜里，那家人全家被装上一辆黑色的汽车，拉走了……

她披一条棕色的大披巾，冬天穿一件粗呢大衣，一双大毡靴，夏天穿一双不开口的鞋，垫一双厚鞋垫。如果我看到她身穿一件军上衣，蹬一双战士皮靴，我可能也不会吃惊的。当她把杯子等茶具向餐桌上摆时，她那双粗大的手，就好像在战争时期的一个兵工厂里往传送带上放炮弹壳似的……

她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称呼他的父姓，叫吉米特里奇，他有时也到我们这儿来，那时我们的厨房里便都是他沙哑的声音，好像经过好几个年头的漫长冬季才开始一点点缓过气来一样。无论是我姑母，还是他，他们都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可丢失的，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怕。他们什么都谈论，口气十分尖酸刻薄，同时又显得悲观失望。男的嗜酒如命，但双目却清澈有神。只是有时他的下巴闭得很紧，而且愈来愈紧，就像在军营里要讲粗话以前的准备活动一样。就是他，让我喝了第一杯伏特加，也是由于他，才使我了解了一个看不见的俄国——那块四面围着刺铁丝网和观察哨所的大陆。

在这个一切都被禁止的国家，即使最简单的话语，都可能被认为包含有可怕的含义，都可能像我用厚玻璃杯喝的那“苦水”一样，灼伤你的喉咙。



一天，他提到了在泰加森林里的一个小湖，一年十二个月，它有十一个月要结冰。按照他们驻地长官的意愿，湖底被改做了墓地，这当然比挖那长年结冰的冻土要简单多了，因为有十几个犯人死了……

“秋天，有一天，有人又到那边去了，因为又有十人或者十五个人要被扔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已经开了一个口子，在这之前扔进去的那些人我都看见过，一个个都被扒得光光的，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被留了下来，啊呀，真正的一丝不挂，因为在冰下边，所以绝对不会腐烂。瞧，就像一块肉冻。”

一块肉冻，正好在我们饭桌上有一只放肉冻的盘子，于是“肉冻”这个词就变成一个可怕的词儿了——冰冻，肉，和冻僵的尸体，听起来都那么刺人。

在他们两个人夜间是谈话时，最使我痛苦的，就是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可抗拒的爱，而这种内心的情感在我身上也产生了效用。正在同伏特加作斗争的我的理智却起而反抗了：“这个国家是残酷的！病痛、拷打、痛苦、自我作践，是它的人民最喜欢的消遣形式。我为什么要爱它？倒不如说我爱它的愚蠢，爱它的残酷。它这儿只有一个最高意志，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理性概念都打不进去……”

这种爱是一种持久的痛苦，我愈是发现这个俄罗斯的黑暗，这种依恋之情便愈见强烈，因此你想要爱它，就必须弄瞎双眼，弄聋双耳，还要禁止自己思考。

一天晚上，我听到姑母同她的男人在议论贝利亚<sup>①</sup>……

从前，在我们家客人的交谈中，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可怕的

---

<sup>①</sup> 贝利亚（1899—1953）：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内务部长。

名字后面所隐藏的一些事情。他们带着厌恶的口气议论他，但也并非没有尊敬和畏惧之意。我当时还太小，尚不能理解这个暴君生活中使人不安的阴暗的领域，但却猜到了，那一定是有关人性弱点方面的问题。每当谈到他时，他们便压低了声音，在一般情况下，这时便看看我是否在那儿，如在，便把我从厨房里赶出去……

但自此以后，厨房里就我们三个人，三个成年人。在一般情况下，姑母和吉米特里奇，从不向我隐瞒什么。他们便谈了起来。在烟草的蓝雾中，在酒意朦胧中，我似乎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大型卧车，车窗都是不透明的玻璃。尽管这辆大型卧车外形庄重，但我总觉得它好像是一辆流动兜客的计程车。只见它十分奸诈地慢慢向前开行，然后又突然停住，随后又很快地开走，像是在追赶什么人。由于十分奇怪，我便注意起这辆车在莫斯科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路线。忽然，我一下子就猜出了它的目的，这辆黑色轿车是在追踪女人。追踪年轻、漂亮的女人。车上的人通过单向透明的玻璃窗观察着她们，并以和她们步行相同的速度向前开着。然后便丢开她们，或者有时候似乎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尾随着她们来到一条横马路上……

吉米特里奇没有理由防备我。他毫无保留地全部都讲了出来。在那辆黑色轿车的后座上，歪着一个人，长得圆圆的，秃顶，一个夹鼻眼镜卡在满是肥肉的脸上，此人就是贝利亚。他正在物色可以满足自己胃口的女人，选中某个行人之后，他的手下就对她实施逮捕。那正是无须任何借口便可为所欲为的时代。然后把她带到他的官邸，这个女人便被他强行奸污了——那手段是多样的，可以先用酒灌醉，实施威逼利诱，或者是拷打……

至于这些被糟蹋的妇女后来怎样，吉米特里奇没说——他

自己也不知道，总之，再没有人见到过她们就是了。

我曾有几夜不能入睡。站在窗前，两眼呆呆地发直，头上满是湿漉漉的汗水。我在想贝利亚，想那些只被睡了一夜就被抛弃的妇女。我每条神经都烧得发烫。我觉得嘴里有股酸味，金属的酸味。我把自己看成是被那辆黑色汽车所跟踪的年轻姑娘的父亲，或者是未婚夫，或者是丈夫。是的，只要我能够忍耐得住，哪怕是几秒钟，我也要钻到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搞个清楚，看看他的苦恼是什么，看看他是如何流泪，如何枉自发怒而又无能为力，以及如何在更上一级面前卑躬屈膝。因为每个人都晓得这些女人是怎样失踪的！我肚子疼得肌肉直痉挛，便把气窗打开，并在窗槛上捡起一块留在上面的雪块，用它摩擦面孔，这样也只能使我滚烫的脸清爽一分钟。现在我已看到这个人正蜷缩在那辆轿车不透明的玻璃后面。他那夹鼻眼镜的镜片上映着女人的身影，他对她们进行反复挑选，用手抚摸，仔细估量着每个人到底有什么妙处。然后就开始拍板定案了……

我恨我自己！因为我竟情不自禁地仰慕起这个女人的观察员来了。是的，在我身上有那么一位，他怀着恐惧，怀着反感，怀着羞愧拜倒在那个戴夹鼻眼镜人的强权面前。所有的女人都供他享用！他在偌大的莫斯科闲逛，就像漫步在自己家里的妻妾们中间一样。而最令我惊异的，是他那种毫不在乎的样子。他无须被爱，也毫不在意被他选中的女人对他有何种感觉。他选中一个女人，喜欢她，当天就会占有她，随后便把她忘在脑后。所有的喊叫、哀嚎、眼泪、嘶哑的喘气声、哀求、谩骂，等等，如果他有时能听到的话，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淫乐时的一种辛香佐料，更能增加他的兴趣而已。

我在第四个不眠之夜时，一开始就失去了知觉，就在这次失去知觉之前，似乎隐约知道了一个被他奸污的女人那狂躁不

安的想法。她突然猜到，今后放她回去的可能性是不会有有的了。这个想法一下子使她从强行被灌醉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恶心——同时也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从而使我昏倒在地。

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却是另一种感觉了，变得镇静多了，也有了较强的自控力。就像一个病人动过手术之后重新练习走路一样，我话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我须要在各方面都恢复常态。在黑暗中，我默默地叨念着很短促的话语，这些话表达了我一种新的心态：

“就这样，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他可以目睹那些奸淫活动。我可以命令他保持沉默，但他却总是留在我身上挥之不去。既然如此，那就可以在原则上说，一切都听之任之吧。这一套也是贝利亚教会我的。如果说，俄国控制了我，那是因为它不懂得凡事都应有个限度，无论是善是恶它都不懂。特别是对于恶，更不懂得那个限度。它允许我羡慕那个猎取女人的家伙，也允许我憎恨自己。它允许我同那个被满身大汗的肥肉压得喘不过气来，并被害死的女人相会，也允许我猜测那个女人临终前的想法，即那个已死的女人正在进行丑恶的交媾时的想法。也允许我存有那种和她同时去死的向往。因为一个人在同时既仰慕贝利亚又憎恨他时，就不应该继续活下去……”

是的，我是俄国人。我现在明白了，但却是更加惭愧地明白了，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灵魂中存在着所有因痛苦而扭曲了面孔的生灵，所有已化为灰烬的村庄，所有充满了一丝不挂的裸尸的冰湖。认识了被那个暴君奸淫后，那些顺从的一群人。也体会了在思想上想参与这种罪行的恐惧，以及再现这些往昔历史的强烈愿望——那目的是想把这些痛苦、不平、和惨死连根拔除。是的，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跟踪那辆黑色轿



车，然后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它压扁，然后，屏住呼吸，目送着那位年轻的女性推开自己的家门，登上了楼梯……重新改变历史。净化这个世界。使丑恶无藏身之地。在他的心灵里给所有这些苦难者以庇护，以期有朝一日，可以使他们生活在一个从罪恶中蜕化出来的世界上。但与此同时，就须同他们共患难。不要有丝毫的气馁。要疯狂地、忘我地推动这个语言的实现。在漩涡边上能泰然自若地生活。是的，一点不错，这就是俄罗斯。

就这样，在这青春时期的躁动不安中，我牢牢地抓住了我新的身份，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正视生活本身。我想，这种生活就是，它将就此永远把我头脑中的那个法兰西幻境抹去。

这种生活很快地便把它主要方面表现了出来（但生活的陋规阻止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它）——即它那全面的虚假。

从前，我生活在书本中。我是从对一个人物的认识中增长了知识，那途径就是通过男女间爱情的私通或者一场战争，从中分析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但是在这个三月的夜晚，天气是那么的温和，我姑母便把厨房的窗打开了。我方始明白，在这个生活中没有任何相关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协调的一致性。也许只有死亡这件事，是可以预见的。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父母亲一直向我隐瞒的那些事情，即发生在中亚的那个混乱的插曲，其中人物有夏洛特，手持武器的男人，他们在拥挤，在喊叫。我只能从他们从前的讲述中，保留着这种模糊的，带点孩子味的理解。因为成年人的话当时太隐晦了！

而这一次他们明白无误的讲述，竟使我几乎失去理智。我



姑母一面把一些热气腾腾的土豆倒在一个盘子里，一面以极其随便的口气，对坐在吉米特里奇身边的那位客人说道：

“当然，在那边儿，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生活。你要知道，他们一天要向上帝做五次祈祷！甚至，他们吃饭也不用桌子，是的，大家都席地而坐，当然是坐在地毯上，吃饭也不用勺子，而是用手抓！”

那位客人为了活跃一下谈话的气氛，便以一个爱争辩者的口吻反驳道：

“哦，同我们不一样，话说得太过头了吧，我就曾在塔什干住过，就是去年夏天。你知道，也同我们差不了许多……”

“在偏僻的地方呢，你也去过吗？（她说话的声音更高了，对于能找到这样一个争论的导火线，和活跃晚饭的气氛，感到很高兴）对，我说的是荒僻的地方，你去过吗？比如说他的外祖母（姑母用下巴向我这个方向动了动）就是那个叫夏尔……叫舒尔……总之，就是那个法国人，她在那边遇到的事，可完全没有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些卑鄙的明争暗斗，那些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土匪，他们曾把她抓起来过，那时她还非常小呢，就在一条大路上，他们把她奸污了，那做法就像一群畜牲！当时在场的都干了，一个接一个，可能不是六个就是七个。可你却说，‘他们同我们一样’……完了事之后，他们就朝她头上放了一枪，幸好这一枪瞄得不准。当地的一个农民用手推车把她推走，但那些家伙像杀一头羊一样把他杀了。你看，真的‘和我们一样’吗……”

“不对，你听我说，你讲的是过去那个时候的事！”吉米特里奇插言说。

他们一边喝着伏特加，吃着东西，一边继续争论。在打开

的窗户后边，我们院子里可以听到一些乱糟糟的声音。夜色是绿的，非常温和。他们谈着话，并没注意到我已经不能呼吸了，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讲的话也听不懂了。终于我像一个梦游者一般离开厨房，来到大街上，走在融化的积雪中，对于这个初春的明净的夜晚觉得比一个火星上来的人还陌生。

不，我并没有被那个偏僻所在发生的事情所吓倒。以那种庸俗的口气讲述一个故事，我已经预感到永远不会摆脱日常生活中那些粗俗的字眼和动作的。事件的严重性让那几个伸出来的粗大手指去抓醋渍小黄瓜的动作给冲淡了。让我们那位客人大口喝伏特加时喉结一上一下的活动给冲淡了，也让院子里孩子们的欢笑声给冲淡了。这就像我有一天在公路上看到的那条胳膊一样，当时两辆汽车相撞，一辆已经嵌到另一辆里去了。那条胳膊就在汽车旁边，一个人在等待救护车时，便用一张报纸把它裹起来了，那张报纸上的铅字和照片被搞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形几乎把事情本身的严重性给抵消了……

不，真正使我惊异的，乃是生活的虚假性。一个星期以前，我了解了贝利亚的秘密，了解了他对妇女先奸后杀的淫乱情况。现在又了解了那个年轻的法国姑娘被强奸的事，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承认，那就是夏洛特。

我一下子知道的事太多了，突然知道了这么多事，使我心神不宁。这么多既荒唐又真实的事，充斥了我的头脑，使我思想混乱不堪。我想即使在一本小说里，描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莫斯科，公然绑架妇女的荒唐故事之后，也得让读者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吧。他也许在想象着会有一位英雄出现，把这个暴君打个落花流水。然而，生活却不管事物的相关性，它把自己的内容搞得乱七八糟，毫无条理。由于它的笨拙，它把我们人类同情心的那种纯真也给搅乱了，使我们正义的愤怒也受到

了损害。实际下，生活就是一本长得没完没了的流水账，在这本账上，各种安排得乱糟糟的事件接踵而至，甚至互相倾轧，其中涉及的人物是太多了，他们都不敢讲话，不敢难过，不敢被爱，也不敢有个人的爱憎。

我在这两个悲剧的故事之间挣扎，一个是贝利亚的事，一个是那些年轻的女性，她们的生命随着奸淫者的兽欲得到满足后快乐的喘息声而告终结。夏洛特，她年轻，没有人能认出她来，被扔在沙滩上，倍受糟蹋，倍受折磨。我感到自己被一种奇怪的麻木所战胜。我感到绝望，我怨恨自己，怨恨自己这种麻木不仁的无动于衷。

这天晚上，我的关于生活中这种平静的互不相关的思考，我觉得都是错误的。在一次似睡非睡的梦中，我又看到了那只用报纸包裹的胳膊……不，在这个普通纸包里的东西，比这还要可怕一百倍！现实生活的虚假，远远超过了小说里杜撰的故事。我使劲地摇了摇头，以驱走眼前所见到的包着血淋淋的手臂的那张报纸上的小血点。突然，在那半透明的沙漠空气中，没有一点儿干扰，既清楚又明白地在我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那是一具年轻妇女的躯体，十分虚弱地躺在沙漠上，这个身体已然疲惫异常，但万分激动的男人们仍然野蛮地扑在她身上。我仰头盯着天花板，只见它已变成了绿色，我的痛苦是那么强烈，以致感到胸膛内那颗火热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脖子下的枕头也显得硬而粗糙，像砂子一样……

我的行动已不受自己的支配了。竟开始打起自己的耳光，开始时还留有余地，随后竟毫不留情地打起来了。我感到我身上的那个人正在我思考的沼泽地里，带着享乐的目光看着那个女性的躯体……

我不停地打自己的耳光，直到两颊肿胀，沾满泪水，直到

脸皮黏糊糊的，使我感到厌恶时，直到附在我身上的另一个他完完全全地不再出声时才罢手……随后，便十分激动地踉踉跄跄地向窗户走去。一弯如钩的新月划破了天空。冰冷的寒星眨着眼，似乎它们都来到了地上，像一个梦游者走过院子时把它们踩在脚下一般发出嘎嘎的响声。凉爽的空气使我肿胀的面孔感到舒服些。

“我是俄国人。”我突然小声说。



## 二

多亏了那位女性的躯体，它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并具有一种天生的肉感，才把我的幻觉病医治过来。是的，那是四月份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已然从严冬中解脱出来，冬天，一向是我青春时期最痛苦的季节，它给人们带来了死亡和意想不到的重压。

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嫁接在我头脑里的那个法兰西枝条，似乎是已不存在了。好像我已经成功地在我胸膛内把我的那个第二心脏给扼制下去。它夭折的最后那一天，恰好就是四月份这一天的下午，这一天对我来说，标志着没有幻觉的生活的开始……

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只见她站在树下一张粗糙的厚松木板打成的桌子前边。一位教官一边用眼睛看着她工作，一边不时地看一眼他手中拿着的那块秒表。

看样子她年龄应该和我同岁，十五岁左右。这个年轻姑娘的身躯沐浴在阳光里，使我有点儿眩目。她正在分解一支冲锋枪，然后再结合起来，看谁做得快。这是一次准军事化的比赛，本城里许多学校都参加了。按顺序排，该轮到我们了，我们便也来到桌前，待教官口令一下，我们便立刻扑到那种名叫卡拉奇尼科夫的冲锋枪前，开始分解它那沉重的零件。把每一个零件卸下来分别摆在台子上，然后再过一会儿，经人把零件位置变动一下，再重新摆好，我们便开始组装。我们同学中，

有的人把那个黑弹簧弄掉在地上，另外一些人把解合的顺序给弄混了……而她呢，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在大桌子面前跳舞呢。她身穿一件粗布短上衣，一条卡其布的裙子，棕红色的头发上扣一顶橄榄帽，只见她的身体随着手上操作的节奏很有规律地摆动着。她操作这么一大堆油滑的武器零件能达到如此娴熟的地步，一定是经过很多训练的。

我非常惊讶地看着她，这一切她干起来显得那么简单又那么漂亮！那腰肢轻轻地扭动着，同双臂的动作配合得非常和谐。那双被阳光照成金黄色的丰满浑圆的大腿也在微微地晃动着。她对自己操作的灵活也显得自得其乐，因此还加了一些同操作无关的动作，比如她那肌肉丰满的漂亮的臀部，也在有节奏地摆动。是的，那就是在跳舞。甚至不用看她的面孔，我就能猜到她正在微笑。

对这个不认识的棕发姑娘，我一下就爱上她了。不用怀疑我这种爱的前提，首先是对肉体的迷恋，对她那种未发育成熟的，还有孩童特点的奇妙的肉体的一种迷恋，它同她那已有女性特点的胸部形成明显的对比……我按照要求，做我自己武器的分解结合，搞得我手忙脚乱，用了三分多钟，成绩被列为不甚理想的行列……但是搂抱她的愿望愈是强烈，想用手抚摸她那光滑的、晒黑了的皮肤的愿望愈是强烈，我便愈发有一种幸福感，但却叫不出它的名字。

在树林边上有一张用厚木板做成的粗木桌子，有太阳，还有留在树林荫处的残雪发出来的味道。这一切都万分平常，也非常清楚，就像还带着女孩漫不经心神态的那个小姑娘一样，就像那位教官的命令一样，没有任何一点儿往昔的阴影来干扰现时的这种真切和明亮。我自由地呼吸着，心里向往着，手里机械地按教官的命令做着。我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心情，

觉得整个冬天郁积在胸的愁绪，难过和混乱，现在都从我头脑中消失了……只见年轻的棕发姑娘在冲锋枪前把腰肢轻轻地一扭，阳光穿过她宽大的短上衣把她身躯的轮廓透析出来，她那如火般的棕色卷发直伸到橄榄帽的外面。像从深井下传出来一般，一个沉闷忧郁的声音叫出了几个奇怪的名子：玛格丽特·斯丹海尔、伊莎博·巴维尔……我实在无法相信，在我过去生活中经历过的这些已经落满尘土的名子又出现了，那时我的生活中没有太阳，没有欲望——只生活在书本的暮色中，一心想在充满鬼魂的往昔的法兰西里看见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幻影……

教官发出一声高兴的喊声，一面向大家显示着他手里的秒表：“一分钟十五秒！”这是最短的时间。棕发姑娘转过身来了，高兴得光彩照人。一边摘下她的橄榄帽，一边摇动着头，那一头棕发在阳光下似一团火，晃动时那棕色的头发乱舞像一团团火星，我闭上了双眼。

第二天，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了紧握一只武器，比如那只叫卡拉奇尼科夫的冲锋枪时的那种奇特的快感，体会到它在发射时因剧烈抖动而撞击我肩头的滋味，也体会到在远处看到木板靶上布满弹痕时的那种高兴心情。是的，她那不停的动作，那男人般的力量，在我眼中，带有强烈的性感。

此时，自第一次连发射击后，我脑袋里就一直嗡嗡作响，什么也不能思考了。我左边的那个人比我先射击，把我耳朵震聋了，耳朵里始终充满射击声。太阳发出的彩束照在我的睫毛上，身子下面的土地发出一股野兽味——我感到幸福极了。

那原因就是，我终于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我为生活找出了一个含义。那就是生活在按命令办事的既简单又使人高兴的这种状况中，比如，射击、走步、列队、用军用铝饭锅吃小米

荞麦粥；在别人的指挥下集体行动。指挥你的人是那些心中了解最高目标的人，这些人非常宽厚，他们能除掉我们肩上的重负，使我们变得轻松、开朗、纯真。那个最高目标，对他们也同样适用，它既简单又单一，那就是，保卫祖国。我急不可待地想把自己融溶于这个伟大的目标中去，急不可待地想投入可以不需自己承担责任的由我们同学组成的这个可爱的群体中去。我训练投掷手榴弹、射击，还练习支了一架帐篷。很高兴、很满意、很安全。不过有时还在呆呆地想从前那些往事，比如，在草原边上的一栋老房子里，我能一连几天，去思考一堆旧报纸中的一张照片上看到的那三个美女，设想她们的生和死。如果有人把这样一个幻想者介绍给我，无疑我不会相信他，而我也不会被对方相信……

第二天，教官带我们去参加欢迎一个坦克纵队的到来。首先，我们看到的，好像在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灰色的云，接着，我们便觉得脚底下传来了强烈的震动。像地震一样。那片云慢慢变黄了，变高了，一直升到太阳那么高并把太阳遮住。巨大的轰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履带的金属撞击声。第一个炮管从一片黄土的幕墙中显现出来了，司令员的坦克出现了，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在停车之前，这些坦克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曲线，以便在主持人旁边列成一个车队。履带依然尖厉地响着，并且把草地碾成片片的碎块。

我被这个强大的帝国镇摄住了，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地球，就用这些坦克（我们的坦克！）可以把它给碾掉一层皮。那只要简单地一声令下就可以了。于是我便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骄傲……

待那些战士从炮塔里出来时，他们那种镇定，从容的阳刚之气很使我惊羨。只见他们一个个长得很相像，就像用同一种



材料做成的，坚强、健康。我猜想，那些折磨我一冬的虚幻想  
法，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起作用的。不会的，像我那种精神  
上的空虚，在他们理智之光的照耀下，在头脑中连一分钟也不  
会停留的。他们对待事物简单、直接，就像他们执行命令一  
样。我对他们这种生活，羡慕得无以复加，这种生活摆在那  
儿，在阳光下面，明亮得没有半点儿阴影。面对他们身上体现  
的那种力量，那种男性的阳刚味，他们身上穿的布满灰尘的军  
服，再加上有时还能见到那个棕发少女，那个少年妇人，那个  
爱的希望。所有这一切，只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有朝一日，  
能够从坦克上那个狭窄的炮塔里钻出来，跳到履带上，然后再  
到潮湿的土地上，然后，迈着疲劳而愉快的步伐向那个“爱的  
希望”走去。

这种生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苏维埃式的生活，而我也始  
终是处于它的边缘而已，但它却使我激奋异常。把自己融溶进  
这种集体主义式的生活中去，使我突然觉得乃是一种最明智的  
解决办法。生活在大家的生活中！开坦克，然后复员，到伏尔  
加河岸上一个大工厂里，在各种机器轰鸣声中，让钢水奔流。  
每周六都到体育场去看一场足球赛。特别需要明白的是，这种  
生活，安宁又可以预见的生活，它头上却戴着一顶救世主的花  
冠，即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总有一天要使所有的人都过上幸  
福生活，每个人的思想都同水晶一般的纯，大家都绝对的平等  
……

就在这儿，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出现了战斗机群，几乎把  
树林的树梢都给扫平。那些战斗机三个编成一组，就在我们的  
上空，几乎让爆炸的天空都要坍塌下来。它们一个冲击波一个  
冲击波地向下俯冲，破空之声尖厉，那分贝之高，好像要把我  
的神经震裂。



不久，在傍晚的寂静中，我仔细地打量着那空无一人的平原，上面到处留下些被轧碎的黑印痕。我心中暗想，有一次，一个孩子曾经想象过，就在这片笼罩着薄雾的地平线上升起一座神奇的城市……现在，那个孩子不在了。我已经好了。

自从值得纪念的四月份的这一天开始，我们学校的那个迷你小集团便接纳我了。他们带着恩赐的高傲态度迎接我，就像正教徒对刚皈依的异教徒那样，又像对待回头的浪子或忏悔的荡妇一般，我就是那种人。在任何时候，我都应向他们表示出，从前我那些怪毛病是真正地一去不复返了，真正和他们一样了。此外，还要准备好，为自己曾经脱离他们而付出一切代价。

此外，这个迷你小社会在此期间，自己也有了变化。即他们愈来愈向成人化过度，它本身也分化成好几个小团体。是的，几乎和社会上一样划分成等级！我就知道三个这样的小团体。它们已经预先设想出将来自己要干什么。这些团体，昨天还团结得像一个人，今天就已经出现了“无产者”小组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于工人家庭，这些家庭成员都是那个巨大的内河港口上各部门中的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个由数学尖子组成的核心，这些人被称作未来的“技术专家”，从前同那些无产者混在一起，并受他们控制，现在也愈来愈不受他们管束了，而且在学校各项事务中也开始出头露面了。最后，还有一个最坚定，最顶尖儿的小团体，当然人数也是最少的，其中有一些是未来的知识分子。

我成了他们所有集团的成员。我这种中间态度受到所有人的称赞。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物。那还是多亏了……法兰西！

我从那个法兰西里摆脱出来，因此，我也便可以公开地讲这些了。我很幸运，能够把这几年来积累在头脑中的存货，讲给那些愿意接纳我的人听。我讲的那些内容很能吸引他们，比如，地下墓地的战斗；青蛙腿要用金币才能买到；在巴黎有的地区，附近的几条街都是卖淫的场所，等等。这些故事为我赢得了一个“专业故事员”的称号。

我这样说，也这样感觉，即我的病已经彻底痊愈了。那种狂症从前一发作起来，便使我堕入可怕的对往昔的顾恋之中，现在是不会再出现了。法兰西现在已变成我向他们讲故事的材料。在我的同学眼中，那些事特别有意思，特具异国风味，而当我讲到“爱上那个法国姑娘”时，他们感到特别刺激，但又觉得同那些开玩笑的故事没有多大差别，特别是在我们搞文体活动时，讲到这些事，便一边叼着过早就开始吸的香烟，一边口里讲着粗话。

我不失时机地发现，应该结合我听众的口味，不断地在我讲的有关法国的故事上加一些调节他们胃口的佐料。同样一个故事，我讲起来要因人而异，比如对“无产者”们讲就同对“技术专家”讲的不同，而对“知识分子”讲的又不同。我对自己演讲的天才十分满意，并不断变换故事的种类，改变故事的风格，选择使用的词汇。为使“无产者”听众感兴趣，我在总统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热烈程度上特下功夫。比如我对他们讲，一个男人，特别是一个共和国总统，竟因为做爱过度而死去。这样一幅画面，仅这一件事，就足以使他们心动神摇了。而那些“技术专家”们则对心态的变化，故事的曲折感兴趣，因此，他们想知道的是，经过这场爱情的骤变之后，玛格

丽特的情形如何。于是我便谈到走投无路的隆散<sup>①</sup>的那次神秘的谋杀案，谈到那个可怕的五月份的早晨，那时有人发现玛格丽特的丈夫已被人用一条丝绳勒死，他的岳母也被绞死，但却是在自家的工具架上吊死的……我也没有忘记补充，她丈夫的职业是个画家，在官方的策划下，失去了职业，而他的夫人却从未断绝过同高层人士的来往。再者，根据另一种说法，是费利克斯·富尔的一位继承人，很明显，是一位部长在同她幽会时被她的丈夫当场撞见了……

而对那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故事看起来不太使他们感兴趣，其中有些人为了表示他们的冷漠，还不时的打个呵欠。只有当他们找到一个借口搞文字游戏时，才抛弃那种假惺惺的冷漠。“富尔”这个名字很快便成了他们玩同音异义词文字游戏的对象，“送给富尔”在俄语中意思是“给情敌一顿老拳”。于是便爆发出一阵学问大到似乎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笑声，某些人平时总带着这种懒散的微笑。如果他喊：“富尔，多好的 forward!<sup>②</sup>”那就是指足球的前锋。另一个，一面显示自己头脑的天真，一面说：“佛多什卡<sup>③</sup>，气窗……”我发现，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使用的语言几乎都是些绕弯子，打哑谜般的词汇。句子都是装腔作势，其表达方式，只有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才能懂。我带着半欣赏，半忧虑的心情，承认他们的语言，不需要我们周围这个世界上的物事，比如，不需要我们这个太阳，也不需要我们这种风！不久，我就很轻易地学会了他

---

① 隆散（1752—1794）：法国将军，曾任国民卫队军官，并是科尔德利俱乐部成员，于1794年被杀。

② forward：英文，前锋之意。

③ 俄语“天窗”的音译。

们这种玩弄词句的把戏……

只有一个人对我这种态度的大转变不表欢迎，他就是巴什卡。就是我从前和他一起钓鱼的那个笨家伙。有时候，他也同我们这些小团体接近，听我们发表议论。当我讲我那些法兰西故事时，他就带着不信任的神气，两眼盯着我。

一天，一群人围着我，比平时多了不少。可能我的故事特别使他们感兴趣。（我讲的是那个可怜的斯皮瓦尔斯基的小说，此人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的大罪，并在巴黎被处死。）我讲的是一对恋人在那个行将就木的沙皇帝国内东躲西藏，一天，他们在一列几乎没有多少乘客的火车上度过了美丽的一夜，第二天，便就此永远分手了……

这一次，我的听众三个等级里的人都有，即无产者的儿子们，未来的工程师和知识分子。讲到了他们在包厢间的黑暗角落里如何疯狂地拥抱，车外面的村庄和在黑暗中的火光如何飞一般地向后退去。他们听得有滋有味。对他们来说，想象着这一对情人在火车上做爱的情景，比想象一个共和国总统同他的恋人在官邸内做爱要容易些……为了满足那些文字游戏的爱好者，我也提到了那列火车在外省的一个城市停了下来，这时小说的主人公便把车窗放了下来，向外面很少的旅客打听这个车站的名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原来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城市！这个城市住的全是外国人。于是那个小团体的审美学家满意地吁了一口气。我接着使用电影技术的“闪回”镜头，返回来讲述那两位流浪恋人……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头发散乱的巴什卡的面孔，他听了几分钟，然后便粗声大气地埋怨起来，他的声音自然就盖过了我的：

“喂，这样一来你高兴了吗？这一群混蛋就喜欢听这些玩艺儿。他们对你的胡说八道已经听得直流口水了！”



在这种面对面的对抗中，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顶撞巴什卡。但作为一群人，这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勇气，于是众人便群起而攻之，向他发出了愤怒的叫声。为平息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我用和解的声调说：

“不，巴什卡，这不是胡说八道！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这个作者，在十月革命后带着他的情妇逃出了俄国，然后到了巴黎，后来被人杀害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讲在车站上发生的事，嗯？”

他问得我张口结舌。那时我才想起来，我曾对我这位笨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这样的：一天早晨，这一对恋人在黑海边上又相会了，那是在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城市中一个还没有顾客的啤酒店里。他们坐在覆满冰霜的窗下，喝着一杯热茶……几年以后，他们又在巴黎相会了，他们互相倾述衷肠，说几年前那天早上几个小时的相会，比他们一生中所有美好的爱恋更可贵。是的，那是个忧郁，灰暗的早晨，海上响着沉闷的雾笛，他们就在那个历史谋杀的风暴中偷偷地相会了……

巴什卡讲的就是那个城市车站旁边的啤酒店……上课的铃声把我从尴尬中救了出来，我的那些听众把香烟掐灭，便涌进教室。可我却呆在原地发愣，心中暗想，我这种讲故事的风格，不管是对那些“无产者”的儿子们讲的，不管是对那些“技术专家”们讲的，也不管是对那些偏爱文字游戏的“知识分子”们讲的，在我所用的语言中，没有一种语言或风格能够再现那个风雪的早晨，在岁月的鸿沟旁那一对恋人相会时那种神秘的风情。无法再现那时的色调，那时的沉默……再说，在我的同学中，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人对那个环境和气氛感兴趣。那场面是过于简单了：没有色情的诱惑，没有男女私通

的情节，也没有文字的游戏。

从学校回来后，我又想起一件事，即我对同学们讲共和国总统偷情的故事时，还从来没提到过他的警卫。当时那位警卫正一声不响地站在爱丽舍宫黑暗的窗户旁边，就他一个人，面对着那个秋天之夜，而在这个秋雨绵绵的黑色夜晚的某处，却正有一位头罩满是雨珠的面纱的女性。但是，如果我仅醉心于描述秋雨之夜中那个潮湿面纱，又有谁会听我的故事呢？

巴什卡后来为驱散又重新聚在我周围的人群，又做过两三次努力，当然，总是干得不漂亮。一天，他邀我去伏尔加河边上去钓鱼，当着众人的面，我脸上带着一种含糊的不屑神态拒绝了他。他站在我们那个小团体面前，一个人在那里有好几秒钟，显得犹豫，出奇的虚弱，尽管他长得人高马大……还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赶上了我，并要求我把斯皮瓦尔斯基的书带给他。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我十分醉心于一种新的集体娱乐活动：欢乐之山的娱乐。

这个名字是大家对我们这个城市里那个大型的露天舞厅的称呼，它位于伏尔加河岸边一个小山坡的山顶上。当时我们刚刚学会跳舞，而我们之所以那么卖力去有节奏地扭腰摆臀，就只有一个目的：怀里能抱住个女性的躯体，接触它，驯服它。以便跳过之后心里不至于害怕。晚上当我们全副武装向欢乐之山进发时，什么等级，什么团体之类的差别都不存在了。当我们尽情地狂欢时，大小都一律平等。只有那些获准外出的年轻士兵们与众不同，他们单独组成一个组。我眼睛看着他们，心里特别嫉妒。

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叫我。声音好像从那一片树丛的密叶中传过来的。我抬起头来，看见的正是巴什卡！露天舞厅的

四周用高大的木篱围了起来，木篱后面，长着一些野生植物，是一片矮树丛，把一个无人看管的公园同一道大树林隔了开来。我看见他正坐在高高木篱上面一个伸出来的大槭树枝上……

当时正是我在跳舞时，笨手笨脚地撞上了我舞伴的胸脯后，从舞厅里走出来的时候……那还是我第一次同一位相当成熟的年轻姑娘跳舞。我放在她背上的手湿漉漉的全是汗。由于乐队奏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装饰音，我被搞慌了，做了一个错动作，于是我的胸脯便径直地同她的前胸撞在了一起。那作用比电击了一下还强烈！女性柔软又富有弹性的胸脯搞得我手忙脚乱。我双脚继续跳着，但却听不见音乐，一边从观察女舞伴的面孔的最佳位置上看到一张椭圆形的面孔在发着冷光。当音乐停止之后，她一句话也没说便离我而去，很明显是有些恼意。我穿过舞厅，小心翼翼地在一对对的人们中间溜过去，像走在薄冰上一样，我走出了舞厅。

我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儿，安定一下我的神经，好好喘一口气。于是便在舞厅周围的那条路上漫步。从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凉风使我火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如果是我的女舞伴，她自己故意来撞我呢？”我突然这样想。是的，是不是她想让我体验一下她那酥胸的柔软而向我发出来的一种诱惑行为，可由于我太过天真和腼腆，竟猜不出她的用意来呢？如果是这样，那我可就错过了有生以来的一次好机会了！

就像一个小女孩刚打碎了一只茶杯，闭上眼睛想，但愿这倒霉的时刻快过去，一切都马上恢复正常一样，我也闭上双眼，想道：为什么不能重新演奏原先那首曲子，而我再去找那位女舞伴和她一起重跳原来的动作，一直到双方紧紧靠在一起？我从来也没有感受过，而且也将不会再那么强烈地感受到，那么

亲密地靠近一个女孩的身体，而且与此同时也无可奈何地离得它那么远……

正在我头脑中思绪纷乱之际，我听到藏在树枝后边巴什卡的声音，我抬起头来，只见他半坐半吊在一个粗大的树枝上，一面朝我笑一面说：

“喂，爬上来！我给你找个位置。”他一面说一面把双腿盘上去。在城市里又笨又呆的巴什卡，当他一接触大自然，就完全变了样。在这枝粗大的树枝上，他就像只大猫在夜间捕捉老鼠之前那样，蹲在上面……

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会无视他这种邀请，他处的那个位置是太特殊了。再说，我自己觉得就像一个当场被人捉住的现行犯一样。就这样，他就在那个树枝上，把我那些狂热的想法给截获了！他向我伸过手来，我也就拉着他的手上去坐在他旁边。这棵树是个名符其实的观察哨所。

从高处往下看，数百对摇摆起伏的身体紧紧抱在一起，那又是别具一番景象。看起来有点荒唐（所有人都在那里原地踏步）但同时也具有某种逻辑上的道理。一个个的身体来来往往，互相搂在一起，中间休息时再分开，有时两个人互相粘在一起甚至一连几个曲子也不分开。从我们这棵树上往下看，只有一个视角，可以把舞场上所有有关爱情的小动作尽收眼底。有情敌之间争风吃醋的，有怒目相对的，有互相背叛的，有一见倾心的，有彻底决裂的，有百般解释的，也有一开始互相吵架，但很快，一方便控制住自己变得百依百顺的，特别是那些想借助音乐的掩护和跳舞的礼节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最为明显。突然，我在这起伏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刚才撞了她胸脯的姑娘。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看着她一个舞伴一个舞伴地换着跳……



我感到，这种旋转的旋律，在我的潜意识中似乎想起了某种事情。“是生活！”突然一个无声的声音提示我说。我的双唇也在默默地念着：“生活……”同是被欲望驱使的各种躯体的大混合，但却被数不清的装腔作势所掩盖。生活……“但是，就在这一刻，我自己又在什么地方？”我这样自问，一边在猜想，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会使一个非比寻常的真理从此诞生，它可以一劳永逸地回答一切问题。

路边传来了嘈杂声。我听出来了，那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们正在返回城里。我抓着那个树枝准备跳下去。这时巴什卡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带着顺从的口气，但却又不甚自信：

“等一等！这里的聚光灯马上就要灭了。你看着吧，天上会满是星斗的！如果我们再爬得高一点儿，就能见到人马星座……”

我没听他的，便跳下地来。地上伸着许多粗大的草根，扎得我脚掌十分疼痛。我便跑着去赶我的同学们，只见他们远远地走着，一边指手划脚地谈着什么。我急不可待地想尽快把我那位女舞伴的美丽胸脯讲给他们听，也急不可待地想听听他们有何新发现，想听听他们惊人的新闻。我匆匆忙忙地又回到生活中来。我怀着恶意的欢乐，又把刚才在我头脑中形成的那个奇怪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我现在在哪儿？我原先在哪儿？然而，刚才在树枝上，在那个傻瓜巴什卡的旁边，现在则在真正的生活旁边！”

在一个很奇怪的偶然情况下，（我已经懂得了，现实是在许许多多虚假的重复中形成的，而小说作者们却极力追求这种重复，无疑是一个大毛病）我们第二天又相会了。两个人都感到有些不自然，这种不自然就好像两个伙伴，头天晚上互相交

换过心里的秘密，这些秘密是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具有感情色彩的，而且彼此又都深入到对方的灵魂深处，早晨，这两个人又见面了，而且是在头脑清醒，都对对方有所怀疑的情况下，所以便有些不自然了。

当时我正在还没开门的舞厅外漫步，顶多也就是晚上六点左右。当时我抱着不惜一切的态度，一是要第一个做昨天晚上那个姑娘的舞伴。怀着一种迷信思想，我希望时间能够开倒车，希望把打破的杯子重新修补得完好如初。

巴什卡从公园的荆棘丛中出现了，看见我后，犹豫了一下，随即便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只见他拿着全套的钓鱼具。胳膊下夹着一个大黑面包，一面一块块地撕下来，十分香甜地吃着。我又一次感到像被当场抓住的现刑犯一样。他不错眼地盯着我看，打量我那件浅色衬衣，看那大翻开的领子，看我那时髦的裤子，和大喇叭裤脚。然后点了点头，做了个再见的姿势，便扭头走了。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突然，巴什卡又回过头来用有点儿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道：

“你过来，我给你看点儿东西！来吧，你不会遗憾的……”如果他停下来等着我的回答，我可能不好意思干脆拒绝他，可他却依然继续走他的路，不再回头瞧我了，我也只有犹豫不决地跟在他后面。

我们一直来到伏尔加河岸上，沿码头走着，只见那些大型吊车，各类工地，用瓦楞铁皮搭的仓库，等等，看都看不过来。再往下游走，我们就来到一片大空场上，堆着些平底大驳船，生锈的金属建筑器材，堆成角锥形的带树皮的大原木有的已经腐烂了。巴什卡把他捕鱼的线、网都藏在一个被虫蛀的大原木下面，然后便开始从一个小船跳到另一个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废弃不用的码头，一些当浮桥用的旧船在我们脚下直

晃。另外我一面跟在巴什卡后面走，一面惊异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陆地竟随他到了这个由旧船构成的浮动小岛上。我紧紧抓住一个断了的栏杆，跳到一个类似帆船的小船上，跨过船帮，一下子便滑到一个潮湿的木排上……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河道上，两边的陡坡长满了接骨木花，这里的河面上摆满了旧船，挤挤拥拥，乱得出奇。

我们两人坐在一条小船的长凳上，一条驳船的侧翼横伸在这条小船的上方，上面还留下了被火烧过的痕迹。我伸长了脖子往上看，发现在驳船的甲板上，船仓旁边有一条拉紧的绳子，上面有几块褪了色的布衣随风轻轻地飘着，原来是一件衬衣，晾在那里已经好几年了……

这里的夜晚有雾，而且闷热。河水的味道同接骨木花的败花味混在一起。不时地可以看到一艘船在伏尔加河的河心远远地驶过，于是我们这个河道便涌过来一层层懒洋洋的浪。我们这条小船就开始上下左右地颠簸，同那条驳船黑色的船帮互相摩擦。这时这个一半浸在水里的墓地就显得有了些生气。可以听到船缆绳嘎嘎的响声，平底船下面发出的啪啪的水声，和唰唰的芦苇声。

“这一道舷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惊叹着说，不过我用的“舷墙”这个词，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它是一个航运词汇罢了。

巴什卡有点局促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想说话，不过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我便站了起来，急急忙忙地想把话题再拉到欢乐之山上去……突然，我朋友使劲拉住我的袖子，让我坐下，而且很神经质地悄悄对我说：

“等一等！他们来了！”

这时我便听到了脚步声。一开始是从河堤陡坡潮湿的粘土

上传过来的，随后就是咚咚地走在跳板上的声音，最后是在我们头顶上传过来的金属声，那是走在驳船甲板上的声音……当我们听到那些压低了的说话声时，那些人已经到了船舱里了。

巴什卡一下子便站直了身子，并紧紧靠在驳船的船帮上。直到这时我才看见那上面有三个舷窗，玻璃已经碎了，里面已用一些胶合板块堵上。但这些胶合板表面粗糙，上面有一些极细的缝隙。我朋友靠在舷窗上不动，打手势让我照他的样子做。我用手抓住驳船边上伸出来的一块钢板，便靠在左边的那个舷窗上，中间那个便空着没被占上。

我透过胶合板缝向里面看，那情况既平常又不一般。只见里面有一个女人，只能看到侧面和上半身，好像弯着腰把手臂支在一张桌子上，平行支着，手一动不动。从脸上看显得很平静，甚至还有点睡意。这一切，使人奇怪的只能是何以她会到这个驳船上来。不管怎么说……只见她正轻轻地点着头，头上是光亮的卷发。她不断地点着头，看样子好像正和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在谈话。

我离开我这个舷窗，朝巴什卡看了一眼，有点茫然地问道：

“我们到底想看什么？”

只见他双手手掌紧紧贴在驳船粗糙的船体上，前额顶在胶合板上。

我换到另一个舷窗前，把眼睛凑在胶合板的裂缝上……

我就觉得我们在的这条小船似乎在游动，而且已沉到这个拥护的河道底下，而那条驳船相反地却在上升而且升到了天上。我激动万分，把自己的身体靠在驳船粗造的铁皮上，极力想把刚才使我眼花缭乱的那个场面留在视觉中。

那是一个女人的臀部，白白的，肥肥的。是的，一个女人



在弯着腰，只能看到侧面。那双肥白的大腿，那丰腻的后臀，其丰满让我吃惊。她背部的上端由于板缝窄小视界不宽，给挡住了。那肥臀后面，有一个战士，也似跪在那儿，裤子解开了，上装十分零乱，只见他紧紧抓住那个女人的腰部，向自己这边拉过来，看样子就像要钻到这一堆白肉里似的，他全身不断猛烈地晃动，每抖动一次，就把那堆白肉向外顶一下。

我们这只小船在我脚下开始下沉了。一艘从伏尔加河下游上来的船又把它激起的河浪送到我们河道里来。

有一道浪使我失去了平衡，为防止跌下去，我向左迈了一步，于是又站在第一个舷窗口边，便把头紧紧靠在舷窗的铁框上。从板缝中又看到了那个卷发女人，就是我第一次看见的面无表情，甚至有点睡意的那个。只见她用手支在一块像桌布一般的布上，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衣，仍然在继续轻轻地点着头，而且还心不在焉地用眼睛打量着自己的手指……

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里是一个有一双惺忪睡眼的女人，她的服装和发式极其平常。这是另一个样式，她赤裸的臀部高高抬起，接着这一堆白肉的那个男人看上去身材瘦长，只见那厚厚的肥臀，那沉重的动作，都压在她的腰上。在我年轻的头脑里，这两种形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即这个女性的上半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这样一个肥大的下体联系在一起！

我兴奋异常，竟觉得驳船的船舷在地平线上铺展开来。我像一条蜥蜴一样爬在它上面，一点点地向那个裸体女人的舷窗移动。她还在那儿，但她那圆圆的强有力的臀部却一动不动了。那个战士，从正面看，他正在系扣子，动作软弱无力，而且笨手笨脚。另一个男人，个子比第一个小，也开始在这个白臀后面跪了下来。他的动作同第一个相反，快速而神经质，还有点慌张。当他一开始同她搏斗，用肚皮顶她那沉重的、白白

的两个半球体时，他好像和第一个一样，觉得自己搞错了，因为同他们的做法没有一点两样。

我的眼里已满黑色的尖钉，两条腿也弯曲了，胸部紧贴在生锈的铁甲板上，气喘吁吁，沉重的心跳似乎震动得整个船体也在晃动。又有一片片微浪晃动着小船，驳船的船舷又变成垂直的了。这时我已无法像蜥蜴那样灵活地爬了，便向第一个窗口滑了过去。那个穿白衬衣的女人还在机械地点着头，一面打量着自己的手。她正用一个手指刮另一个手指甲上的指甲油……

这时他们的脚步声同原先来时的顺序正相反：首先是甲板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便是跳板上传来了咚咚声，最后便是脚步走在河堤陡坡潮湿粘土上的声音。巴什卡看都不看我一眼，便跨过我们小船的船舷，然后跳上一个半浮在水面的浮桥，接着便到了码头上。我跟在他后边，像个木偶一样，有气无力地跳着。

来到岸上，他就坐了下来，把鞋脱下，把裤腿直卷到膝盖，然后就进到水里，一边躲着粗大的芦苇一边向前走。然后拨开浮萍，认真地洗起脸来，一边发出欢快的叫声。那声音从远处听着，就像一个很苦闷的人发出的呼声。

这是她生活中一个伟大的日子。其时正是六月份的一个夜晚，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就要把自己委身于一个年轻的朋友，一个同她在欢乐之山露天舞厅里跳舞的舞伴。

她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面孔长得很一般化，如果在人群里走，绝对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棕色的头发使人觉得只能在白天的光线下看，如果在欢乐之山的聚光灯下照一照，或者在青蓝色的反光灯下，她就只能是一个金发女郎。

我发现他们之间的事情，也只不过几天以后的事。那是在舞厅里蚂蚁般跳舞的人群中，我看到一群一群的人互相组合起来了——一个成年人组成的旋转的涡流出现了，他们摇摆着，兴奋着。然后就分散开，分头找一些人去学习，学些什么呢？学那些我觉得有时简单得出奇的舞步，有时又异乎寻常的奥妙和高深，即谈情说爱。

她特别喜欢和她的一位女伴在一起，也和其他人一样喝酒，但却是偷偷地，经常藏在欢乐之山的山坡上那一片小树林里喝。而当她们那个非常活跃的小圈子里大家都结成对子时，她就一人站在那里。因为恰恰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是单数，她时运不济，没分到舞伴。那些一对对的舞伴都溜了，只剩下她一个人，这时她已然喝醉了。她本来不善喝酒，但这次又喝多了，一是由于兴奋，一是由于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当然也是由于想在这无所事事的大白天里，借酒压一压自己的愁烦……她又来到舞池，但又不知该怎么安排自己这个没有一个地方不感到焦躁的身体。但这时已开始把聚光灯给关了。

所有这一切，没过多久，我就猜测出来了……那天晚上，我就只见到一个女性少年，她在黑暗的公园的角落里围着一盏惨淡的路灯转。就像一个大蛾子让灯光吸引着一样。她走路的方式甚使我吃惊，只见她像走在一条绳索上一样，步子迈得既轻飘飘的，又十分紧张。我明白了，原来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酒精在作祟，她在和酒精作斗争。她面部表情呆板，似乎她全身各个器官都动员起来做唯一的一件事——不要跌倒，不要使人有任何怀疑，并且继续围着路灯转，直到周围的树不再前后摇晃，也不再把树枝搞得哗哗作响，直向她附近跳动。

我向她走了过去。走进了那盏路灯的蓝色光环内。她的身体（穿一件黑裙子，浅色上衣）突然间便激发了我的欲望。是

的，她一下子就变成了我昼思夜想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尽管她还有点不死不活的样子，尽管她的面孔因酒醉而显得有些朦胧，尽管她的面孔和她的身体可能不会使我满意，但在当时我却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美好。

她在灯光下走着走着便撞在我身上，就抬起头来看我。我发现她的脸上一会儿的功夫换了好几种表情：先是害怕，继而生气，随后便面带微笑了。最后还是微笑占了上风。那是一种朦胧而模糊的微笑，它好像不是对我而是对另一个人，她笑着便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们便一起下了山。

一开始她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她那带着醉意而稚气的声音怎么也不能保持平稳。一开始是细声细语，接着几乎要喊起来。她搂住我的胳膊，还不时要绊倒，便骂一声粗话，但随即又天真地慌忙用手把嘴捂住。要么就突然离开我，一副受了伤害的样子，但过一会儿又跑过来紧紧靠在我身上。我猜想，我这位伙伴正在演一场已准备了很久的爱情戏剧。此乃是一种手法，为了向她的舞伴表明，她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但是在醉意朦胧中，她把这些小插曲的下文给忘了。而我呢，又是个蹩脚的演员，在这种情况下，一句话也说不出，并且被一个这样的女性在身边搞得手足无措。她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容易到手。如果我的幻想继续下去，那么这个女性的身体就将奉献给我了。我一直认为，这种奉献，是应有一个很长时期的情感接近为先导的，要有千言万语的绵绵情话，要有优美的情调。然而我一句话也没有，只觉得胳膊被一个稚嫩的女性胸脯挤得紧紧的。而我这位夜间出来活动的，说话结结巴巴的女伴，突然放弃了那种幽灵般向我大胆的主动接近，把两腮鼓得胀胀的，有好几秒钟，表示她在和我赌气，然后又用一种自认为引人爱怜的目光打量着她想象中的情人，但那目光却因酒精的作



用和内心的激动而显得模糊无光。

我把她领到一个唯一可以使我们做爱的地方，即那漂浮的小岛上，也就是今年夏初我和巴什卡偷看妓女和战士的地方。

在黑暗中，可能我走错了方向，我们在寂无一人的小船中间走了好半天，才在一艘类似旧轮渡的船上停了下来，那上面带支撑的栏杆已经断裂，泡在水里了。

她突然不讲话了。可能酒意已然慢慢地消除。在黑暗中，她紧张地站在那儿等着，可我却一动也不动。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便跪了下来，用手摸着船上的跳板，一会儿向水里扔下一团烂绳头，一会儿又扔下去一团干水藻。就在我这么收拾地面的时候，差一点儿碰到她的腿，我的手指便在她的皮肤上抚摸着，使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直到完了事，她一直一声不响，只是闭着眼，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把一个微微颤抖着的身体交给了我……可能由于我动作匆忙，使她感到很痛。这件令人十分遐想的事，在做完许多笨拙的很受束缚的动作之后，也就结束了。做爱就好像是一种匆忙的神经质的搜索一样。双膝和双肘像奇怪的解剖一样一动不动地伸展着。

那种快感就像在冷风中火柴燃着后的火苗一般——那火在熄灭以前要烧到你手指时，才在你眼中留下一个明亮的光点。

我想再吻吻她（我认为这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在我的嘴唇下，我觉得她的双唇特别热烈……

但使我最吃惊的是，完事一秒钟之后，我就觉得不想吻她了。那在松开的衬衣下尖尖的乳房也没有了吸引力，包括她迅速地向上提裙子时露出来的那单薄的后臀也是一样。她整个身子对我变得无所谓了，没有用了。沉浸于肉欲的满足之中，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她还这样半裸着身体伸展着四肢躺在这里

干什么？”我心中不快地想。这时我觉得背后的木板变得粗糙不堪了，手掌心也像有刺扎的一样疼痛，吹来的风也带着一股强烈的死水味。

在这黑暗的时刻中，人们也许有一瞬间的疏忽，几分钟的睡意吧，因为我就没见到有一只船驶过来。我们睁开双眼，因为强烈的白光已经照到我们身上。我原以为我们躲避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最隐蔽的小港湾内，里边泊了些生了锈的破船，谁知相反的情况却出现了。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是一个湾角，一直伸到河心里……那个灯光辉煌的大客轮慢慢地自伏尔加河上游驶了下来，突然出现在我们这个破轮渡前边，它的三层甲板就在我们头上。只见人影在黑暗的天空乱晃。许多人在最上一层甲板上跳舞，灯光照耀得如白昼，热烈的探戈舞曲像一股热流向我们涌来，并把我们裹走。船舱上的窗户射出来的灯光好像特别谨慎，有点羞答答的，好像让我们了解了里面的亲密情形……大客船通过时形成的水流十分强大，以至使得我们那个木排竟转了半个圈。一阵飞快的滑动使我们感到头晕。那个灯光辉煌，舞曲响亮的大船似乎正在绕过我们向下开行……就在此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并且紧紧地靠在我身上。她身上的全部热量似乎都集中起来传到我的手掌上，并且像只小鸟一样，全身在颤抖。她的手臂、她的身体十分柔软，就像从前有一天我采的那枝睡莲一样，当时它的许多枝蕊都纠缠在水里……

这时那只大船已经融入黑暗中，探戈舞的曲子也听不见了，它在驶往阿斯特拉罕的途中，也同时带走了夜色。我们轮渡周围的空气充满了犹豫不决的气氛。我觉得非常奇怪，那只大船，它航行在一条大河的中心，何以竟能看到我们，何以竟能在微弱的晨曦下，看到我们在潮湿的跳板上。即使在岸上，

也只能很模糊地看出港口的轮廓而已。

她不等我，也不看我，便开始一条船一条船地跳过去往回走了。她逃跑了——就像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跳错了舞步，下场时那样，急匆匆地跑了。看到她连跑带跳地逃走，我便下定决心紧紧地跟着她。她一直都在十分潮湿的木板上跑，突然，一个跳板腐烂了，她便一下子掉在两条小船的中间，两个船帮很快便在她头上接拢在一起了。但我尖利的目光却透过晨雾看见了她的特技表演。

隔了不一会儿，我便看见她已经走在河岸上了。四周都静悄悄的，只有潮湿的砂石在她脚下嘎嘎作响……这是一个在一刻钟之前我还同她十分亲近的女人，现在正在远去。我感到自己有一种从前未经验过的新的痛苦，即一个女人离开了我，并且正在切断那条至今还联系着我们的、看不见的纽带。她就在那儿，在那个寂静无人的河岸上，却变成了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一个被我所爱的女人，可也正在变成与我无关的人，一个陌生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她就要同别人谈话，对别人微笑，和别人生活！

她转过身来，等着正在她后面追赶的我。只见她面色苍白，她那头发，现在我明白了，是一种非常浅的棕红色，她脸上没有笑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已经忘记了在一分钟之前，当我听到潮湿的砂石在她脚下响着的时候，我要向她讲什么了。“我爱你。”那是一句说不出口的谎话。只有她那揉皱了的黑裙，只有她那还是孩子般的细胳膊，对我来说，才能超越世界上所有“我爱你”这句话。我建议她，我们今天或者明天再见，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这一夜，只能是唯一的一夜。就像那只客船上的旅客，就像我们突如其来的睡意一闪，就像刚才她的身体在这条沉睡的大河里被冷水泡了一下一样。

我想把这些对她讲。于是我便极不连贯地讲了那些砂石在她脚下嘎嘎作响，讲了她一个人在岸边的孤独，讲到她今夜的瘦弱，使我想到了睡莲的花茎。突然，我带着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想道，我还应该讲夏洛特的凉台，讲我们的草原之夜，讲在一个秋天的早晨，爱丽舍宫里的那三个美女……

她脸上的肌肉在收缩，同时带出一种既蔑视又担心的表情，她的嘴唇在颤动。

“你是病了，还是怎么的了？”她打断了我的话问。她的话带点儿鼻音，欢乐之山上的姑娘们同使她们讨厌的人讲话时，都带这种鼻音。

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她转身便向港口的第一群大楼走去，不久便被那高大的大楼挡住了。工厂的大门口已经能看到来上班的工人了。

几天以后，在晚间经常到欢乐之山来的人群中，我听到我同校的同学们在讲话。他们并没发现我就在旁边。他们说他们小圈子里的一个女性，抱怨她的男舞伴不会做爱（他们讲话的方式十分露骨）好像是她还把他表现得很可笑的细节都讲了出来（“特别滑稽”，他们其中一个说）。我一边听他们讲，一边希望他们能透露出一些色情内容。突然，他们把那个男舞伴的名字喊出来挖苦了，只听他们说：“那个法兰罗斯……”这是我的外号，对这个外号我甚至颇有点自豪：“法兰罗斯”——一个法兰西人，在俄罗斯。在他们的笑声中，我瞥见有两个朋友在一边交换了几句话，样子很诡秘：“今天晚上就去照顾照顾她，跳完舞就去，去两个，同意吗？”

我猜想，肯定还是指的她。我离开那个隐蔽的角落向出口走去。这时他们发现了我，只听“法兰罗斯！法兰罗斯……”



这样小声议论了一会儿，随后，第一声乐器声便把他们的声音压了下去。

第二天，没有通知任何人，我便动身去了沙朗札。

### 三

我来到这座被遗弃在大草原上的昏昏欲睡的小城，乃是为了摧毁法兰西。必须同这个夏洛特的法兰西一刀两断，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突变体，使我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生活。

在我的头脑中，摧毁法兰西的工作，应该似一声长长的呐喊，似一声猛兽的咆哮，这样才可以把我所有的愤慨尽情地发泄出来。这依然是没有语言的狂叫。然而话还是要说的，对此可以肯定，只要夏洛特那双沉静的眼睛一落在我身上，我就要说话，不过目前，我还仅是默默地呐喊。只是各种形象还如潮般乱七八糟、花里胡哨地向我涌来。

我看见了那个夹鼻眼镜在那个大型黑色轿车中半明半暗的缝隙里闪闪发光。贝利亚正在选择一个女人来和他共度良宵。我们对面那位邻居，安闲的退休者，经常面带笑容，正在他家的凉台上浇花，一边还在听着半导体。在我们的厨房里，一个两臂刺满花纹的男人，正在讲着一个冰湖，里面堆满了裸体死尸。在我去沙朗札的那列火车的三等车厢里，所有的人好像对这些令人心碎的景象毫不在意，继续过他们的日子，而且还心安理得。

在我的呼喊声中，我要把所有这些物事，一古脑儿地倾泄给夏洛特。而且还要等待她作出回答，我希望她能做出解释，为自己辩护，因为是她把我改造成一个法兰西的同情者，是她宣判了我，让我在“两个世界中间”痛苦地生活。

我要向她讲我的父亲，讲他头骨上那个“洞”，而他的生命却正是站在这个小火山口上。还要同她讲我的父母，讲我们从她那里继承了一听见突如其来的门铃声就吓得心惊胆战的恐惧心理，特别是在节日的晚上。这两个人都双双去世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便有些埋怨夏洛特，她何以会比我的父母活得还长。埋怨她在为我母亲下葬时竟那么坦然。埋怨她在沙朗札过的日子从好意和本义上讲，都太过西方化了。我发现她身上“西欧”这个概念，已经人格化了，而对于这个理性和冷静的欧洲，俄国人对它报有的仇恨是无法消除的。这个欧洲，从它文明的堡垒中，以其高傲的态度观察着我们这群野蛮的受苦人——在战争中，我们死的人以百万计，在革命中，它给我们写了那么多电影剧本……在我这个年轻人的愤慨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先天的不信任。

那个嫁接过来的法兰西枝条，我虽然觉得它已经枯萎，但它一直都还在我身上，并且妨碍我观察事物。它把现实一分为二。就像那一天在驳船上，我通过两个不同的舷窗，偷偷地看那两个女人一样，一个是穿白衬衣的女人，很平静，干那种事也显得很平常；可另一个呢，由于她那个肥臀极具肉感的吸引力，以致使她身体的其它部分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我也知道，这两个女人，实际上只是一个。一切都像这个被撕裂的现实一般。这便是我的法兰西幻象，它模糊了我的视线，使你如喝醉了酒，用一种足以迷惑人的、活生生的幻象，把世界分成两个……

我的呼喊成熟了。而头脑中的那些将要形成语言的形象，也在我眼前愈转愈快：贝利亚悄悄对他的司机说：“加速！赶上她，我要看看……”一个身穿圣诞老人服装的人，即我的外祖父费奥尔多，就在新年之夜被捕了；还有被烧成灰烬的我父

亲的那个村庄；还有我所喜爱的那个年轻姑娘瘦弱的臂膀——孩子般的胳膊上都能看到青筋；还有那副高高耸起的、具有野兽般力量的肥臀；还有那个自己的下体正在被人占有的时候，若无其事地刮自己指甲油的那个女人；还有那只“小新桥皮包”；还有那块“维尔顿”；还有那一堆法文的废报纸，它们简直是浪费了我的青春！

在沙朗札的火车上，我在站台上停了一会儿。和从前来时一样，我四处张望着寻找夏洛特的身影。随后，便带着一股自嘲的怒气，骂自己是个傻瓜。这一次根本没有人来接我。外祖母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要来！再说，我坐的这一趟火车，同我每年到这个城市里来时乘坐的那趟车比起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我到沙朗札的时间不是早晨，而是晚上。而且这列火车也长得令人难以置信，对边缘省份的这个小站来说，它是太长，人也太多了。然后它就又笨重地摇晃着，开往塔什干——这个帝国的亚洲边缘。乌尔金什、布克哈拉、沙马尔干，原先我经过这些地方时，种种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并唤醒了我对东部地区的怀念，这种怀念对每个俄国人来说，是痛苦的，也是深切的。

但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门是开着的。现在依然是一到晚上就关房门的时代。我推门时恍若置身梦境。我对当时的情况记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已经准备好见了夏洛特时要对她说的话，以及怎样埋怨她……

但当我听到那几乎难以觉察的门响，就好像亲人的声音一样那么熟悉时，当我闻到夏洛特房间里特有的那种令人愉快的、淡淡的气味时，就觉得头脑里什么话也没有了，只剩下事先准备要大声呼喊的一些只言片语还在耳边响着：



“贝利亚！那个老家伙还在悠然自得地浇着他的萱兰花。那个女人，已经被切成两半了！你把战争忘记了！把被奸污的事也忘记了！这个装满了法文报纸的西伯利亚旧箱子，我拖着它走时，就像一个犯人拖着他脚镣上的铁球！而你，你这个法国人，对我们的俄罗斯根本就不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理解！而我所爱的那个年轻姑娘，将要受到那两个下流鬼的‘照顾’！”

她没听到我进来。只见她正在凉台门前坐着。面孔凑在放在她膝上的一件浅色衣服上，手上的针一闪一闪地反着光。（我不知为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夏洛特总是在缝补一个带花边的衣领）……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不像是唱歌，倒好像是慢腾腾地在背诵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却很有旋律，语调抑扬顿挫，那声音随着无声的思想在变化，如行云流水。是的，这是一首歌，半哼半唱。在迟暮的闷热中，她的音调使人顿生一种凉意，其尖细似羽管键琴的声音。我听着那歌词，过了几秒钟，却感到似在听一种我听不懂的外语——一种对我毫无感应的语言。又过了一分钟，我才听明白，那原来是法语……夏洛特很缓慢地低声吟咏，其间不时有几声叹息。在两段歌词的间隙，可以听到大草原上那无边的寂静。

这是一首我曾经听过的歌，当时我还很小，它的魅力现在来说，就在于它浓缩了我整个的辛酸：

在床的四角，  
各有一束长春花……

“不错，就是这种法国式的多愁善感，妨碍我正常地生活

下去！”我怀着怒气在想。

就在那儿，我们要，  
一直睡到天荒地老……

不，我不能再听这样的歌词了！

我走进房间，故意以一种生硬的语调用俄语说道：

“我来了！我敢打赌，你没有去接我！”

使我吃惊，也使我失望的是，夏洛特抬起头来看我的那目光竟那么平静。我猜想，她眼睛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强有力的自我控制，只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极善压制自己的痛苦、悲伤，并能成功地避免种种危险的人才能做到。

通过侧面的、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几个问题，她知道了，我这次出来，没通知家里的人。于是她便起身走到门边上给我姑母打电话，通知她我已到了这里。这时，夏洛特对那个同她完全不一样的女人谈话时，那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这又使我吃惊。她的声音，就是刚才哼着一首法文老歌曲的那个声音，现在却带着一种轻微的大众化的平民腔调，而且只用了几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处理得妥妥当当，并且说，这次我的出逃，实际就是我们每年夏季例行的相聚而已。

“她是在尽力模仿我们，”我一边听她讲话，一边这样想，“她是在学习我们的讲话腔调！”

夏洛特的平静，以及她那种非常俄语化的声音，更加重了我的气恼。

于是我便开始一句句地挑她刚才说的话里的毛病，可能有一句让我给说中了，我想，夏洛特应该建议给我讲“雪球”的事，讲我们喜爱的甜点心，这样，我就可以指责她那些法国玩

艺儿毫无意义了。或者，为再现从前我们夏夜的那种气氛，她也可能会讲她童年的故事，是的，可以再讲一讲塞纳河码头上给狗剪毛的工人……

但是，夏洛特却一言不发。而且对我讲话好像很不注意。好像我的到来，对她生活中这个平常的夜晚的气氛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有时我们的目光相遇，她便朝我笑笑，随即便又板起面孔。

晚饭也简单得令人吃惊。餐桌上既没有“雪球”，也没有我们童年时爱吃的甜点心。我惊异地发现，这些黑面包片，这种淡茶，就是夏洛特的日常食物。

饭后，我便在凉台上等她。还是从前那同样的花丛，还是在热雾笼罩下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两丛玫瑰中间，那个有小胡子的石像还在那儿。我突然竟想把这个头像从栏杆上扔下去，想把这里的花丛都拔下来，想用我的呼喊，打破这草原的沉闷。是的，夏洛特会出来的，她还会坐在那把小凳子上，在双膝上放一块布料……

她出来了，但并没坐在那把小凳子上，而是来到我的旁边，把身子靠在栏杆上。这个位置，原是从前我们，我姐姐和我，相继以这种姿势来凝视大草原是如何慢慢地融进夜色之中，一边很有兴致地听着外祖母的故事。

是的，她靠在了已裂开的木栏上，打量着无际的草原，只见这一片空旷已染上了一片明亮的紫罗兰色。突然，她依然眼睛看着远方，却开口讲话了，声音是冷漠的、沉思的，似乎是在对我讲的，也像对别人讲的：

“你瞧，这有多奇怪……一个星期前，我碰到一个女人，那是在公墓里，她儿子和你外祖父埋在同一条路旁。我们谈起他们的事来，谈到他们的死、谈到战争。在坟墓前，还能谈些

什么呢？她儿子是在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月受的伤，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向柏林进军了。她每天都在祈祷（她是一个教徒，也可能是在那漫长的等待中变成了信徒的）以便让她的儿子能够在医院里多住上一个星期，多住上三天……但，他却在柏林战死了，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在柏林的街头被打死了……她对我讲得很朴实，就是在讲她祈祷时，她的泪水也那么朴实……你知道她讲的这些使我想起了什么吗？我想起了我们医院里的一个受伤的战士，他害怕再到前线去，每天晚上都用马蹄铁破坏自己的伤口，被我碰上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任医师，我们便把他的伤口打上了石膏，过了一段时间，伤愈后，便又回到前线……你看，在那时候，我这样干觉得是那么明白、那么正确，可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儿被遗弃了。是的，生活已经在我的身后了，但突然间却觉得一切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了。这一切可能你觉得是愚蠢的，但有时候我就自己问自己：‘如果，这个年轻的战士，是因为我把他送上前线而死的呢？’我想，很有可能，在俄罗斯的某一内地，有那么一位女子，她每天都在祈祷，希望能让他在医院里尽量多住些日子，是的，那个女子也正像墓地里这位母亲一样。我不知道……我忘不了这位母亲的面孔。你知道，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可我现在却认为，在她说话的声音里却包含着责备的意思。我不知该怎样向我自己解释这一切……”

她不讲了。站在那里好长时间一动不动，双眼睁得大大的，似乎想把落日的余辉留在眼里。我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能用目光斜视她，几乎不能转动自己的脑袋，不能变换自己手臂的姿势，也不能松开双手交叉的手指……

“我去给你安排床铺。”她终于对我说，一面便离开了凉台。



我站了起来，很惊奇地向周围看了看。夏洛特的这只小凳子，这盏带青绿色灯罩的台灯，这个带着忧郁笑容的小胡子石像，这个高挂在草原夜色中的狭窄凉台……这一切突然变得那么虚幻了！我忽然惊愕地想起，我曾经有过想把这个短暂的小天地毁掉的念头……凉台变小了——似乎我是在很远的地方看它——是的，渺小又不能自卫。

第二天，一股火烫的干风袭击了沙朗札城。街角上，原本被太阳晒得干硬的土地刮起了小股小股卷着沙尘的陆龙卷风。随着这股风而来的，还有很响亮的另一种声音——那是一支军乐队正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演奏，那威武雄壮的嘭嘭声被热风直送到夏洛特的家里来。接着便是一片突然的沉寂，只听到砂石打在门窗玻璃上的嘎嘎声，还有一只大苍蝇在屋里飞的嗡嗡声。这是在距沙朗札几公里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的第一天。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首先，穿过了整个城市，随后便来到了大草原上。夏洛特讲话时还同头一天晚上在凉台上一样，那么沉静、冷漠。她的叙述融进军乐队欢快的乐曲中。但当热风突然停止时，她的话便立刻以一种出奇的清晰度在白茫茫的阳光下和寂静的草原上响着。

她讲在战后的第三年她在莫斯科那段短暂的居留情况……在五月份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她步行穿过普雷斯尼亚地区的那一片小街道，这些街区直延伸到莫斯科河。当时她感到自己已在战争、恐惧的重负下逐步解脱出来，特别是费奥多尔的死去，使她生活中觉得似缺少了什么一样，久久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却又不能对外人讲。直到那时，她也方始感到思想上开始平静了一些……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她听到两个走在她

身旁的女人在谈话，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

“那些大茶炊子……”其中一个说。

“原先的好茶……”夏洛特听罢，这样想。

当她来到广场上，看到市场上搭的那些木棚子，凉亭子，和用厚木板建成的栅栏时，她方始明白，自己是搞错了。只见一个男人，已没有了双腿，坐在一种类似箱子一样的小车上，正向她这边滑过来，而且向她伸出了唯一的一只胳膊：

“喂，漂亮姑娘，给我这个残废人一个小卢布吧！”

夏洛特本能地躲开了他，因为这个陌生人好像从地上出来一般。直到这时她才看到，在市场四周挤满了残废军人——即所谓的“茶炊子”。他们坐在那种箱子似的车里，有的下边安的是带小橡皮轮胎的车轮，有的就是简单的安一个滚珠轴承。这些人在市场门口围住出入的人们，向他们讨钱或烟草。有些人给他们些钱，有些人赶紧躲开，更有些人则出口不逊，最后还以教训人的口气加上一句：“国家不是把你们养起来了么……可耻！”这些茶炊子几乎都很年轻，其中有几个明显可以看出是喝醉了。每个人眼睛都很尖利，都有点儿疯狂……这时有几个箱子向夏洛特滑过来。这些战士把手里拿的棍子插在广场上被踩得很硬的土地里，然后便抓住它用身子使劲地在棍子上扭来扭去，并且使劲摇晃着自己的身躯以相互帮助，尽管他们很费劲，但看起来倒很像做体育活动。

夏洛特停下来了，匆匆忙忙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票子，便递给最先靠近她的那个人。但此人却不能拿，因为他唯一的一只左手，没有手指。便把那张票子扔在车子底上。随后便突然在车上翻动起来，原来是把他残废的腿伸向夏洛特，把她的脚踝骨碰了一下。并且抬头看着她，目光里充满了苦涩……

她没有时间了解以后还会怎么样，便看到另一个残废者靠

了上来，他的两条手臂倒是十分健壮，只见他到了第一个人旁边，十分粗野地从那个独臂人车子里把那张揉皱了的票子拿了出来。夏洛特“啊！”地喊了一声，随即便又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但刚才轻轻碰她脚的那个战士似乎很驯服，便把背转过去，不看抢他钱的那个人，而且已经沿着那条小巷子向上滑去，巷子窄得很，就像朝天开的一条缝……夏洛特停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去赶上他吗？再给他钱吗？她又看到几个茶炊子正转着自己的车轮子向她滑来。她心中感到特别不是滋味，这其中有害怕，也有羞愧。突然，一声嘶哑的短促的呼喊打破了广场上单调的嘈杂声。

夏洛特突然转过身来，那目光比闪电还快，只见那个独臂战士正坐在他那个滚动的小车上从小巷子里向下滑来，那轴承在路上嘎嘎作响。他有好几次用那个残肢撑地，以保持这种疯狂的下滑方向，只见他用那由于强笑而变了形的嘴，咬着一把钢刀，刚才抢他钱的那个残疾者正牢牢地用手握住他的木棍，独臂战士的车，直向他的车撞了上去，鲜血立即喷了出来。夏洛特看到另两名残伤战士匆忙地奔向独臂者，只见他正在摇着头用嘴上的刀划他对手的身体。还有一些人嘴里也叼着闪闪发光的钢刀。喊叫声从四面响了起来，残疾车互相撞在一起。过往行人眼见着这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混乱的群殴，也便不敢加以干预了。另一个战士，以极快的速度从街那边的坡道上冲了下来，嘴里也叼着一把刀，也参加到这群残伤者可怕的斗殴之中……夏洛特极力想靠近些，但打斗几乎紧贴着地面进行的，要想加以调停，就必须趴下钻进去。民兵也跑了过来，一面吹着哨子，这时周围的观众方始明白过来，一些人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人躲到柳树丛的树荫下以看看这场战争结局如何。夏洛特看到一个女人，弯着腰从滚成一团的人堆里拉出一

个“茶炊子”，只听她带着哭声不断地重复说：“阿廖沙！你答应过我不再到这个地方来了！你答应过的呀！”然后便像抱孩子一样把那个残疾者抱走了。夏洛特想看看她那个独臂战士是否还在那儿，但一个民兵把她推开了……

我们还在一直向前走，愈走离沙朗札愈远了。军乐队的嘈杂声也消失在静静的草原上。我们只能听到风吹野草的沙沙声。就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明亮而闷热的草原上，又重新响起了夏洛特的声音：

“不，他们不是为了那点钱被抢走而斗殴，不是的！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他们打架是为了……是为了向生活报复，报复它的残酷，报复它的荒唐，也是为了报复在他们头上的这个五月份的蓝天……他们互相打斗，也好像是因为他们蔑视某一个人。是的，这个人把这个春天的蓝天和他们残缺不全的身体混到唯一的生活中去……”

“是斯大林呢，还是上帝？”我几乎就要脱口问出来了，然而草原的空气使这几个字变得很涩口，难于启齿。

我们还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沙朗札早已淹没在地平线上飘浮的雾气中，这一次无目的的出行，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我背后，我几乎从直觉上感觉出那个莫斯科小广场上的阴影……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铁路的路基附近，这条铁路就是这茫茫无际的草原上的一条超现实的标界，因为在这儿，除了太阳和天空外，没有任何可以用做标记的东西。奇怪的是，在铁路的那边，那景色竟然同这边不同。我们不得不绕过几条深沟，那其实是沙土地内部的一些巨大的断层形成的。然后就下一个河谷地带。突然，在柳林的枝条中，有一条光亮的河流，于是我们相视而笑的同时，也便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苏穆拉河！”

苏穆拉河是伏尔加河的一条小分支，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河，发源于广袤的草原，人们之所以知道有这么一条河，唯一原因是，它是注入伏尔加河里去的。

我们呆在柳树荫下，一直到傍晚……直到回来的路上，夏洛特才讲完了她的故事：

“行政当局最后还是赦免了所有在场的残废军人，不计较他们的大喊大叫，以及他们的打架斗殴。但比这些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为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一个坏形象。你知道，人们对待一个战士，要么希望他能作战勇敢和面带微笑，要么……希望他光荣地战死沙场。而那些……总之有一天，突然开来许多卡车，民兵们便开始把那些“茶炊之”一个个从滑动小车里拉出来，然后再一个个扔到卡车的货台上，就像向架子上堆劈柴一样。有一个莫斯科女人对我说，那些人被运到北方一个湖泊的岛上，并为此专门改造了一个麻风病院……秋天，我就想办法打听这个地方，我想，我可以到那儿去工作。但待到来年春季，我到达那个地区时，有人告诉我，岛上已经没有一个残废人了，那个麻疯病院也已经关门大吉了……但那个地方可是特别美，一望无际的松林，许多大的湖泊，尤其是空气特别新鲜……”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夏洛特向我报以一个没有笑意的微笑：

“等一下，我要坐下歇一会儿……”

于是她便坐在枯草上，把两条腿伸开。我又下意识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才转过身来。就像在一个奇特的远处，或者站在很高的地方，我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头发苍白的女人，身穿一件很朴素的浅色缎裙，只见她坐在地上，坐在一个大得难以估

量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其大无比，从里海直到蒙古，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大草原”的那块土地。而我的外祖母……然而就在头一天晚上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在视觉上产生了错觉，从而站在一种难以解释的距离上来看她。我觉得自己已然看出了，夏洛特经常体验到那种对生活环境的极端不习惯，即几乎是对宇宙间的一切都不习惯。她就坐在这儿，在这淡紫色的天底下，淡紫色的草地上，头上几颗疏星乍现，似乎这个星球上就只她一个人一样，显得绝对的孤独。而她的法兰西，她的青年时代，已离她甚远，比天上那个惨白的月亮还远——已被抛弃到另一个星系的另一个天底下了……

她抬起了头。那双眼睛似乎比平时更大。她用法语对我讲话了，这个语言的声音颤动着，似从那个遥远的星系上发来的最后的信息。

“你知道，阿廖沙，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的生活一窍不通。是的，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外国人。可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可那些‘茶炊子’……我弄不懂，有些人看到他们斗殴竟在旁边笑！”

她动了一下，想站起来，我连忙跑过去把手伸给她，她朝我笑了笑，一边抓住我的胳膊。当我弯下腰时，便听到她说了几句简短的什么话，那语调坚定、严肃，使我颇感惊奇。可能当时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把它们译成了俄语，这样才便于记忆。译成俄语要用一个很长的句子，可夏洛特的法语只把它归纳成一个很形象的语言：那个独臂的“茶炊子”坐了下来，背靠一个大松树干，一声不响地望着树林那边湖上的波浪在平息下去……

译成俄语时，在我的记忆中是，夏洛特又以辩解的口气加了如下一段话：

“有时我又想，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比那些俄国人自己对它的了解更清楚。因为这个战士的面孔在我头脑中已保留了好多年了……因为我已经懂得了他在那湖边上的孤独……”

她站了起来，靠在我臂上慢慢向前走着。我感到，自从昨天来到沙朗札以后，那个咄咄逼人的、神经质的青年，正在我的身体内，在我的呼吸中消失。

我们两人的夏天，我自己在夏洛特家里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方始感到，真正的我，才回到我身上来。一个巨大的沉静，它苦涩又安详，在我的身上扩展开来。我已不再为自己是法国身份还是俄国身份而苦恼了，我承认了我自己。

我们现在在苏穆拉河畔几乎过了整整一个夏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带着一大壶水、面包、奶酪。晚上，趁着刚刚刮过来的凉风便开始向回走，每天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已认识了道路，它便不显得那么长了。在太阳直射下的大草原上，我们发现了许多标界石、标杆，我们很快便熟悉了它们。这种花岗岩，其中的云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边有一片沙滩，就像一个小沙漠地带。这一片地方长满了荆棘，要绕着走。当沙朗札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之后，我们就知道，过不了多久，那条路基就会在地平线上消失，只剩下两条铁轨在闪着光。一旦跨过这条界线，我们几乎就可以说要到了——在那些大沟后边，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那条河的存在了。这些大沟，以其陡峭的断层把大草原给分割开来，那条河似在等待着我们……

夏洛特，拿着一本书坐在柳荫下，距河道只几步远。我

呢，就在河里游泳、潜水，在这条不宽也不太深的河面上，游几个来回，直到精疲力尽为止。沿河两岸有一块块岛状地带，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青草，在那上面恰可以让你有尽情遐想的余地，可以舒适地躺在上面，想象着自己正在大洋的一个无人的孤岛上……

然后，便躺在沙滩上，侧耳细听大草原上那种深邃的寂静……我们的谈话，无须找题目，如阳光下苏穆拉河的流水，如柳林中飒飒作响的长叶，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夏洛特双手抚在打开的书本上，眼睛望着河对岸那片阳光下灼热的平原，便开始娓娓而谈，有时是回答我一些问题，有时把某些问题同她叙述的故事结合起来一起讲。

就这样，在整个夏天里，那些漫长的下午，我们便在这大草原上度过，在这里，每一块草地都经历过干旱和炎热，而我也在这儿了解了从前对我秘而不宣的夏洛特的一些生活情况，同时，也理解了我孩提时代所不能理解的一些物事。

我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一位战士，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向她手中塞那块名叫“维尔顿”铁片的那个人，乃是她现实中第一个恋人。只不过在1919年7月14日庄严游行的那一天，他们尚还互相不认识罢了。但两年之后，夏洛特动身到俄国之前的几个月，他们便认识了。但我也知道了，这位战士同我们天真的想象臆造出来的那位胸前挂满光灿灿的奖章，唇上留着胡子的英雄相去甚远。他长得极为瘦弱，一张苍白的面孔，一双忧郁的眼睛，还不时轻轻地咳嗽，在开始同毒瓦斯作战中，有一次他的肺部被灼伤。也并非是在大检阅时他离开队伍把那块“维尔顿”铁片交给夏洛特的，而是在他动身去莫斯科的那一天，在火车站上，他把这件定情物交给她的。当时他十分肯定，不久便会再见到她。



一天，她向我谈到了被强暴的事……她平静的声音中似乎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当然，你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种事对你，已不再是秘密。”我在心中也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她这种意思以一系列“是的，是的”这样简短的回答予以肯定。听她讲完后，我感到十分害怕，在站起身来时，好像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夏洛特，看到的是另一个面孔，一个被强暴了的女人脸上那种永远抹不掉的表情，但首先是，这一块发光的弹片，已嵌入了我的神经。

一个头裹缠巾的男人，身上穿着类似一种很长的外套样的长袍，看起来很厚，也很热，特别是在寂无人烟的沙漠包围之下，更是如此。一双带有蒙古褶的眼睛，像两个剃须刀片的刀，古铜色的圆脸上冒着油汗。他还很年轻，此人动作狂热，想伸手抓去挂在腰带上的那把弯形匕首，他腰带另一边挂着一把手枪。这几秒钟的时间，好像永远也看不到头似的。因为这个荒无人迹的地方和这个男人的匆忙动作，都被人在眼缝里瞧见了。一个似乎虚脱的女人躺在地上，裙子被撕破了，头发散乱，一半已被砂子埋住，好像永远就这么躺在这一片空洞的地方似的。一条鲜红的伤口穿过她的左鬓角，她还活着。子弹擦破了她头发下的皮，打到砂子里去了。那个男人扭转身子去拿那把匕首，他希望死者更像个肉体——把她的喉管割断，让流出来的血染红砂地，他寻找的那把匕首，刚才他那件长袍的下摆大敞开，他在死者身上搏斗时，已滑到另一边去了……他带着怒气紧紧拉住自己的腰带，并对这个女人已然僵化的面孔投过一瞥仇恨的目光。突然，他听到一声马嘶，便转过身去，他的伙伴们已经骑上马跑远了，他们的影子在山顶上很清楚地显现在背面的蓝天上。他突然感到出奇的孤独，这里只有他自

己，夕阳余辉下的沙漠，还有这个垂死的女人。他恼怒异常，用尖尖的长靴踢那个毫无生气的身体，然后像猓猓一样那么灵活地跳上马背。待到马蹄声远去，那个女人便慢慢地睁开双眼，也开始慢慢呼吸了，她迟疑不决，好像不知身在何处一般。空气里有一股石头和血腥味……

夏洛特的声音同柳枝轻微的飒飒声融为一体。她不讲话了。我还在思考那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何以会动怒：“只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她杀死，让她成为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不就可以了吗！”但此时我已经具有了男性特征的理解力，懂得了，那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残酷而已。于是我就想起了做爱时，当动作开始时，最初的几分钟，她那个肌体还能满足你的欲望，但当完事之后，它会突然使你感到没有用了，看着、摸着都不舒服了，甚至会使你对它产生厌恶感。我就想起了我那个青年女伴，那天夜里在木排上的情形，一点儿不错，我当时越来越觉得她不能令我满意了，越来越使我心烦了，对于她靠在我肩上也感到不耐烦了……此时我就索兴把自己的内心想法完全亮出，把那种既使我害怕，又对我有诱惑力的男性的个人主义私心干脆赤裸裸地摊开，便想道：“事实上，在做爱以后，女人就应该走开！”我又一次想到了那只焦躁的手在寻找匕首的情景。

我突然站了起来，把面孔转向夏洛特。我要向她提出几个月来一直折磨我的，现在也反复字斟句酌了上千次的那个问题：“请告诉我，用一个词，或用一句话，爱情，是什么？”

无疑，夏洛特认为她的话可以避开我将提出的必不可免的问题，于是便首先开口了：

“你知道是什么把我救了吗？或者说，是谁救了我吗？……这件事还没对你讲过？”

我用眼睛看着她。不错，关于被强暴的叙述，在她的脸上没留下任何表情，只有柳叶和太阳的影子在她脸上轻轻地晃动。

救了她一命的是一只大鼻羚，这种沙漠上的羚羊有一个大鼻子，就如把一条大象的鼻子割去一段一样。与此成明显对比的是，有一双胆怯和温顺的眼睛。夏洛特就经常见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沙漠里奔跑……当她终于勉强站立起来时，她看到一只大鼻羚正慢腾腾地向一个沙丘上爬。于是夏洛特便不加思索，本能地跟在它后边——这种动物是这无边无际的沙漠上唯一的标记。像在梦境中一样，她慢慢靠近了这只大鼻羚。它见到她也并不逃跑，夏洛特在朦胧的暮色中，见到沙漠中有许多黑点——那是血迹。只见那大鼻羚忽然趴下了，随即猛然间摇晃了一下脑袋，便又从地上爬了起来，四只长长的蹄子直抖，身子也直晃，很狼狈地向前跳了几下，接着便又跌倒了。它受了致命的重伤，是刚才那些几乎要把她杀死的男人干的吗？有可能。其时正是春天，夜间还是很冷的，夏洛特把身子紧紧靠在大鼻羚的背上，蜷缩在地上，大鼻羚也不再动了。它全身的皮骨都在颤抖，喘气声好像人在叹息，又像悄悄地讲话。夏洛特在寒冷和疼痛造成的浑沌状态中也常常惊醒，观察着那个似在固执地讲着什么的动物。在深夜里，有一次她又醒了，忽然惊奇地发现有一个光亮，非常之近，在沙地里闪闪发光，似一颗星从天上掉了下来……夏洛特便向这个光点凑了过去。原来那是大鼻羚睁着的那只大眼睛，就像一颗美丽而脆弱的星，在这个浸透了泪水的地球上放着光……她没有发现这个给了她生命的动物，在此时此刻竟停止了心跳……

清晨，沙漠上铺满了闪亮的白霜。夏洛特在这个身上盖满冰霜一动不动的动物面前站了几分钟。然后，便开始沿着头天

晚上那个大鼻羚没爬完的沙丘继续向前爬。待到她爬到顶峰时，便放开喉咙大喊了一声“啊——”那声音便在清晨的空气中传播出去。一面湖，被清晨的霞光染成了玫瑰色，就在她的脚下伸展开来。那个大鼻羚就是想到这个地方来的……当天晚上，才有人发现夏洛特在那个湖边上坐着。

直到进了沙朗札城的大街上，其时夜幕已然降临，她才把她故事中那个动人的结尾讲了出来，只听她压低了声音说：

“你外祖父从来不提这一段往事，从来不提……他很喜欢你舅舅塞吉，就好像他自己的亲生子一样，可能比亲生儿子更加喜欢。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第一个孩子是母亲被强暴后生下来的，这件事情接收下来十分痛苦。特别是塞吉，这你知道，在我们家里，他谁也不像。是的，他从来没谈过这些……”

我感到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她很爱费奥多尔，”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是他，使这个让她受过那么多苦难的国家能够成为她自己的。而且，在失去他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爱他。她爱他，就在这大草原之夜爱他，她爱他，就在这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爱，她爱他……”

爱情，以它使人痛苦的简单内涵，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它无法被理解也难以表达，就像天上那颗星，在这覆盖着冰霜的沙漠上，在一个受伤的野兽的眼中闪着光。

我已了解到这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出于偶然的口误，因为我讲的法语，已经不是地道的法语了……

那一天，我向夏洛特提出一个问题时，我把法语里的词用混了。我可能遇到了以下几组词汇当中的一组，这种很容易使人弄混的词，在法语里是很多的。是的，它们就如同孪生姐妹一



样,比如:“percepteur – precepteur”<sup>①</sup>或者“decerner – dircerner”,还有诸如一些意涉淫秽但又意义相反的词,如“luxe – luxure”等,由于我口头表达较为笨拙,在从前,我遇到类似词语便常常引起我姐姐的嘲笑,夏洛特有时还悄悄地给予纠正……

这一次,并不是说,她又悄悄地把正确的词语告诉我,因为我在迟疑了几秒钟之后,便能自己加以纠正,但这一次却比那时的犹豫不决要强烈得多,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感觉:我正在讲一种外国话!

我起而对夏洛特进行反抗的那几个月,也并非默默无闻毫无结果地就此罢休,也并非自那以后用法语表达思想就不大方便了。然而决心同法兰西决裂却正是在那个时候,归根到底使我感到窘困的,还是夏洛特的有声语言,她向我讲的那些故事。

但自从那天发生口误之后,这种“技术”问题便始终使我绕不过去了。目前,法语已成为我的一种工具,在讲它的时候,我就一边仔细考虑着它表达的意思。是的,它已是独立于我之外的一种工具了。我一边使用它,也一边不时地在想,自己这样做是否有点儿古怪。

自我发现了这种语言是一种使人感到困惑的语言后,便对它的特点有了一种强烈的直观感。这种可以操作的、严密的、经过不断完善的语言——工具,我想,只能用作文学写作之用,在整整这一年之中,从我用来消遣我们同学的那些法国的轶闻故事中,我已初步感觉到这种语言的浪漫性。我不是已经运用它或者是使那些“无产者”们大开其心,或者是让那些

---

① 意为“税务官—家庭教师”,这些字意义不同,但在法文中写法和发音均很相近。以下几组均同。意思分别为“颁发—认清”,“豪华—淫荡”等。

“审美学家”们感到美的享受了吗？文学已经显示出，在世界赖以依存的语言长河中，它永远是一个使人惊奇的因素。我现在已经明确看出，法文，我的“外祖母”语言，乃是这种使人惊奇的语言中的皎皎者。

……是的，自从在那个遥远的过去，在源于大草原深处的一条小河边上，那一天进行的法语交谈后，我便常常出现对往昔的那种惊奇的回忆：一位头发灰白的女性，睁着一双沉静的大眼睛，和她的外孙一起坐在被太阳照射得灼热炙人、寂无人烟的大草原深处，这种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无际空旷，十分具有俄国风味。他们互相用法文交谈，这实在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现在我又重温这种场面，对我讲法语十分惊讶，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法语只能去喂猫。奇怪的是，或者倒不如说完全合乎逻辑的是，在那个时刻，我处于两种语言之间，但却自觉所见所感均比从前激烈得多。

也可能就在同一天，即我把“percepteur”误说成“pre-cepteur”<sup>①</sup>的那一天，我便进入了两种语言之间的那种沉默状态，同时我也发现了夏洛特的美丽……

关于她美丽的想法，我觉得，首先这是不够真实的，在那个时代的俄国，任何一个年过五十的女人，都已变成“巴布什卡”了，也就是说，把她们看成女性都有些荒唐，哪里更谈得上美丽呢。至于说，我要当众宣布：“我外祖母长得漂亮。”……

然而，夏洛特在六十四五岁的时候，她确实是漂亮的。她坐在陡峭的苏姆拉河的沙岸上，在柳枝掩映下读着一本书，在

---

<sup>①</sup> 见前注。

她的长裙上形成一个阳光和树影织成的网，那银白色的头发归笼在颈背上，并且不时地面带微笑用眼睛向我这边望来。我努力想弄明白，在那副面孔上，在那条非常朴素的裙子上，那种美是怎样洋溢出来的，并且我也几乎不好意思承认在她身上存在着这种美。

不，夏洛特不是那种“叫人看不出多大岁数的女人”，她的面孔也没有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同“精心保养”的皱纹做斗争的那种风流女人所具有的人工美。她也不企图掩饰自己的岁数，然而年龄的变老在她身上并没有产生皱纹堆垒、身材干瘪的现象。我用眼睛仔细打量着她那满头银发，打量着她面孔的轮廓，那微显褐色的双臂，以及那双脱了鞋袜的光脚，它们几乎就要伸到苏穆拉河懒洋洋的河水里了……我怀着异常的惊喜发现，她那裙子的花布，同太阳透过树荫洒下来的光点，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严格的界限。她全身的轮廓，在不知不觉中便同周围光亮的空间融为一体；她的双眼，恰似一幅水彩画，同天上洒下来的灼热的光线融溶在一起；她那不时翻着书页的手指，那动作同柳树枝的摇曳配合得十分和谐……在她身上存在的这种同万物融溶在一起的和谐，蕴含着她美的奥秘！

是的，她的面孔及她的身体，并没有萎缩，也并没有因老之到来而张皇失措。但却倍受过风吹日晒，饱尝过草原的辛酸，当然也沐浴过春风杨柳。由于她的存在，使这个空旷的草原变得令人惊奇的和谐了。夏洛特就在这儿，在这炎热得火一般单调的草原上，但却有一个抓不到、摸不着的和谐和声形成了：河流发出悦耳的旋律，湿润的泥土散发着强烈的田野味，以及草原上特有的辛香味和枯草味，这一切同岸上的垂柳摇曳弄姿，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和谐。这是唯一的美好时刻，同以后随之而来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年头和时代，没有共同之

处……

这是一个永不流逝的时刻。

我在发掘夏洛特的美。几乎就在同时，我也发现了她的孤独。

那一天，我躺在河岸上，倾听她讲述着我们带出来的书。自从我发生口误之后，每当我们谈话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注意外祖母是怎样操作法语的。我把她运用法语的方式，同我读过的那些作家们使用的法语加以比较。因此，我对她的法语特点就很熟悉了，她喜欢用的表达方式，她独特的句法结构，她惯用的词汇，甚至她句子里所蕴含的时代色彩，即那个“美好时代”的色彩等……我都已了解得很清楚。

但是那一次，除了对她的语言进行仔细的观察之外，突然一个新奇的想法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她的语言，在绝对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且平时她讲得也很少，用它来解释一个与它自己本土毫不相关的外部事物，那岂不是把一种植物放在光秃秃的岩石上让它去生长一样吗……”然而，夏洛特的法语却依然保存着它异乎寻常的活力，并且简洁、纯粹，有如多年的陈酒，发着琥珀色的光。这个语言，曾经受过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曾经受过中亚细亚旷无人烟的沙漠的炙烤，而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一直在这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中，这条河边上回荡着……

于是，这位女性的孤独，便在她凄凉而悲痛的话语中，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中，尽收我的眼底。“她的内心情怀，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我呆呆地想道，“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同她讲一讲法语……”我突然明白了，每年夏天，对于夏洛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了，她的法语，她用法语编制的句



子，在我看来尽管那么自然，但只要我一离开，即便凝固了，要凝固整整一个年头，取而代之的，是俄语，是书页翻动时的沙沙声，是无边的沉默。我想象着夏洛特：她一个人走在沙朗札黑暗的道路上，被卷裹在风雪中……

第二天，我看到外祖母在同加夫利里奇谈话。此人是我们心目中的酒鬼和专干坏事的家伙。“巴布什卡”们的长凳是空的，那原因自然是这个家伙的出现把她们吓走了。孩子们也纷纷躲到柳树后面。附近的居民则在窗户里很有兴趣地向外看着：这个奇怪的法国女人竟敢接近这个坏家伙。这时我又想起了外祖母的孤独。我的眼皮里好像满是小砂粒一样，又痒又难过：“这就是她的生活，这个大院子，这个酒鬼加夫利里奇，这个又黑又大的木屋，对面就是许多家庭都挤在里面的大房子……”夏洛特回来了。微微有点儿喘，但却是面带笑容，眼里含着高兴的泪水。

“你知道，”她用俄语对我说，好像已没有时间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了。“加夫利里奇同我说起了战争的事，他曾经保卫过斯大林格勒，而且还和你父亲在同一条战线上打过仗。他常和我谈这些事，刚才他讲的是在伏尔加河岸上的一次战斗。他们为从德国人手里夺回一块高地在作战。他说，他从没见过那么多冒着火焰的坦克，也没见过那么多残缺不全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土地。晚上，这块高地上就只剩下他们十二三个活人。他便向伏尔加河走去，因为渴得实在受不了了。来到河边，他看到那里的水特别平静，沙是白颜色的，走近后那些芦苇及水中的小鱼就看得很清楚。他觉得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又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我听着她讲。而俄罗斯，使她孤独的这个国家，我觉得好像也不再对她这个“法国味”很浓的人有什么敌意了。我很为

感动，心想，这个大个子酒鬼、这个常带着嘲弄人的眼神的加夫利里奇，恐怕还没敢对任何人讲过他自己的感受。是的，别人也许会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来：“刚才还大谈斯大林格勒，大谈战争，却突然又谈起什么芦苇、什么小鱼来了！”在这个地区，大概没有人肯于劳神听他讲点什么。“一个酒鬼，能回忆出什么值得一听的事呢？”但他却能同夏洛特讲话，而且以信任的态度，而且绝对肯定自己会被理解。这个法国女人，在这一刻距他比那些在旁边偷偷地观察着他的人都近，那些人窥伺着他，并指望从他身上看见某些不花钱的好戏来，而他也用阴沉的目光看着他们，一边在心里暗自抱怨：“这些家伙都在这儿，简直像看马戏……”突然他看到夏洛特正拿着一个食品袋走来，他便站起身来向她打招呼。一分钟之后，他那阴沉的面孔就放晴了，便听到他说：“夏洛塔·诺贝尔托芙娜，您知道，在您的脚下，已经不是土地了，而是一堆肉糜。自大战开始以来，我看见的就是这个。然后，待到晚上，待摆脱了德国人之后，我就到伏尔加河上去，在那边，该怎么对您说呢……”

早晨，我们走出家门，在那栋又黑又大的木屋旁走过时，那儿早已经人声嘈杂的热闹起来了。可以听到煤油炉火苗呼呼的燃烧声；男人和女人们的争吵声，还有好几个收音机一齐响，发出的讲话和音乐的混合声……我一边挑着眉毛做个嘲弄的鬼脸，一边向夏洛特看了一眼，无疑，她一下子就猜出了我这种笑容的含义。但这一大群醒了的蚂蚁，似乎并不使她感兴趣。

一直到我们到了草原上她才开口讲话：

“今年冬天，”她向我用法文说，“我给那个正直的弗罗斯娅送了一些药品，就是那个一看见加夫利里奇便第一个逃跑的

‘巴布什卡’，你知道她的……那一天特别冷，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那栋木屋的门打开……”

夏洛特继续讲，而我愈往下听便愈感到吃惊。我觉得她那朴素的语言充满了声色，气味以及在严寒的大雾笼罩下的光芒……似乎看到她正在使劲地摇着门把手，直到把门周围的冰框打碎后，那门才带着刺耳的声音勉强打开。她便来到那个大木屋的里边，站在一个很阴暗的楼梯前，她每上一个台阶，那楼梯便似发出抱怨的呻吟。走廊上堆满了旧衣橱，靠墙堆放着许多叠起来的厚纸板、自行车、褪了光的镜子，等等，把这一块深沉的空间搞得面目全非。燃烧的木柴味，在黑暗的墙壁上飘荡，然后便同夏洛特大衣褶子里带进来的冷空气混合在一起……直到二楼走廊的尽头，外祖母才看到了她，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正站在结满螺旋状冰花的窗前，只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微微低垂着，正在出神地瞧着门外边走廊上一个大火炉上火苗跳舞。布满冰霜的窗户外面，冬天的暮色正在慢慢地消失，天空清澈、湛蓝……

讲到这儿，夏洛特停了一下，然后便以一种犹豫不决的声音说道：

“你知道，这显然是一种幻觉……但她的面孔是那么苍白，那么清纯……就像覆盖在窗上的冰花一样，是的，她的面部轮廓上也点缀着这种冰花。我从未见过那么娇嫩的美，是的，那是一幅画在冰上的圣像……”

我们彼此沉默着走了好长时间，在蝉鸣声中，大草原已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但这枯燥的蝉鸣，这炎热的天气，都驱不走仍然留在我胸中的那个大黑木屋里冰冷的空气。看到了那布满冰霜的窗，那上面蓝色的结晶体，以及那位年轻的妇女和她的孩子。夏洛特是用法文讲的。法文也便打进了这栋木屋，

然而那里面阴暗的、沉重的、而且特别具有俄国味的生活却始终使我望而生畏。在它的深处，有一个窗户是亮着的。不错，她是用法语讲的，她也能用俄语讲。这一切，在再现的一瞬间，什么也不会消失。那么，世界上就可能存在着一种中介语言，即一种万能语言！我又想起了“处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事，那是由于我法文的口误才发现的……

也就是在那一天，一个使人兴奋的想法，第一次在我头脑中出现：“如果能够用笔头把这种语言表达出来，岂不甚好？”

一天下午，我们在苏穆拉河边消遣时，我突然想到了夏洛特的死。或者，不如说恰恰相反，我想到的是，她是否能够永远不死……

那一天天气出奇的炎热，夏洛特把她那双绳底帆布鞋脱了下来，然后把裙子挽到膝盖以上，便下到水里来了。我趴到一个小岛上，看着她沿着河岸在水中走。我又一次感到，她，和这条白色细沙的河岸，以及这个大草原，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距离与此非常遥远的地方似的。是的，就像被悬在一个热空气气球下面的大篮子里一般。这样所有的人和物都尽收眼底，从而我们也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往昔之中。是的，我处于这样一个虚幻的高度来看着她，我站在这样一个未来的角度来看着她，对于这个未来，我以我全部的青春力量去迎接它。她在水中带着少女般的梦幻漫不经心地走着，她那本翻开的书还留在柳荫下的草地上。在这一瞬间，似一道极快的闪光般，我重新看到了夏洛特的一生，那一切是那么清晰、明亮：本世纪初，她生活在法兰西，随后便是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的大沙漠，然后又回到无垠的雪原，接着是战争，最后定居在沙朗札……我还从未对一个活着的人的生活作过如此详尽的从头到



尾的审视，也自然没有像对她的生活那样说出一句：这种生活是封闭的。在夏洛特的生活中，除了这个小城沙朗札，这个大草原之外，已没有什么了，再有，那就是死。

我在这个小岛上站了起来，用眼睛盯着在苏穆拉河里缓缓走着的这位女性。突然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欢乐充满我的胸膛，我轻声对自己说：“对，她永远不会死。”同时，我也便立即产生了一个愿望，想明白自己这种公正的肯定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奇怪的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特别是这一年来，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我的亲人们相继去世。

但，我并没有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却反而在这一瞬间看到一股水流在令人眩晕地混乱中流淌着：一个充满薄雾的早晨，在一个晨光照耀下想象中的巴黎；带有薰衣草香味的风，直吹到火车车厢里来；“咕咕什卡”的啼声在傍晚温和的空气中回荡；在战争时期的一个可怕的夜晚，在那遥远的初雪之夜，夏洛特在窗下观望着天上穿行的飞机；而这些景象又同目前的景象相重叠——只见一个修长的女性，白色的方巾罩住她那灰白色的头发，这个女性正在漫不经心地走在一条清澈的河水中，这条河在无际的大草原上日夜不停地流淌着……

这些景象呈现在我眼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同时却又有着某种永恒的性质。我感到了它们的一种令人兴奋的可靠性，即：倘从神秘的角度看，这些景象使得夏洛特的死成为不可能。我推测，在那个阴暗的大木屋里，同那个站在覆满冰霜的窗户旁边的年轻女性相会，她便是附在冰上的圣像！甚至关于加夫利里奇的故事，那些芦苇，那些鱼苗，那天晚上的战争，甚至那两道短暂的光芒，都使得夏洛特的死成为不可能。而最为神奇的是，这一切都无需展示出来，无需解释，也无需论证。我看着夏洛特，只见她已上了岸，又回到柳荫下她所喜

爱的那个地方坐了下来，有如一件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我对自己又说了一遍：“是的，这一切的瞬间景象，将永远不会消失……”

当我来到外祖母身边时，她便抬起头来对我说道：

“你知道，今天早晨，我又为你重抄了两首波德莱尔<sup>①</sup>一首十四行诗的两种不同译文，你听我给你读一读，这样你可能会感兴趣的……”

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很使人感兴趣的文体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夏洛特经常在她读的书中找出来讲给我听，而大多数情况下，又都是以猜谜般的形式出现，于是我便全神贯注，很高兴能有这种展现我法国文学根底的机会。我甚至无法假设波德莱尔这首诗是否就是对我一个真正的解脱。

不错，在夏季的这几个月里，女人，做为一种持续不断的重压，始终强行压迫着我的各种感官。我在不知不觉中正经历着这种痛苦的转变，即把初期的那种肉欲之爱，经常是刚刚开始显露，便同随之而来的各种爱分离开来。这种过渡有时比从对女人的身体的无知向第一次接触女性的身体过渡时那种感觉更见其微妙。

甚至，在沙朗札这个使人堕落的地方，那种复杂的、不可捉摸的数不胜数的女性，也非常奇怪地到处都有。而且比在大城市的那种女人更加会奉承讨好、更加隐蔽，但却也更具有挑逗性。比如，有这么一位姑娘，有一天我在一条大街上同她迎面相遇，当时街道上满是尘土，被太阳照得炎热炙人。她高挑的身材，人长得姣好，正是在外省常见的身体健康、性感很强

---

<sup>①</sup>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

的那种女孩。她的上衣把那高高的、圆圆的胸脯裹得紧紧的。那条迷你裙把高耸而丰满的臀部也紧紧地包住，那双白色漆皮鞋尖尖的后跟，使她走起路来显得很挺。她那时髦的穿着，那一种化妆，以及那种一颠一颠的走路姿势，由于她在这条街上的出现，使这条静悄悄的街道平添了一种超现实的气氛。尤其是她肉感上过于丰满，几乎带有某种兽性的身体和她的动作，更是如此。然而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街上举目无人的下午，在这个沉睡的小城市里，这样的招摇过市，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何在？我禁不住偷偷地向后看了一眼：是的，她那强壮的双腿显出光亮的古铜色，那腰肢、那臀部的两个半球，每迈一步都非常灵活地摆动着。惊得目瞪口呆的我，心中暗想，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沙朗札，应该有那么一间房子、一张床，让这个躯体躺在上面，把双腿叉开，然后让它承受另一个身体。这一明确的想法使我沉浸于毫无止境的惊奇之中。似乎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又那么不真实！

还有，一天晚上，一条赤裸的女人胳膊，浑圆、丰满，出现在一家窗口。那是一条弧形小街，被浓密的一动不动的树叶所覆盖，那条臂膀非常之白、非常之圆，赤裸着直到肩膀，只见它摇摆了几秒钟，那正是在屋子里的黑暗处拉平纹细布窗帘的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战术可以使我承认，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些激动并且急不可待，但我却了解拉窗帘的这赤裸的胳膊，当时内心是如何想的……我甚至都能体验到这条赤臂在我唇上那种清凉光滑的感觉。

每当遇到一次这种情况，一种坚决的呼唤便在我头脑中响起：必须立即对这些不认识的女人进行引诱，把她们变成我的，使这一个个的梦想的躯体变成实在的灵肉，因为错过一次机会便是一次失败，便是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就是一次另一

个身体只能部分替代的空白。每到这些时刻，我的狂热便变得无法承受！

我从来不敢向夏洛特提起关于这方面的事。更不敢向她讲在驳船上那个一分为二的女人，或者我同那个喝醉酒的女舞伴过夜的事。难道她自己已然猜度出我这种魂不守舍的原因？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用不着去想象通过舷窗口看到的那个妓女如何动作，也用不着去想象那个棕发少女在轮渡上的情景，我觉得她便能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我的性爱活动已到了何种程度。在不知不觉中，通过我平时提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在某些问题上的回避态度，通过我对某些敏感问题故意显得若无其事的态度，甚至通过我在某些事物面前故意的沉默，我为自己画出了一个情场生手的画像。但却没有想到，我这样做正像一个想掩饰自己动作的人，却不料把自己做的动作的影子都映在身后的墙上了。

因此，当听到夏洛特谈到波德莱尔时，在那长诗的第一节中出现女性化的诗句时，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已：

一个秋日晴热的夜晚，当我把双眼合上，  
便呼吸到你热烈的胸脯发出的幽香，  
我看到欢快的海岸在我眼前伸展，  
一个火一般的骄阳照得它灿烂辉煌……

“你看，”外祖母把俄文同法文加杂在一起说，因为一边还要引用这首诗的俄文译文，“布鲁索夫第一行是这样译的：‘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闭上了眼睛时……’但是巴尔蒙却译成这



样：‘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当我闭上眼睛时……’依我的意见，这两位译者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把波德莱尔的诗文简单化了。因为你知道，在他的诗中，‘秋日晴热的夜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不是吗，时值深秋季节，突然，好像上帝的恩赐一般，那天晚上特别热，在阴雨连绵和困苦的生活中，那是唯一的，也是例外的有那么一片光明。但在他们的译文中，却违背了波德莱尔的思想，‘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闷热的夏天’，这太平淡了，失去了诗的灵魂，但在波德莱尔来说，这一刻可以是神奇的，可以比做秋末冬初时突然出现的温和天气……”

夏洛特发表她的译论，总是表现出一种稍带模拟色彩的业余爱好性质，这样便可以不甚显现她常常是非常广博的知识，并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骄傲情绪。但在我耳朵里听到的，却是她那时而俄语，时而法语的悦耳旋律。

现在，那种女人的灵肉，那种无时无刻都念念不忘女人，而且这些想法有增无减地缠绕我的现象没有了，我感到一种极大的平静。那个“秋日晴热的夜晚”显得极其清澈、明亮。一种徐缓的，几乎是忧伤的对女性胴体的冥想带来的宁静代替了我幸福而疲倦的爱欲。而这个肉感极强的胴体便扩充为一系列模糊的回忆，各种不同的味道，和各处耀眼的光亮……

在暴风雨尚未到达我们这块地方之前，河水便涨起来了，待听到河水冲击着两岸边的柳树根喇喇作响时，我们也感到有些震惊了。天也变成了青紫色，阴沉了下来。整个大草原似凝固般一动不动，呈现出一片铅一般的色调。一股刺人的酸味加杂着骤雨将来之前的凉意，向我们袭来。夏洛特一面整理我们在上面用午餐的大餐巾，一面用她的讲解收尾：

“但待到这首诗的最后，在最后一节诗中，译文出现了翻

译中真正的反常现象。布鲁索夫竟超越了波德莱尔！是的，波德莱尔写的是那个‘热烈的胸脯发出幽香’的岛上‘船员们的歌’，而布鲁索夫在翻译它时，却听到了‘船员们用数种语言呼喊的声音’，尤其绝妙的是，在俄语中竟能用一个形容词给它表现出来。必须承认，这种用数种不同语言喊出来的声音，可比那种略带矫饰的浪漫主义的‘船员们的歌’生动多了。你看，这就是那天我们所说的：‘散文的译者是作者的奴隶，而诗的译者，却是作者的对手。’另外，在这首诗中……”

她没来得及把话说完，河水便在我们脚下涌了上来，并且冲走了我的衣服，几页纸，还有夏洛特的一只绳底帆布鞋，充满雨水的天空一下子便坍落在草原上。我们匆忙地收拾尚能抢救的东西。我赶紧用手抓住我的裤子和衬衣，幸好它们在冲走时被几条柳枝挂住，同时也正好把夏洛特的那只鞋给挡住。那几张纸——抄下来的诗的译文，也被挡住了。不过，大雨很快就把它浇成一团团带墨汁的废纸……

我们并没感觉怎么害怕，因为震耳欲聋的雷声以其不及掩耳之势驱走了任何想法，倾盆大雨，打得我们身上直发抖，我们强烈地感到，我们那颗赤裸的心已被这水天相连的大雨给淹没了。

几分钟之后，大地又阳光普照了。我们站在陡峭的河堤上放眼雨后的大草原，只见成千上万彩虹般的雨珠在发着光，颤抖着，大草原也似乎在呼吸。我同夏洛特互相交换了一个微笑的目光，她的白色方巾丢了。她潮湿的头发打成缕披散在肩上，她的睫毛上似还沾着闪闪发光的雨珠，衣裙已然全部打湿，紧紧贴在身上，“不管怎么说，她还是那么年轻，而且漂亮，”这个不由自主的声音在我身上响起，它既不听命于我们，且还以极不得体的直率使我们感到尴尬，但却表明了话语反映

思想。

我们在铁路的路基前停了下来。远远地便看到一列长长的货车驶了过来，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地方经常停着一列喘着气的火车，一动不动地挡住去路，不过时间很短。这个大障碍物肯定通过信号机和铁道叉来控制的，似乎专在和我们开玩笑。那一节节车厢连在一起像一堵大墙，上面布满了灰尘，在阳光直射下的车厢皮辐射出一片热浪，再远一些，车头发出来一阵阵蒸汽声是唯一打破草原寂静的声音。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便想不待火车开走，便在车厢下钻过去，但都被夏洛特给挡住，她说，不能钻，因为她正听见车头在鸣笛。有时候实在等得时间太久了，我们就爬上那个时代的货车车厢上所特有的一种两边开门的平台，从这边上来，便从另一边下去。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充满了欢乐的兴奋，如果恰在这个时候火车开了，把我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奇特的地方，该怎么办？

这一次我们也不能再等了，两个人都湿成那个样子，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去。于是我第一个先爬上去，然后把手伸给夏洛特，她便蹬在脚踏板上，就在这个时候，火车晃动了，我们飞快地穿过平台，我还可以往下跳，可夏洛特却不行……我们只好在两个车厢中间的门洞里站住，但这个地方的风可是愈刮愈大，回头看看我们应该走的那条小路也已经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草原里。

不，我们并不为此而着急。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车站，在那个站上，另一辆火车将把我们这辆换下来，再继续开出。我甚至还觉得夏洛特对我们这次意外的遭遇抱有某种高兴的心态。只见她用眼睛看着被暴雨洗刷过变得焕然一新的草原，那一头长发在风中飘拂着，不时罩住她的面孔，她也不时地以一种极快的动作把它们甩到脑后。尽管天上挂着太阳，但极细的

雨丝却有时还在向下飘着，透过这闪亮的雨丝，夏洛特朝我微笑着。

在这个大草原上，突然发生在颠簸的火车平台上的一切，就像一个孩子，对一幅以杂乱无章的线条精心绘制的图画，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毫无所得地观察之后，忽然在其中发现了隐藏的人物或者是一件物品一样。他并且看出了，这幅画的图案包藏有一种新的意义，一种新的生活……

对我心灵的视觉来说，是一样的，即在突然之间我们看出它的意义来了！或者说，我是以我们全部的身心感觉到了这一条发光的纽带，它把这充满彩虹的一刻，同往昔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时光联系起来了。比如，那个遥远的夜晚，和夏洛特在一起时听到的那杜鹃的声声哀啼；又如那一天清晨，在想象中，在晨光照耀下裹着薄雾的巴黎；还有在夜间的木排上和我第一个爱人在一起时，那艘大客船突然向搂抱在一起的我们开来；还有我童年时经历的那些夜晚，如今想起已恍若隔世……这一切便都这样同现在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世界，有它自己的节奏、自己的空气、自己的阳光，几乎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一般。在这另一个星球上，这个有着灰色大眼睛的女性之死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个星球上，女性的躯体永远向着一系列梦幻的时刻所开放。在那个星球上，我那“令人吃惊的语言”，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星球，同我们这列货车所行驶的世界是同一体。是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车站，在那儿，火车终将会停下来一动不动。并且也有一个共同的寂静的站台，被骤雨冲得干干净净的站台，也有着为日常生活所操心的，那些极少数和我们相同的旅客。这个共同的世界，但在别人眼里却不一样。

我在帮助夏洛特下来时，想完成我这个“不一样”。是的，



为了看到这另一个星球，必须有非比寻常的行动。但需怎么做呢？

“你来，咱们吃点儿东西，”外祖母对我说，便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出来。说着，她便向车站侧翼的一家饭馆走去。

饭馆里空无一人，桌上也没有桌布。我们便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窗是开着的，可以看到周围种着树的广场。在建筑物的正面，可以看到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常见的歌颂党的光荣的标语，还有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标语……一位服务员向我们走来，以一种听了令人不快的声音说，暴风雨把电刮没了，因此饭店只有关门。我都准备起身走了，但夏洛特却非常礼貌地，用她过了时的客套话坚持在这里吃饭，我知道，这种借助于法语讲话的办法，俄国人听起来总是印象很深的。只见这位服务员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离开了，那表情很明显有些异样。

他给我们上的那道菜惊人的简单：一盘香肠，有十二小片左右；一条大酸黄瓜，都切成了薄片。就是这些了。然而却在我们面前放了一瓶酒，这种式样的晚饭我可从来没吃过。也许这位服务员也看出了我们一老一小这一对有点不太寻常，而尤其是吃着这样一顿冷餐未免有点滑稽。于是便笑了笑，一面小声抱怨了几句天气，以表示他对我们这种接待的歉意。

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凉风从窗外刮进来，带来一股树叶的潮湿味。天上是层层叠叠的灰色的云，现时已被夕阳照成了紫红色。外面不时传来汽车轮子在潮湿的沥青马路上滚动的声音。每喝一口酒便给这种声音和彩色平添一种新的情调：被雨水冲刷得湿润而沉重的树木、被雨水洗刷得干净明亮的橱窗、门面上的红色横幅标语、车轮在水地上发出的声音，以及依然是云层翻滚的天空，都使人平添一种遐想。我便慢慢地感

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空空的餐厅，已经开始脱离了现在、脱离了这个车站、脱离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和它的日常生活……

我头脑中满是沉重的树叶、门面上的红色标语、潮湿的沥青马路、汽车轮子转动的声音，以及这个灰红色的天空。待我转过头来，夏洛特已经不在……

此刻已经不是大草原深处那个车站旁边的饭店了，而是一家巴黎的咖啡馆，时间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依然坐在窗下，天上依然是灰红欲雨的云层，汽车依然在潮湿的沥青马路上轰鸣地行驶，依然是枝叶繁茂而湿润的栗树，广场那面是商店搭成的红色大帘子。二十年以后的我，刚刚辨认出这个彩色系列，刚刚体验过这个又重新出现的乱糟糟的时刻，现在又置身于此地了。在我的对面，是一位年轻的女子，以非常典型的法兰西风度，正在和别人随便交谈着什么。我打量着她面带笑容的表情，还不时地随着她讲话的节拍点着头。这位女子，是我的近亲，我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的思维逻辑，我也熟悉她全身的那种协调一致的动作……“如果我能够向她谈一谈二十年前在大草原上那个车站里当时那一刻，该多好呀！”我暗自思忖，但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

在二十年前那个遥远的夜晚，夏洛特已经站起身来，一面对着打开的窗户玻璃上反照的影子整理好自己的头发，随后我们便出发了。我的唇上还带着使人非常愉快的酒的酸味，却不敢说出这句话来：“尽管她头上已满是白发，又辛辛苦苦活了这么多年，如果说她依然还是那么漂亮的话，那是通过她的双眼，通过她的面孔和她的身材，显示出她光彩照人和美丽的天质……”

夏洛特走出车站，我跟在她后面，陶醉在自己那种难于启

齿的遐想中。草原上已是一片夜色，我童年时的沙朗札已然持续了二十个年头。

十年以后，我再一次见到夏洛特。仅只几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出国前的一次匆忙的会晤。那天晚上我到得很晚，而第二天我又必须很早就起来动身去莫斯科。那是一个秋末的冰雪之夜。那天晚上似乎把夏洛特一生中所有的生离之苦和所有的告别之夜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们一夜没有睡觉。她去准备茶水，我呢，便在她那间屋子里来回走着。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出奇的小，又由于那些熟悉的家具显得那么亲切，所以又非常动情。

当时我二十五岁。这次远行使我激动异常，我知道此行的时间较长。甚至可以说这次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要超过预定的两周。我觉得，我的出行将会打破我们这个麻木帝国的安静，它所有的人民将会对我的出逃加以议论。而在国境线那边，一待我的第一个行动出现，一待我的第一个讲话发表，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展现在眼前。我要去相会的那些新面孔、那些梦幻中的景色、那些危险的刺激等，我也已经历过了。

带着这种青年人自命不凡的傲气，我颇有点儿自得地问她：

“我说，你也可以到国外去嘛！比如说，去法国……这对你有吸引力吗，嗯？”

她脸上的表情一点儿没变。只是把双眼垂了下去。只听到水在炉子上的壶里丝丝作响，结晶的雪打在漆黑的窗上发出啪啪的声音。

“你知道，”她终于带着疲倦的微笑对我说，“当在1922年我到西伯利亚时，那旅程的一半，或者也可能有三分之一，都

是我徒步走下来的。那距离相当于从这儿到巴黎。你瞧，我根本不用坐你们的飞机……”

她又向我笑了笑，并用眼睛看着我。尽管她语气中颇带诙谐，但我觉得出，声音中带着强烈的苦涩。我觉得十分尴尬，便拿出一支香烟，走到凉台上去……

在那儿，置身于大草原冰冷的黑夜之上，我才相信，我终于明白了，法兰西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 第四章



来到法兰西，我几乎完全把夏洛特那个法兰西忘到脑后去了……

直到那年秋季，我同沙朗札的时代相隔了整整二十年。我懂得了这一时间距离的含义——懂得了这个神圣的“二十年后”的意义。那一天我们的广播电台正播送它最后一次俄语节目。那天晚上，在我离开编辑部时，头脑中想象着一片无垠的天地，那是位于这个德国城市和在雪原下沉睡的俄国之间的一大片开阔地。整个这片黑暗的空间，在头一天还回响着我们的声音，但自那以后便永远消失了。我觉得它似乎是处于空白波段的模糊的沙沙声中……这种旨在煽动叛乱和颠覆的广播，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大雪覆盖下的那个帝国苏醒了，已经向外界打开了大门。这个国家不久即将改变名称，更新体制，改写历史，重划边界。另一个国家将在这里诞生。因此便不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便把这个电台关闭了。但同事们故意吵吵嚷嚷互相热情地道别，然后便各奔东西。有的人想就地另谋生路，有的人卷起行李到美国去了。还有一些人，不太讲究实际，还梦想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冰天雪地的国度去生活……但没有人存有幻想。我们晓得，这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电台，而且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从前所言、所写、所想、所保护并为之战斗的一切，还有我们所爱、所憎、所怀疑的一切，都属于那

个时代。于是我们便站在这个真空世界的前面，正像蜡像馆里的那些蜡人，已成为这个行将就木的帝国的殉葬品。

坐在去巴黎的火车上，我思考着想给远离沙朗札的这二十年起一个名字，以流放的方式生存？醉生梦死的生活？半生已过，一无所成？这些年来，究其生活的意义，我觉得是阴暗的。我试图把它改变过来，改变成有肯定价值的那种生活意义，即这种生活环境的改变有使人愉快的回忆（我带着孩子般的骄傲，心中暗想：“自那以后，我不是看到了整个世界吗！”），有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娇躯作陪……

但这种回忆依然显得平淡乏味。那些女人的身躯，也出奇的了无生气。有时这些身躯只不过像人体模型一样，但却带着惶恐的眼色刺穿人们记忆中的昏暗。

不，这些都不准确。这二十年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旅途，在其中，我逐步地寻到了归宿。这个归宿，在我出发时曾经设想过它，或者在旅途上，甚至某天，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城市中，须要解释我的到来时，我方始设想它。

是的，这是一个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一旦我停留的那个地方开始使我留恋，开始使我的日子变得惬意时，我又必须动身离去了。这种旅行只有两个时刻，一个是到达某一陌生城市的时刻；一个便是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刻，这时，这个城市的街道和门面才刚刚开始在你的眼里变得有了活力……我到慕尼黑已经半年了，走出车站时，我的想法特别实际，即首先要找一个旅馆，然后再找一套离我工作的电台最近的房子……

来到巴黎，正是清晨，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是真正地回来了：在离车站不远的一条街上，这条弥漫着清晨薄雾的大街，此刻尚未完全从睡梦中醒来，我见到一个敞开的窗，房间里一



片朴素、平常的宁静，但对我来说却有点儿神秘，桌上那盏灯还亮着，一个木制老式的五斗橱，已经发暗，墙上一幅画也有点儿歪斜了，我为这种似隐似现的温馨所打动了，突然一种古老和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登上台阶，敲开房门，认出一个熟悉的面孔，然后便自我介绍……我匆忙地把这种久别重逢的幻觉驱散，因为在这中间，我看到的，只有一个游子精神上的失落感，此外无它。

生命很快便枯竭了，时光也停滞不前，今后唯一可感知的，是鞋跟在潮湿的马路上的磨损，是旅馆走廊上被风吹来的接连不断的嘈杂声，但不久也便被心灵所接收，从而变得习以为常了。我那个房间的窗户正朝着一个被拆除的建筑物，一堵废墙上面贴着彩色糊墙纸，孤零零地立在砂砾中。在有彩色的这一面，上面有一面镜子，没有框，里面反映出蓝天上淡淡的、变化莫测的白云。每天早晨我都想，如果我能绕开围墙，自己变成镜子里的映像就好了。这个清晨的悬念，使得凝固的时光也有了节奏，我也对这种日子逐渐习惯了。甚至这种想法，有一天也要同这种生活一起来结束，也要同把我和这个秋天联系着的、和这个城市联系着的那一点点关系绝断，尽管这种想法不久我便习以为常了，但它却可能要我的命……一天早晨，我听到一种泥土倒塌的钝声，在围墙后面，那堵废墙的地方，我看到尘土飞扬处，已是一片空地了——那种想法，在我看来，就像一场游戏般神奇地结束了。

几天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其时我正坐在一个林荫大道的树荫下的一条凳子上，天上正下着朦胧细雨。在高热中有些迟钝的我，觉得自己身上正有一个受惊的孩子同一个成年

人进行无声的对话：那个成年人，自己还在惶惑不安的状态下，却企图安抚那个孩子，故作诙谐地说着话，却明显地看得出是假做出来的。这个带着鼓励的声音对我说，我应该站起来，再到咖啡馆里去喝上一杯酒，并在那里暖和上一个小时。要么，便到温暖而湿润的地铁去，或者干脆再到旅馆去住上一夜，尽管身无分文，无法付房钱。或者，在必要时，还可以到街角上那家药店里去，进去便坐在皮椅上，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待到人们走过来围住我时，我就压低声音轻轻地嘟囔说：“让我安静一会儿，让我在这种灯光下和这么暖和的地方，只呆一分钟就行了，随后我就离开，我向你们保证……”

刺人的冷空气在林荫道的上空凝结了，然后形成了细雨，很有耐心地下着。我于是便站了起来，那个安慰我的声音没有了，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像被裹在一团灼热的棉絮里。我躲开一个手挽着一个小姑娘迎面而来的行人，我怕我这个火烫的面孔和全身冷得发抖的样子吓着那个孩子……我想横穿马路，脚却一下子绊在人行道的边上，我便像个走钢丝的演员一样伸出了双臂。一辆汽车驶来，赶紧刹闸，才险险地避开我。我觉得车门很快地碰了我的手一下，司机很不高兴地放下车门上的玻璃，向我骂了一句粗话。我看到了他那愤怒的脸色，但那骂人的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却出奇地缓慢。与此同时，一种思想，由于它的朴素，简直使我着了迷：“这实在是我命中注定的，尽管是这么一撞，和金属碰了一下，但却很猛烈，这一撞可以撞碎头颅，撞断喉管，撞破胸膛，只要这么一撞，立刻便一声不响了，而且一劳永逸。”响起了几声哨子，于是我便荒唐地想，大概是有个警察向我追上来了吧，于是便加快脚步，在潮湿的草坪上困难地向前走。我感到窒息，此刻我眼花缭乱，只见许多金花在我眼前闪现，我恨不得像个动物一样钻进地洞里。

前面有一个大开的公墓大门，在它后面是一条宽阔的林荫路，路上雾气沼沼，空无一人，我便跑了进去。给我的感觉就像在两排树间游泳一样，又似沐浴在傍晚晦暗的空气中一般。突然间林荫路上响起了刺耳的哨声。我便拐到一条较窄的通道上去，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滑倒，随后便跌进一大堆奇怪的灰色方块一样的东西里。我实在没有力量了，便蹲在一个方块的后边。哨子响了这么一会儿，然后便不吹了。远远的，我听到那个栅栏门在响。在那个多孔的方块壁上，有几个字，并非一下子就能了解它的含义：“终身特准，第……号，18……年”

在树林那边的一个地方，哨声又响了起来，同时还有人在谈话，只见有两个男人，两个看门人走上了林荫道。

我便慢慢地站了起来。由于疾病初起时那种疲劳感和昏沉感在起作用，我觉得在我眼前有一个微笑着的映象在说话：“嘲弄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物事的自然属性，它同万有引力定律有同样的地位……”

此时墓园里所有的门都已关上。我绕过那个墓碑龕，原先我就是在那后边滑倒的。它的玻璃门一下子就让我推开了，我甚至觉得这个神龕里面可以说得上是宽敞的，石板地面上除了尘土和几片枯叶外也很干净。并不潮湿，此刻我的双腿已然支撑不住了，便坐了下来，随即便四肢伸开躺在了地上。黑暗中我的头碰到一个木头东西，用手一摸，是一个祈祷用的跪凳，于是便把脖子枕在它的丝绒面上，奇怪的是，它的表面似乎挺温暖，好像刚才有人在上面跪拜过……

头两天，除了出去找点面包和洗洗脸外，我一直呆在这个避难所里。出去后也便立即回来，又躺在地上，在高热中处于迷糊状态。只有在墓地关门时，那几声哨子，才能把我从昏迷

状态中惊醒几分钟。只听那个大栅栏门在雾气中嘎嘎作响。于是世界便缩小到只有四面墙那么大的范围，那个冰凉的石墙，我可以把双臂交叉成十字状碰到它；缩小到只能看到毛玻璃门上反映出的映象；缩小到能听到石板地下和我身体下面那寂无动静声音……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头脑很快就变得糊涂了。只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感到似乎好了一点儿，便在阳光下眨着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正在回……回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家！是的，我是这样想，却很惊奇于这样想，便禁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便是一阵大咳，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样便惊动了旁边的行人，纷纷转过身来看我，那个墓碑龕，建造了已有一个世纪；把位置选在墓地上人最少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著名的、须众人前去凭吊的坟墓，只有一个——我的家。我惊愕地想，“我的家”这个词，自我童年起，我就没用过……

就在那天下午，秋天的阳光也照进了我这个碑龕，我便开始读镶嵌在墙上的那些大理石板上的铭文。实际上，这是属于贝尔瓦尔和卡斯特罗家族的一个小教堂，大理石板上刻的简洁的铭文，介绍了这个家族的历史。

当时我还很虚弱。我坐在石板地上，每读一两段碑文，便像干了很重的活儿一样，气喘吁吁，而且头晕目眩，脑袋里嗡嗡作响。上面写着：“1837年9月27日生于波尔多，于1888年6月4日逝于巴黎。”这些日期已经把我搞糊涂了，我只能神思恍惚地读着它们。“1849年3月6日生，1901年12月12日一命归天。”在这两个年代之间，在历史上和文学上充满了谣传、阴影和动乱。我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形象，这些形象犹如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芒刺般，刺得我疼痛。我似乎听到了那位登上一辆马车的夫人她那长裙的窸窣声。她在这一简单的动



作中把那些曾经生活过、爱过、受过苦的不知名的女性们往昔岁月集中在一起了，这些女性，曾经凝视过这里的天空，曾经呼吸过这里的空气……我也曾切身地感觉到那位身穿黑衣的显贵一动不动的拘束，他面对的是，天上的太阳，外省一个大城市的大广场，各种讲演，全新的共和国标志……战争、革命、人群的拥挤。一道闪光、一个声音、一支歌曲、一声礼炮、一首诗、一起轰动的事件，接着便是一连串生死时间表竞相奔来：“她于1861年8月26日生于比亚利茨，1922年2月11日逝于万塞纳……”

我从一段墓志铭到另一段逐个看下去，其中有：“女皇金龙号船长、师长、历史画画家；法兰西武装部队驻非洲、意大利、叙利亚、墨西哥武官、总督、行政法院分庭庭长、女作家；法国元老院掌玺大臣、步兵224师副师长、棕榈叶十字勋章获得者；为法兰西殉难者……”这些都是那个从前曾在世界各个角落都闪光的帝国的影子……。这些铭文中的人物距今时间最近的，自然也是最简短的：“法兰西女性，1952年11月2日——1969年5月10日。”仅只16岁，其余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我坐在石板地上，闭着双眼。感到这些生命都在我身体内震荡。我并不企图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便喃喃自语：

“我能猜想到他们在世时和去世时的氛围。也能猜到那个1861年8月26日出生在比亚利茨的女性的神秘。这样一种生命本身就有不可思议的独特个性，却又恰恰在比亚利茨<sup>①</sup>。现

---

<sup>①</sup> 比亚利茨：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首府，该地气候宜人，适于海水浴。该城市之所以出名是因欧热尼·德·蒙蒂若在当皇后之前曾在那里住过，在当了皇后之后，又于1854年同拿破仑三世再次访问该地，便更加出名。

在距那一天已一个世纪有余了。我感觉到那副在 1969 年 5 月 10 日便消逝的面孔的憔悴，我从她身上感到有一种存在在我身上的那种激情……这些陌生的生命，和我都非常贴近。”

我在半夜里出去了。这一带的石围墙并不太高。但我大衣的下摆却被固定在墙头上的铁尖给挂住了。我几乎一个跟头栽下去。在黑暗中路灯柱上那一点蓝色的光，构成了一个问号。我跌在一层厚厚的枯叶上。这一跌，使我觉得时间特别长，似乎在飞机上正在向一个陌生的城市降落，在这个黑暗的时刻，这个城市的房屋恰像一个荒城里的遗迹。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树林味。

我开始向一条寂静无人的大街上走去，此外我所走过的所有街道都动起来了，好像要把我推向这个黑暗大城市的深处。迎面开过来很少的几辆汽车，似乎都在全速开动以逃出这个城市，我在它们面前径直前行。一个流浪汉正在他当被子用的纸板壳下翻身。只见他向外探了探头，对面玻璃橱窗的反光正照在他脸上。他是一个非洲人，双眼呆呆的，似有些精神疾患，人还镇静。我听到他在讲话，便向他俯下身去，但我什么也听不懂。自然，他讲的是自己国家的语言……给他当被子用的卡通纸上面画满了潦草难认的字。

当我穿过塞纳河时，天空已变成鱼肚白色。我像个梦游者一样走着，已经有那么一会儿了。病后恢复期的那种狂喜也已消失。我的感觉是，自己依然在一片房屋的浓重阴影中踟躇而行。由于头脑依然昏迷，便觉得眼前景物有些变形，并在我周围旋转。码头上和河岛上一排排的建筑物，就像在已熄灭了的聚光灯前，黑暗中巨大的电影布景一般。此刻我已记不清自己何以要离开那个墓地。

走在木桥上，我不时地转过身去探望，因为我总觉得背后

响着脚步声。有时又觉得太阳穴上的血管跳动得更厉害了。我转了一个 180° 的大转弯，因为我好像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身穿长裙在一个拱门下悄悄地走着。我已然没有了力气，便靠在一堵墙上站在那里。世界似乎解体了，墙壁也在我手掌下倒塌，窗户也在房屋的灰白门面上掉了下来……

那几个刻在已发黑了的金属板上的字，像中了魔法般出现在我眼前，我被它上面的前言所吸引了：一个决心沉湎于酗酒和纵欲的男人，却突然被一句内容平庸，但尚无错误的格言所打动，于是便就此打住，没有堕落下去……该金属板固定在地上有一米深：那上面的题词我看了三四遍：

洪水 1910 年 1 月

……这并非是一个记忆，乃是生活本身。不，我不愿再生，我愿长生。看起来，这种感情非常之卑下。夏日之夜悬在空中的凉台上身靠木栏杆时的炎热；枯草败叶那种干燥刺人的气味；一辆火车自远处发出的忧伤鸣叫；坐在花丛中那位女性膝上的书本，在翻页时发出的瑟瑟声；她那灰白色的头发，她那声音……此刻，书页翻动声同她的声音混合成柳树长长的枝条的摇曳声——我正生活在阳光下一望无际的草原里那个河边上，我看到那个头发灰白的女性，沉浸在清澈的梦境中，慢慢地在水中走着，她显得那么年轻。这种印象曾使我在列车车厢交接的平台上激动万分，当时列车还在时晴时雨的草原上飞驰。那位女性，就站在我面前，一面向后甩着她额前的头发，一面向我微笑，她的睫毛在落日的余晖中放出虹彩……

洪水。1910 年 1 月。我听到了雾气中的寂静，听到了一

只小船划过时流水的汨汨声。一个小女孩正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看着被洪水淹没的大街上那面灰白的反射镜。我正真切地生活在本世纪之初巴黎的一幢极大的套房内，静享着那安宁的清晨时光……而这种清晨，正带着被秋叶染黄了的林荫大道上砾石的沙沙声，一个一个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三个女人，一律身穿黑绸长裙，长发上罩着轻纱，插着羽毛，正渐渐地走开，似乎正把那个短暂的时代中的一瞬间及它的太阳和空气都带走……又是一个清晨，夏洛特（现在我已认出她来了）正在她的童年时的纳伊，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走在喧闹的大街上，正带着羞怯的欢快充当向导。我觉得在每一条大街上，都能看到清晨明快的光线，看到每一片树叶的抖动，也都能猜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在那个男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而街头的景色，在夏洛特的眼里又是那么熟悉。

在那个时刻我明白了，夏洛特的那个阿特朗蒂德，在我童年时起，就只让我模糊地见到它永恒的瞬间那种神秘的协和音。这些永恒的瞬间，自那时起，在我不知不觉中，便在我的生活旁边勾勒出另一种不为人所见的、也难以言传的生活。这恰如一个细木匠，用整整几天的时间刻出了椅子的四条腿，或者刨出了一些木板，都没有想到落在地上的刨花却也能组成一个用树脂合成的闪闪发光的漂亮的装饰品，并且以其光亮透明吸引着人们。今天，是可以穿过狭小的窗户进入一个堆满工具的房屋的阳光线，而明天，却是淡蓝色的雪的反射光。

正是这种生活，它现在所显示的，是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必须使它在我身上开出花朵，尽管我还不知怎样才能做到。必须通过记忆这一默默无闻的工作，记住这些瞬间的波段。要学会在日常的活动中，在平庸、麻木的语言中，保持它们的永恒性。生存，便是自觉认识这种永恒性的手段……



我回到墓地时，正是它关门之前。夜色很清明，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便开始在我久已不用的通讯录小本上写了起来：

“我在坟墓外边的生活是理想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发现这种生活中的主要东西，而且还是为了使它再现，并使之保持一种有待推敲的特色。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特色今后将成为我生存的方式。除了让这些永恒的瞬间在一页纸上再生之外，我没有其它的生活……”

由于纸张不够用，我的宣言，不久即告中断，而写作一向在我的计划中又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信条支配下，我确信只有拿起笔来写出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管是在墓地上，还是在坟墓外。

我举出某些人的哮喘和另一些人的癫痫，以及还有一些人遭到流放，被关在比地下室还要深的地窖里，都能写出作品……但从事这一职业的这种夸张信念，很快就无影无踪了。代之而来的，是我第二天用我兜里的最后一点儿钱买来的那本当草稿本用的本子。在第一页上我只简单地写道：

### 夏洛特·勒莫尼埃传记

当天早晨，我便永远离开了贝尔瓦尔和卡斯特罗家族的这个墓碑龕……半夜里，我醒了。一个不可能实现，但却很强烈的想法像一个曳光弹一样刚刚在我的头脑中划过，我应该大声把它们说出来，以便衡量一下它那非比寻常的现实性到底如何：

“夏洛特现在是否还活着？……”

处于惊慌失措中的我，想象着她从屋里走到摆满鲜花的小小凉台上，然后坐下低头看着一本书。已经有好多年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沙朗札的消息了。夏洛特可能继续像从前那样活着，像我的童年时代那样活着。那么，现在她应该是 80 多岁了，但这个年龄却在我的记忆中没起多大作用，她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是原来的她。

于是一个梦想便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也许正是这个梦想的光晕把我惊醒，即要找到夏洛特，让她到法国来……

这个由那个躺在墓碑龕里石板地上的流浪汉所设想的计划的不可实现性是十分明显的，只要看看连我自己都不打算对此加以论证，就足够了。不过目前我已决定，对这一计划的细节不予考虑，把这一不够理智的想法每天都放在心上，以这一想法作我生活的支柱。

那一夜，我一直没能入睡。于是披上大衣便走到外边，秋末冬初的天气，温暖的气候已让北风刮走，我站在外面，仰望着天空那低低的云层在慢慢地变成灰白色。我想起了，有一天，在开一个并不开心的玩笑时，夏洛特说，在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她长途跋涉过那么远的路程，如果说，再让她步行去法兰西，对她来说当不在话下……

一开始，在那漫长的几个月中，由于痛苦兼到处流浪，我那个狂热的梦想，很近乎一种可怜的虚张声势。我想象着一个身穿黑衣的女性，在一个阴沉的冬天的清晨，来到一个边境的小城里。她大衣的下摆溅满了泥浆，那一方大披巾上结满了冷霜。只见她来到一个还在沉睡的狭小的广场上，推开角落上一家咖啡馆的门，然后便坐在一个靠暖气的窗下。女老板给她送来一杯茶。那位女子坐在窗下，一边打量着外面房屋宁静的门

户，一边低声自语道：

“这就是法兰西，……我又回到了法兰西，然而……然而，整整一生却也已走完了。”

## 二

从书店出来后，我便横穿城市，并走在阳光照耀下宽阔的桥面上。这时我便想，在一些老电影中，就有那种很好的老式手法，即在几秒内就可以给那些主角几年的生活来一个鸟瞰式的概括。这时银幕上的画面突然中断了，在黑色的背景上出现了字幕，而那毫不绕圈子的直爽语气，总使我感到高兴：“两年以后”，或“三年以后”。但是在今天，谁还敢使用这种过了时的手法呢？

然而，就在一个外省的这座由于炎热而变得沉闷不堪的城市里，当我走进那家书店，并在书架上选完我最后一本书时，我恰有三年过去了的感觉。那座墓地，和那个贝尔瓦尔和卡斯特罗家族的墓碑龕，同现在被屋顶的彩色广告牌上所宣传为最新出版的“法国小说”的这本书之间，正是这么长的时间……

傍晚时分，我到了朗德<sup>①</sup> 森林区。我想，现在我要在这被松柏覆盖的幽谷中走上这么两天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以便感应一下像这里的海洋那样那种永久的期待。两天两夜……为了那篇《传记》，时间对我来说十分紧迫。生活在夏洛特往昔的日子里，却使我觉得对“现在”的感应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正是这些往昔景色，它们给针叶树丛中这一方蓝天，给这块为琥珀色的落日晚霞映照得彩色斑斓的林中空地以一种奇特的鲜

---

<sup>①</sup> 朗德是法国西南部地区名和省名。



明色彩……

早晨，我又上路了（有一棵树干被划破的松树，我头一天晚上并没发现，树身上流出了它的眼泪——树脂，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宝石”），在路上，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书店里那一面书架，上面标明：《东欧文学作品》，其中我的早期出版的几本书也在上面，紧紧地排在那儿，同莱蒙托夫<sup>①</sup>和拿波科夫<sup>②</sup>的书摆在一起，这便给了我一种妄自尊大的诱惑。对我来说，我那些作品，乃是纯粹的、简单的文字上的故弄玄虚，因为那些书都是直接用法文写出，而且又是被编辑们拒之门外的作品，我被称为“一个开始用法文写作的俄国怪人”。在绝望中，我杜撰了一位译者，把我的手稿寄到编辑部去，说那是从俄文作品中译出来的。于是那部作品便被采纳并出版了，而且其译本，大都受到欢迎。我心中暗想，开始是辛酸，随后是笑颜，但我那法——俄双重身份的厄运却始终没变。只不过，如果在孩提时代，被迫掩饰我的法国血统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的俄国血统又受到了指摘。

晚上，在躺下睡觉时，我又重读了一遍《传记》的最后几页，头一天写的那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在夏洛特住的那栋住宅对面的一栋大木屋里，一个两岁的男孩死了。我看到孩子的父亲把一个长方形上面盖着一块红布的盒子靠在门前台阶的扶手上了，那是一具小棺材！其体积大小像个玩具一样，使我感到很害怕。我必须立刻在这片天底下，在这块地上面，找到一个地方，以便在那里我能够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活着时的情景。一个比我还小的人死去，就应该对这个世界重新提起诉讼，我

---

①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家。

② 拿波科夫：20世纪初俄国作曲家，作品有《颂歌》，《放荡生涯》等。

匆匆地向夏洛特跑去，她看出了我的悲伤，便对我说了一件事，却使我大为惊奇：‘你还记得，在秋天我们看见的那些候鸟吗？’

‘是的，’我回答说，‘它们在我们头上飞过，然后就不见了。’

‘对，但它们还是继续飞下去，飞到别的地方，飞到很远的国家，只不过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眼力太差，看不见它们罢了，对于那些死者，也是同一个道理……’”

在睡眼朦胧中，我似乎觉得外面树枝的晃动声比平时强烈而且声音清晰，好像风一直在不停地刮。清晨醒来我才发现，那原来是大海的涛声。头一天晚上，由于旅途疲乏，便不知不觉地停留在这儿，那一片树林也便消失在这里的沙丘里，经受着波浪的冲击。

我在这片无人的海堤上停留了整整一个上午，观察着海水难以察觉的上涨……当海水开始退潮时，我又开始上路了。赤着脚走在潮湿粗糙的沙石中，我现在是向南而行。一面走，我一面想着，在我们童年时，我姐姐和我把它称之为“新桥皮包”的这个小包，里面装着用一张纸头包着的许多铁石小块，其中有一块叫做“费岗”，一块叫“维尔顿”，还有一块叫“比亚利茨”的，这个名字，当时让我们想到的是石英石，而不是当时我们不认识的那个城市……我沿着大海走了十一二天，以便再次找回那个城市，其中有极小的一方天地迷失在俄罗斯大草原深处的某一个地方。

### 三

直到九月份，通过某一位名叫阿莱克斯·崩的人从中传递，我才得到沙朗札的第一批信息……

这位“崩先生”实际上是一位俄国商人，是那些“新一代俄国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人，当时已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开始崭露头角，常把自己的姓名搞成美国式，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弄成和侦探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一样，或者和五十年代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的名字相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曾向阿莱克斯·崩，也就是阿列克塞·班达尔丘克建议，不如把他的名字改成法国式的，就叫做阿莱克西·托诺里埃。比现在把个名字搞得支离破碎的要好。但他却板着面孔向我解释名字短一点儿，有几个谐音，在商务活动中的好处等等……当时我们的印象是，通过和这些名字叫“崩”、叫“孔德拉”、叫“费”的人的联系，我对俄国是愈来愈不理解了……

他是去莫斯科，由于被我的亲情所感动，便同意绕这么个弯子替我办这件事，去沙朗札，在那儿的大街上走一趟，同夏洛特会面，我觉得这样做比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走一趟更显得奇特。阿莱克斯·崩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根本不问一问夏洛特同我是什么关系。他在电话里同我讲话，就像假期结束后互相交换情况一样：

“哎呀，那个沙朗札是个什么鬼地方呀！不过多亏了您，我才能发现内地的俄国是个什么模样。啊哈，那个城市，条条

街道都通草原，而那个草原又没边没沿……她非常好，您那位外祖母，请放心吧。是的，她现在仍然很积极，我去找她时，当时她并没在家，邻居告诉我，她去参加一个什么会了。他们那栋建筑物里的居民成立了一个支援会，或者别的什么会，是为了保住他们那个街区要被拆除的一栋老木屋，那是一栋很大很老的木楼，已有两个世纪了。因此，您的外祖母……不，我没见到她，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要赶到莫斯科，但我给她留下了一张条子。你可以去看她，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入境了。哈哈，哈哈，铁幕已不再是一架过滤器了，正像人们说的……”

我所有的，只是一份避难证明书，再加上一份旅行准许证，上面规定，我可以访问“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在我同那位“新一代的俄国人”通话的第二天，我便去巴黎警察局打听关于入籍手续事宜，我尽量保持沉默，不把我头脑里的这个想法讲出来：“从今以后，一定要同这个看不见的时间赛跑，因为夏洛特已到了这个年龄，即每年、每月都可能是她最后的时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既不想给她写信，也不想打电话。我有一个迷信的想法，怕说出某些不吉利的话影响了我的打算。当务之急是尽快地取得法国护照，前往沙朗札，同夏洛特痛快地谈几个晚上，然后把她带到巴黎来。我好像看到了，这一切行动，都如梦幻般简洁、快速地完成了。但是，突然间这个形象模糊了，我处于一团浆糊之中。它把我的行动给粘住了，那就是时间。

当局让我准备的档案材料很使我放心：没有一份找不到的材料，也没遇到任何官僚主义的为难。只是去医生处检查身体给我留下的印象颇为不佳。检查总共只用了五分钟，而且总的来说也非常粗略，结果是我的身体状况基本可以加入法国籍。



在作完听诊后，医生告诉我让我弯腰，两腿同时绷直，伸出双臂以手掌触地。我照做了。但由于做得太认真、太快，使得身上有些不舒服。医生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便低声说：“谢谢，好了。”看样子就如同害怕我再做这种弯腰的动作一样。通常情况下，在我们相互的态度中，只要有很小的一点儿示意，便足以把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一般内容表达明白的。比如像这一次，在一间狭窄的体检室内，一盏白炽灯的直接照耀下，两个男人在那里，其中一个突然弯腰伸臂双手触地，几乎要碰到另一个人的脚，而且还那样一动不动地停一会儿，似乎在等另一人认可一般，这会使人感到尴尬的。

当我来到大街上时，想起了集中营，在那里也做类似的体能测试，以挑选有某种用途的战俘。但我这种比较有些过分了，并不能解释我心中不快的原因。

我想，这是一种虔诚，我以虔诚之心完成了对方的要求。在翻检我的档案资料时，我又发现了这种虔诚。我发现所有的有关资料上，那种极力想使对方相信自己的痕迹随处可见。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要求我这样做，我还是经常提到我出身于法国的遥远往事。是的，我提到夏洛特时，那意思就是要预示那些所有反对意见的人，并事先消除他们的怀疑态度。而时至如今，我已不能摆脱那种似乎在某些方面背叛了夏洛特的心情了。

还需几个月的时间要等待。他们给了我一个期限，即要到五月份才行。我立刻便感到这个春天的日子已经充满了光明，尽管这件事还相当不现实。但毕竟不是月复一月地往下推，而且这一段时间也可以做为一个特殊的空间世界，它将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气氛。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准备期，特别是一段可以同夏洛特进行悄无声息的长时间对话的时期。现在，走在大街上，我的感觉是在用她的眼睛来观察一切，像她曾经看过的那样去看这个静悄悄的码头。只见码头上的垂柳，在一阵春风吹拂下，似接受了一个悄悄的重要的信息；像她曾经感受过的那样去感受这个古老而狭小的广场街面上发出来的声响，而巴黎的这种像外省城市一般宁静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的向往，一种过平静生活的愿望。

我晓得，我在巴黎居住的这整整三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实施我的打算，尽管进行得缓慢而慎重。自我感觉到那位黑衣女性步行来到那个边境的小城之后，我的梦想便从她那模糊的面孔转到比较现实的景点上。我觉得自己已到车站上去迎接外祖母了，并且陪同她来到旅馆，她在巴黎居留时间就住在这里。随后，一待最阴暗，最痛苦的那段时期过去，我便开始设想为夏洛特安排一个比旅馆里还要舒适的房间，以让夏洛特住在那里更舒服些……

可能正是由于我能够有这许多的梦想，所以这许多灾难和屈辱常常是很残忍的，它们陪着我在这个世界上迈出了头几步。而这个世界上，书籍这个我们人类最脆弱的部分，却变成了商品。而一件待拍卖的商品，如果摆在普通的旧货摊上，就只能廉价出售。我的梦想便是一副解毒剂，而我写的《传记》则是一个避难所。

在这等待的几个月中，巴黎的地形图有了改变。由于在某些地图上，巴黎的各个区都以不同的颜色标出，因此整个巴黎市区的地图便满是夏洛特在巴黎时的各种不同的色调。甚至有些街区，在清晨宁静的朝阳照耀下，还保留着她的回声。咖啡

馆的平台上似乎还有她散步后疲劳时坐下小憩的座位。每一个门面，每一个彩绘玻璃窗，似乎在她的眼睛中依然保留着原来那种模糊的淡淡的色彩。

这个想象中的地形图，在各个城区的彩色图上留下了许多无色的空白点。夏洛特到来时，我们在巴黎逗留时的参加路线应该十分小心地避开近几年来建筑学上大胆设计的某些建筑物。而她在巴黎居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我们没有时间让这些新型的金字塔、玻璃塔、大拱门，在我们的眼里变得很驯服。它们的影子将在一个奇特的，未来主义的明天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但绝不能搅乱我们散步时保留的那个永恒的现在。

我也不想让夏洛特看到我居住的那个地方……当阿莱克斯·崩到我的住处同我会面时，惊讶而挖苦地说：“您听我说，真是些好人，这地方哪里是法国呀，这是在非洲嘛！”他曾经发表过一通演说，它的内容和许多“新一代俄国人”的话一般无二。诸如：西方的蜕化，白种人的行将就木，新蛮族即将入侵（“也包括我们这些斯拉夫族人”为了讲得全面，公正，他补充说），一个新穆汗默德“将会把你们彬彬有礼的民主给予结束”等等。我们就坐在咖啡馆外面的平台上，他受到在平台前面不断走过去的有色人种的启发，便把他那可怕的预见，同“由于野蛮人年轻后代所致，将会造成一个新生的欧洲”这一话题混合起来，把希望能发生一次全面的，国际性的科技战争，同全世界人种杂交问题混合起来……这个问题很使他感到兴奋。他可能一会儿站在垂死的西方世界那边考虑问题，因为他的皮肤是白的，他的文化是欧洲文化，一会儿又站在新鞑靼人那边考虑，“不，你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而来自地中海国家的外国佬还是太多了！”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但却忘了，在一分钟之前，他还把拯救旧大陆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外国

佬”身上……

我们梦想中的散步，绕过了这个区，以便不使该区的居民同夏洛特那条敏感的神经相碰。作为一个出色的侨民，她一直生活在极端众多的民族中，同各种文化和各种语言接触。从西伯利亚到乌克兰，从俄罗斯北部到大草原，她对这个帝国所拥有的这些多种民族非常熟悉。在战争时期，她又在医院里同他们广为接触。在死亡面前，她和他们是绝对平等的，那种平等是一丝不挂的，像被解剖的尸体一样。

不，在巴黎的这个老区并不是这里那些新的居民会使夏洛特感到惊奇。我之所以不带她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你走遍所有街道都听不到一句法语。在那里看到的，是那种异国情调，听到的是一个新世界的许诺，或者是对灾难的预言。而我们，却不是建筑学或人文学上的异国情调的追随者。我想，我们生活环境的这种改变将是深刻的。

我准备向夏洛特揭示的这个巴黎是一个不全面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虚幻的巴黎。我记得在拿破仑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其祖父生命最后一段日子的生活情况，他说，他祖父躺在床上，尽管隔着厚厚的窗帘依然能看到南边太阳的光辉和外面的金合欢花丛。他微笑了，以为自己身在尼斯<sup>①</sup>正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中，并没料到自己会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死在俄国，而他所见到的阳光，乃是他女儿在窗帘后面装上的一只电灯，以为他制造出那种温柔的幻境……

我知道，完全按照我的路线参观，夏洛特可以看到巴黎的一切。把电灯架在窗帘后面是骗不了她的。我能看到，在某些现代雕塑面前，她向我投过来的那飞快的、难以形容的一瞥。

---

<sup>①</sup> 尼斯：法国的一个城市，在巴黎东南方。



我也能听到她那充满幽默的评论，且非常机敏。对于我原曾想让她避开的那些地方，比如那个老区和我的住处，她也都去了……那是她在没有我的陪同下，一个人去的。她是到爱尔米塔奇大街上寻找一栋房子，那里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住过一位战士，就是那个曾亲手交给她一块弹片的那个，在我们还是孩子时，把那个弹片称为“维尔顿”……

我还知道，我应该竭尽所能，不要提起那些书的事。但我们却照提不误，而且还谈得很多，有时甚至谈到深夜。因为法兰西之所以有一天能在沙朗札的大草原上出现，应该归功于那些书。是的，那原是一个书籍的国度，一个由文字组成的国家，在那里，江河的流淌恰如诗句的流淌，在那里，女人的眼泪就是十二音节诗，男人之间的冲突，也用行吟诗人的讽谕诗来表现。在孩提时，我们就是这样发现的法兰西。透过它的文学生活，可以看出，它的口头文学是十四行诗的模式，并由作者做过精心的推敲。我们家族中所讲的那些神话故事足以说明，在夏洛特所有的旅行中，她都随身带有一本封面破旧，有烫金切口的神话小册子。那可做为她同法兰西的最后一条连接的纽带。也或许是始终随她在一起的一种魔法。“这是一只歌曲，我为它献出了……”有多少次在旷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冰雪原野上，这些诗句变成了“上砖下石的一座城堡……它那门窗的玻璃已被夕阳染红”<sup>①</sup>，对我们来说，法兰西就是一个同它的文学相结合的一个混合体。而真正的文学，就是这种魔法，它的一个词，一行诗，乃至一个段落，都能把我们带入美的一个永恒的瞬间。

我很想对夏洛特说，这种文学在法兰西已经寿终正寝了。

---

① 这是引用的前文录出的一首诗中的两句。

而自从我隐居起来当了作家之后，大量阅读的当代出版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书籍，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本可以使人回忆起在西伯利亚的木屋中她双手捧读的那种书。是的，一本书已然翻开，但她的眼中却闪烁着一点泪花……

在想象中同夏洛特谈话时，我又变成了一个少年。我的青年多数派主义理论，在生活的事实面前早已偃旗息鼓，如今又复活了。我在重新寻求一个十全十美的，独特的作品，我梦想能够有一本书，它以它的美来重塑一个世界。这时我又听到外祖母回答我的声音，她依然那么善解人意，而且面带微笑，像以前在沙朗札的凉台上一样：

“你还记得在俄国时那个被书籍压塌了的小房子吗？不错，那些书堆在床下，放在厨房里，堆在进门的过道里，甚至一堆堆到天花板。还有一些难以见到的书，你在别人那里借来，只能读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六点整就要还回去。还有一些书得用打字机打出来，同时还得用六页复写纸抄出一式七份来。传到你手上的是第七份，那字迹几乎是看不清了。大家叫它是‘盲文’……你看，那简直是没法比的。在俄国，作家就是一个偶像，大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不是把他踩在脚下，就是把他捧到天上。你在那边曾听说过一本书的价格吗？没有，因为在那边，书根本就没有价格！你可以在冬天里不买鞋子，任凭自己的双脚冻坏，但你却一定要买书……”

夏洛特谈到这里便停了下来，似乎意在让我明白，在俄国，这种对书的崇拜，现在也已只成了一个回忆而已。

“那么，我这本独特的书，这本十全十美的书，也会被踩到地下和捧到天上吗？”我这个刚变成的少年这么惊讶地感叹。

这种不安的低语，把我从想象的讨论中拉了出来。我感到羞愧，正像一个人正在谈论另一个人时，却被另一个人当场听

到一样，我已看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一个在小黑屋子里指手划脚的男人。一面黑黑的窗户开在一堵砖墙上，它既不需要窗帘也不需要窗护板。一个用三步就可以走到头的房间，里面的家具由于没有地方摆，便叠床架屋地一个个擦起来，堆在一起。诸如旧打字机、电炉子、椅子、搁板、沐浴器、饭桌等等都这么堆起来，还有像幽灵一样挂在墙上的衣服。另外，到处都是复写纸，不用的草稿纸，和一些书籍，这一切使这个乱七八糟的小屋子内部便很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疯狂的景象。在这个细雨纷纷的冬夜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玻璃窗的后面，是一片迷宫般破旧的房屋，响着一只阿拉伯乐曲，时而如泣如诉，时而似颠似狂。这个男人身穿一件浅色旧大衣（当时天气非常之冷）手上戴着露出五指的手套。在这个冰冷的屋子里，操作打字机，这种手套是必要的。只见他正在同一个女人讲话。他同她讲话时表现得非常信赖，那语调，就是知己朋友之间也不经常如此。他在问她关于那部独特的，十全十美的作品问题，丝毫不怕自己表现得天真可笑。她将对此做出回答……

在入睡前，我想，夏洛特来到法国，想尽量了解法兰西文学现在已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她在西伯利亚时有几本老书向她介绍的，只是诺大法兰西领土上的几个小岛。我又想，在一天晚上，当我走进她居住的房间时，我会发现在桌子边上，或者在窗台上，会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一本最近出版的书，夏洛特正背着我在读它。我于是俯首往书上看去，眼光便落在下面这几行上：

这的确是那个冬天最暖和的一个早晨。天上的太阳照着，像四月初的天气。冰霜融化了，湿润的青草闪着光，像沾上一层晨露……在利用我这唯一的清晨时光，在冬日的阴云下，带

着日益增长的忧郁，带着幻觉，我回想了一千百件事情后，却忘了这所旧花园，和这一片葡萄树，就在它的树荫下，我的命运被决定了……保留着这个美好的生活形象，正是我乐于做的。这个国家的整洁，它的透明度，它的深刻，同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光明，奇迹般的相会，这一切是我获得的唯一认识，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这种永远的和谐，并非虚幻，它是实在的，在它面前，我感到了话语的必要……



## 四

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妻，在婚礼的前夜，还加上前来帮助在新房里安置家具的人们，他们应该能感觉到同那种单调生活告别的愉快心情。那几天欢乐的节日气氛，或者搬入新房后那种喜气洋洋的混乱，使这些人觉得这种气氛在一直持续着，并且已变成了他们生活中轻松的和闪光的一种因素。

我便陶醉在我等待的最后几个星期之中。我离开了我那间小屋子，租了一个套房，我知道，我只能付四至五个月的房租，这对我来说问题不算大。从夏洛特将要住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可以看到一大片蓝灰相间的屋顶，在四月的蓝天下闪光……能借贷的我尽量借贷。我买家具、买窗帘，还买了一块地毯，而所有一切乱糟糟的家具，一概从我的老房子里搬走。于是我那间房子就显得空荡荡的，我晚上就睡在一个床垫上。现在，只有外祖母的那间未来的房间看起来还像个住人的屋子。

随着五月份的愈来愈近，那种欢快的意识行为，那种疯狂地乱花钱现象也便愈演愈烈。我开始在旧货商那里买一些小古董了，按我的想法，我认为它们可以给这间外表过于普通的房子增添一些活力。在一家古董商店里我看到一座台灯，老板把灯打开给我做演示。我想象着夏洛特的面孔，在这个灯罩的光照下该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不买这盏灯我就不想离开这家商店了。我还在书架上插满了皮书脊的老式图书，以及本世纪初

的一些画报。每天晚上，在这间屋子中央的那张圆桌上，我都展示一下我的战利品，它们是：半打酒杯、一个老式折迭式皮包、一迭旧名信片……

尽管我经常对自己说，夏洛特绝不想离开沙朗札，特别是不能长时间离开费奥多尔的坟墓，而且把她安排在一家旅馆里住，同安排在这样的临时布置的博物馆里，她都会同样开心的。但这些想法都没有用，我照样继续买东西，照样继续布置房间。尽管人们对记忆魔法非常熟悉，对再现一个已失去的瞬间的做法也很熟悉，但他们依然停留在对往昔的物质崇拜阶段上，这就如一个魔术师，尽管他秉承上帝的意志，获得了表演奇异魔术的能力，但他还是更喜欢自己那双灵活的手和那只双层底的魔术袋，因为它们的长处在于能尽量保持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而真正的魔术，我知道，它将在这个浅蓝色的屋顶下显示出来，而当夏洛特来到巴黎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当她打开窗户时，会在窗户后面那些轻巧的线条上表现出来，也会在大街的某个地方当她同某人谈话时，她讲第一句法语时响亮的声音中显示出来……

在我等待的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竟惊异于自己做起祈祷来……不，这并不是一个形式完美的、应做的祈祷。因为我是在一个战斗者的无神论的抚养下长大的，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几乎可以说始终不渝地同上帝做斗争。因此我从未学过什么祈祷。这倒不如说由于自己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犯罪活动，便匆忙想办法来自嘲。我想，鉴于我过去不信宗教，我就可以像伏尔泰<sup>①</sup>小说中那个水手那样大声呼喊：“我四次到日本，

---

<sup>①</sup>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

四次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上走过！”我自视是一个异教徒，偶像崇拜者。但这种自嘲，却并不能阻止连我自己都听到的我内心深处那种模糊的自语，那语调颇带点儿孩子气，好像我在向一个不知其名的交谈者进行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我只能再活二十年了，甚至也许是十五年，好吧，算了，就算再活十年吧，这对我都无所谓，只要这次能够相会，只要能找回那些永恒的瞬间就行了……”

我站起身来，把隔壁房间的门推开。在半明半暗的春夜，那间屋子依然没有入睡，还在很有精神地悄悄等待着。甚至那只老电风扇，尽管才买了两天，也好像在那个矮桌上放了好几年一般，在等待着。

那是很幸福的一天。是那种懒洋洋、醉醺醺，又迷迷糊糊的，好像总是过节一样的五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在门道里往墙上钉了一个大衣帽钩，那上面至少可以挂十几件衣服。至于到了夏天，还需不需要它，我连想都不想。

夏洛特屋子的那个窗户正开着，这个时候在一片片银白色的屋顶中间，可以看到春天里第一片新绿了。

上午，我又在我的《传记》中加了一段。因为我又想起了，有一天，在沙朗札，夏洛特向我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她在巴黎的生活。她对我说，这种战后的局势，还没有人能够猜测得出来，已经变为两次战争间隙的局面了。在某些方面，那气氛已经变得非常虚假了。一个虚假的欢乐，而且大家都显得非常健忘。这就使她想起了在战争时期，她在报纸上读的那些文章：“不需用煤取暖了！”同时还有人介绍怎样利用“纸团”取暖。还有：“家庭主妇们不要用热水洗衣服了！”甚至还有：“主妇们，节约一些吧；燉牛肉汤不要用大火了！”……这

时夏洛特便想，待她把阿尔贝蒂娜送到巴黎之后，再返回西伯利亚，这样她们两个在战前都可再见到巴黎……

在写上面那几行的时候，我想，过不了多久，便可以向夏洛特随心所欲地提各种问题了，也可以具体了解许多细小的情节，比如要了解一下，在我们家庭的相册中，有一张上面有一个穿燕尾服的人，这位先生是谁？为什么这些照片中有一半都被仔细地剪断？那位穿棉袄的女人是誰？她处在那么多“美好时代”中的人物中间，曾让我感到很惊讶。

待到傍晚时分，我出门时，便在我的信箱内发现了一封信。信封是奶油色的，上面印有巴黎警察局的地址。我站在人行道上，花了好长时间还没打开它，最后还是笨拙地把它撕开了……

对信的内容，我的双眼比我的头脑明白得更快，特别是遇到关于头脑不愿意明白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在这踌躇不决的瞬间，我的眼光想把那无情的字词的链锁打碎，好像这样就可以在思想上想抓住信上讲的内容之前，能把内容改变了似的。

那些字母在我眼前直跳，那些词句，就像弹片一样刺穿我的心。随后那个重要的词汇，用粗体字，间隔很宽地像有节奏般沉重地压在我心上：**不予受理**。那些解释性的文字便随着我头上血管突突的跳动，出现在我眼前：“您的情况不适合……”“的确，您并没有全部汇集……”我站在那里至少有一刻钟，一动不动，两眼直盯着那封信。终于，我开始向前走了，但却忘了我应该去哪里。

当时我还没想到夏洛特，在这头几分钟使我不舒服的，是想起了在医生那里检查身体时的情形。是的，那种荒唐的双手触地的弯腰，以及我的那种热情，现在显得双倍的没有必要而且感到羞耻。



直到往回走时，我才真正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把上衣挂在衣帽钩上。再往里走，那扇门的后边，就是夏洛特的房间……这并不是时间问题，不是它夭折了我的计划，使我的打算落空的，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官员，是他把那几句话打在一页纸上的那个决定，是那个我从来也不认识的男人，他之认识我也只是因为他曾拐弯抹角地向我提了那些问题。应该感谢他，正是由于他，我才学会了作祈祷……

第二天，我上交了一份申请书，一份“措辞优美的上诉书”，这是收到我的信的人的说法。但我还从未写过这样违心的信件，从没有像信中那样愚蠢，既傲慢同时又低三下四。

我不再一天天地数日子了，而是按月数，这个月是六月，马上就是七月。那间房子我也用来堆满了旧物品，同时也堆满了往昔的情怀。这个展览馆如今已改变了用途，我也就成了它失了业的馆长了。因为我所等待的她不能来了。至于那份《传记》，自从我的申请遭到拒绝后，便再也没写过一个字。我知道，即使是我写的这些手稿，其气质也取决于我们这次的相聚。

在这几个月里，经常是半夜里被同一个梦惊醒，即：一个身穿深色长大衣的女性，在一个寂静的冬天早晨，来到边境一个小城市里。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字游戏。即，你可以选择一个表示极端的形容词，比如“讨厌极了”这个词，然后，再选一个和它的意义极其相近但程度却相对轻一些的一个词，比如“真讨厌”。而下面的这个词义，又比上面的词义有了相对的削弱“够讨厌的”，于是以此类推，后面出的每一个词都在程度上有微小的

减弱，可以选出：“叫人受不了的”、“难以忍受的”、“使人不快的”……最后的那个词可以用“坏的”表示的，在这之前还有一些词其顺序是：“勉强的”“中等的”“说得过去的”开始“上坡”时，可用“不错的”，“差强人意的”，“令人满意的”，“很得体的”，“讨喜的”，“很好的”。然后再加上十来个词之后，就可以达到“出众的”“了不起的”。最后是“登峰造极的”。

八月初，我得到的来自沙朗札的消息，其模式的变化，就和上面的词汇变化相似。因为一开始时通过阿莱克斯·崩传递的消息（他把他在莫斯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夏洛特）和随消息一起到的包裹，要在路上走很长时间，而且还要转好几个人的手。而且每转一次手，那内容的严重程度和感情色彩就大大削弱一次。比如当一位陌生人在电话里说下面那段话时，那口气简直可以说非常快活：

“请您注意，在那边有人转给我一个小包，是给您。是谁给您的呢……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总之是您的一位亲属，她已经死了……死在俄国了。您肯定已经得到了通知。对了，她已经把给您的遗嘱传给您了，嘿嘿……”

他原本想开玩笑地说：“把留给您的遗产……”但由于出了错，出现了这种口误，这种口误特别在那些“新一代俄国人”身上，我经常听到，因为英语已成了他们的主要外语，所以便把“遗产”说成了“遗嘱”。

我在巴黎一家最好的旅馆的门厅里等待此人，等了好长时间。那些冰冷的大镜子里空无一人，两边的扶手椅也空空的，这种空旷恰好同我满目的虚无，满脑子的空虚相适应。

那位不认识的朋友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走在他前边的是一位棕发女郎，她身材修长、光彩照人，她脸上的笑容似在和所

有的人打招呼，但却和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在他们俩身后紧跟着——一位肩膀很宽的男人。

“瓦尔·格里，”那位不认识的朋友一边紧紧和我握手，一边这样自我介绍。同时又把他的两位同伴介绍给我，并补充说：

“她是我随时都可能飞走的翻译，他是我忠实的贴身保镖。”

我晓得，被邀请去酒吧间是不可避免的了。听瓦尔·格里讲话，实在就是对他表示感谢的一种回报方式。要好好地大吃一顿，并且好好享受一下这家旅馆的安适，他需要有我来陪着他。他还需要我欣赏一下他这个“跨国商人”的新头衔和他那个“随时都可以飞走的翻译”的美貌。他同我谈他的成功，谈俄国的破产，可能并没想到这两个话题之间却有着一个奇特的因果关系。他那位翻译肯定不止一次地听过这种讲话了，所以她尽管眼睛还睁着，却和睡着了一样。那位贴身保镖，像证实他向我所介绍那样，对进来和出去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注意观察。这时我突然想：“如果要解释一下，我从火星人身上的感受到的和从他们三个人身上所感受到的，该是很容易的吧……”

我在地铁的列车上把外祖母带来的小包打开。只见一张阿莱克斯·崩的名片落在地上。上面写的几句话无非是表示哀悼之意，并为不能亲自把这个小包交给我表示歉意。我特别注意的，是夏洛特去世的日期。那是去年9月9日！

下面那几站是怎么走的，我已不晓得了，只是到了终点站我才清醒过来。去年九月份……但在一年以前的八月份阿莱克斯·崩不是还到沙朗札吗。几个星期以后，我就放弃了申请入籍的事了。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夏洛特便去世了。这么说，

我所有的一切活动、我的打算，还有那几个月的等待，那都是在她去世以后的事，并且已经与她的生命无关，而且与她已逝的生命没有任何联系了……那个小包是由邻居保存下来的，随后，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转给了崩。在一张牛皮纸上，有几句话是夏洛特亲手写的：“我请你把这个包裹设法送到阿列克塞·班达尔后克手中，他必然会把它转给我的外孙。”

我在地铁终点站又上了车。在打开包裹时，我感到一阵痛苦的宽慰，打破我计划的，归根到底，并不是那个官员的决定。而是时光，是颇具讽刺挖苦味道的光，通过它对事物的参与作用，和它的不协调性，这个时光使我们想到它那种无保留的权力。

小包里，除了二十几页用别针别在一起的手稿外，别无它物。我想，可能是一封诀别信，但我不懂何以会写得那么长，因为我晓得，夏洛特索性不善那种严肃而正式的套语，也不善废话连篇地发表议论。由于我不打算连续把它读完，便看了看头几页，根本没有发现有类似：“当你读着我这些文字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等等的套语，而我也恰恰怕听到这样的话。

另外，这封信在开头时，好像不是对任何人写的。我飞快地一行行、一段段地看了一下，方始明白，信中所写，是同我们在沙朗札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故事。同我们的法兰西——阿特朗蒂德和她这样一个使我急着猜测的结局没有任何关系。

我走出地铁，并无意立即转车回去，便找了一个小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来，继续漫不经心地读那封信。至此，我方始了解，夏洛特所讲的这些，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她以秀丽、工整的字体，记录了一个女人的生活。由于我的粗心，可能把外祖母讲述她们如何相识的那一段在阅读时漏丢了。不过对我来



说，关系也不大。因为她所讲的这段往事，只不过叙述了一个女人的命运，在斯大林时代的诸多悲惨的命运中的一个。这在我们年轻时曾使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但时至今日，那种切肤之痛早已淡漠了。这位女性，她是一位名叫库拉克的男人的女儿。她还在孩提时，便流亡到西伯利亚西部的沼泽地区。随后，在二战以后被指控为进行“反集体农庄宣传”，于是便被关在一座集中营里……我浏览着这些记述，就像看一本曾熟记在心的书一样。这座集中营；那些犯人们砍伐的雪松，它们深深地埋在雪里，一直到树干；他们日常受到的凶残待遇；看守人员的庸俗不堪；以及疾病和死亡等，我都很熟悉。在那里边女犯人还要被强行做爱，否则便以枪口相威胁，或者课以惨无人道的劳役。而且只要用一瓶白酒作交换，也便可以和女犯人睡一次……这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便可以免除她的各种劳役。并在这座“女犯集中营”里，还单设一些专为这些生了孩子的妇女们用的房子。但就在解冻的大赦前几个月，这个女人被一架拖拉机轧死了，当时孩子才刚刚两岁半……

下雨了，我只好从长凳上站起来，把夏洛特的信掩在衣服底下，便向我们的住处跑去。这个没看完的故事，我觉得很有典型意义；自由化以后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开始把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从前那些犯禁的东西，都拿出来公诸于众。但他们不知道历史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小恩小怨的文章，只要有一部宏篇巨制，堪称经典之作，也就够了。夏洛特给我寄这些见证材料来，她很可能也和别人一样，陶醉在言论自由的舆论中，其实是上了当的。她寄的这个材料，既感人又无用，很使我不舒服。于是我再一次对时光的那种倨傲的无动于衷进行了掂量。这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女人和她的孩子，正在

最终将被遗忘的小船上摇晃，也只能在这几页手稿上留下一点痕迹。夏洛特也会是这个命运吗？

我把房门推开，一股冷风把敞着的窗户吹得劈啪作响。我便走到外祖母房间把它关上了……

我回忆着她的一生。她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截然不同的时代：在世纪之初，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时代，那个时代几乎同拿破仑的统治具有同样的传奇性。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之末，那么多次的革命，那么多的战争，空想的乌托邦失败了，使人战栗的恐怖成功了。她在其痛苦和欢乐的生活中，从这些杂乱纷纭之中，提取了精华。而这种浓浓的、动人心弦的体验，不久也将在被遗忘中黯然失色。和那个微不足道的女犯人和她的孩子一样。

我在夏洛特房间的窗下站了一会儿，几个星期以来，我所想象的她的视线应该落在我这里……

晚上，毋宁说为了使自己问心无愧，我便决定把夏洛特的信从头到尾完整地读一遍。我又看到了那个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女人，看到了集中营里管理人员的残暴，也看到了那个出生的孩子给这个残忍的世界带来了某些短时间的安宁……夏洛特写道，她曾经得到准许到那个女人死去的那个医院里去看望一下……

突然，我手上拿的这一页纸，一下子变成了很厚的一页银片。是的，那金属发出来的光直照我的双眼，又似发出一种冰冷的，尖细的声音。有一行字突然一亮，就像灯泡里的钨丝发的光直刺你的眼睛一样。原来这封信是用俄文写的，唯独到了这一行，夏洛特却改成用法文写了，好像要表达这一行的意思，她对自己的俄语没有把握似的，又好像用法文，她的法文乃是上一个时代的法文，可以面对她下面要向我说的这句话，

能使我有某种程度的解脱一般：

“这个女人名叫玛丽娅·斯特潘诺芙娜·多丽娜，她就是你母亲。就是她，决定尽量什么也不对你讲，而且时间愈久愈好……”

在最后一页上还夹着一个小信封，我便打开来了。里面是一张照片。我毫不费力地便认出来了：那个头戴一顶两个护耳下垂的棉帽，身穿棉袄的女人。在衣服扣子旁边，缝着一块长方形的白布，那是她的监狱号。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外面裹着一方毛毯……

夜间，在我的头脑中又出现了那个景象，那个我一直相信是在我出生前的一种模糊景象，它自我的法兰西祖先那边向我走来。我为此感到骄傲，并从中看到了我是法兰西后裔的证据。那个景象便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在一个森林的边上，空气特别新鲜，一位用眼睛看不见的女性，及一片蛛丝，在这一片光明的空间飘动着……现在我明白了，那片森林实际上就是泰加森林，那个迷人的圣马力诺的夏季也将消失在一年有九个月的西伯利亚的严冬中。而那一片光灿灿的纤细的蛛丝，在我法兰西的幻境中也只不过是几道新的带刺的铁丝网，只不过还没生锈罢了。我同母亲正在那座“女犯集中营”的土地上散步……这是我童年时的第一个回忆。

两天以后，我便离开了这所房子。房东在头一天就来了，以两厢情愿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我把这几个月来积累的所有家具和物品都给他留下……

我睡眠很少。清晨四点便已起床，并整理好背包，打算当天就离开这儿，像我惯常做的那样以步代车。在离开之前，我向夏洛特的房间最后看了一眼。在清晨灰暗的光线下，它静悄

悄的已不再使人想到它是个展览馆了。是的，它不再像一个无人住过的房间了。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一本放在窗台上的旧书，转身便走了。

街上静悄悄的，还沉浸在睡意朦胧中。它的景色似乎随着我向它走去在变化着。

我想到了放在背包里的《传记》。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要把昨天夜里想起来的那一段写进去。那是在沙朗札的事，在外祖母那儿过最后那个夏天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到大草原去，我们并没有走那条直通那儿的小路，而是夏洛特把我领到一个树林里，那里面到处是战时留下来的器材，当地居民称这儿为“斯大林防线”。我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据传，在斯大林防线的灌木丛中。很可能会踩上一颗地雷……夏洛特来到林中一块宽阔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并低声说：“瞧！”这时我看到有三四棵长得一样的，和膝盖一般高的枝条。叶子很大也很好看，它们的卷须缠绕在几条插在地下的细木棍上。这是些小木槭树吗？是小黑茶藨子树吗？我真不明白夏洛特何以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喜悦。

“这是一种葡萄树，真正的葡萄树。”她终于告诉了我。

“啊，是的……”

她告诉了我，也并没有引起我的好奇心。在我的头脑中，并没有把这种不显眼的植物同外祖母的祖国愿意为之献上一杯美酒的那种崇拜心情联系起来。在斯大林防线的中心，站在夏洛特秘密种植的这些小树前，我们停留了几分钟……

在想到这些葡萄树时，我感到一种几乎承受不了的痛苦，与此同时，也感到一种由衷的欢喜。这种欢喜，首先使我感到羞愧。夏洛特去世了，根据阿莱克斯·崩的说法，在斯大林防线那个地方建造了一个体育场，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再也找不到



她就此一去不回的、切实可靠的证据了。但最终还是欢喜占了上风，因为在这片林间空地上，在那个她曾经历过的瞬间里，在这大草原上寒风的呼啸中，在这位站在四棵矮丛树中女性的脸上表现出来的安详和宁静中，我看出了，她在那里应该是源远流长的。而那四棵小树，我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幼小的总状花序。

我一面走，一面不时地端详着那个穿棉袄的女性的照片。自此，我方始明白，何以她的相貌会同我寄居的家庭相册上的那些人有些朦胧的相似，那原因就在于，照片上那种轻轻的微笑，亦即是因为夏洛特所发明的神奇的魔法——“petite pomme”所致！是的，那个在集中营大围墙旁边照相的女人，可能心里也在发着那几个神秘莫测的音节……我突然站住了。很注意地看着她的双眼，心中暗自思忖：“今后我必须使自己思想上适应，这个比我还年轻的女人，她就是我母亲。”

随后便把这张照片放好，又重新迈步前行。当我想起夏洛特来时，似乎她又明白无误地、不引人注目地，而且很自然地出现在这似睡非睡的大街上，甚至将永生。唯一的缺陷是，我依然找不出适当的词汇加以表达。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法兰西遗嘱

作者 = ( 法 ) 安德烈 · 马奇诺著      王殿忠译

页数 = 2 8 7

S S 号 = 1 1 1 9 4 9 9 0

出版日期 = 1 9 9 8 年 1 0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